

·父辈丛书·

父亲留下的遗产是可以使我与广大民众共享的思想，而没有半点儿的家私。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女儿。

——李敏



我的父亲毛泽东

李
敏
／
著

我的父亲毛泽东

李敏 著
王桂苡 执笔

· 父辈丛书 ·

父亲留下的遗产是可以使我与广大民众共享的思想，而没有半点儿的家私。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女儿。

——李敏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父亲毛泽东/李敏著;王桂苡执笔. -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10

(父辈丛书)

ISBN 7-205-03878-2

I. 我… II. ①李 ②王… III. 毛泽东 - 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3640 号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20 千字 印张:13³/₄ 插页:14

印数:39,001-59,000 册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4 次印刷

责任编辑:赵 炬

责任校对:侯俊华

封面设计:杨 勇

版式设计:王珏菲

定价:24.80 元

序 语

江泽民总书记在韶山参观毛泽东纪念馆后指出：“毛主席对子女要求很严、对全党干部子弟也是很大教育。要宣传毛主席是怎样教育子女的。在这方面，我们后代人都要像毛主席那样，对子女要求严格。”



◀ 我的母亲贺子珍（左一）与
我的姨妈贺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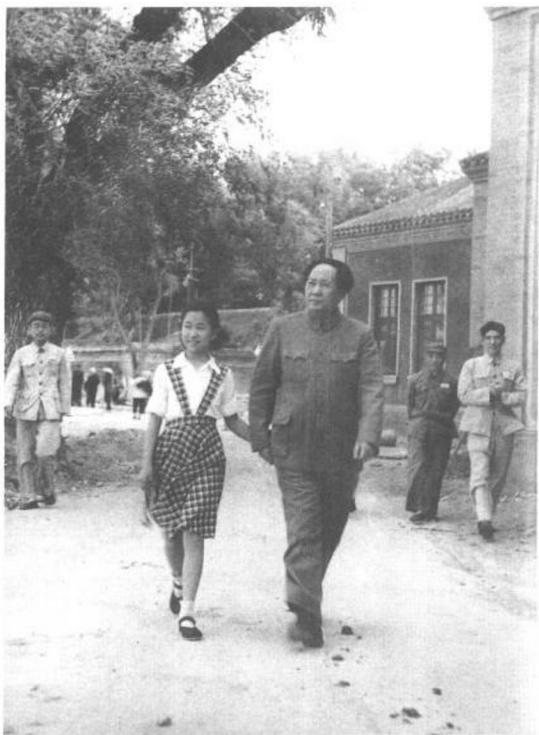
▶ 1949年7月，父亲与我在香山。



▲ 1949年7月，父亲与我及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一起看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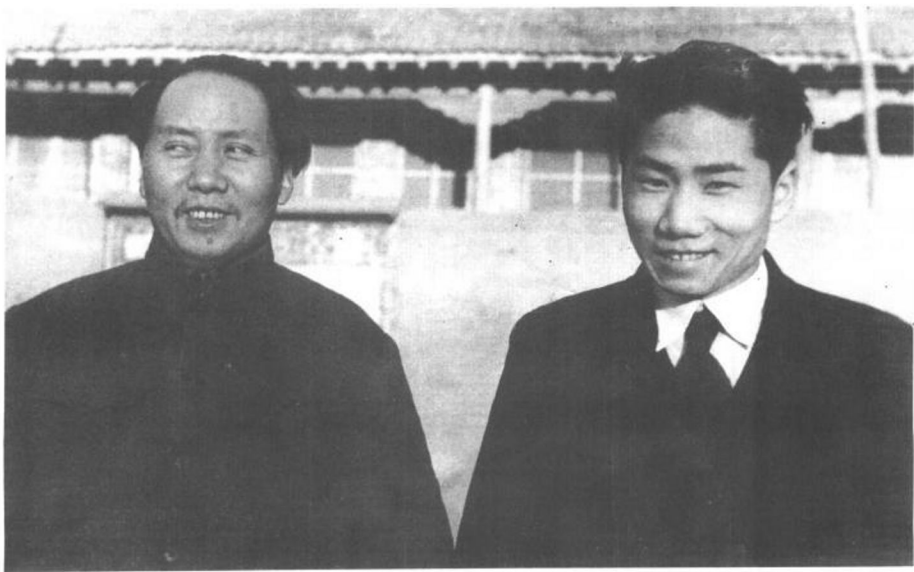


◀ 1946年，父亲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教我的妹妹李讷识字。



◀ 1951年，父亲与我的
妹妹李讷在中南海散步。

▼ 1946年，我的父亲毛泽东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我大哥毛岸英合影。





◀ 1949年，父亲毛泽东与我大哥毛岸英在北平香山。

▼ 1951年，父亲同我、妹妹李讷等在香山。





▲ 1951年6月5日，父亲带我在中南海划船。

▼ 1951年夏，父亲同我在香山看照片。





◀ 1951年7月，父亲与我妹妹李讷在北京香山寺。

▼ 1953年1月4日，父亲来看我和妹妹李讷学滑冰。





◀ 1953年4月12日，父亲与我在中南海瀛台。



▶ 1953年4月12日，父亲带我到中南海看古碑文。



◀▼ 1953年5月30日，父亲与我、李讷、刘松林及身边工作人员在北京玉泉山。





▲ 1954年7月，父亲与我及身边工作人员在北戴河。

▼ 1954年7月，父亲与我、刘松林在北戴河海边。





◀ 1960年7月，父亲与我妹妹李讷在北戴河海边。



▶ 1960年4月，父亲带我参观工业展览。



▲ 1959年8月28日，我与孔令华结婚时的合影。

注：父亲毛泽东（右五）、公公孔从洲（左五）、王季范（右三）、蔡畅（左三）、邓颖超（左二）。



► 1963年12月26日，父亲与我和孔令华在中南海住址。



◀ 1963年12月26日，父亲同我、孔令华、王海容（左二）、毛远志（左一）在中南海住地合影。



▶ 1961年2月23日，父亲与我在中南海住地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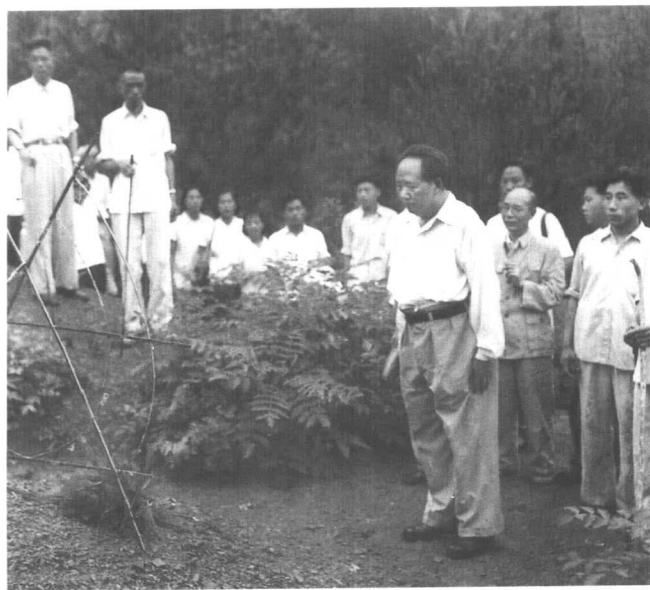
▲ 1961年2月23日, 父亲与我及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中南海住地合影。

▼ 1962年春, 父亲与我二哥毛岸青及张少林、刘松林、邵华、杨茂之在中南海住地交谈。





▲ 1959年6月25日，父亲在故乡韶山与乡亲们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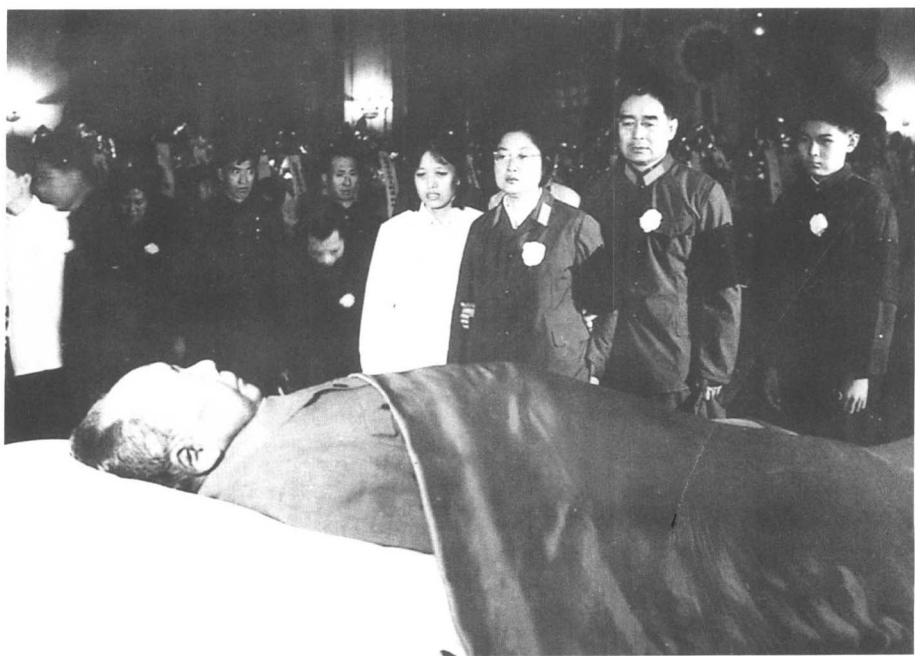


► 1959年6月26日，父亲在故乡韶山到其父母坟墓前，献上松柏枝，行礼致敬。



▲ 1976年9月，我慈爱的父亲逝世，令我万分悲痛。

▼ 我与孔令华率子在父亲的遗体前默哀。





◀ 我和孔令华同我的公公孔从洲（左二）、婆婆钱俭（左一）在家中悼念我的父亲毛泽东。



▶ 我的母亲贺子珍同我和孔令华来到纪念堂我父亲的座像前悼念。



◀ 我与妹妹李讷（左）

▼ 我与我的朋友王桂苒



献给我的父亲毛泽东

“父辈丛书”编委会

主 任：任慧英

副主任：阎景堂 陈志强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任慧英 李定国 陈志强

赵 炬 索世晖 阎景堂

目 录

序 语

第一章 (1)

○我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 (1)

○爸爸送我去找妈妈 (9)

○在苏联，我与妈妈相会 (12)

○二哥岸青指着毛泽东像说：他是我们的爸爸 (20)

○我给毛主席写信问：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 (31)

第二章 (42)

○爸爸问：娇娃，是哪个说江青要打你 (42)

○爸爸说：我的娇娃就姓李，单字敏 (52)

○江青回来了，一进家门，就主动地

● 目 录

上前搂住我	(58)
○没想到爸爸问我：你为什么要入党	(60)
○叶子龙叔叔交给任务：一定要拉爸 爸去跳舞	(66)
○爸爸说：蒋介石这个人很坏，外国 人想要他，我们还不给哩	(72)
○爸爸讲“王八为什么驮石碑”	(74)
第三章	(78)
○爸爸和他的儿子岸英、岸青	(78)
○爸爸和他的女儿	(88)
○爸爸和我的远志姐姐	(98)
○爸爸带我们学滑冰	(100)
○爸爸的家教真严	(107)
○爸爸告诫：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 女儿	(112)
○爸爸提出：娇娃，你来帮助爸爸管 理这个家好吗	(117)
第四章	(120)
○我的爸爸是农民的儿子	(120)
○我的二叔、三叔及姑姑	(140)
○我的杨开慧妈妈	(167)

○我的楚雄哥哥和岸英哥哥	(173)
--------------------	-------

第五章 (181)

○永新一枝花——我的妈妈贺子珍	(181)
-----------------------	-------

○我的爸爸毛泽东与我的妈妈贺子珍 相识在井冈山	(192)
----------------------------------	-------

○袁文才当媒人，想把毛泽东拴住	(196)
-----------------------	-------

○爸爸和妈妈在战火中的爱情	(201)
---------------------	-------

○遵义会议结束，爸爸笑着对妈妈说： 今后有发言权了	(207)
------------------------------------	-------

○我的爸爸毛泽东和我的妈妈贺子珍 风雨同舟、相依相随了整整十年	(214)
--	-------

第六章 (222)

○我的爸爸毛泽东对我的妈妈贺子珍 的追忆	(222)
-------------------------------	-------

○爸爸和妈妈婚姻悲剧的根源	(231)
---------------------	-------

○爸爸和妈妈的庐山相会	(236)
-------------------	-------

○庐山相会后，妈妈大病一场	(243)
---------------------	-------

○爸爸说：江青嫌我是土包子，她同 你妈妈完全不同	(255)
-----------------------------------	-------

第七章 (260)

● 目 录

○一张照片引起的风波	(260)
○一幅“西瓜画”引来的风波	(262)
○“后妈”问题引来的风波	(268)
○爸爸为我主持婚礼	(270)
○婚后我们生活在爸爸身边	(282)
○我们被迫搬出中南海	(292)
 第八章	 (311)
○爸爸的独立生活观	(311)
○心系人民的爸爸	(319)
○风趣而真诚的爸爸	(322)
○爸爸的读书生活	(329)
○爸爸的简朴生活	(333)
○富于同情心的爸爸	(347)
○乐于慷慨助人的爸爸	(354)
 第九章	 (358)
○我参军当上了参谋	(358)
○“文化大革命”，我成了“保皇派”	(363)
○我们戴了高帽，挨了批判，爸爸却 乐呵呵地说：经风雨见世面嘛	(368)
○中央领导关心着我	(373)

第十章	(381)
○爸爸面对社会主义这个全新的课题	(381)
○爸爸的生日清冷寂寞	(389)
○爸爸与江青之间	(393)
○爸爸悲凉地说：娇娃，你为什么不 常来看我	(402)
○爸爸走了，他走的时候， 身边竟没有一个子女	(412)
结 语	(426)

第一章

- 我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
- 爸爸送我去找妈妈
- 在苏联，我与妈妈相会
- 二哥岸青指着毛泽东像说：他是我们的爸爸
- 我给毛主席写信问：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

■ 我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

我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这个名字是后起的，我的小名叫娇娇，大名曾叫毛娇娇、贺娇娇。

在说我父亲之前，我想先说说我自己。

我是1937年，在陕北保安县出生的。关于我

的生日，又有许多种说法。有人说，我是 1936 年 8 月（农历）出生的；有人说，我是 1936 年的冬季出生的；我爸爸说我是 1937 年初出生的。妈妈也这样说。

其实，生日对我这个普通百姓来讲，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日子。清楚与不清楚，也无关大局。反正我该来的那天，也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这就行了。虽然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少有不知道自己生日的，但是，在我出生的年代里，爸爸、妈妈正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奋斗，孩子带来的欢乐他们不可能充分地享受，更何况，我和黄土高原上所有的孩子一样，出生了，不过是一个小生命，生日，并不重要，对于毛泽东的女儿来说，更不重要。因为，对于爸爸来说，他期待的是一个民族新生的日子。

1935 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的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跋山涉水，终于胜利到达陕北。

1936 年秋，毛泽东——我的爸爸，率红军东征后，来到妈妈已先到达的保安县。

保安县，是个小县城，全城人口还不足四百。这儿人口不多，房屋也就不多，再加上黄土地的贫瘠，想找一孔好的窑洞住，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的父亲毛泽东和母亲贺子珍就住在保安县小

石山的一孔破烂不堪的窑洞里。窑洞光破还不说，里边黑洞洞的，洞顶上还时不时地往下滴水，里面格外潮湿。

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很幸运，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接生了我。我该称她为同妈妈或刘妈妈。

当年，她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妈妈的身边，精心地照料、护理着妈妈，用她那细致、娴熟的动作，以一颗慈母般的爱心，将我这瘦小的身躯接到这个世界上。

我的第一声啼哭，是从她的双手上托着的小身躯里发出来的。她为我洗干净身子，包裹好，又重新双手托着我，仔细地端详了一下我的长相。大概她是想判定一下，我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吧！看了一会儿，她笑吟吟地把我放在了妈妈的身边。

后来，刘妈妈谈起当年时，她这样说：

1936年5月5日，东征胜利回师后，中央和毛主席由瓦窑堡来到保安县。毛主席住在城内炮楼山下的窑洞里。我们住在离他不远的北山坡上。

那年，冬季的一天早上，毛主席的警

卫员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对我说：“快！快！贺子珍要生孩子啦，毛主席叫你快去。”我赶紧拿上前些日子就准备好的小被子、小衣服跑到毛主席住的地方。老远，我就听见贺子珍在院外的岗楼里喊叫。毛主席见我来了，说：“刘嫂子，快来呀！”

我走进岗楼，见贺子珍面色蜡黄。消瘦的身子躺在地铺上，冷得直打哆嗦。

岗楼的墙是石头垒起来的，顶子是用高粱秆子抹着泥巴搭起来的。岗楼里四面透风。我很生气地埋怨他们：怎么能挑选这地方生娃呀！毛主席说：“石窑里太潮了，是子珍跑到这里来的。”

毛主席焦虑地问我怎么办？我先让子珍喝了半碗开水，让她的身子暖和些，然后，扶住她，替她按摩腹部，使她减少些痛苦。不一会儿，娃娃生下来了。这时，医生赶来为娃娃扎了脐带，将子珍抬回窑洞。我用半盆热水洗了娃娃的身子，裹起来抱进石窑洞安顿好，就跑向北山坡家里，去取前几天就准备好的鸡蛋。

刘志丹的牺牲，使我的脑子受到很大刺激，影响了我的记忆。我一时怎么也想

不起把鸡蛋放在哪里了，一直翻到中午才找到。当我推开毛主席的房门时，见子珍正在吃鸡蛋，不知道是谁送来的。我端着刚找到的那碗鸡蛋木呆呆地站在她身旁，一个劲儿地落泪。

娇娇生在苦难的岁月，生下来时又瘦又小，一对小眼睛睁开看人，真叫人心痛。

后来，她到了保育院。再后来听说她到苏联找妈妈去了。解放初，她回国以后，有一年在上海我见到了她。一见面她就叫我“刘妈妈”。后来还托人给我捎来一张照片，上面写着：“敬赠刘妈妈留念，毛娇娇。”再后来，她改名叫李敏了。

这就是我的出生经历。

再大些时，我知道了，同桂荣妈妈为我接生时，刘志丹刚刚牺牲半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积极组织民族统一战线，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1936年年中，中央派刘志丹带领红军打过黄河，进入山西作战。刘志丹作战英勇，不幸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回到保安不久牺牲了。我出生的保安也是他的家乡，为纪念他，改成现在的志丹县。

听大人们讲：我出生时，爸爸和妈妈的老战友，红军女战士康克清妈妈、邓颖超妈妈都闻讯来庆贺。

爸爸笑咪咪地招呼她们进窑里坐坐。她们问：“子珍生了没有？顺利不顺利？”

“生了，生了，像母鸡下蛋一样，生了个大鸡蛋。”爸爸风趣地说。

后来，听人们讲起来，我觉得爸爸挺有意思。我也想不出为什么爸爸说：“生了个大鸡蛋。”他是指我身子瘦小而言呢？还是指我是个女孩呢？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我就无从得知了。

据说，当时邓颖超妈妈抱起我来，看看我那瘦小的身子，产生了爱怜之心，连声说：“真是个小娇娃，一个小娇娇。”

爸爸听了这句话，便说：“对，就叫娇娇！”

后来，有人叫我毛娇娇，有人叫我贺娇娇。其实不管叫什么，我都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

我的到来，为爸爸妈妈的生活增添了喜悦与欢乐。这一年，我爸爸43岁。尽管他早已是四个儿子三个女儿的爸爸了，但在那动荡的岁月里，孩子们的下落都不清楚。杨开慧妈妈生的岸英、岸青、岸龙，自从杨妈妈牺牲后，一直没有确实的消息。

爸爸和妈妈在苏区生了哥哥小毛，一直托给叔叔、婶婶——毛泽覃、贺怡寄养，现在也不知道情况。后来妈妈又生了两个女儿，都送人了。这些孩子的下落都不清楚。所以 43 岁的爸爸身边，倒是只有我一个孩子。爸爸亲眼目睹了我的诞生，亲耳听到了我的第一声哭啼。

婴儿的第一声哭是宣言书，她向世界宣告：我来了！婴儿的第一声哭，又是进军号，她向人们宣告：我加入到你们这个行列里来了；婴儿的第一声哭，就像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符，像是唱出的最悦耳、最动听的乐曲，叫人们百听不厌，百听不烦。这乐曲在父母的耳边萦绕，是使父母终生难忘的欢乐乐章。

爸爸双手抱起我，仔仔细细地端详起来：小脸蛋、小嘴巴、小鼻子、小额头，像谁呢？他看看疲惫的妈妈自言自语地说：“像，像！像子珍的清秀、文静，是个好娇娃。”

爸爸抱着我。我贴在他那博大的胸怀里。他的博爱像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离开母体的孤独感没有了，我吮动着小嘴巴，眼睛连睁都不睁地熟睡在他的怀抱里。

此时的爸爸在想什么？我当然不知道。妈妈的心里明白。就在长征大军翻越六盘山，到达甘肃南

部地段的时候，我开始在妈妈身体里孕育、生长。冰凉的山水，口口的雪花，变成了哺育我的乳汁；野果、草根，经过母亲的咀嚼，变成了我的营养主食。我这小小的生命，从孕育的那天起，就跟着妈妈同患难，共甘苦，就跟着妈妈一路风尘，来到陕北。我能平平安安地来到世上，见到父母，享受到父母的亲情之爱，已实属不易。比起我的哥哥姐姐们，我可真算得上是一个幸运而又幸福的人了。更何况我是生在陕北这块热土上呢！

可是，我没有能像其他的同龄孩子那样，长期生活在父母身边，因为我的父母都在忙着自己的工作或学习。

听说，我刚刚满月，父母就把我托给奶妈喂养，妈妈到抗大学习去了。只有星期六放假才能回家。一周也只能见我一面。到我哑哑学语的时候，妈妈又到苏联治病去了。细算算，我在妈妈身边也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妈妈是个什么样子？我没有一点印象。

爸爸忙于党和国家的大事，哪能担当起当妈妈的责任呢？他照顾不了我，就又把我寄养在当地一户农民家里。虽然享受到陕北农家孩子同样的生活，但我却失去了所有孩子都能享受到的亲生父母的关怀和爱护。在这家呆了多久，我记不清。别的

人也说不准确又是什么时候把我送到在当地合作社工作的一对长征夫妻家里抚养，在那里又是呆了多长时间，我更搞不清。但是，有些老人又叫我是合作社的娃娃。再后来，我就被送进延安的洛杉矶保育院去了。

我好像听人说，在延安时，妈妈的战友、长征过来的四川人张秀英是我的阿姨。把我托给她时，我已经是一岁多了。等我到保育院时，张秀英阿姨也在保育院当保育员。我俩算是“老熟人”了。一直到1940年，我都生活在这里。

爸爸住在杨家岭、枣园多久，我都记不得。他到保育院来过没有？我也记不得。我是否回过家？当然，我还是记不得。

爸爸送我去找妈妈

我对爸爸的记忆，实在淡极了，能记得的是1940年，爸爸送我去苏联，可这个印象仍然是极模糊的。1940年，在爸爸的亲自安排下，我和朱德爹爹的女儿朱敏，罗亦农烈士的儿子罗西北和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四个孩子一起，搭乘一架苏联的轰炸机，转道甘肃、新疆到苏联，他们是去学习，我是去找妈妈。

黄土高原的气候是：“夏日热得慌，下雨泥汪

汪；冬天透心凉，刮风满天黄。”那时，正是冬季，那狂风，那寒冷，那细沙碎石被风卷起来，再甩到人们的脸上、额上、鼻尖子上，甭说小孩会觉得如刀割一般痛，就连大人也常皱眉头，无法忍受。这狂虐的西北风，吹得人浑身都泛起鸡皮疙瘩，那真让人难受。

那天早上，朱德爹爹同康克清妈妈带着朱敏，我则坐在爸爸的怀里。我们和另外两个孩子同乘一辆轿车向飞机场驶去。

一路上，我看到的除了山就是道路两旁枯黄的野草在风中摇动，风吹着黄土，细沙满天跑，别的什么也看不到，路上连个来往的行人都没有。当车子过了桥儿沟再往东驶，老远老远看见了机场里升起的一股股的浓烟。走近时才看清楚，原来机场里支了个老大老大的锅，在为我们乘坐的那架飞机烧水，上水。我们都看见了几个人，正忙乎着，做起飞前的准备工作。

机场里满地都是枯黄的杂草，风在呼呼地叫，飞机在轰隆隆地响。那西北风呼地一阵，一股寒冷袭来。我望望四周，拉紧爸爸的手，紧紧地紧紧地贴在他的身旁。

尽管天地如此寒冷，但当我们看见这个庞然大物时，竟忘记了寒冷，也顾不得将要与爸爸离别的

悲伤。我松开爸爸那温厚的大手，跟着他们高兴地往飞机上爬。

我不懂得离别的悲伤，也不知道离开爸爸后会孤独，会恐慌。我也一味地跟着大哥大姐的后面，像模像样地学着他们东摸摸西瞧瞧，感到好玩极了。我们都开心地笑着。

大人们帮我们把行李放好后，我们光顾高兴，好玩，还没有发现，他们已悄悄离去，飞机舱门也不知什么时候关上了。只觉得飞机一阵颠簸，等我们明白过来，飞机已腾空而起……

这才发现，朱德爹爹、康妈妈、我的爸爸……都没有在我们身边。

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爸爸呢？他坐在哪儿呢？我左看右瞧，都没有找见爸爸。这时候，我仿佛突然长大了，明白了。爸爸是怕我伤心，才悄悄地走了。我伤心地低下头，一声不响地坐在朱敏大姐的身旁。

这些天来，我患感冒，又拉肚子。这时候，我的肚子又痛了起来，又要拉肚子。朱敏真不愧是大姐姐，看到我肚子痛得直哭，就赶紧帮助我，找到破纸铺在地上，然后她安慰我。其他两个男孩子也一起过来帮忙。大家手忙脚乱了一阵子，总算帮我收拾干净了。我的肚子不痛了，就又静静地坐着，

一句话也不说。

我坐在这颠颠簸簸的飞机上，两只手不时捂着肚子。我感到头痛，便蜷曲在飞机舱的角落躺下，眼泪汪汪的一声不吭。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是想远在苏联的妈妈吗？我记不起妈妈的样子，当然也就想不出来；是因为，远离我的爸爸吗？爸爸留给我的是高大的身影，温暖的胸怀，笑咪咪的脸庞，是我的小手在爸爸那温厚的大手里转来翻去的印象。

这就是我的爸爸毛泽东留给我3岁时的记忆。而就是这点记忆，又随着日后的漫长岁月而渐渐淡了，浅了，消失了，忘却了。

飞机把我带走了。它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离我的爸爸。我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有黄土吗？有窑洞吗？有我熟悉的阿姨和小朋友吗？我还能再坐到爸爸的怀抱里吗？他那温厚的大手还会再牵着我的手吗？我能再见到那么高那么高的爸爸吗？爸爸说是让我找妈妈去，妈妈又是个什么样子？我的小脑袋里就这样忽而东忽而西地胡乱想着，胡乱猜着……

■ 在苏联，我与妈妈相会

经过一番折腾，我们终于到了苏联。

当我在苏联莫斯科见到妈妈时，说不上激动，

也谈不上兴奋。我毕竟还只是个3岁的孩子，可对妈妈说来，可就全然不同了。当有人把这消息告诉她说：“你的女儿娇娇要来莫斯科找你来啦！”妈妈听了摇摇头，不信。认为是同志们和她开玩笑，逗着玩。

“莫逗嘛，她怎么会来？”妈妈虽然嘴里这么说，可心里却想：这事也许是真的。

她是怎么知道我真的要来了，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了。反正那天妈妈是到机场接我的。一见到我，妈妈便一把将我揽在怀里，问着，亲着；亲着，问着，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妈妈高兴地一遍又一遍地问我：

“你是谁呀？来干什么呀？”

“我是娇娇，来找妈妈呀。”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妈妈叫贺子珍。”

“你给妈妈带来什么礼物啦？”

“我给妈妈带来娇娇。”

离别3年，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我与妈妈相会了。

我来到妈妈的身边，妈妈可高兴啦！我俩在一起，妈妈唤我的亲切柔声，我叫妈妈的甜甜细音，在房间里久久回响着。

可妈妈还要学习、工作，不能天天陪着我玩，就只好把我送到国际儿童院的幼儿班。我又开始过上了像在延安时的集体生活。

在这里，除了有妈妈的爱之外，还有亲我爱我的两个哥哥——岸英、岸青。

虽然生活在异国的土地上，但四个人，节假日团聚在一起，围在妈妈的身边。这也是一个温馨的欢乐的家呀！岸英、岸青是在上海地下党和张学良将军的帮助下来到苏联的，他们比妈妈来得早。

妈妈是1937年底，为了治伤离开延安到西安，经兰州、迪化再到苏联的。

妈妈是在这里与我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杨永福（岸英）、杨永寿（岸青）相识的。

后来听两个哥哥讲，他们的相识，还真有点戏剧性：

1938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位叫阿烈耶夫的老师领着一个高高的身材，30岁上下的女干部模样的人，来到我们跟前。老师向我们介绍说：“谢廖沙（岸英哥哥俄语名字的爱称）、戈勒（岸青哥哥俄语名字的爱称）你们瞧她是谁？她是专门来看你们的。”

我俩一愣！到苏联一年多了，我们没有亲人在这里，怎么会有人专门看望我们呢？

面对这位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女人，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从她的举止、神态上看，她不像那些平时来看望我们的阿姨；从她的言谈中好像她和我们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特殊关系。我们一时也搞不清楚。该怎么称呼她好！叫同志，还是叫阿姨？干脆，什么也别叫。我俩一声不响地同时又用审视的目光，偷偷地打量着她。

她，浓眉毛，大眼睛，瘦长的个子，温和的脸庞上带着点挺不自然的微笑。她好像也是有话不好直说一样。看样子，她很疲惫，也有几分忧郁。看她的表情，也有点不知如何是好。怎样才能打破这片刻的沉静呢。她只好回过头来问阿烈耶夫老师：“他们就是岸英、岸青吧？”

站在一旁的阿烈耶夫看到三个人不自在的样子，忙来解围说：“是的！他是哥哥岸英，又叫谢廖沙；他是弟弟岸青，又叫戈勒。”说着又转过身来，对我们两个说：“她是你们的贺妈妈，贺子珍！刚从中国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

“是的！我就是贺子珍，到苏联后改名文英。”她脸上漾着笑意，亲昵地说：“你们的爸爸可想你们哪！”

自从妈妈杨开慧牺牲后，我们便失去了母爱，“妈妈”这两个字，对我们来讲真是太生疏了。我

们既不喊她妈妈，也不向她打听爸爸毛泽东的情况，我们不大习惯这个事实。

“你们父亲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他常常念着你们呢！”她为打破僵局这样说。

阿烈耶夫老师看到我们开始交谈起来，便招呼她坐下来，自己悄悄地走开了。

她见我们的床铺又脏又乱。便三下五除二地为我们收拾起来。

她把拎来的水果放在桌上，把我们又脏又乱的床铺收拾干净。整好后，又弯腰把床下的“杂货摊”清理好，又把我们的脏衣服卷起来，拿到河边去洗干净，晾好……看到她屋里屋外地忙活着，我们怪不好意思，也觉得过意不去。就跟着她也干起来，但却没有说一句话。

屋里整理得干净、漂亮，像样了。看样子她也累得够呛。

我们坐下来。她把苹果削好送到我们手里，我们真不好意思接受这种爱。可当我们看到她的一片真诚和充满母爱的眼神时，也忙泡了一杯热茶送到她面前。可谁也没有喊她一声贺妈妈。

她所在的东方大学离我们的儿童院不远，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她总要带些物品来看我们，像慈母一样关怀着我们的衣、食、住、行。她把每月发给

她的红军干部 70 个卢布的待遇费，除了自己的必需开支以外，把剩余的钱都花在了我们两个身上。她给了我们温暖和母爱。渐渐地，她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员，有时她不来，我们还怪想她的，一有空儿，我们就到她住的共产国际办公楼的一间小屋去玩。

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见到她。她是生病了还是回国了？我们决定去看看她。

刚一进她的房间，看到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小男孩。我们相视笑笑，我们明白了，这是父亲毛泽东的又一个儿子，是我们的小弟弟。

“唉唷，这小弟弟多像我爸爸呀！”大哥盯着那小脸上打着褶的小男孩，左端详右端详，越看越高兴，越看越喜欢。瞧他高高大大的额头，多像爸爸，就连鼻子、眼睛也都像爸爸。

“对！这个小男孩还真像爸爸。”二哥说着就去轻轻摸他的小手腕，逗着他玩。

“因为他和你们是同一个爸爸呀！”她说望着望我们。

看到我们高兴，她也会心地笑了。她笑得那么甜，那么真。这样的笑容是过去很少见到的。

她的小房间里，成了我们团聚的地方，也成了我们的家。

在这个家里，我们逗着小弟弟玩；在家里，听她给我们讲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在家里，我们帮助她学习俄语；在家里，她讲我们的爸爸毛泽东，也讲她自己负伤的痛苦经历；在家里，我们还听她唱江西民歌，特别是那一声：“哎呀来喂……”的清脆的开腔，一下子就又把我们带回到祖国，带回到家乡……

这个家，充满了欢乐、笑声，歌声回荡在房间里。

有一天，当我们再回家时，她变了，变得衣衫不整，也不梳洗，无力地和衣躺在床上。她好像突然间苍老了许多。再一看，她泪流满面，两只眼睛痴痴地、呆呆地，没有一点往日的神色。这是怎么啦？

我们突然发现，小弟弟没有在屋里。大哥急切地问：“弟弟呢？小弟弟呢？”这一声发问，使她如梦初醒，她悲痛地嚎啕大哭起来。

原来小弟弟感冒转成肺炎，还没等送到医院，他就去了……小弟弟来到人间刚刚十个月，就夭折在他乡异地。我们难受，我们爱这个小弟弟。他那么幼小，还未来得及叫声“哥哥”，他便去了。我们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如涌泉地哭了起来。

我们劝她：“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

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呢，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

和她相处这么久，这是第一次这样称呼她。“贺妈妈！贺妈妈……”我俩不住地叫着。

刚刚还是满床翻滚，痛苦不堪的她，这时突然停止了哭声，从床上腾地站了起来，一把将我们俩紧紧地搂在她的怀里，“儿呀！儿呀！”不停地叫着。我们像又回到当年，像在妈妈的怀抱里一样，感到母爱的温暖，享受到了妈妈的亲情。

她一声声“儿呀！儿呀……”地喊，我俩一声声“妈妈！妈妈……”地叫，我们三个人抱成一团，哭成一团。

这哭声是悲痛的，因为她失去了儿子，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妈妈，因为我们孤独了这么久；这哭声又是幸福的，因为我们又有了妈妈，又享受到了人间的伟大母爱。

贺妈妈两年的学习生活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她留下来在东方部教孩子们中文，我们一家人才真的生活在一起。

爸爸再婚的消息，是真是假，我们也搞不清，反正也隐隐约约地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这事，贺妈妈肯定也听说了。失去儿子痛苦创伤还未愈合，这消息对她来讲，犹如雪上加霜，又是一个沉重的

打击，她的精神一下子垮下来了。

贺妈妈精神大不如前，身体也很弱。为使她心灵上的创伤减轻些，我们想方设法使她高兴；有时说故事；有时讲笑话；有时说国内；有时谈国外。但谁也闭口不提我们总想到的一个人：我们的爸爸——毛泽东。

他们讲着，我听着，我觉得我的两个哥哥真懂事，我为他们的母子真情所感动。我爱我的妈妈，我爱我的哥哥，我更爱这个家。

二哥岸青指着毛泽东像说：
他是我们的爸爸

我到苏联不久，就是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了对苏联的侵略战争，苏联人民的生活都转入了战争轨道。所有旅居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响应斯大林的号召同样也都要支援前线。我们的生活也因此乱了套。

战争带来了物品的极度匮乏，我们所在的儿童院的生活也已不像早先那样丰富，食品供给也开始紧张起来。我们每天的早餐只有半片面包，一碗玉米面粥；午餐和晚餐也仅仅是一片面包和一盘盐土

豆。这点食品量，连我都不够吃，更何况我的两个哥哥！他们都是小伙子，正处在长身体的年龄，当然就更吃不饱了。

妈妈的食品定量也跟我们差不了多少，但她总想着我们，把领到的面包分出来一部分收好留着。我算是职工子弟，饭可以打回家去吃，妈妈又从我的口粮中挤出一点省下来也留着。到周末，两个哥哥来了， she 就把土豆切碎，煮一锅汤，拿出攒下来的食物一起吃起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饭食，但一家四口人，围坐在一起，喝着热乎乎的土豆汤，生活也还是很愉快的。

妈妈和其他的女同志一样，为支援前线，她每月要织一件毛衣，三双袜子。她要全凭自己的双手去完成这个任务。她打呀，织呀，双手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有时候，我都睡一大觉了，妈妈还在织着。她靠自己的劳动挣点钱来维持自己和我们三个孩子的生活。

为了我们，为了一家人能填饱肚子，妈妈除了完成织毛活的任务外，还要开荒种地。她拖着带伤的身子，种了胡萝卜、黄豆、菠菜、土豆。她自己提水浇地、施肥，盼望有个好收成，来补充我们生活食品的不足。

妈妈就这样不辞辛苦地为我们操心劳累。

一个又一个的节假日，我们就这样过着。虽说不富裕，但生活还是苦中有乐。因为我们有妈妈，有这样一个四口之家。

这种日子过了没有多久，生活又发生了变化。

先是岸英哥哥上了苏雅士官学校，他不常回家了。二哥岸青又到莫斯科念书去了，家里又只有我和妈妈了，生活又开始寂寞了。

后来，我得了肺炎，因为是战争时期，缺医少药，我的病情一天一天加重，真的到了命在旦夕的地步。

妈妈听说这一消息，拼命地跑到儿童院，要把我抱回家。院领导不让，妈妈只好又忍着泪回去了。

一天，院方突然通知妈妈，可以到医院探视了。妈妈可高兴了，可当她赶到医院时，没有看到我。她急切地问：“娇娇呢，我的娇娇在哪里？……”

“她已无法医治，推到太平间副室去了。”医生告诉妈妈。妈妈一下子惊呆了。

妈妈不顾医务人员的阻拦，疾步跑到病危室，看到我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她五脏俱焚，此时，妈妈只想要救我，她喊着：“我的娇娇，我要救活你……，你们不能把我的女儿送到太平间呀！她活着，她活着，我的孩子还活着……”

妈妈抱起我，对医生说：“孩子我带走，一切后果由我负。出了事和你们没有关系……”

妈妈用她的大衣、围巾把我裹好，迎着呼啸的夜风，深一脚浅一脚地一路小跑回到家。

滴水不进的我，在妈妈的精心护理下，病终于好了起来。在妈妈的照顾下，我好了，妈妈却累得比过去更加消瘦，也更加疲惫。看着妈妈，我心里也难受，可又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举目无亲。妈妈救活了我，我从心里感激她，我更加爱我的妈妈。她是我惟一的亲人，我也成了她惟一的精神寄托。甭管是为了她，还是为了我，或是为了我的爸爸，我活下来了。我活着是妈妈的功劳。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爸爸总没有忘记我们这段苦日子。每当他想起来时，总念叨：“是妈妈救了娇娃！”

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病好后，儿童院要我回去。妈妈则要求让我在她身边再呆些日子，再恢复一段时间。这本来是人之常情，是可以商量的事。结果院方不同意，强行要妈妈把我送回院里去。一天，院方派了一个人来，要把我带走。那个人态度十分蛮横。妈妈和他们发生了争执，结果他们却说妈妈是“疯子”，是“精神病”，还说：“你呆在这里不想干活，难道还要我们再养活你们这些懒虫……当心我把你送到疯人病院……”

“你是在胡说，我有双手，我是在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靠我自己的劳动。你懂吗……”妈妈也急了。对这种人格上的侮辱是谁都无法接受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而在国外，这尊严里还有民族的、祖国的尊严，更何况妈妈一向性格刚烈，她是从井冈山走过来的，是从腥风血雨中拼死拼活走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当然更不会买他们的账。她毫不退缩地和那苏联人大吵起来。

妈妈是讲理的，谁知道这一吵，竟得罪了他们，结果那人走后，过了不几天，他们真的就强行连拉带拖地把妈妈带走了，并真的把她关进了精神病医院强行给她进行所谓的治疗。这治疗实质上是对妈妈的精神、身体的摧残。致使她在此受到非人的折磨，致使我与妈妈再次生离死别。我哭天呼地，可有谁来管我们呢！

我又进了儿童院。这一呆就是两年多，直到1947年夏季，我才见到妈妈。

在儿童院里，我和所有的小朋友一样，生活、学习、劳动，过着集体的食宿生活。

1946年，大哥岸英已经回国了。二哥岸青还在莫斯科学学习，只有二哥时常来看看我，也只有二哥是我的亲人了。

一天，二哥又来看我。哥哥陪我在儿童院礼堂

里玩着，我一边玩一边吃着他给我带来的糖果。哥哥说我长高了，长大了，成了个大姑娘了。他关心地询问我的学习、生活。谈笑间，他指着墙上挂着的各国领袖照片（其中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等）。说：“你知道他们都是哪国的领袖吗？”

“我知道。老师都给我们讲过的。”我回答他说。

“那，你说他是谁？”他指着毛泽东的照片问我。

“我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叫毛泽东。”我说。

“是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可你知道吗？他还是我们的爸爸……”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就急得打断他说：“你疯了，你瞎说。他不是我们的爸爸，他不是……”

“是的，他是我们的爸爸，就是他送我们到这来学习的。”哥哥又接着说。“不是，不是！他不是我们的爸爸，你瞎说！”我急得几乎要跟他吵了起来。

“他不是我爸爸。我没有爸爸。我只有妈妈。”我和他争辩着。这是因为我还小，考虑到我的安全，妈妈说过：不许提爸爸的事。

“好了，好了，哥哥不说了，不说了。”他见我

生气了，就赶紧劝我。

等哥哥走后，我心里也开始有点嘀咕起来；哥哥说得那么认真，或许那个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真的是我的爸爸，不然，哥哥怎么会这样对我说呢？他不会跟我开这样的玩笑吧！

从那以后，我再仔细地看看那张照片，想想莫非他真是我的爸爸！……不，不对，我没有爸爸，我只有妈妈。这是我到这儿以后妈妈告诉我的：我姓贺，叫贺娇娇。我就这样，一会儿想他可能是我的爸爸；一会儿又想，他不是我的爸爸。

我在努力地回想着，我什么时候见过爸爸？爸爸长得跟照片上的人一样吗？……可怎么也记不起来。这时候，我又想起了我的妈妈。如果妈妈在我的身边，我问问她，问题不就明白了吗？答案不就有了吗？可这时的妈妈，也不在我的身边。你在哪里呀？我的妈妈！

在国内，我离开妈妈3年才得以相见。在这里，跟妈妈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我曾享受到了母亲的爱，家庭的温暖，我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可现在，我又失去了妈妈，也得不到爸爸的爱，我多么孤独啊！爸爸的影子没有留在我的记忆中，照片上的毛泽东若真是我的爸爸，他会不管我吗？他会让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这里生活吗？难道他就

不想我吗？

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的一天，儿童院的一位老师把我领到院长室。院长问我：“你想见你的妈妈吗？”

我看看他，既不点头也不摇头。不说想也不说不想。我心里吃不准。他们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我要用自己的头脑来分析问题，辨别真伪。没有多大把握，我是不会轻易表态的。他见我不吭声，就又接着说：“如果你想见你的妈妈，现在就送你去。”

哪个孩子不想见妈妈呢？我天天盼，月月想，我今天真的能见到妈妈吗？他们该不是骗我吧！可我心里也在想，这也许是真的，说不定我真能见到我日夜思念的妈妈。是真是假，要等真见到妈妈才能证明，才能算数。我已经学会了用理智来控制我的感情。尽管我心里特别地高兴，但我表示出来的却是超出我年龄的冷静。我没有用一个字来回答院长的话，只是以点头表示了我愿意去见妈妈的心情。

我跟着他们走了。

他们把我带到了一家旅馆。一进屋，我抬头见到一位中年妇女站在我的面前。

我一愣神！这是妈妈吗？这么苍白、瘦弱、憔

悴！就连笑都那么无力，大眼睛也没有了神采！可这是我的妈妈，真是我的妈妈，我的眼泪像泉涌一般哗地涌了出来。我扑进妈妈的怀里，不停地叫着“妈妈，妈妈……”

“娇娇，我的女儿，妈妈想你，妈妈想你！妈妈再也不会离开你！”我和妈妈抱成一团，哭成一团。那哭声，那话语，使在场的叔叔阿姨都动情地落泪了。

失散两年了，我又见到妈妈，我们又团聚了。这骨肉分离之苦、之惨、之悲、之痛，至今铭刻在我的心中。正因为妈妈与我同尝了这人间的悲痛，所以，在我们心中，对那些过早失去父母的孩子，对那些失去儿女的父母，有着一种说不出的爱怜之情。

妈妈和我见面的消息传开了，正在莫斯科学习的二哥岸青赶来看望我们。我们一家人又团聚了，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妈妈从不愿提起那段使人难忘的苦涩的回忆。

离开精神病院不再受折磨了，妈妈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笑容又重新飞上了她的脸，笑声又回荡在我们的家中。妈妈变得特别开朗，话也多了起来，语言也不像开始那么木讷，变得流畅起来；干

起事来，又像当年那样动作既快又灵活。一句话，妈妈是在欢乐中度过的。

但过了不久，我发现她又开始焦急不安起来。我原以为她是有病了。后来才知道：蔡畅、王稼祥夫妇到苏联去的时候，爸爸曾委托他们设法寻找我们。苏方却不予配合，并以种种借口推脱此事。说妈妈因精神分裂症住进医院，以不见为好。王稼祥夫妇及蔡畅又通过种种渠道终于知道了妈妈的下落。他们想方设法见到了妈妈。当蔡畅和王稼祥夫妇见到妈妈时，他们问她：“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回国去！”妈妈脱口而出，说出了她埋在心头多年的愿望。尽管爸爸又结婚了，但中国是她的祖国，她的家。

王稼祥夫妇很快就把此事如实地电告了我的爸爸——毛泽东主席。请示他如何处理。

1947年5月30日，我的爸爸毛泽东复电蔡畅，告诉她：已联络苏联方面允许贺子珍回国，并请她对贺子珍加以照顾。

这些日子，妈妈盼望早日启程，急切地想回到祖国。离家久了，这怀乡之情无法消除，反而与日俱增。有时看她特别高兴，那神态，那情绪，仿佛此时此刻就在井冈山上，又摸到了根根挺拔笔直的翠竹；仿佛又在长征途中那硝烟未散的敌机轰炸下

雄姿勃发；仿佛又回到延安保安县那孔滴水的窑洞……妈妈无法掩饰她想念祖国、思念亲人的焦急的心情。

对于我来讲，这一切好像都无所谓，我只要能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就是幸福，就知足了，更何况此时，又见到二哥岸青，我们又愉快地生活在一起了，当然就更加高兴。

妈妈盼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们从莫斯科启程，乘火车回国了。

一上车，我特别高兴。一路上与二哥用俄语讲故事，说笑话，我们谈笑风生。我的身边有妈妈，有哥哥，看到妈妈高兴，想到要回国了，我怎么能不高兴呢！再说还有好几位叔叔阿姨与我们同行。路上也不寂寞，乘车又好玩。

从莫斯科到哈尔滨，要穿越苏联的大半部地区，听说我们要走八天八夜才能到达呢！我心想：这祖国离我们好远好远啊！

我看看妈妈，她坐不住，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脸贴着车上的玻璃窗往外看着。我奇怪，她在想什么？找什么？看什么呢？！

■ 我给毛主席写信问：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

火车在继续向前行驶，向前行驶……

当火车靠近中国边境时，妈妈一直站在车窗旁边。我明白了，妈妈是想快点、再快点地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她曾出生入死捍卫过的那块属于她的自己国家的土地上。

火车继续向前行驶，向前行驶……

虽然很慢，但还是向着前方的祖国行驶。

终于我们随着那咕咚咚、咕咚咚的单调声，进入了中国的领土。列车终于驶进了哈尔滨车站。

人们都站起来，准备下车了。我走到妈妈的身边，紧紧拉住她的手。我感到她的手有些汗，并且有些不停地抖动。抬头看她，她激动地四处看着，向车窗外看。

此时的哈尔滨，已是满地金黄色的落叶，这是深秋呀。

我跟妈妈走到车门口，抬头看看，妈妈的脸上流露出了喜悦、兴奋和幸福的神情。激动的泪花在她眼眶里转着。她站在车门口，长长地舒了口气，那意思像是说：终于到家啦！到我自己的家

啦！我站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啦！这是我的祖国，我的城市，我的街道，我的人民，我的同胞。我终于摆脱了那令人恐怖的日子；我终于摆脱了那寄人篱下的生活；我真正地自由啦！

妈妈快步走下车，我跟在后边小跑着，差点跌倒，赶快走上去又拉住妈妈的手。这时，我发现我们的前方，站着几个人。其中一个人远远地向我们大步走来，并微笑着。我有些害怕，我快速地躲在妈妈身后，并连声用俄语说：“这是日本鬼子，这是日本兵。”妈妈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一样，走过去和那人紧紧握手，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似乎过了很久，妈妈好像突然想起了我，她把我从她的身后拉过来，向他们介绍。我却使劲往她身后躲，嘴里还是重复着“日本兵”那句话。这时妈妈冲我笑了，她对我讲：“这不是日本兵，这是妈妈的战友，这是叔叔，快叫叔叔！”说着把我推到那个身穿黄色大衣，头戴黄色大耳帽的叔叔跟前，吓得我紧靠着妈妈的两腿间不敢动。

见我这样，那个叔叔笑了，亲切地摸摸我的头。这时妈妈好像想起了什么，她指了指叔叔的帽子、大衣，又指了指我。他们一起大笑起来。我猜他们说的是“日本兵”的服装的事儿。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叔叔就是李富春。

我们在哈尔滨住下了。妈妈到东北财政部担任机关总支书记。后来又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工作。我在这儿开始像哑哑学语的孩子一样，开始学习那难认、难记的祖国方块字来。

这一段时间里，来看望妈妈的人特别多，他们尽谈了些什么，我也听不懂。不过从妈妈的神态、表情来看，有她高兴的事，但更多的好像是她不高兴，不爱听的事。因为她有时很难过，很悲伤，有时则是很伤心地一个人独自坐着，默默无语。我真搞不懂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她可是特别高兴地回国的呀。

有一天，是一个星期六，我跟随妈妈到机关去玩，又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泽东主席的照片。这时，我想起二哥曾在苏联国际儿童院说的那件事来，我就小声地试探着问妈妈：“妈妈，岸青哥哥告诉过我，他说……他说那照……”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他说什么？你慢慢说给妈妈听。”妈妈冲我笑笑说。

“他说……他说那照片上的人是我爸爸……”说着，我两眼紧紧地盯着妈妈，想看看她有什么表示。

妈妈良久没有说话。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是我说错了还是岸青哥哥说错了，还是我现在不该问这

事？我搞不明白，于是不敢再说，也不敢再问。

妈妈弯下腰来，拉着我的手，我猜不透她此时的表情意味着什么？摸不透她此时内心在想什么。妈妈还是不说话，只是以点头来示意。我明白，大人点头就是算数，就是认可。也就是说，岸青哥哥没有瞎说。照片上的毛泽东是我的爸爸。

此时，我也说不清自己的感情，说不上高兴，谈不到激动。因这已证实，岸青哥哥是对的，我没有爸爸的说法是错的。为什么当初妈妈不告诉我这真实情况呢？我想：一是妈妈那时的心情，我现在可以理解了。二是当时正处于战争年代，为了人身安全，保密是很重要的。我想，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不会再有其他的原因吧。所以，多年来，我只知道有母亲，只享受到了母亲那伟大的爱，却缺少了父亲的亲情与爱。

现在知道了，中国人民的领袖，那个老师曾讲过他带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长途跋涉两万五千里的、靠自己的双脚使蒋介石的追兵、汽车、飞机都没有用途的人，竟是我的爸爸。

回国以后，我无时无刻不感到爸爸的存在。他就在我身旁，就在我的生活中：我学的课本中，听的广播里，看的报纸上，哪儿哪儿都有爸爸——毛泽东的名字。毛泽东三个字，又是常常和胜利呀，

革命呀，万岁呀连在一起。此时的我，也对爸爸油然而生敬意。我开始崇拜他，仰慕他。感到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心想：他一定是个非常非常能干的人。

一天，妈妈对我说：“你回国一年多了，还没有给你爸爸写过信，你应该给爸爸写封信才是。”听了妈妈的话，我想：对呀，既然他是我爸爸，我为什么不写信呢！于是我马上动手给我的爸爸写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写给我爸爸的信，而且还是用俄语写的。我用大家都惯用的称呼来称呼他。我可不能贸然地称呼他为爸爸，虽然二哥岸青说过，妈妈也点头认可，这只是一方面，我还要看他本人是怎么说的，这才能证明这事儿是真是假。

我在信中这样写道：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

娇娇

据说爸爸收到我的信以后，非常高兴。他看了翻译出来的信后，马上就动笔给我写了回信。信未发走，就又改成电报发给我。

等信的我等到了发给我的那份电报。妈妈把电报的内容译成俄语念给我听。电报上是这样写的：

娇娇：

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欢迎你来。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

毛泽东

我听了以后，高兴得跳了起来，搂住妈妈的脖子给了她个响响的甜甜的吻。在妈妈面前，我还是第一次流露出这样的喜悦，第一次给妈妈这样一个吻。妈妈呢，平时很严厉的妈妈，此时，被我的激动心情所感染，她也笑了，还同样捧着我的脸蛋，也给了我一个亲亲的吻。

“乌啦！我有爸爸了！我要见到爸爸了……”我高兴得在房间里跳跃着。等我再回头看妈妈时，她坐在椅子上，不笑，也不说话，只是愣愣地看着我。

妈妈又在想什么？难道她不高兴爸爸认我吗？难道她不喜欢我去见爸爸吗？她的心情我真摸不透，也说不清。我只是感到妈妈在喜与悲中，在矛盾中生活。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我没有答案。别人也没有跟我说过，也许妈妈总还把我当成个孩子，许多事不便对我说。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已是1949年初了。我同妈妈到了沈阳。

从人们的谈话中我知道，爸爸领导的革命已经成功，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北平。听说爸爸跟机关一起从山沟沟里的西柏坡搬到了北平郊区的香山。还听说香山是个好地方，是游览的好去处。爸爸就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我想那里一定很好玩。人们说香山是一大群的古香古色的宫殿式建筑，环境特别清静；满山树木丛生，有高大的古柏；更有一到秋季就变得满山红红的枫树叶，那风景更为好看，更为壮观……

我要是能去就好了！我想。

在苏联的时候，我的亲人只有妈妈和两个哥哥。回国以后，我觉得家庭关系变得特别复杂起来。有些关系我记也记不清，也记不住。有时就把称呼搞错了，或把辈分给搞颠倒了，弄出很多笑话来。

妈妈、岸青哥哥我们三个人先到哈尔滨，再到沈阳，都有家里的亲戚来看望。我最先见到舅妈李立英。她人长得很文静而且秀气，为人直爽又热情。在来看望妈妈的人中，数她和妈妈谈得来，谈话时间还特别长。她们之间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一样。我不知道她们在谈什么，我也不去打听大人们谈论的事。

一天，来了一位跟妈妈长得有点像，但个子比妈妈稍矮一点的中年妇女。我想该又是哪位阿姨吧。妈妈却向我介绍说：“这是你的姨妈。妈妈的妹妹，她也姓贺，叫贺怡。”

我对姨的概念很模糊，但妈妈说是她的妹妹，我就明白了。这位姨妈与别人确实是不大一样。她不光对我们给予热情的照顾、关怀，还和妈妈谈起有关其他亲戚的情况。姨妈还是个快人快语的爽快人，她的性格非常开朗，与大人孩子都能谈得来。

我很喜欢这位姨妈，总是在她身前身后地转着，她与妈妈谈话我听不懂，可从她的表情上看，她是有什么事在和妈妈商量。妈妈像是同意了，但心情好像不大愉快。

过了两天，妈妈就和她开始收拾起我的几件衣服和从苏联儿童院带回来的书。还把岸青哥哥的东西也收拾好。我觉得这事挺奇怪，就问妈妈：“干

吗要把我的东西收起来呀？”

“收好东西，娇娇带上到北平去见爸爸呀！”妈妈头也不抬地说。

“妈妈，您也跟我们一起到北平见爸爸吗？”我又问。

妈妈笑了。不过，今天我觉得妈妈笑得不是很自然，有点无可奈何。她说：“不，妈妈不去。你跟岸青哥哥两个去见爸爸。”

这时，站在一旁的姨妈说：“你妈妈现在不去，她要过些日子才去。”又转过脸对妈妈说：“我和两个孩子一块去。我要见主席。我会为你把一切事情办好的。”

妈妈没有说话，只是为我们忙碌着。

这些天，我们过得挺高兴。妈妈好像也不像过去那么严厉地要求我了，她看起来也很高兴。

走的那天，我们是和尤金同行的。尤金是当时苏联驻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我们是从沈阳坐火车到北平的。

尤金带着哥哥和我去见爸爸。我们坐在一辆小汽车里。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香山的双清别墅。

这时正值初春，是鲜花盛开的季节。我看到了香山，这百花似锦的香山景色，真美呀！

尤金将我们送到爸爸身边说：“主席先生，我

将您的公子和千金都给您送来了。”

“过来，这就是你们的爸爸，给你发电报的毛主席。快叫爸爸，快叫呀！”旁边一位工作人员笑着对我说。

我抬头看看这位陌生人。真的，他跟照片中的人长得一模一样，照片上的人不说话，很威严。当哥哥告诉我，他是我们的爸爸时，我不信，后来妈妈也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时，我信了。我就想，我怎么有这样一位既严厉又严肃，看样子又很厉害的爸爸呀？

可现在，站在我面前的爸爸和照片上的爸爸不一样了。他目光慈祥，和蔼可亲，个子高高的，大大的，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曾有过这个影子，有过点印象。我就使劲儿地想呀，想呀，回忆不起来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反正我觉得这不是第一次见他。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离开延安时爸爸送我时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他穿着宽宽大大的灰布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平底黑色布鞋；那么平平常常，又那么普普通通。从他身上看不出一点领袖的样子。他和我的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

我情不自禁地扑上前去，柔声叫道：“爸爸！”便投入了爸爸那宽大温暖的怀抱里。

爸爸也兴奋地一下子把我抱起来，喃喃地说：

“娇娃，我的小娇娃！”又用脸紧贴着我的脸蛋亲了起来。“娇娃，我的小娇娃……”说个不停。我除了笑，还是笑，因为爸爸的中国话又加上浓重的湖南音，我一句也没有听懂。

尽管语言不通，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交流。我们仍然是高兴地笑着，亲着，享受这天伦之乐。

这就是我的爸爸，我3岁就告别、几乎毫无印象的爸爸，离别了9年的爸爸，多种传说中的爸爸，妈妈感情中的爸爸。

今天，我终于认识他了。

第二章

- 爸爸问：娇娃，是哪个说江青要打你
- 爸爸说：我的娇娃就姓李，单字敏
- 江青回来了，一进家门，就主动地
上前搂住我
- 没想到爸爸问我：你为什么要入党
- 叶子龙叔叔交给任务：一定要拉爸爸去跳舞
- 爸爸说：蒋介石这个人很坏，外国人想要他，我们还不给哩
- 爸爸讲“王八为什么驮石碑”

爸爸问：娇娃，是哪个说江青要打你

初到双清别墅，对它所处的地形、位置不了

解，再加上自己年岁小点，也不去注意这些事。只觉得有山有草，有树有鸟，挺好玩的。每天都在外边转转、玩玩，又能和爸爸在一起，可开心啦！

双清地处香山西南边的一个山坡坡上。它是一处比较大的独立的院落。它有两个大门，一个大门朝东边开，一个大门朝北边开，外出挺方便的。

院里，北边是一排平房。房子挺高，也挺大的，屋里的光线特别好。房子从西边数起是卫生间，住房，办公室，会客厅。会客厅可大啦，能容二十多人呢。再往东也是办公室，会客厅，还往东，就是一个小餐厅，我们就在这里吃饭的。出餐厅，过小走廊就到厨房了。

出双清北门走不远，有一个特别大的大院是朱德、刘少奇、周总理和任弼时等首长的住处。我没敢随便到那个院里去过。

我们倒是时常出东边的门到外边去玩。因为爸爸有言在先：不得允许，不许随便到北边的大院里去，不能影响大人们的工作和休息。爸爸的这一叮咛我是牢牢记在心里。

后来，爸爸就开始进城办公了，常常是下午进城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返回双清。我们几个却早就入梦乡了，我只能在梦里见到爸爸。

我和爸爸之间，由陌生变为亲近；由紧张变为轻松。慢慢的，我有什么高兴事儿就跟爸爸说；我有什么心里话就跟爸爸讲；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就向爸爸提问。我觉得，我所有的疑难问题，只要跟爸爸一说，准能解决，因为我认为我的爸爸不光是博学多才，不光是对我和蔼可亲，而且凡事有问必答，每次都能保证让我满意。

有一天，我又跟在爸爸的身后，随他在香山双清别墅外的林间小道上散步游玩。爸爸在前边背着手漫步向前走，我跟在他后边，也背着手，学他的样子，漫步向前走。没走上三五步，爸爸就把我落下一大截路，我又赶紧甩开手小跑几步跟上去。等我喘口气的时候，爸爸又把我甩上老远站到高坡上去了。

我想，我要跟爸爸比爬山走路，我可不是爸爸的对手。

爸爸见我气喘吁吁地跟上来，就高兴地拉着我的手，找个曲折小径往回返，跟我边走边聊起天来。

我突然停住脚仰头问：“爸爸，江青会不会打我？”我的话音一落，爸爸愣神地看着我。那眼神是惊奇，是疑惑。他一时间没有说什么。

这时我还没有见过江青的面呢！

我们继续往回走。

“娇娃，是哪个说江青要打你？”爸爸停下来，拉着我的手，看着我问。

“姨妈说江青爱打人。我看小说里写的后妈，都爱打孩子。”我照实说给爸爸听。

爸爸再没有说什么，领着我回到家里。

过了些日子，好像是7月的一天吧，姨妈真的来到我们家了。见到她我心里很高兴，早把说江青爱打人的话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可爸爸却把我和二哥叫到跟前对姨妈说：“你向孩子道歉。”

爸爸认为姨妈不该那样说，怕在我幼小心灵中产生不好的影响。再说，江青也确实还没有回来，我们还没有见过面，怎么能这样说呢！这会影响到我们家的团结、和睦。其实，姨妈也没有别的意思，也是为我的妈妈而抱不平，才这样随口说的一句气话而已，姨妈绝没有挑拨、破坏家庭和睦的意思。

没想到姨妈随口说的一句话，我又无意中告诉了爸爸。爸爸会如此认真，竟把它当成一件事来处理。

我就用俄语与二哥交谈起来，他一会儿摊开双手，一会儿又耸耸肩，我俩的表情似乎让爸爸感觉

到了什么。“你们在说什么？”爸爸问。

“莫名其妙。我们感到莫名其妙。姨妈的话对我没影响，道什么歉？如果对哥哥有影响，就对哥哥道歉，我没事了。我玩去了。”说着，我就要走。这时，我又听到姨妈对我爸爸说：我妈妈在我们离开她以后，感到特别孤独、寂寞，想叫我们回沈阳去。

爸爸说：“我不同意他们去。让他们留在我身边。我会照顾好他们。”还说：“你也可以问问两个孩子，看他们自己的意见怎样。”

当姨妈向我俩说起此事时，当时我们表示：不想回去。那时我想：这里环境美，又好玩，所以，我们就没有跟姨妈走。

那时我小，也没有可能去设身处地地替妈妈想想，更没有想到我们过去在苏联困难环境里那与妈妈相依为命的日子已成为妈妈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没想到妈妈这时会感到痛苦、孤单和寂寞。虽然有时我也想妈妈，但自己毕竟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一玩起来，便把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便把什么都忘到脑后去了。当然，更不会想到，我们现在是跟一个伟大的爸爸在一起了。我的脑瓜子还真没有那么复杂。所以，我们当时都没说要跟着姨妈去沈阳。

姨妈同我们一起呆了几天就走了。当时她与爸爸谈了些什么？我并不知道。后来，我再次见到姨妈时，我曾问她：“妈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您不是说她过些日子就来吗？我想妈妈了。”

姨妈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那表情极复杂，心中似有难言之处。

“说呀，您说呀，妈妈为什么没有来呀？”我又在追问。在这种情况下，姨妈向我这个不大了解中国风俗习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半大孩子，讲起我似懂非全懂，似明白又不全明白的事情来：

“按照中国的习惯传统而言，我是你的姨妈，我和我的妈妈是同父同母所生的亲姐妹，我叫你妈妈姐姐，你叫我姨妈。按贺姓论，你是我的外甥女；按毛姓说，我可以称你妈妈为嫂子，她可以称我为弟妹。因为我的丈夫是你爸爸的亲弟弟毛泽覃，你该叫叔叔。这样论起来，你是我的侄女，我是你的婶娘。你爸爸可以叫我姨妹，也可以叫我弟媳……

听着她介绍这一大堆的人际关系，一会叫婶，一会叫姨；一会叫嫂子，一会叫弟妹、姨妹的，都把我给搞糊涂了。

“您说的这都是亲戚关系呀？”我问她。

“对，是亲戚关系。可有些事，靠亲戚关系又

办不成。”

“这次我到你爸爸那里，我不光为你们，还谈了有关你妈妈的事情……”

“我妈妈什么事情？”我没等她说完又问。

“你妈妈是毛主席的妻子，要不然你怎么是毛主席的女儿呢！”

我点点头。她这句话我听懂了，全明白了。

“我到你爸爸面前，就是要为你妈妈争得她应该得到的。懂吗？她应该得到的……”

她加重了说话的语气。

“我同你爸爸谈起你妈妈，你爸爸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

快人快语的姨妈，不管我懂不懂，不管我理解了没有，她又讲开了：

“按中国的传统，当然就是要恢复他们的夫妻关系。承认这不是哪个人的过错，而是历史造成的事实。”

“这时，江青，你的后妈带着你的小妹在苏联养病，你妈妈可以回到北平。”姨妈继续说。

“我就返回沈阳去接你妈妈。当我们乘火车到达山海关车站时，有两个人上车后走进我们的车厢。他们讲自己是组织上派来的。他们说：‘你们

不能进北平。只能南下，到你哥哥贺敏学那里去。这是组织决定。’”

“‘我们去，是主席同意了。你们……’我力争着。”

“‘这是组织决定。不服从，开除你的党籍。’说完他们下车走了。”

“我明白了。你妈妈也明白了。这是有人从中阻挠你爸爸和你妈妈的重逢……”

“我沉默了，你妈妈也不说话。我们只好改变了路线……”姨妈说完后，很久再没有说一句话。

当时，我只懂得了爸爸、妈妈不能在一起，不是他们不想，也不是他们不愿意，这是组织上决定的，他们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

为什么他们自己的事自己做不了主？这是我长大以后，才渐渐明白的。爸爸是领袖，他的一切事都要首先考虑政治影响。换句话说，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带有政治色彩，凡事都与政治相关。与政治相关的，问题就不是那么好办了，包括他的家庭、婚姻也同样紧紧关联着政治。只为政治，妈妈才苦苦熬了那么多年；只为政治，爸爸苦思了那么多年！两位老人终生都未能如愿。

说到“开除党籍”，当时我心里还有点埋怨姨妈。心想，怕什么？您怎么也那么胆小？党籍有那

么重要吗？

党籍重要，而且很重要。这也是我长大以后，当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要求加入共产党后，我同姨妈他们老一辈人一样，视党籍为生命。这样一来，我当初埋怨姨妈的情绪也就没有了。

姨妈还说过：“你爸爸是个伟人，又是个平凡的人，也是个很好的人。在他身边，你是幸福的，你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正因为如此，当我向你妈妈转告主席让你到他身边时，你妈妈一点也没有犹豫，就一口答应了。她只想到应该叫你们父女团圆，让你到爸爸身边享受父爱。她觉得，有你爸爸的指点，你在学习上、思想上会有更大的长进。可你知道吗？在你走了之后，她感到特别的冷清，好像过去的孤独、寂寞又回到她的身边。她很痛苦，她在想你……”

跟姨妈相处的时间虽然不算长，她就在为寻找我妈妈在苏区丢失的我的哥哥毛毛时，为抢时间，赶夜路，结果车毁人亡。姨妈在这场车祸中丧生。但她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她给我讲了很多我不曾知道的事情，那些事情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在和爸爸、妈妈生活的几十年里，我渐渐从感性到理性认识了我的父母亲。

在说爸爸的同时，要涉及到妈妈；在说到妈妈

时，同样也要联系到我的爸爸。因为，我觉得从小处说，一个家庭的大小事都会牵系到它的每一个成员，一个平平常常的家庭都会如此，何况这是一个特殊情况的家庭呢？我说它特殊，是因为这个家庭的许多情况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所造成的，也是在特殊的革命形势中造成的。爸爸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在人们的心目中，一切都应该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在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下，人们又把个人、家庭生活道德拿来衡量人的一个最高准则。考虑到政治影响，为了维护党和领袖的尊严，就连他的个人生活、婚姻、家庭、子女等等，都要加以政治的考虑，都属于严禁涉及和谈论的话题。

其实，细想起来，我们这“中华第一家”也跟许多老一辈的家庭生活一样，因为我的爸爸他不是“神”，他是人。他具有常人所有甚至超过常人的极丰富、又极细腻的思想情感。

我和妈妈从此天各一方了，她永远地留在了上海，而我留在了爸爸身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妈妈的思念越来越强了，然而这现实的鸿沟永远地隔在了生活中间。

爸爸说：我的娇娃就姓李，
单字敏

为了爸爸办公方便，减少路上的来往时间，我们大概是1949年7月份，跟着爸爸一起从香山的双清别墅搬到城里的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的菊香书屋。没想到，我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四个年头。这是难忘的十四年啊！

丰泽园是一座标准的古朴的正方形四合院。院里有几株百年松，南北、东西两条小路交叉形成十字形使院里的草坪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田字形。整个院落显得幽静、典雅。

四合院的布局很严谨：北房之间，正中一间是门厅，西边一间留给江青住，东边一间爸爸住。北房的房屋高大，跨度也大，因此就更显得非常宽敞。

爸爸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大的木板床，一套沙发、书架和写字台。

东房三间，中间同样是门厅，爸爸在这里吃饭，这里也是我们全家吃饭的餐厅。爸爸的衣服和来宾的衣服也都挂在这屋里。北边的一间是办公室，南边一间是会议室。

南房三间，正中是个穿堂，另两间是二哥岸青及我和妹妹李讷分住的地方。

西边那三间，正中一间是穿堂过道，这是从院里外出的通道，南头一间原来是江青的会客室，后来改成了我们的活动场所，乒乓球室。北头那间，是我爸爸的书房。

我3岁离开爸爸，直到1949年5月再见到爸爸时，已经是个12岁的女孩子了。爸爸亲我，爱我，但他从不惯我，娇我。别看他老叫我“娇娃”，那是称号而已。

在苏联呆了七八年，回国后才开始学中国话，认中国字。这种方块字认起来多难，记起来多麻烦。我除了学习之外，爸爸还要我练习毛笔字。这对我来讲，难度就更大。困难大也得学。他不光严格要求我必须天天抽空练习，还在百忙中为我由浅入深、由易渐难地写出仿帖，让我去一笔一画地扎扎实实地练毛笔字的基本功。我记得爸爸给我写的第一仿帖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数字的练习。第二仿帖是：“毛娇娇学写字”。爸爸是下了功夫栽培我，想让我练出一手好字来。可惜，我不争气，辜负了爸爸，不但字没有练好，就连爸爸给我写的仿帖我也没看住，都不知道叫谁给拿走

了。笔、砚也不翼而飞了。这文房四宝我丢了两宝，剩下那两宝也没什么用处了，我就送人让它们各自去发挥作用去了。从此，我与文房四宝绝交了。

小学毕业要上中学了。

一天，爸爸把我叫到他跟前，很认真地说：“我的娇娃要上中学了，成个大孩子了。成个大孩子就得有个大名。爸爸给娇娃起个名字……”

“我有名字呀！我不是叫毛娇娇吗？”我不解地问爸爸。

“那是你的小名，该给你起个大名了。我想好啰，我的娇娃就姓李，单字敏。”

“爸爸，我干吗要姓李呀？两个哥哥都姓毛，我为什么不姓毛？”孩子就爱打破沙锅问到底儿。我也同样。爸爸没有直接告诉我该不该姓什么，而是从一段往事讲起：

1947年3月，解放战争时，胡宗南调集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为了将来的胜利。我们党决定暂时放弃延安，采用了诱敌深入而后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党中央撤离延安时，为了保密，中央领导都不用原名，而取了化名。在革命生涯中，爸爸的化名有好几个，润之、子任等，但他最喜欢的还是这时的化名“离得胜”的谐音——李得胜。所以就把

他的这个“姓”给了我们两个姐妹。还从孔子《论语》中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句子中，各取了一个字给我们俩，妹妹叫李讷，我就叫了李敏。这名字中含有爸爸对我们的教导与期望。

爸爸关心我的学习，同样也关心我的生活。

我刚回国时，十几岁的孩子长得和八九岁孩子的个头差不多，身材特别瘦小。爸爸心痛地说：“娇娃是吃面包吃得不长个了。改吃中国饭。中国饭好吃，养人，能促进发育长大个。”

因为我在苏联呆得时间长了，加上那时是战争年代，食品又供应不足，本来体质又弱，饭量就更小了。以至于别人都悄声说我是吃“猫食”。所以，每次周六吃饭时，爸爸总是叫我多吃点，再吃点。我不光饭量小，而且吃得很慢，往往别人吃完都准备走了，我还在慢慢吃。这习惯很难改。爸爸有时是坐在我身边，有时候就起身站在我旁边说：“娇娃莫急，慢慢吃，细嚼慢咽好。”我抬头看看爸爸，他笑咪咪地望着我。

我的爸爸就这么平平常常的，像所有做父亲的人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

我说过，我的中文水平很差，学习起来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到高中阶段古典文学在课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学习起来，困难就更大。我开始还真

有些发怵，产生了畏难情绪。这时候，又是爸爸给我以鼓励，帮助我学好语文。

“你的中文这么差……”爸爸说。

“那怨谁？谁叫您送我去……”我有些委屈，但我的话没再往下讲。

爸爸没有讲完他要说的话，我也没有讲完自己要说的话。我知道爸爸不会责怪我中文不好，因为他知道我学习是努力而且是刻苦的。我更不会去埋怨爸爸八年前的决定。因为我俩心里都明白，我们共同为一个人——我的妈妈，爸爸才割爱送我去了苏联。

事情已经过去八九年了，突然从我嘴里冒出这句话来，我觉得自己有点冒失，就很歉意地冲爸爸笑笑，这事就算过去了。

人们常这样说：父亲对子女的爱不如母亲。还说，如果父母离异了，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还用“宁跟讨饭的妈，不跟有钱的爹”来加以引证。我可不这么想，我爸我妈都非常疼爱我。只不过是表现方法上不尽相同罢了。

妈妈知道我从小身体弱，冬日让我户外锻炼；夏日常带我在院里或野外晒晒太阳。她用小伞遮住我的头部，让其他部位尽露于阳光下。她自己却热得汗直流。我妈妈疼我、爱我，因为妈妈深深体会

到，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算有再大的本事，为人民服务也是一句空话。

同时，她又从自己的生活、工作的实践中体会到：知识对事业的重要。所以对我的培养教育抓得很紧。要求也相当严格，有时为此甚至以“武力”对待，以惩罚来制裁。不过这些都是在极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我从小就胆小，听话。这些“家法”也只是一条规定而已。

妈妈对我的爱，还重在培养我的思想品德。她特别重视为人的诚实、厚道、直爽、正派，要我堂堂正正地做人。尤其强调凡事都要以他人利益为重。关心他人、爱护他人要胜于自己。不要存私心，更不许贪便宜损害别人。

这些听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谁都会讲，谁都能说。我却从心里感激我的妈妈。是她的从严教育，使我长大成人之后，问心无愧地生活在群众之中，是她的苦心，教育了我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无私教诲，使我终生受益。

离开妈妈来到爸爸身边，妈妈的爱远了，但是爸爸和妈妈一样教育我，除了像天下的所有的父母爱子女、关心孩子们的吃喝冷暖之外，他给予我更多的则是学业与品德，独立与自强精神的培养。

到北京后，爸爸正忙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国家大事。香山的家里只剩我们几个孩子。爸爸像所有当父亲的人一样，心里总是惦记着我们。一到会议休息时，他就打电话问问，或派人回来看看，给他报个平安。尽管每天会议结束他都回家，可他还是放不下心。我们一起搬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住下后，他也一样细致地关心我们。

■ 江青回来了，一进家门，就主动地上前搂住我

那时生活中的小插曲儿，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我刚到爸爸身边，只有我一个女儿，但我独自享受爸爸的爱算算也只有四个月多点的时间。

这是多么宝贵而又短暂啊！也就是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

江青带着妹妹李讷要从苏联回来的消息我早就听说了。我心里也开始嘀咕起来：江青会喜欢我吗？会把我当做亲生女儿吗？她要不喜欢我，冷淡我，甚至讨厌我，我该怎么办？就这样想过来思过去，也没个准主意。唉，随它去吧，反正没见着人，想也没有用，等见到再说吧。

不几天，江青带着妹妹李讷回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江青。当然，在延安我也一定见过，而那

时小，根本没有印象。

那天，江青刚进家门，一看到我，还没等我想好该怎么办呢！她就主动地上前搂住我，抱住我，在我脸上亲吻一下。她满脸堆着笑意，那股子热情劲，真叫我浑身感到不自在。她显得比多年未见的亲生母女相见时还要亲昵，还要热情。说实话，那亲热程度太高，真叫人有点接受不了。

后来的日子，她常在人前夸我好，说我懂事；说我爱她，和她好得跟亲生母女一样；还说我宁跟她一起生活，也不想跟亲妈……

她今天夸我是个绘画天才；明天又夸我四肢灵活，双腿又长又细，将来会在体育方面出成果。今天说给我请个老师辅导美术，明天说找个老师培养我体操。我全当真了，就左等今天，右盼明天，结果全无下文。我开始感到她说的话不算数了。我感到她的言谈举止有点虚假。以后办事说话要谨慎些就是了。我这样暗暗告诫自己。

有一天，爸爸把我叫到身边说：“娇娃，你怎么不肯叫她妈妈？她很难过呢。”

我低着头，不说话。

“她会对你好的。”爸爸又说。

我低着头，还是不说话。

“你就叫她一声妈妈，这对你不会有损害嘛，

怕么子哟！”爸爸有点急了。

我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爸爸的规劝。

我这样做是为了爸爸，因为我离开妈妈到这里来时，妈妈就一再嘱咐我：听爸爸的话，不要惹爸爸生气。我如果让江青不高兴，她就会找爸爸怄气，爸爸就要受闲气。我爱我的爸爸，不想让爸爸难过。我最后听了爸爸的规劝。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凡遇事，首先考虑到的是我的爸爸。只要爸爸顺心、高兴，我就心满意足了。对这个家里的是是非非，我充耳不闻，一门心思全在我的学习上。

■ 没想到爸爸问我：你为什么 要入党

中学时代，我看到不少同学要求进步，积极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我也想这样做，但又觉得自己还达不到一个党员的标准。因此，入党申请书在我书包里装了好多天，还是没有胆量把它交给党支部。我总觉得自己离党的要求与党员条件相差得很远很远。想来想去，总想找个知己好好谈谈自己的心里话。这时，我想到了我的爸爸。于是，我想利用周六我们与爸爸相见的时间，进行一次“同志”

式的思想交谈。

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里。事也真巧，这时爸爸正好在家。我走到爸爸的书房里，见他正坐在那里看书。

我就规规矩矩地站在他面前，很认真，很严肃，又很紧张。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头说好。

爸爸见我进来，放下书抬头看着我笑笑说：“娇娃，坐下……”我坐下了。心里稍稍平静点。我严肃地说：“爸爸，我想和您谈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的话音刚落，爸爸有点吃惊地抬起头来望着我。那样子，那神态，似乎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一样。我一时也感到有点紧张。因为和爸爸相处的日子里，我们的谈话一向是很随便，很自然的。我们之间，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严肃的场面。

爸爸放下手里的书，用慈爱的目光望着我，轻轻地说：“娇娃，你想谈什么？”那语气，那神情，是温和而又亲切的。我感觉到此时有一种说不出的热流传到我的身心里。

“我想入党。”我望着爸爸慈祥的面容激动地说出我的心里话。

我不知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说完就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可又急切地想听到爸爸

的反应。我很紧张，心在怦怦地跳着。这是我生活中的大事啊！

我想爸爸一定会很高兴，会满心欢喜地鼓舞我一番。谁想到爸爸却问：“你为什么要入党？”爸爸的这句问话，把我给难住了，三言两语怎么能讲明我的想法呢？我心想：爸爸怎么跟党支部的人讲的一样呢？他怎么好像并不欢迎啊！

我一时还真不知从何说起才好。满腔的热情，像被一盆冷水浇了一样。我小声喃喃道：“人家的爸爸都鼓励子女好好努力，争取早日入党。您不鼓励我，反问我为什么要入党。我真不理解您的意思。”话语中对爸爸有些埋怨。

可能爸爸见我有点生气，他笑了。他和蔼地望着我说：“爸爸这不是在帮你解决问题吗？问你为什么要入党有什么不对呢？一个人要入党，这是件好事嘛。就是好事，也要问个为什么？要入党，首先要明确为什么入党，要端正入党的动机，才是首要的……”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我一时间说不清。

“那我好好想想，再跟您谈行吗？”我望着爸爸说。

“好嘛，爸爸的大门向未来的共产党员敞开

着！”爸爸笑着站起来伸开双手说。

我知道，这是该结束我们谈话的时候了。我冲爸爸点头笑笑，走出了他的书房。

好些日子，我都在反复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入党？”入党不是一句话的事，这确实是个严肃的问题，来不得半点儿戏。我在认真思考爸爸所讲的话的同时，我也明白了：那天，爸爸不是以爸爸同女儿的身份来同我谈话的。他是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同一个要求入党的青年人进行严肃而又认真的谈话。想到这一层，我心情感到特别舒畅。对爸爸，我更加深了一步理解。他不仅关心我的衣食冷暖，更关心我的理想、事业与学业。

他是一位具有远大理想，远大目标又有丰富感情，充满爱心的既伟大又普通的好爸爸。

至今，我还深深记得，永远也忘不了那次同志式的父女间的谈话。

我说过，爸爸不光关心我身体长高长大，还关心我的学业与进步。这就又说到我的功课。为了提高我的中文水平，爸爸也在费心，他想方设法使我的中文水平能赶上同班同学。为此，他为我安排了有关学习方面的计划。

爸爸几乎是给我下达了一道不可更改的命令：他要我读《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

演义》这几个大部头的中文版本。并绝对不许我看俄文版。

这对我来讲，有多大的难度啊！这意味着我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做出更大的牺牲——放弃周六、节假日。加在我肩上的是一副超出我的年龄和身体负荷的重担。

从此，我没有了同学们最盼望、最欢乐的寒暑假。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到上海看妈妈，除了完成作业之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看书学习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大部头，我硬是一本一本本地啃下来了。我真不知道当我读完这些书的时候，我的脑袋是不是“胀”大了很多，因为有时候书里的故事情节都把我给搅糊涂了。

有一次，爸爸跟我谈起学习。问起我读书的情况时说：“娇娃，我给你的任务完成得怎样？读了多少？读懂了多少？”

我知道，爸爸这是在检查我的学习。我如实地告诉了他。当说到《三国演义》时，我说：“这本书我越读越糊涂，越糊涂就越乱。三家谁和谁打？怎么打？在什么地方打？我都搞明白了。我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再看下去，就要把我加上，成了四国开战，就更迷糊了。我实在是读不下去了。爸爸，请您网开一面，放我一把吧！”我既认真又玩

笑地跟爸爸说。

谁承想，爸爸听完了却说：“糊涂了，就先把这部著作放下，再看另一部吧。”

没办法了，我只好放下《三国演义》，读起了《红楼梦》来。后来，我终于读完了这本难啃的《红楼梦》。

为了尽快提高我的中文水平，爸爸不光是对我提出要求、布置任务，他还给我以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指导与帮助。他专门为我请了一位老师，为我补讲唐诗、宋词、元曲及有关古典名篇名著。凡是初高中学生应该掌握的古典文学知识他都教我，我都要学。

我长大以后，能跟同学们齐步同行地学习中文，实事求是地讲，除了我刻苦、肯学的原因外，能够迈过中文这一难关，我得感谢我的爸爸。要不是他当时给我下达如此强行的“命令”，我可能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当然就不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也许我会从学习中文的行列中掉队的。

但当时，我心里还有点责怪爸爸。看到别人家的父亲对孩子，不仅给吃、给喝，还给钱花，多好！我羡慕过他们，有时累得难以承受时，我还真有点怪爸爸给我加的砝码太大，怪他不心疼我。

现在想起来，爸爸给了使我终生受益的知识，

这种爱是永远的。所以，我为有这样一位爸爸而高兴。他不仅是个伟人，更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的好爸爸。

■ 叶子龙叔叔交给任务：一定要拉爸爸去跳舞

我们家搬进中南海后，别的首长们也都先后搬进了中南海居住。这下子，中南海可热闹起来了。

这时，我有了更多的小朋友，我们在一起玩。

妹妹李讷不用说了，叶子龙叔叔的女儿燕燕和二娃是我最好的朋友。

听李讷、燕燕和二娃说，爸爸在延安，在西柏坡，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都要去参加跳舞晚会。进入中南海后，也是如此。这里的舞会多在春藕斋举行。

有时爸爸一忙就不想参加舞会了。为了让爸爸能休息休息，就想法子让他去跳跳舞，放松放松。大人们有时请不动他，他不肯放下工作去休息。叶子龙叔叔就把这“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四个女孩子。

一天，又要举行舞会了，叶子龙叔叔知道爸爸那天晚上没有安排什么太急太多的事情，就让他女

儿二娃把我和李讷叫走，对我们说：“等主席吃了晚饭后，你们就拉着他领你们到南海边散步。记住，不要光顾让主席给你们讲故事听，就忘了大事——8点钟，你们几个一定要拉他到春藕斋去跳舞。”

“告诉你们，主席如果不跳舞，就会越来越胖，长成个大肚子。肚子大，就走不动路了。你们要是真的关心主席，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让他去跳舞，活动活动身体。好，8点钟就看你们啦！”

回去后，我一看爸爸吃完饭了，就跑过去告诉叶叔叔家的女儿燕燕、二娃。我们仨一块来到我家，加上妹妹李讷，四个孩子前呼后拥地拉着、推着爸爸到南海边散步去了。

我们边走、边说、边笑、边玩，还时不时地看看表。时间还早，我们就又一块回去休息了一会儿。一看快到点了，我们起身拉着爸爸就往春藕斋走。

“快点，快点，到时间啦！”二娃边推着爸爸的腰说着。

“干什么去呀？”爸爸问我们。

几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怕说了爸爸不去。心想，只要爸爸到了春藕斋，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就又拥着爸爸走。

“干什么去呀？你们不说，我可就坐下不走了！”爸爸说着做了个要就地坐下的架势。这一下可真把我们吓一跳，就异口同声地说：“叫您跳舞去。”

爸爸一听，乐呵呵地笑了。“跳舞去，那好。去跳舞是不是该换双鞋子？”爸爸说着伸出脚来让我们看看。

一听爸爸答应要去跳舞了，我们心里可高兴了。这个忙着给爸爸找那双胶底皮鞋；那个忙着给爸爸往下脱穿在脚上的布底鞋；又忙着把皮鞋给爸爸穿上。我们四个孩子还真忙活了一阵子。

“你们不会跳舞，为什么要拉我去跳舞呀？”爸爸走在路上问我们。

“我爸爸说，说什么来着？”二娃一时记不起来她爸爸怎么说的了，回头问她姐姐燕燕。

“叶叔叔说，您不跳舞就会长个大肚子。肚子大了，就走不动路啦！”我接过二娃的话茬说。

“呵呵呵。”爸爸笑着说：“好，我去跳舞，不要长成个大肚子！”

到了舞场，大人们都高兴地随着舞曲跳起来。

我们几个在场外，看着他们跳得那么起劲，那么热闹，那么高兴，自己不会跳也怪着急。干脆，我们也跳！我们四个也手拉着手下了舞场。我们一

会跟在爸爸身后学他一左一右地上下大摆动式；一会儿随着周恩来伯伯学他潇洒自如的舞步；一会儿又跟着朱德爹爹后面，学他那四平八稳的慢步舞。

那天晚上的舞会，爸爸跳得开心，其他首长也跳得高兴。我们四个在舞场里来回穿梭地玩着，跳着，蹦着，给舞会增添了少有的欢乐气氛。

我看到叶子龙叔叔高兴地直冲我们点头笑。我知道，这是他在夸赞我们四个圆满地完成了他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几个也冲着他笑了笑。

爸爸慈祥、随和，喜欢跟人聊天，更爱逗孩子们玩耍。这些，凡在中南海住过的大人、孩子对此都深有体会和感受。

1949年，我们刚刚搬到中南海居住不久，孩子们相互认识了，玩得就挺热闹，也挺开心。那时，我们四五个很要好的女孩子，那就是除了我还有周伯伯的侄女秉德、叶子龙叔叔的女儿燕燕、二娃子与妹妹李讷。

我们虽然年岁不同，班级不同，但一到节假日，总爱在一起玩耍。周六我们也跟上大人们一块去学跳舞。

我们家住的离南海很近。我们几个孩子就常到南海边去用两只手捞那些不长眼的小笨鱼、小笨

虾。大家把捞来的小鱼小虾放在一起，就想煮汤解解馋。找谁帮忙呢？大家想想，就决定去找爸爸。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中南海里，爸爸爱逗孩子们玩耍是出了名的。正因为如此，孩子们都喜欢爸爸。爸爸慈祥，说话又很有风趣，所以我们就拿着抓到的小鱼小虾风风火火地去找他。我们见到爸爸就七嘴八舌地说：“毛伯伯，毛伯伯，您看，我们捞了好多小鱼小虾……”

“毛伯伯，毛伯伯，我们把小鱼小虾都拿来了，和您一起吃饭行吗？”

“好啊！那你们就来吧！”爸爸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我们就一窝蜂似地把小鱼小虾送到厨房。

这顿饭，我们就跟爸爸一起吃了。餐桌上除了往日的几个简单的菜之外，今天多了一盘爸爸爱吃的苦瓜菜和一盆新鲜的小鱼小虾汤。

我们吃得高兴、热闹、开心。就是谁也没有动筷子去夹那一盘子苦瓜菜吃。爸爸就批评我们说：“从小就要学会吃苦，不学吃苦怎么行啊！”我们听了，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谁也不去动筷子。

因为我们知道，爸爸是个很随和又充满爱心的老人，就是不吃苦瓜菜，爸爸也不会因为我们不听他的话而生气。

不光我们孩子们在爸爸跟前能这样随便，就是在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和我们一样，跟爸爸相处得那么自然，那么随和，又那么随随便便，好像是与自己家的老人生活在自己的家里那样，充满着家庭的温馨，显得无拘无束。

年轻人有时喜欢动，也喜欢玩。爬高上低，逮麻雀捉鸟的。爸爸除了工作时间严格要求他们之外，余下的时间，任他们自由嬉闹、玩耍，从不去指责他们。

年轻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总是想出去走走，出去转转，到处看看，反正是喜欢热闹和自由点。爸爸对这点是很理解他们的。所以，只要不影响工作，爸爸从不去限制他们任何有益的活动。

爸爸曾不止一次地对他们讲：“我可没你们自由，他们都管着我。想吃的东西不能吃，想去的地方不让去。我是一点自由都没有啰！还是你们好哇！”

“主席，您也发牢骚啊！”卫士问。

“我也是和你们一样的人嘛！我又不是不吃不喝不吭不响的泥菩萨嘛！”爸爸的一席话，逗得年轻人笑起来。

爸爸又随着年轻人的笑声开怀大笑。

爸爸说：蒋介石这个人很坏，
外国人想要他，我们还不给哩

1951年夏季的一天。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也许是暑假期间，我记不太清楚了。那日的天气比较热。我和妹妹李讷一起玩，为一个什么话题我记不清了，我俩争论起来。

“蒋介石是中国人。”我坚持自己的看法说。

“蒋介石不是中国人，因为他太坏。”妹妹同样坚持她的看法。

“他是中国人。”我又说。

“他不是中国人。”妹妹讲。

“他坏，他坏也是中国人呀！”我说不出更多的理由，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他是坏人。坏人就不是中国人。”妹妹还是不同意我的说法。没办法，我们只好去找爸爸。让爸爸给我们判断谁说的对。因为爸爸学识渊博，世界上没有爸爸解答不了的问题。

“咱们找爸爸去，让爸爸说说谁对。”妹妹说着就向院里跑去，我也紧紧跟在她的后边一块去找爸爸。

爸爸这天穿着一条浅灰色的单裤，一件白色的

长袖衬衣，袖子卷起一截。右手拿着一本什么书，左手还夹着一个插着半截香烟的烟嘴，正坐在院子南边的一张藤椅上乘凉。

妹妹先跑到爸爸跟前，蹲下身子，两手扶着爸爸的双膝，面对着爸爸；我站在爸爸的背后，用手扶着爸爸坐着的藤椅背儿，从爸爸的右肩伸过头去，望着爸爸笑笑。

“爸爸，爸爸，您说，蒋介石是中国人吗？姐姐说他是中国人！我说不是。”妹妹性急地一口气把话说完，两手又使劲儿摇着爸爸的双膝，急切地盼望得到爸爸的回答。

“蒋介石是中国人！”爸爸面带微笑地说。

听爸爸这么一说，我心里挺高兴，因为爸爸的回答肯定了我的说法是对的。我站在爸爸身后，高兴得用两手撑着爸爸坐着的藤椅背圈，用力向上挺挺身子，有意让妹妹看看我得意的神态。

“爸爸，您说的不对。蒋介石那么坏，他怎么会是中国人？”妹妹在力争了，她的理由很简单，中国人都应该是好人，坏人就不许他是中国人。

“蒋介石是很坏，但他还是中国人。现在他跑了，跑到我们中国的台湾省去啰！”爸爸耐心地对讲着，深深吸了口烟后，又从嘴角轻轻吐出。我最怕闻烟味，就用右手把飘到我面前的轻烟左右拂开。

“蒋介石这个人很坏，外国人想要他，我们还不给哩。”爸爸说。

“那为什么不给外国？”我俩异口同声地问。

“因为，他是中国人！”爸爸说完，乐呵呵地笑了，我俩也跟着笑起来。

爸爸讲“王八为什么驮石碑”

我上高中时的一个星期天，爸爸突然来到我的房间对我说：“走哇，跟爸爸出去走走。”

我特别高兴，把桌子上的书、作业本收拾好，跟在爸爸身后，走出了我的房间。

原来爸爸要视察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他知道我今天在家，就带我跟他一块去。让我也换换空气，开开眼界。

我跟爸爸单独出去的机会还是很少的，今天可是个难得好机会。我高高兴兴地跟着爸爸走了。

我俩在车上聊得可热闹啦！爸爸一会问我的功课怎样？一会问我的生活如何？我都一一回答了他，还不住地向爸爸讲着一周来在学校发生的新鲜事。爸爸听得特别高兴，样子还特别专注，还时不时地同我一起笑起来。

汽车飞驰向前。路旁的树木、古建筑从车窗外

向后飞快地移动。突然，一座龟驮石碑一闪而过。我惊叫一声：“爸爸，那是什么？”爸爸也看到了，他让司机停下车。我们下了车，他领着我围着石碑转了好几圈儿，还停步驻足仔细地看那碑文。

“娇娃，你说说王八为什么要驮石碑呢？”爸爸问我。

我仰脸看看爸爸，向他摇了摇头。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这其中的典故。

爸爸略微思索了一会儿，大概是想想看怎么讲我才能听得明白，弄个清楚吧。我在等爸爸说故事。

爸爸却用浓重的湖南音，配上曲调，还边走边两手打着拍子给我唱起来：“望望东来望望西，望见王八驮石碑。我问王八犯什么罪？上辈子卖酒兑了凉水。”

“因为它掺水，就让它驮石碑啦？”我疑惑不解地问爸爸。爸爸笑着不语。

回到车里后，爸爸给我讲了这个故事：

“驮石碑的不是王八，也不是乌龟。它的真名叫赑屃（bì xī），神话里传说，它是龙王的儿子。龙王有九个儿子，九个儿子中数它力气大，而且性格好，又善背重东西。它的身体形状和其他兄弟也不一样，它体形像龟，可头部又像龙。古人为死者立碑时，就想什么能让碑经久不倒，能保存千秋万

载呢？就想到了它，就把它请来。把碑立在它的背上，想借助它的力气，让人名传千古。”

“明代十三陵的石碑，是功德碑。就是靠它这龙首龟身给驮到现在，它还要继续驮下去。”

“有的石碑上面还盖着亭子，叫碑亭。以后别竖那么多碑，叫它驮得太累了。还是多建些亭子好。人们可以夏季避雨乘凉；冬季可以避风雪嘛！”

我的爸爸就是这样，常常是信手拈来一些典故，寓教于乐。在谈笑风生中，既受到了教益，又记住了故事。

我佩服爸爸的博学多才，跟爸爸在一起，真是长学问。

事情过去很久了，我才知道，爸爸唱的那种湖南音的调子是人们常说、许多人都会唱的类似“小放牛”的曲调。不管什么曲，什么调，反正我是不会唱。不过，我却是记住了这故事。

刚到爸爸身边时，我觉得一切都那么好玩，都那么新鲜，我生活得是那么幸福。尤其是在香山双清别墅的那短暂的日子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那时，我同二哥岸青和爸爸在一起，不仅能常常见到爸爸，每天还都能跟爸爸一起吃晚饭。跟爸爸一起漫步在香山的小路上，当爸爸休息的时候，

拉着我的手，二哥岸青跟在爸爸身旁。我们仨高高兴兴地聊天、散步。爸爸给我们讲了好多我从未曾听说过的故事。

只可惜，时间长了，都记不起来了。

有一天，我们俩跟着爸爸又去散步。我用脚时不时地踢着路旁的小石子，看它们一个个骨骨碌碌地往前跑，我觉得特别好玩。我手里拿着从路边采下的小花、小草，一会儿问爸爸这是什么花？一会儿问爸爸这叫什么草？玩得真开心。走着，走着，看见一个老头梳着一条大辫子。

“爸爸，男人为什么也留辫子呢？”我问爸爸。

“您为什么要留辫子？”爸爸走上前去问老人。是想让那老人亲口回答我的提问。我紧走两步站在了爸爸身边，想听听。那老人没有说话，只是冲我们笑了笑，就走了。

“清朝时，老百姓要是不留辫子，那是犯罪。要是把辫子剪掉了，那是要杀头的。革命者不怕杀头，就都把辫子剪掉了。”

爸爸回头看着二哥岸青说：

“岸青没有辫子。你是不怕杀头的革命者。爸爸也没有辫子，也是革命者。娇娃留了两个辫辫，你是怕杀头哟！”爸爸说着用他的大手扯了扯我的两个小辫子，逗得我俩都跟着爸爸笑了起来。

第三章

- 爸爸和他的儿子岸英、岸青
- 爸爸和他的女儿
- 爸爸和我的远志姐姐
- 爸爸带我们学滑冰
- 爸爸的家教真严
- 爸爸告诫：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女儿
- 爸爸提出：娇娃，你来帮助爸爸管理这个家好吗

爸爸和他的儿子岸英、岸青

延安，是我诞生的地方，可在我的印象中却没有留下一点记忆，但我对它却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这种感情因何而来？是因为我的爸爸在那里生活、战斗了13个年头，因为我的大哥岸英在那里

生活、学习过，而且妈妈也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将近两年。

我回国以后，大哥不止一次地向我讲起过延安，讲起过爸爸的生活，说起过妈妈的工作，谈到他自己的学习。

他说：在延安，他只呆了一年左右，时间虽短，但他所受到的教育却是很深的。

他讲：“我从莫斯科乘飞机到迪化（乌鲁木齐）又乘小飞机由迪化到西安，再从西安飞到延安，回到爸爸的身边。那是1946年初。

“我到延安时，正值数九寒天。三九天的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刮得天昏地暗。飞机在延安上空转了个大圈子，向机场俯冲降下时，可把人颠得够呛，震得人几乎从座位上掉下来。当飞机刚一停住，我第一个站起来走到机舱门口。心里想：我的爸爸会到机场来吗？他会来的；不，他太忙了，听说身体不太好，他不会来的！我的爸爸……18个年头未见到他啦！……

“当我走到舱门口抬头看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黄土高坡。灰蒙蒙的天空下，凛冽的寒风，摇曳着枯干的树枝。陌生，那么陌生；远远地只是黄土高坡，还是陌生。而在那些陌生的人群中，有我的爸爸吗？

“我弯着身子走出机舱时，啊！我的眼睛亮啦！我一眼就看到站在舷梯脚下的我们的爸爸——毛泽东。是他，是他，跟照片上、画报上、电影里的形象一模一样：魁梧、高大、和蔼、慈祥，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好像也看到了我。是他，是他，我最亲爱最敬仰的爸爸——毛泽东。”

“我也忘了自己是怎么走下舷梯的。爸爸张开双臂紧紧地把我抱住，激动地说：‘你长得这么高了！’我也紧紧地搂着爸爸，连声叫道：‘爸爸，爸爸，我想您啊！’爸爸看看我，亲昵地说：‘我一样想你啊！’”

“随后，我同爸爸坐上吉普车回到爸爸的住地王家坪。”

“爸爸对我很亲，但要求也很严，开始我还真有点受不了。他不让我跟他一起住，一块吃，让我到机关住，在机关吃，还不许我吃小灶。”

“有一回我去看爸爸。爸爸问我：‘你吃么子灶？’我说：‘吃中灶。’爸爸生气地说：‘你应该跟战士一样，吃大灶去嘛！’我一声没吭地服从了。”

我想起爸爸曾对我说过：当大哥回到延安后，爸爸让他脱掉苏式军装，换上他给他的旧棉衣、棉裤。爸爸把这个“洋学生”、“苏联军官”打扮成了一个农民，一个“土八路”。

再后来，便是送哥哥到“劳动大学”去学习了。

爸爸对大哥岸英说：“你过去是吃面包喝牛奶，回来要吃中国饭，吃陕北的小米，小米可养人哪！”

哥哥下农村时，爸爸把自己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衣送给他。走的那天，哥哥又脱去大皮鞋，穿上爸爸给他的布鞋，背包里装满了小米，菜籽，瓜籽。他就这样上路了。

爸爸送了他一段路，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岸英，你要和老乡们一同吃，一同住，一同劳动，要从开荒一直到收割了再回来。等你‘劳动大学’毕了业，再上延安大学好不好？”

“好。”哥哥爽快地答应道。

哥哥带着爸爸的重托，走到劳动人民中去了。因为他知道，爸爸的一生与农民、与人民是分不开的。爸爸同样希望他也能如此。

哥哥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他很快就投入到群众中，他吃苦耐劳，又肯干。尽管一天劳动之后，他已累得腰酸背痛，浑身没有一点劲，就像是散了架子一样难忍难受，可他从不叫苦，不偷懒，更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因为他牢牢记着：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所以，再苦再累他都坚持下来了。

在“劳动大学”里，哥哥学会了赶着毛驴下地

送粪；学会了把玉米种子袋袋挂在脖子上，单手点种，又学会双手同时点种的手艺；还学会了撒种时两手同时使用，他一手点种，一手抓粪。当地农民夸赞他说：“岸英是个好后生，学会了施粪、犁地、刨地、播种这些庄稼活，是个好劳动力。”

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1946年下半年，胡宗南要进攻延安。村里就决定把哥哥送回来了。

爸爸仔细地端详着哥哥，高兴地不住点头笑。他见哥哥头上扎着毛巾，身上穿着跟农民一样的灰土布汗褂褂，胳膊黑油油的发亮光，脸也晒得黑黑的，跟陕北农民一个样。

“好哇！白胖子成了黑胖子了！”爸爸说着又疼爱地摸摸哥哥那双厚实粗糙的大手，看看手心里那些血泡结成的厚厚的老茧子，又夸道：“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

哥哥也笑了，因为他没有辜负爸爸的教导。

想到这些，我就想到延安的窑洞，延安的黄土坡；延安的小米饭就感到特别的亲切，好像我们一家人，都与延安有缘，都与延安有着千丝万缕扯不断的情。

后来，大哥又告诉过我：“江青是1938年底同我爸爸结婚的。”还说：“她不如贺妈妈好，我和岸青都喜欢贺妈妈。”

这就是说，我两岁时就有了后妈。只不过是为我当时年岁太小，记不得这些事。

我认识江青，还是我 1949 年回到我爸爸身边以后的事。

有关她的事情，大家知道的比我还多。她的下场，大家也都看到了。这是历史给予的最公正的判断，人们给予的最恰当的评说。

平心而论，江青开始也不是个坏人。不过人总是在变。有的人可能由坏变好；有的人会由好或一般而变坏。江青该属于后者。听哥哥说，他刚回到延安时，江青还给他织毛裤，织毛背心、毛袜，也算是关心吧。后来就变了，变得对家里人谁她都不关心，不爱护，惟独钟爱她自己，变成了个自私自利的人。她聪明，但不走正路，这也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吧！

我叫过她妈妈，那是为了我的爸爸。但在我心中，我只有一个妈妈，她是贺子珍。

在与爸爸相处的日子里，我越来越感到爸爸对我们的爱是很深的，我越来越体会到，爸爸对我们的爱是永久的。

爸爸是个伟人，又是一位普通的细心的慈祥的父亲。我深深感到：由于历史的原因，环境的影响，使得我们这个家庭的组成，显得比一般人家复

杂。当然在我的同辈人中，有不少家庭也是如此。甚至比我们家还要复杂些，麻烦事还要更多些。

我爸爸有过三次婚姻，也就是说，他先后有过三位夫人，而且每位都留下了同父异母的子女。这当然也可以说是由于爸爸的情感变化所致。所以，作为父亲，他总是由衷地希望我们这些孩子们能够友好相处，和睦善待。为此，爸爸总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尽到一位父亲的责任。

1946年1月7日，爸爸给岸青哥哥写了信：

岸青，我亲爱的儿：

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喜欢。看见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你妹妹（李讷）问候你。她现在已五岁半，她的剪纸寄给你两张。祝你进步、愉快、成长！

对于我们兄妹，爸爸是很尊重我们个人的感情的。他从来不把我们不能接受的感情以父辈之权强加给我们。他允许我们各自保留自己情感的小天地。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尽管爸爸日理万机，忙于国家和世界的大事。但他也要抽

空给不在身边的孩子写信，问寒问暖问学业，对孩子进行教育，给予父亲的关怀。

1937年，两个哥哥到了苏联。1938年，有人从苏联带回了两个哥哥的照片。爸爸高兴得一遍又一遍地看个没够。当得知有人要去苏联时，爸爸马上写信给他们：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的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地喜欢。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健康、愉快与进步！

毛泽东

三月四日

1939年8月，岸英哥哥已插班进苏联十年制学校的六年级学习，爸爸又有信给他们：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喜欢！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

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能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在信的字里行间中，既有爸爸深深思念远在异国他乡的孩子的心情，也饱含了爸爸对孩子学习上的关心，同时，更反映出爸爸不光关注自己的孩子，还关心着所有在苏联学习的其他的孩子。

就是在爸爸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紧张繁忙的工作中，爸爸也忘不了远在异地的大哥岸英，抽出空儿来给他写信：

岸英儿：

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

文，托便带去。我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仗，打得敌人很怕我们。

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

我和岸青、妈妈回到哈尔滨后，爸爸又写信给岸英。

岸英：

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的，身体好。我和江青都好。

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再谈。

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

1947年9月12日，爸爸给岸英哥哥的信中说道：“永寿（岸青）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

1947年10月8日，当爸爸得知二哥岸青回国时，又欣喜万分地写信给岸英哥哥说：“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见他。”

就这几笔，就这寥寥数语，却道出了爸爸思念孩子的心切，想念孩子之深情。

爸爸和他的女儿

爸爸对我们是既爱又严。他处处事事时时严格要求我们，不许搞任何特殊，又处处事事时时流露出他对我们既丰富又细腻，充满温情的父爱。

1958年初，妹妹李讷得了急性阑尾炎，实在是疼痛难忍，需要尽快住院治疗，又因小时候因病

打针时，针头不幸断在肉里，当时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取出。这次的病需要动手术，医生们经过商量，决定两个手术一块做。

以往，我们看病的事都是由江青负责安排。这时，江青恰巧不在北京到广东去了。这事就全由爸爸亲自联系处理。李讷就住进了北京医院。

结果，阑尾手术做得非常顺利，但是取断针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开刀后，发现断针已移了位置，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怎么办呢？最后只好把她抬到 X 光透视室，进行边透视边寻找。这才把已经生锈的断针取出来。

因为手术是在无菌室外进行的，因此伤口引起感染，她发高烧了。

爸爸知道后，一边忙着国家大事，一边还在惦记着她的身体。爸爸也真够操心，真够累的了。那天，爸爸忙得通宵没睡，都到中午了，吃了几片安眠药后，准备休息时，可爸爸还是不能入睡，爸爸放心不下李讷，就给她写了封信：

李讷：

念你。害病严重时，心旌摇荡，悲欢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定，我也常常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

观又改观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你以为如何？妈妈很着急，我也有些。找小员，院长计苏华，主治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诸同志今天上午开了一会，一致认为大有好转。你昨夜睡了九小时，你跑出房门在走廊上看画报。白血球降下来了，特别是中性血球，已恢复正常。他们说不成问题，确有把握，你可以放心。这点发烧，应当有的，完全正常。妈妈不放心，打了电话给她，她放心了。李讷，再熬几天，就可以完全痊愈，怕什么？我的话是有根据的。为了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知道吗？你大概十天后准备去广东，过春节。愿意吧。到那里休息十几天，又陪伴妈妈。亲你，祝贺你胜利，我的娃！

爸爸

二月三日上午十二时

半睡状态执笔，字迹草率，不要见怪。有语叫小员来告我。

这就是我的爸爸，就是我的作为伟人的爸爸。爸爸在信中，充满着父爱，充满着无限的温柔亲情。

1954年夏天江青带着我和妹妹李讷到北戴河，我们在那里尽情地玩儿。倾听着大海的波涛。我俩玩得特别高兴。又同时想到爸爸。我们想，也应该让爸爸到这里来放松一下，休息休息。爸爸日理万机，为国家大事而操劳，他也实在是太累太累了。爸爸也早就说过他要来，但至今还迟迟没来。我们一是想爸爸，二是心疼爸爸，也想让爸爸分享我们的快乐，所以就给爸爸写了信，希望他快来这里。很快，我们就收到了爸爸的回信。

李敏、李讷，我的亲爱的女儿：

你们的来信都收到了，很喜欢。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我好，勿念。

亲你们！

爸爸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三日

信中，透着爸爸对我们的爱，更透着爸爸对我们学业上的关心。

我将曹操诗全文抄下：

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不久，爸爸来到北戴河，带着我们下海游泳，与我们共享这亲近大自然的快乐。畅游之余，还与我们谈起曹操。爸爸喜欢曹操那豁达洒脱，直抒胸怀的诗句，就借古人幽思，抒今人情怀，写下了那气势雄壮的《浪淘沙·北戴河》的名篇：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尽管我对古文古诗尚未熟读，不能理解全诗的内容，但我亲临其境地体会到：曹操登山观海，看到的是气象万千的变化，心里肯定是非常激动，借以抒发自己那种伟大襟怀，才写出了这不朽的名篇。

爸爸提及曹操，提及《观沧海》，除了想提高我的中文水平外，还是希望我能从诗中受到启发，受到熏陶，受到教益。

和爸爸相处的时间越长，我越来越多地体会到，爸爸在时时处处教我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爸爸对我们的管教，是以教为主的。因为对孩子管得太严了，不许动，不许跑，不许说，不许笑，不许……会把孩子管成傻子，管成个不动头脑只听指挥的木头人。爸爸讲：“孩子淘气好，说明他健康；会淘气的孩子更好，说明他智力发达。”

爸爸的严管，是要我们恪守本分，即办事、说话要有分寸，接人待物要懂得礼貌。爸爸要求我们扎扎实实地干事，堂堂正正地做人。要求我们生活上绝对不许有一点特殊。在外人看来，我们好像完全是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事事都有人照顾，只要我们一开口，好像什么东西都会有，什么事情都能办到一样。其实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呀！就好比如

用车吧，车是有，但归管理处管，要用车得事先说明，等候批准，我们正在学习，有什么特殊理由呢？就算爸爸的车子空着没用，可司机没有主管部门的指示，他也不会听我们的。他的任务是为爸爸服务。爸爸不能让我们随随便便坐他的车子。

我们用车可以，但有规定：如果有病，发烧38°时，可乘车，但必须是上医院，否则，也不许用。

我们家的伙食也极为简单，和一般家庭生活没有什么两样。就拿早餐来说吧，是同多数人家相同的“老三样”，稀粥、馒头加小咸菜。

有一回，有人给我们家送来一些可可、咖啡和奶粉。伙房的大师傅想，老吃那三样不行，干脆就乘机给孩子们换换口味，改善一下生活吧。

一天早上，往日的“老三样”不见了，餐桌上有一小锅香喷喷的咖啡，冲好了的奶粉，馒头换成了面包，抹上点黄油。我们看着就馋。

新鲜诱人的西式早餐，我已经有很久没有吃了。今天我的胃口大开。我一口气吃了四片面包，喝了两小碗加奶的咖啡。好香啊！我吃完冲着大师傅说声：谢谢，就骑上车子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

谁知好景不长，这事让我爸爸知道了。爸爸把我们叫到一起，说要开个家庭会。爸爸先让大师傅

报了这几天的伙食账，发现超过了每天的规定标准。爸爸严肃地说：“伙食标准规定多少就是多少。什么时候也不能超过。哪个随便超过都不行。”

我们都挨了批评，结果早餐马上就又恢复了“老三样”。

再后来，爸爸就干脆都让我们去机关大食堂就餐去了。爸爸批评起我们来，也够厉害的。

50年代末开始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几个人都在上大学，都住校。只有每周六回家才能同爸爸一起吃顿晚饭。

这是为了能让我们有机会和爸爸见见面，其实也是借着这个机会为我们改善一下生活。让我们稍稍解解馋。大师傅每到这顿饭时，都要加两个好点的菜。所以我们也早早盼望周六的这顿全家聚餐。

渐渐地，我们再吃这顿饭时，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照例加的两个菜，不仅质量明显下降了，有时连油花也见不到几滴，那种味道跟学校大食堂的菜也差不了多少，就连我爸爸最爱吃的炒辣椒，也越来越少了。

有一天，大师傅端上来一盘鱼。爸爸一向爱吃鱼。可是这条鱼，看样子也只有半尺来长，身子又扁又平，都不够一人一口的。我听大师傅说：爸爸也有好久没有吃鱼了。我们几个人都不动筷子，想

留给爸爸吃。爸爸奇怪地看看我们说：“吃呀，吃鱼啊！”

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呆呆地望着爸爸那也开始消瘦的脸，想说什么，但又一句话也说不出。还是爸爸把筷子伸向鱼盘，招呼道：

“吃，我来带个头。”

我慢慢地吃了起来，不知怎么的，我吃在嘴里的饭总也咽不下去，觉得它充满了一种特殊的味道，是酸、甜、苦、辣一齐泛上了我的心头。我说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家的一顿饭，这就是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与他的子女们的一顿饭。

爸爸对我们生活上要求很严，不许我们有一点特殊。政治上同样对我们要求很严，爸爸要求我们政治上要积极进步。要为人民做工作，为人民服务，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就可以了。

爸爸从来不要求我们将来要成什么龙啊，当什么凤啊。他说当一个普通百姓最好。

平常我们家生活如此，困难时期我们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咬紧牙关，勒紧腰带。我们由于缺乏营养而得了浮肿，同样，与全国人民共度这最困难的年代。

我想起爸爸曾说过，这比起在井冈山的一段生活来，也还算不错了。井冈山虽是绝好的根据地，

有它独特的天然屏障，要是种好地，农田里的收获足够供给我们这支军队了。它方圆五百里，纵横八十里，对我们来讲，地盘就已不算小了。等与朱德会师后，来了这么多的人，山上的条件相对变得差了些。部队没有冬装，山上的冬季也是很冷的，粮食又缺，我们的困难也很大，我们有时好几个月只能靠吃南瓜过活。

爸爸讲过，当年在革命受到挫折，遭到失败时，有人就沮丧，就灰心，好像眼前一片漆黑。我可不那么看，黑暗过去就是光明。有一次，我对战士们说：你们年轻人，嘴上还没有毛哩，我比你们的年纪大。我都想看到中国革命胜利，难道你们年轻人就不想？我希望革命胜利后，大家都健在，我和你们一起来庆祝我们自己的胜利。

爸爸的一席话，使我至今难忘。想想过去，看着眼前的暂时困难，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呢！

我知道，爸爸的这段话，是在告诉我，不要忘记过去。正如列宁所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想就是这个理。爸爸对我们的爱不光是在一时一事上，而是把眼光放在未来。

爸爸要求我无论办什么事，都要有始有终，都要专一，要专心致志地把事情办好。学生也是这样，学习起来，就是学习，不要去想别的么子事；

玩起来，就要痛痛快快地玩，就不要想作业没有完成或工作没有做完。总之，干什么都要一心一意，而不能三心二意。

爸爸和我的远志姐姐

爸爸不光对我们这样，对其他的亲属子女，也像要求我们一样，来严加管教他们。

远志姐姐是叔叔毛泽民的女儿，她曾对我讲过她的经历：

“1938年春天，我好不容易通过长沙、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辗转来到延安，可把我高兴坏了。第五天，我就去见伯父，还把我妈妈托我带给伯父的云片糕拿上。伯父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们谈的时间不长我就走了。

“我在延安呆了六七年，到伯父那里去的次数却不多。因为我来时妈妈说过，伯父是干大事的，少去干扰他。我就老记着妈妈的话。

“有一次，伯父很沉重地对我说：‘你有个大哥，活到7岁时，得黄疸性肝炎，送到医院治疗，洗了个澡就死了。’我这是第一次听说我还有一个哥哥。

“我刚到延安，特别不习惯吃陕北的小米饭。我有胃病，疼起来很难受。只好到食堂找米饭锅巴

用水泡泡吃。谁知这事让伯父的一位秘书看到了，给了我一块钱，他叫我每天花5分钱买碗粥喝。结果伯父知道了这事，他把我叫去，批评我说：‘你能不能吃小米饭呢？小米饭养人哩！不吃小米饭要饿肚子的。’我听了伯父的劝告，开始练着吃小米饭，很快也就适应了。”

有一次，大概是1941年的某一天，远志姐姐到杨家岭看病时，顺便去看了看爸爸。当爸爸知道她的病情后，留她在自己身边住了两个星期，等病好了才让她回单位去。这是远志姐姐多年来在爸爸身边呆得时间最长的一次。

1945年，远志姐姐和姐夫要调到东北工作。临走时，爸爸才把叔叔毛泽民牺牲的消息告诉他们。姐姐悲痛万分。爸爸忍着心中的痛苦对他们赠言道：“一，无论到哪里，都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二，无论到哪里，都要团结；三，无论到哪里，都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任何特殊。”

爸爸的三句话，成了他们终身行为的准则。在我们的教育中，爸爸也是以此为准绳，不因为是他的儿女就放松要求。

正因为姐姐是按照爸爸的教诲去做的，所以她在部队，在地方，调过不少单位，从来不以毛家人自居。总是不显山不露水地默默奉献着。很少有人

提及过她的家庭，几乎没有人了解她的身世。在单位，每当人们说到爸爸毛泽东时，她要么称“毛主席”，要么叫“老人家”，从不把自己与伯父毛泽东连起来。

就是后来，每到爸爸诞辰纪念或瞻仰爸爸遗容时，她总是悄然而来，又默默而去，在亲属的签字本上，从未留下她的名字。直到她去世，她都是这样做的。

爸爸带我们学滑冰

爸爸对我们的管教很严格，有时候是很严厉的。爸爸不光要求我们在学习上要尽心、努力、刻苦，在其他方面对我们的要求也同样的严厉。

我记得好像是在小学未毕业时，一个冬季的星期天，等我们各自把作业完成以后，爸爸就让我们几个孩子一起到南海冰场去滑冰。

我们当然很高兴。孩子嘛，就是喜欢玩。就一窝蜂似地跑向冰场。

什么事在自己没有亲自去实践之前，想得都很容易，看着别人做总是觉得很简单，可真要轮到自己头上来，真做起来，可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刚开始时，我的劲头挺大，兴趣也挺高。我们几个争先恐后地坐下来，换上爸爸让人给我们买来

的冰鞋。爸爸穿着大衣站在旁边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们。那神情，好像在说：行啊，孩子们练去吧！我冲爸爸笑笑，爸爸也冲我点头笑笑。

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一起身，一甩手，我的妈呀！还未迈开步呢，一个结结实实的屁墩就把我给摔倒在冰上，把我痛得直龇牙咧嘴。我回头看看妹妹李讷，她也摔在冰上，正在挣扎着往起站呢。我就咬着牙忍着痛也赶紧往起站，谁知越急，冰就越滑，越滑就越站不起来，两脚就是不听使唤，老在冰上打旋旋。好容易刚站起来，又摔了个头重脚轻四脚朝天地带响的。不过还算万幸，我知道要保护好脑袋，就是两肩、背、腰、屁股全着地，我的脑袋却抬得高高的，保住了我的“司令部”。

我扭头再一次看看妹妹李讷，她正在两手支撑着地面，撅着屁股往起爬呢，还没有等她站起来，两脚又往后一滑，她的两手失去了支撑力，来了个卧式，趴在了冰上。

我俩相视而笑。我看看站在冰场旁的爸爸。爸爸在冲我们笑，他在笑我们一个摔得四脚朝天，一个摔得满脸冰雪。那眼神那笑容中带着鼓励，仿佛是在告诉我们：勇敢地站起来！站起来再练！

再练，再摔；再摔，再练。不到规定的锻炼时间，爸爸不许我们退出冰场。又痛又累，实在没有

办法，真想退到旁边坐下来歇歇，但是父命不可违，我们只好又硬撑着再练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在冰上能站住脚了，还多少能往前滑几步了。

爸爸站在那里，一句话不说，只是看着，关注着每一个人。

扑通！李讷妹妹又摔倒了。她痛得太厉害，实在是受不了，就哭起来，她毕竟岁数还小。我趴在那里怎么站都站不起来，气得我索性坐在冰上，眼泪在我眼眶里转着。我使劲儿忍着不让它流出来。我怕让爸爸看见我流眼泪，就把背转向爸爸坐着。

“好了，收兵吧！”爸爸向我们打招呼说。

我一听，高兴得“腾”一下子站起来，哎哟，还没站稳，那冰像伸出手来拉了我一把一样。那么舍不得让我走，结果我又重重地摔倒在冰上。我哭笑不得。干脆，我就不站起来，连爬带滑地到了冰场旁边。

这次的练习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收拾好，尽管挨了不少摔，我们还是以胜利者自居，把冰鞋往手里一提，跟着爸爸回家了。

爸爸说：“怎么样？有何感想？”

“学滑冰太难，太难了。冰太滑，两脚又总是不听指挥，太难。”我发出了感叹。

“难就对头了，要知难而进嘛！”

“摔得太疼了。”妹妹说。

“好嘛，不摔不打不成材，摔摔打打长得快嘛！”

我原想，我们说的难度大点，爸爸也可能就此叫我们收兵，打道回府，以后就算了，谁知，爸爸说：“今天挨摔，明天就少摔或不摔了。下周再继续摔。”

第二个练习日，我们都穿上厚厚的棉衣棉裤，像个大棉包一样。吸取了前次的教训，这次摔跤是少多了，还能甩开手滑小圈圈了。人就是这样，凡事开头难。常言说得好，头三脚难踢。在冰场上也是这个理儿。练的次数多了，就有进步了，就有提高，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由失败走向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这话是爸爸的一句名言。

爸爸所以要我们这样做，并非是要培养、训练我们成为什么健将、能手，而是意在培养我们的毅力和意志。当初我并不完全明白爸爸的意图，以为就是让我们休息日内容丰富些，活跃一下生活；除了适当的学习外，还要放松一下，活动活动就成了。爸爸还意在要我们练好身体。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体魄，就难以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也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还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远新和我们陪着爸爸下水游泳。那天的天气是有些凉，远新上岸后就感到有点冷，我坐在他旁边也有点打哆嗦。他说：“娇娇姐，还是水里舒服些，咱们下水去吧。”不想这话虽声音不大，却让我爸爸听到了。爸爸就批评远新说：“你这个人就是喜欢舒服，怕艰苦，不肯吃苦。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嘛！”

爸爸就是这样，只要有机会同我们在一起，总是不会忘记随时随地对我们进行思想、品德的教育，他总是在日常的生活中，以小见大对我们加以训练培养。而这些教育，他不搞说教，更不讲那些让青年人不大爱听的空空道理。他总是人情入理，让我们自己去领会其中的道理。

人们常用慈母来比喻妈妈的爱，以严父来比喻爸爸的爱。可我觉得，我的爸爸则是身兼二者之爱。人们都爱用菩萨来说人的心眼善，心灵美。我的爸爸也同样有着善良的心肠，丰富而又细腻的感情。他把爱与教紧紧地结合起来，他既不空洞地说教，又不无原则地溺爱。

记得我回国不久，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学校放寒假了，我抽空对爸爸说：“我想到上海看看妈妈。”

“好嘛，你去吧！”爸爸说。

“我怎么走呀？我还没有一个人走过这么远。”

“买票，坐火车走嘛！”

“那，我就一个人去呀？”

“那么多人乘火车，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呢？”

“我有点怕。能找个人送我去吗？”我的意思是想让爸爸说找人送送我，可听爸爸的语气，好像没有这个意思。

“你是大孩子了。莫要人送，自己走。”

我的心一下凉了。心想：疼我爱我的爸爸，怎么这样对我？可我又不敢再说。因为我知道，爸爸决定了的事。是不会轻易改的。

结果我还是自己走了。有了这次乘车的锻炼，才有了以后独来独往的经验。

爸爸就常用这种方法来教育、锻炼我们的独立生活能力，不允许依靠他来享受什么特殊待遇。我想，这种爱，才是永恒的爱。

在我们的兄妹中，李讷是小妹妹。她是1940年8月3日生的。我们几个大的都因为种种原因，过早地离开爸爸的身边，而她却一直都生活在爸爸的身边。所以，有时候，我心里想：她是我们兄妹中最幸福的一个。她得到的父爱比我们几个都多，她是在爸爸的膝下长大的。爸爸的言传身教对她的影响会更大更深，她受到的教益也更多。我真的有

些羡慕她。

我们见面时，她9岁，我12岁，要从感情上互相接受对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相处中，互相之间总难免有些生疏感，在生活中也时常发生些小“摩擦”。爸爸在处理、解决我们的“纠纷”时，从不问谁是谁非，谁对谁错，也从来不各打五十板。爸爸最高的一招是和稀泥。常常是这样对我们说：

“当姐姐的要照顾小妹妹哟。”

“妹妹要听姐姐的话，要互相帮助哟。”

“你们要友好……”

“手心手背都是我手上的肉。你俩都是我的好孩子，你们要相亲相爱哟。”说着，还把一双大手翻过来背过去地伸到我们跟前。

在我眼里，爸爸可真的是个高级泥瓦匠。

等我们长大后，各自走向工作岗位了。爸爸有时就让我去看看妹妹，问问情况，回来告诉爸爸。有时爸爸又让妹妹来看看我，回去给爸爸报个平安。

爸爸去世后，因为我的身体不太好，不常出门，妹妹就约上好友到我家来相聚。我们高高兴兴地坐在一起，说爸爸，谈将来，挺热闹的。因为我们是姐妹，是毛泽东的女儿。我们并不像社会上流

传的那样，我们之间不仅来往，还有着深厚的姊妹之情。

我们兄妹共有十个。我有五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姐姐一个妹妹。由于战乱，他们有的被寄养在老乡家里，一直下落不明；有的夭折了。我的小弟至今还埋葬在前苏联莫斯科郊区的一座公墓里。

现健在的也就只有二哥岸青、小妹李讷和我三个人了。我们三个虽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但都是他的子女，他爱谁都爱得那么深，那么真；他对谁都寄予厚望，对谁都尽心尽责地努力培养，并望我们成才。他对谁都是一视同仁，从来不偏袒这个，宠着那个，一律严格要求，绝对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特殊。

爸爸的家教真严

在我们兄妹中，大哥岸英、二哥岸青和我在苏联生活的时间较长，受的又是欧式教育，加上俄罗斯人开朗、豪爽的性格影响，待人接物的方式有些欧化了。

我因为从小跟着妈妈，受她的影响，我的性格文静、内向。

大哥曾这样讲：

我刚到延安的时候，感到各方面都很别扭，生

活上也不习惯，风土人情又都不了解。我又从小在外边流浪，是在无拘无束中长大的。再加上在苏联养成的待人接物上的习惯，我们都欧化了，这与中国的习惯完全不一样。延安人看我也别扭，我一时也很难以适应这种全新的生活环境，觉得一切都那么陌生。

开始，我与对方谈起话来，高兴时就旁若无人般地开怀大笑，遇到听不懂，搞不明白的时候，往往是耸耸肩，摇摇头，摆摆手。我又特别喜欢用手势来加重与人谈话的语气。这些动作，爸爸看到后很不高兴，认为是毛病。

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这点，也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对。后来我才发现，我一抬手动作时，爸爸总是用他那双眸盯着我的手势，把我盯得很不好意思。

再后来，只要我一有手舞足蹈的动作时，爸爸那双锐利的眼睛便又盯着我，搞得我莫名其妙很不自在。这是为什么呢？我想爸爸很可能是看不惯，或不喜欢我的这些动作。爸爸没有直说，只是用眼神来告诉我。要我注意，让我改掉！

果然叫我想对了。爸爸讲：你现在是在中国，在延安，不是在苏联。你要按照东方人的传统习惯行事。爸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年轻人在长辈面前，在年纪大的人面前，要文静，要规规矩矩地跟人说话，不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听了爸爸的话，我开始注意起自己的言行来。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中国式的待人接物的方式。有时候旧习惯也难改得彻底，在一定的场合时，我一忘情又会冒出手舞足蹈的动作来。每当这时，只要我一抬手，我的眼前就会出现爸爸那冷峻的目光，我就会立刻放下手，改正过来。

爸爸不光让我改正了这些习惯，还让我穿上了他给我的旧棉衣棉裤，渐渐地我让爸爸给改造了，变成了一个内外一体的名副其实的“土八路”。

爸爸还教我按中国传统方式与人交往。爸爸对我这样说：“你先去看看延安的老同志。见了人不要没大没小，年纪大些的，你喊他伯伯、伯母，叔叔、婶婶；最老的要喊爷爷、老爹爹、老奶奶；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你就喊哥哥，或称同志。不能随随便便就直呼人家的大名。”

听了爸爸的话后，我就到各个窑洞去看望老一辈人。

“周伯伯您好！邓妈妈您好！”

“朱爹爹您好！康妈妈您好！”

“……”

大哥说的一点也不错。我想起刚到爸爸身边不久，其实这种管教就轮到我的头上来了。爸爸对我进行中国传统式教育就开始了。

我刚到北平时，正值5月。我在苏联呆得时间长了，培养了耐寒性，习惯寒冷的季节。北平的五月，对于我简直就像已经进入夏季一样，觉得天气很热。可再看看那些住在香山的人们，有的穿着毛衣，有的穿着绒衣，还有的穿着棉衣棉裤。我真感到奇怪，难道他们真的就不觉得热吗？

这样美的好天气，好节气，这样好的太阳，简直像是在苏联时的夏令营里生活一样，太好了。太阳光真是太宝贵了，我可要充分利用它。我就像当年在苏联日光浴一样，穿着小短裙、小背心，光着脚丫，晒太阳。多好的日光浴啊！

晒过了，我就穿着妈妈给我做的小裙裤，穿上小背心，赤着胳膊，光着脚丫在院外的小道上，树林间跑着，玩着，累了就又跑回家，在屋外的院子里继续晒太阳。

这些，都让爸爸看到了，爸爸倒是没有像对哥哥那样对我。爸爸对我说：“你这身打扮，太不成体统。要改改哩！”

我不懂爸爸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什么叫体统。我只好抬头不解地望望爸爸。

爸爸走到我跟前，他没有批评我，而是关切地说：“娇娃，现在的天气还太凉，不可穿得那么少。会着凉生病的。这儿的风很硬哩！这里不兴光脚丫，这地方地又不平，莫把娇娃的脚扎破了，快把鞋子穿上。”

后来，爸爸就把叶子龙叔叔叫来了。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见。反正没过两天，我就穿上了看起来还是比别的孩子洋气点的白底蓝花的连衣裙。这种衣服，在苏联常见，在那个年代的北平，却是很少见到有人穿。一双皮凉鞋虽然小点，穿上后有点夹脚，小脚趾头有点疼，我还是把它穿上了。

我看看自己这身打扮，心里想：这大概就是爸爸说的“成体统”了吧。因为爸爸见到后再没有说什么。

当然，爸爸也像教育大哥那样，让我喊这位伯伯，叫那位爹爹。所不同的是因为我的年纪小，没有让我自己去——看望。多数是他们来同爸爸谈工作时，由爸爸带着我去见他们，由爸爸给我——指点让我认识老一辈人。

我爸爸的家教严格，从我们兄妹的点滴体会中就可以看到了。

爸爸对我们的教育方法也不尽雷同。大哥大了，爸爸对他的教育是尽在不言中。这种方法对年

纪尚小的我来讲，恐怕就不容易，而爸爸对我这样一个女孩子，则总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爸爸告诫：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女儿

爸爸从来不把我们子女当做他的私有财产，从来都不主张把我们拢在他的身旁，靠着这棵大树乘凉。更不允许我们以他的名义、地位、权势去为自己的生活、学习、工作诸方面去寻路子、谋私利。爸爸总是把我们看成同任何人的孩子都是一样的，都是千千万万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之一。视我们为人民的财富。

爸爸一再教育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记住：你们是我毛泽东的子女，处处、事事、时时都要夹着尾巴做人。爸爸把我们当做一个普通党员、普通工作人员，生活安排，工作去向，完完全全由组织上去调动处理，从不让我们有一点特殊感。

跟爸爸在一起时，如果范围只是我们自己家庭的成员时，我们就都放开了，就无拘无束地跟爸爸一起欢聚。这时候，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敞开自己的思想，天南海北地同爸爸聊天。我们可以根据各自的兴趣、爱好，向爸爸提出各种问题。此时，爸

爸可真忙活起来，一会儿跟这个说几句，一会儿又回答那个的提问，气氛活跃极了。这种场面就像是如饥似渴的求知的学生，充分利用课间这宝贵的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一样，围着爸爸问个不停，说个没完。爸爸是有问必答，答必让人满意。每每这时候，我们感到生活中是欢乐、是愉快、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家庭团聚。

有时候，爸爸需要换换方式休息，我们也可以随心地跟在他的身边，跑在他的左右，共享这人间天伦。有时爸爸想玩玩扑克牌，我们虽然也会玩什么“杜拉克”之类，但都自知不是爸爸的对手，谁上阵谁成为爸爸手下的败兵。所以每到这时候，我们就得甘拜下风，退到一旁观战，看爸爸与身边的工作人员“战斗”了。有时还在一旁自作聪明地出点小点子，给爸爸支支招儿。这时候，爸爸绝对不责怪我们随意见论、插嘴。我们更多的时候则是忠实的观众。为胜利者鼓掌，为失败者加油就成了我们的光荣任务。

如果是因公外出参观、视察，爸爸认为带我们去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我们进行教育时，有时也会让我们相随而行。但绝对不许我们在他的身边左右转来走去，只能是在工作人员身后相随。在接见任何一级单位领导、代表时，不许我们抛头露面。这

些都是要我们绝对遵守照办的。

我心里想，能跟着爸爸出去走走，见见世面，开开眼界，看看新事物就心满意足，哪里还敢存有什么非分之想。所以，有多少次外出参观，虽然我们都跟着去了，但在新闻照片中，却很少留有我们的影子。

有一次，我跟着参观，我一不小心稍微走得快了一点，稍不注意，占了一位工作人员的位置，并把他挤到我的身后了。这时，我发现爸爸看了我一眼。我以为是我的衣着不整齐，或是衣着不干净，有什么地方伤了大雅。我赶紧低头看看自身，一切都很正常。我就站在原位置没动。这时，爸爸又扭过头来再看我一眼。那眼神是严厉的，像含有不可抗拒的命令似的。这时我明白了，这是让我走开的意思。我就悄悄地退到了工作人员的身后，再也不敢往前面站了。

一切都结束了，在回来的路上，我心里觉得很痛快，有股说不出的滋味儿。心想：我怎么了？我也没说话，也没吭声，不就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呆着，看着吗？我没有越轨之举呀！我真有点搞不清楚自己有什么错儿，爸爸会用那种眼神看我。我确实是越想越有点生气，坐在那儿一声不吭。

“娇娃，想什么事哩？”爸爸突然问起我来。

“没有，没有想什么……”我一时也回答不出来。我抬眼看看爸爸。爸爸还是往常那种和蔼可亲的笑容。我还是我，衣着还是刚才的衣着，没有什么变化呀？这是为什么？我忽然想起来，在家时，爸爸曾不止一次地这样对我说：“有工作人员在我身旁时，你莫要随便站到我身旁把他们挤走，这是他们的岗位，是他们的工作，这是党分配给他们的任务，这是组织的安排。他们如果不在我的身旁，那就是失职，失职那是要挨批评的……”

这时，我才明白了爸爸当时为什么用那种眼神看我，那是在告诉我：娇娃，你该走开！那个位置是他们的！想到这里，我就自责自己太笨了，为什么刚才就没有往这方面想呢？死脑筋，要早想到，早离开那个位置该有多好。想到这，我又看看爸爸，我冲他笑笑。我的笑中含着歉意；我的笑中有着认错；我的笑中还告诉爸爸，以后我再也不会做那样的蠢事了。

我的心放宽了，因为爸爸的眼神告诉我他已经理解了我，原谅了我无意中的过错。

1960年的4月，我又随爸爸去中南海瀛台，参观技术革新的展览会。这次我牢牢记住了爸爸说过的话，牢牢记住了上次的教训，我就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往前挤！所以我总是跟在最后。后来，还

是爸爸把我拉过来，要我仔仔细细地，认认真真的看工人的革新成果，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学习机会。

这次，我才小心谨慎地站在爸爸的身边，才有了那幅正面的照片。这张照片，成了我露面的永久的纪念。看到它，就想起了我的爸爸，就想起了爸爸对我们的教导：要夹着尾巴做人，做一个普通人。

有一次，妹妹李讷因病要住院。爸爸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许她报真名，更不许她提是毛泽东的女儿。为了避免医院对她有任何特殊的照顾，就给妹妹改名叫沈娟。对医院讲她是爸爸身边保卫人员沈同的女儿。

爸爸不许我们搞特殊，更不许我们打着他的旗号去谋私利。爸爸曾一再对我们讲：“靠我毛泽东不行，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去努力、去奋斗。不要把我挂在你们的嘴边上去唬人。”

爸爸曾这样对二哥岸青讲：“工作了，对同志们说时，你告诉人家，你是中宣部的翻译，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

对我讲：“你还在上学，告诉人家你是学生，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女儿。”等我参加工作后，爸爸这样告诉过我：“告诉人家你是解放军干部，也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女儿。”

爸爸提出：娇娃，你来帮助
爸爸管理这个家好吗

爸爸对我的管教很严，但凡事从不强加于我，总是在讲明道理后，让我自己去权衡利弊，自己去动脑筋想想进行选择。一旦我决定了自己的选择后，虽然与爸爸的想法，要求不符，爸爸还是很尊重我的决定，并能全力支持我，绝不以家长身份强迫我。

爸爸在我眼里是长辈，爸爸在我心中是我的朋友；我在爸爸眼里是女儿，在爸爸心里又是个小大人。我可以为爸爸分忧解难，助爸爸一臂之力。

我高中毕业时，爸爸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说：想让我来帮助爸爸管这个家，爸爸是经过再三考虑才这样提出来的。爸爸曾有过两次嘱托我代他照顾家里的亲人。一次是托我照顾二哥岸青，另一次是妈妈病重时，托我照顾好妈妈。那时我不光是答应了，而且还是尽我的全力去做了。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我是竭尽全力，努力去做了。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该做的都做到了，该尽的义务也都尽了。爸爸对我能如此尽责还是挺满意的。也可以说对我的两次受托，爸爸还是很放心的，也是很信

任的。说实话，这两次考验还是成功的。因此，爸爸又一次向我提出：娇娃，你来帮助爸爸管理这个家好吗？

“我的水平低，刚刚是个高中毕业生，就凭这点水平和我的能力，是管不好这个家的。”我诚恳地对爸爸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你的水平要比我当年帮爷爷理账时的小学水平要高嘛！实践也是学习嘛。”爸爸又说。

“我水平低，也就是过去小学四年级的程度。我真没有能力来担起这副担子。我想……”我的话没说完。

“你想什么事？”爸爸看看我问。

“我想高中毕业后，继续升学……”

“噢。想得对，想得对呀。”爸爸像是对我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从这次谈话以后，爸爸再也没有提起要我代为管家的事。显然是爸爸已经知道了我的心思，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高中毕业，准备继续升学时，爸爸又同往常一样，关心我的身体。他总说莫要太紧张了。他关心我的学习，教我要有劳有逸，劳逸结合，不可因为升学复习把身体搞垮了。他从此全力以赴地支持我升学。

我升入大学以后，因为身体不好，感到非常苦恼。爸爸知道了，他要我好好注意身体。爸爸还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莫要搞坏身体，保养第一，休学一年未尝不可。”

这就是我可尊可敬的爸爸，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伸出那双宽大温厚的手，帮助我克服困难。在我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爸爸向我敞开了那宽大的胸怀，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力量。

有时候，我想起往事来，也感到心里有些不好受，觉得对不住爸爸。当初，如果我答应了爸爸的要求，帮助爸爸管这个家，也许会减少爸爸的精神负担，也许会使爸爸少些忧愁，多点欢乐，也许会使爸爸能够更健康地……

这只能是事后的话，事后的也许，事后的设想。如果我真要接了这个重担子，也许我会给压趴下，也许我会管得更糟，也许……但这已不再是可能重现的生活了。

人们可能认为“中华第一家”什么事都好办，都顺心。其实，大家有大家的难处。

我现在这样想，是我做女儿的心灵上有无尽的欠缺和遗憾。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对爸爸抱有很大的遗憾，我觉得我从爸爸身上得到的太多太多，而我给予爸爸的却太少太少。

第四章

- 我的爸爸是农民的儿子
- 我的二叔、三叔及姑姑
- 我的杨开慧妈妈
- 我的楚雄哥哥和岸英哥哥

■ 我的爸爸是农民的儿子

爸爸的一生为革命而奋斗，他献出的还有6位亲人的生命，爸爸一生系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上，他的心与人民共甘苦，这因为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我家祖辈都是农民。一家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爷爷10岁时，由父母做主与湘乡县文芝仪之女文七妹订了婚，15岁完婚。16岁时，外出当兵。他把军饷积攒起来。退伍后回到韶山。17岁开始

理家，那时家里仅有六七亩地，一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年为温饱操劳。爷爷精明能干，肯劳动，会省俭，又善于经营，是个好当家。他常说：“吃不穷，用不穷，人无计算一世穷。谁会盘算，谁就能过好日子；不会盘算的人，你给他金山银山，也是空的！”

爷爷带着一家人勤奋劳动、省吃俭用，家里没有吃闲饭的。每年口粮之外的剩余谷子，用作押进田产，取利息钱。还兼做贩运谷米和生猪的生意。开始是少量的小规模的运送。后来，得到奶奶文七妹娘家的贷款帮助，就到湘乡大平坳一带成批购进稻谷，加工销售，并逐步由肩挑改为土车运送。直到发展到从银田寺雇船装运白米，运往湘潭市易俗河出售。家里也开始雇工，起初是雇短工，后来雇一长工，在冬天碾谷的时候，还得多雇一个短工。不过，一家人还照常都要去干活。爷爷还贩卖耕牛。渐渐地，他积攒的钱更多了，便于1903年买进堂弟毛菊生的七亩水田，使田产增加到22亩，每年收稻谷约八十担。此后他虽然继续聚积财富，但不再买进土地，而是典进别人的地，大致是由于典地要比买地便宜，又不用自己操心农田，对经营生意比较有利。一来二去，他的资本增加到两三元，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个大财东。

爸爸 1893 年 12 月 26 日出生在这个家里。

爷爷非常勤劳、顽强，但脾气粗暴。爸爸在农民的家庭长大，最懂得农民的疾苦。

爷爷个子不高，很壮实，但长期艰苦的劳动，使他身体衰弱得过早。爸爸却长得高大，虽然只有七八岁，已跟十岁的孩子差不多，大手大脚浑身是劲。见爸爸长大了，爷爷便送他进私塾读书，这比一般山村农民高明。他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岳父家文氏多有读书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读书不多，在一桩柴山公案中败诉，明明自己有理说不出来，对方引经据典，被告变成了原告，眼看着柴山断给了人家。因此，他想培养爸爸读书，也能引经据典，给自己争口气。

1902 年春，刚过了元宵节，爷爷就把爸爸送到离家不到二里的南岸邹春培老师的私塾，受启蒙教育。

邹塾师五十多岁，他把爸爸引到东墙下神龛的地方说：“这是孔夫子的神位，从今天起，你每天早晨进来，都要对神龛作揖。以后，你就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老先生高兴地对爷爷说：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爷爷忙说：种田人家的子弟，不稀罕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账，写得几句来往信札，就要得了。

爷爷对爸爸读书不用操心。但是，对爸爸很像自己的倔强性格，却很伤脑筋。一天中午，天气炎热，先生又不在私塾，爸爸就提议大家去游泳，老先生回来看见学生们赤身露体游泳，以为不雅，要惩戒他们。爸爸却引用《论语》上的话说，孔夫子是赞成去河里洗冷水澡的，并把《论语》打开，把孔夫子的原话念给教师听。老先生一听，想起确实有这样一段书，但一时又下不了台，就到上屋场，找爷爷告状，火气很大地说：“你家润之了不得啦，他的才学比我高，我教不了啦！”爷爷历来家教很严，听说儿子带头闹学，同老师顶嘴，格外恼火，顺手在路上拣了一根楠竹板子，向南岸私塾奔跑过来。看见爸爸，不问情由，便劈头盖脸地打来。爸爸急忙躲避，回头就跑。爷爷怎么也追赶不上他，急得跺脚骂着：“我看你跑到哪里去！你敢回来，我就要打死你这个没王法的东西！”爸爸知道父亲的性情，这时候要回到家里，那准定要挨一顿死打，连母亲都劝解不住。就决定不回家，去县城。但是，他毕竟是不足十岁的孩子，在山里转了三天只离家八里远，没走出韶山冲。爷爷托人四外寻找，最后由一个砍柴的老人遇到，送回家来。爷爷找到儿子后，没有再打他，态度也缓和些。爸爸认为这是他第一次反抗的胜利。三十多年后，爸爸回

忆这段经历时风趣地称它为“胜利的学潮”。

不久，爷爷送爸爸进桥头湾、关公桥、钟家湾、井湾里等私塾读书。先后经过五年的读书生活，爸爸有了相当的读写能力，但他不满足于《四书》《五经》，想停学务农，在家自学，看更多的书。爸爸同爷爷商量时，爷爷同意了，他希望爸爸能当家理财。他对爸爸说：“我原本就没有指望你去考举人秀才，现在又废除了科举，再读书也没有用。田里的活忙不过来，你回来也好。”从此，爸爸在家务农，白天像大人一样到田间劳动，学会扶犁、掌耙、扬谷、下种等农活。晚上替爷爷记账，并常常看书到深夜。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凡是能找到的一切书籍。读的全是旧小说等杂书。爷爷是极聪明能干的人，他虽然只读过两年私塾，却打得一手好算盘，左右两手都能打，因此爸爸刚上学不久，爷爷就教他打算盘、记账。他希望爸爸成为精打细算、兴家立业的人。不过爸爸的兴趣不在这里。

此时，爷爷按照古老的陋习，为爸爸娶了媳妇。爸爸与这位比自己大几岁的姑娘并无感情，一直不承认这桩“婚姻”。爷爷对他也无可奈何。父子间因思想观点不同，产生许多冲突。爷爷精明俭省，与爸爸的勤奋好学、乐于助人之间，时常引起

争端。晚上爸爸记完账目，就躲进自己卧室，点起桐油灯，在灯下看书，常常看到半夜三更。爷爷总是喊他：“快早点睡！明天早起还要做工夫！”奶奶有时候也催他：“快点睡吧，莫熬夜了，这样会把身体搞坏的。”爸爸也总是回答：“好，就睡了，就睡了。”可是，他没有吹灭那盏桐油灯，却用蓝布被单，遮住了窗户，不让灯光透露出去。爷爷是十分精明的人，瞒不过他，起床看见爸爸还在看书，吼道：“哪里这样的喊不赢哪！一夜熬掉了多少桐油，一个月就是几百文铜钱，这样下去，还了得！”说着，他又把那本线装书的封皮看了一下，原来是一本《西游记》，更生气了。爷爷历来就不信什么佛法无边，也不相信因果报应，凡是抽签卜卦、念经拜佛的事，他一律不喜欢。不过后来有一次他遇到一只老虎，心想必死无疑，可是老虎见了他却掉头跑了，就相信冥冥之中定有神灵保佑。从此之后，也和奶奶一样虔诚地信佛。

一年秋天，韶山冲里家家户户都在割禾。天气突变，下起了瓢泼大雨。冲里的男女老少赶快跑到自己的晒谷坪上，抢收稻谷。爷爷也赶紧召集全家紧张地收稻谷，惟独不见爸爸。不久，雨停了，爸爸浑身水淋淋地跑回来了。原来他在帮邻居收谷子。爷爷很生气，说，自己的谷子流到沟里去了，

你倒帮人家去收。说罢扬手就要打爸爸。爸爸却站着不动，理直气壮地说：“人家是佃的田，要交租，冲去一点都了不得；我们是自己的田，又比人家多些，冲走了一些也不太要紧。”爷爷听了更加冒火：“你说不要紧，你还吃饭不吃饭？”爸爸笑着说：“好喽！我一餐少吃一口，这总可以了吧！”

爸爸受奶奶慷慨、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影响极深，因此，对爷爷的为人处事颇为不满。他不满爷爷的吝啬，在受灾的年景，穷人们“吃大户”，爷爷却囤积谷子。有一次旧历年关，爷爷叫爸爸去收一笔卖猪的账，他去了，账也收了。不过，他回家的路上，碰见几个衣衫褴褛的穷苦人，就把钱都分送给了他们，惹来爷爷一顿骂。有一回，一个老阿婆，把自己的猪卖给爸爸，已说好价交了定钱。没过几天，爷爷叫儿子去把猪赶回来时，猪价又涨了几元，老阿婆后悔自己把猪卖早了，受了损失。爸爸很同情她，没有把猪赶回家，只收了老阿婆退还的一元定钱。这使爷爷很生气，骂他无用，不会办事。

爸爸有位堂叔毛菊生，家境十分贫苦，爸爸与奶奶都很同情他。可是爷爷却在堂弟最困难时，买下他家七亩水田，这件事母子俩都极力反对。但爷爷认为没有什么不应该的，他说：“管他兄弟不兄

弟，我是用钱买田。”这件事给少年的爸爸印象深刻。

16岁的爸爸渴望着走出韶山冲，到湘乡新式的学堂东山小学去读书，开阔眼界。父子之间，又发生了矛盾。奶奶站在爸爸一边，她和爸爸一起劝说爷爷，并请来亲朋好友说情。爸爸的老师毛麓钟、李漱清，表兄王季范、文运昌等都应邀到家中来说。爷爷最后只好答应了爸爸的要求。

1910年秋，爸爸第一次离开家乡，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一首诗赠给爷爷。诗云：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是根据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青年时的诗略加修改而成。爸爸把改写好的诗，夹在爷爷的账簿里，因为账簿是爷爷每天必看的。爷爷看到这首诗后，告诉了文家，这件事就流传下来了。爷爷去世后，此诗一直由表兄文运昌珍藏着。在爸爸动身启程这天，爷爷带着一家人，把爸爸送到塘岸上。

爸爸在东山学校读书半年很有长进，写得一手

好古文，看了一些进步书籍，抱负更大了。

1911年春，爸爸到达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堂。后又入全省高级中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等求学。从此，爸爸完全离开了爷爷，离开了家庭和闭塞的韶山冲，走上革命之路。

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爸爸潜心学习，钻研学术。他不是死读书的学生，他的心时刻关注着中华民族的安危，关注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丝变化。

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失败后，全国军阀混战多年，帝国主义乘机攫取中国大众的利益，那时，爸爸每天都读报，他学费的三分之一都花在订报上。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15年5月7日，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作为奇耻大辱使每一个中国人无不为之愤慨。

爸爸听了这个消息，愤怒地挥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不久，反袁世凯的浪潮在全国涌起了，爸爸时刻关注着形势的发展。1915年，他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的有关时局的言论印成册子，在全校广为播发。

1916年6月奶奶在韶山因病卧床，回乡探望奶奶的路上，爸爸目睹了因战争造成的人民的疾苦。在家只呆了半个月，他又返回长沙。

1917年11月，爸爸做了这样一件事，从这件事发生的过程里，人们看到了爸爸初露的军事才能。

原来，一天下午，北洋军阀的一支部队由湘潭、株洲向长沙溃退。当时长沙一带兵力空虚，溃军则大肆骚扰百姓，到处抢掠。

消息传到了学校，人们都不由得慌乱起来。

爸爸稳住了大家的情绪，对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对大家说：现在溃兵疲惫不堪，只要我们把学校的学生志愿军组织起来加上城里的警察，就可以击败溃军。

学校同意了爸爸的意见，并让他具体负责实施这个计划。

爸爸于是组织了200多位大胆的志愿军，手拿木棍，分成三队，对溃军形成了包围之势。

溃军小心地逼近了，距布防不远时，爸爸命令

警察开枪，学生志愿军则在煤油桶内燃放起鞭炮，并齐声呐喊：“缴枪没事！”“缴枪没事”。溃军十分心虚，遭到这个袭击，便不敢抵抗了。他们还真的缴了枪。

爸爸免去了长沙城及学校的一场兵灾，他的胆略表现出来了。

爸爸是个农民的儿子，对农村，他有极特殊的感情，农民的一切痛苦，农民的一切生存境况，他都有极切实的感受。他关心中国政治，他要真正地了解中国，就要考察农村。

于是，爸爸把目光投向他熟悉的农村，他采取了穷知识分子寻师求学采取的“游学”方法，开始了他漫长的旅程。

爸爸穿一件白色旧上衣，带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布包，布包里有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他从楚怡出发，直奔宁乡，随行的还有老同学萧子昇。

在宁乡杓子冲，他们见到了友人何叔衡，经何叔衡介绍，爸爸访问了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主人告诉爸爸，他是一个佃农，一年到头，收的粮食七成要交给东家，自己所剩无几，生活极苦，如遇灾年，日子则更难了。在一个叫宋家潭的村里，爸爸又访问了一位老农和一位青年农民。于是，爸爸对

农民具有了细致、深切的了解。

离开这儿，他们又向浏山进发了。走时，他们坚决谢绝了何叔衡所送的路费。爸爸就是这样要磨炼自己。

他们来到一户人家，遇见一对和善的老夫妇，并和他们进行了一场有意思的对话：

老人问：你们两个小伙子看上去不是乞丐，为什么要饭呢？

爸爸回答：我们想旅行，看看农村的情况，又没有钱，只好“游学”。

老人说：当叫花子没什么不好，叫花子总比强盗好得多。那些当官的，多数都不廉洁。我在县衙里当守卫时知道，县太爷满脑子想的都是钱。每审一个案子，给他钱多的一方照例是打赢官司，向他求情是没有用的，除非花大钱贿赂他。

爸爸一听，非常生气，他说：这是什么世道！

他们又跋山涉水，来到了安化县城——梅城，爸爸查阅了安化县志，走访了一些贫困人家。一路上，他们遇上学校、商店、庙宇，常常写上一副对联，换几个钱。

到达沅江时，正值湖区涨水，他们就返回了长沙。

这次游学，走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

江五县许多地方，行程 900 多里。这次游学分了整整一个暑假。

回到长沙后，针对工人文化水平低的现状，爸爸组织工人夜校。

他组织学生，张贴广告。工人夜校，受到广大工人的欢迎。1917 年 11 月 9 日，第一师范工人夜校开学了，爸爸和夜校的教职员把一批批穷苦的工人领进了教室。

1917 年冬天，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拍打着湘江两岸，新文化运动在一代青年心中激起了追求新生活、新境界、新世界的理想。

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行动——这个想法在爸爸和他的同志心中萌发了。

1918 年春，新民学会在长沙成立。4 月 14 日，在长沙蔡和森家里，这个学会带着春天的气息诞生了。

爸爸从第一师范毕业后，面临着新的生活道路的选择。

中国的改造应该如何入手？新民学会应该如何发展？这时，爸爸接到了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的来信，得知了北京正在筹组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

爸爸十分亢奋，他觉得新民学会应向外发展，

开展大规模的“自由研究”。不久，新民学会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一致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十分必要，应尽快进行。

1918年8月15日，爸爸和25个青年，开始了他们的北京之行。路上遇洪水阻隔时，他即组织大家轮流到北方的农村，了解农民的情况。

到北京后，爸爸没有经济来源，经杨昌济先生介绍，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条子，交给了图书馆，他于是得到了图书馆助理员的位置。在这儿他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

北京是新文化的中心，北大则是新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新旧思想、新旧文化交锋的战场。

爸爸在这儿受益匪浅，他一边贪婪地读书，一边了解、吸收新的文化思潮。

李大钊非常器重爸爸，爸爸表现出了非凡的学识与才干，深得李大钊的赞扬。

在他的引导下，爸爸开始了解了十月革命，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

爸爸还参加了北京大学进步学生组织。

1919年3月，爸爸和一批准备赴法的青年，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当然，这时，他已经认识了杨妈妈，爱已在他们心中滋生了。

爸爸为赴法的学生奔走呼号，但他自己却没去

法国。一来是因为新民学会需要他“殿后”；二来爸爸认为自己在国内情况并不了解，想继续搞研究。

一个月以后，他又回到了长沙。5月，爸爸即在长沙发动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活动，随后，他创办了具有崭新风貌的《湘江评论》，发表文章。这时他已成为社会主义思潮的热烈赞同者。

《湘江评论》震动了整个社会。创刊号印了2000份，当天被抢购一空，加印了2000份，仍不能满足需求。北京的李大钊、陈独秀给予这份杂志以很高的评价。在那个黑暗的年代，自由的声音总是被扼杀。《湘江评论》不久即被查封了。

继而他又担任了《新湖南》的主编，继续发出他自己的声音，结果《新湖南》也被查封了。

1919年12月，驱逐张敬尧活动展开了，爸爸作为赴京代表团负责人，来到北京。终于迫使北京政府驱逐了张敬尧。

1920年，爸爸在上海，同年7月，他又一次回长沙，仍致力于新思想、新文化的教育传播工作。

也是这一年，在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亲眼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他得出了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的结论，他

说要建立共产党。他写信给爸爸，强调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必要性、紧迫性。

他这样的想法与爸爸不谋而合。

1921年，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爸爸任书记，在短短的半年间，就发展了39名团员。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在爸爸的带领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重视起来了，同时，爸爸把这种宣传扩展到了工人中去，过去办的夜校，经爸爸的操持，又恢复起来了，爸爸亲自给工人上课，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

爸爸还特意在师范附小小学部设一个补习班，招收18岁以上的失学青年。所学课程，以补习国文、算术为主要内容。

就这样，长沙的失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逐渐组织起来了。1921年5月，为庆祝国际劳动节举办了游行大会。爸爸曾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和引导。”

1921年6月，爸爸接到上海的通知，他会同何叔衡，赴上海参加第一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主持了会议，爸爸任记录。在这个会上，爸爸只作过一次发言。

回到长沙后，他和何叔衡开始秘密地酝酿筹建长沙湖南地方组织的工作。那一年的10月10日，湖南省的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了，爸爸被选为书记。并积极地开展活动。

爸爸非常重视共产主义宣传。

同年8月，爸爸与何叔衡在船山学社社长兼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的积极支持下，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湖南自修大学是一个平民的大学，创办这所大学是出自把革命理论普及到大众中去，把更多的人才培养、聚集到共产主义旗帜之下。所以自修大学设置的课程和研究的重点，也完全是为了改造社会。

中共中央于1921年8月成立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始把工人运动作为开展工作的重心。10月，爸爸担任了湖南分部的书记。

爸爸首先做通了湖南劳工会的工作，引导工人运动走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轨道。

12月25日，爸爸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学生，举办了反对太平洋会议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劳工会的两个领导人黄爱、庞人铨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来年1月16日，这两位工人领袖被军阀赵恒

惕逮捕杀害。爸爸悲愤万分，继续领导湖南工人阶级展开新的战斗。

安源工人大罢工成为湘赣工人运动的高潮。1922年9月14日，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工人们潮水般涌出矿井，涌出工房。汇成了不可抗拒的洪流。

这次罢工迫使路矿分局接受了工人提出的要求，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力，罢工取得了胜利。安源工人俱乐部是李达等人筹建的。

这是爸爸第一次领导工人运动的胜利。冬天，爸爸第六次来安源，他深入群众中间，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宣传革命。

到1923年，安源的党团组织发展了13个党支部、26个团支部。

这一年，“二七”大罢工被吴佩孚残酷地镇压了，工人运动受到了严重摧残，安源当局也言称要解散工人俱乐部。

爸爸在这危急关头召开会议。他认为要避敌锋芒、不轻易罢工，另一方面要做好罢工的准备。这致使路矿当局终于不敢干涉工人的活动。

1922年10月，爸爸领导了长沙泥木工人罢工，这是他组织手工业和苦力工人罢工中突出的一次。

为了便于领导和更大规模地开展工人运动，爸爸筹划成立了湖南全省的工人组织，即：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爸爸任总干事。至此，他同湖南省长赵恒惕开始了面对面的斗争。他先采取说理斗争。凭着他高超的斗争艺术，赵恒惕被迫允许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爸爸又胜利了，事后，赵恒惕对身边的人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1923年4月，赵恒惕下令通缉爸爸。爸爸从容不迫地安排了湖南党的全省工作，半个月后，离开了湖南，绕道上海，前往广州参加中共的“三大”。工人运动的生涯结束了。

在“三大”上，爸爸成为中共执行委员会委员，又成为中央局5个成员之一。“三大”以后，他留在中央工作。

国共第一次合作，爸爸担任了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的职务。然而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宣布了这次合作的失败。

爸爸越来越关注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注意。

1924年12月，爸爸从上海回到长沙。这时，岸英哥哥、岸青哥哥和杨妈妈和他一起回到了韶

山。本来回来养病的爸爸马不停蹄地工作。他和杨妈妈一起创办了农民夜校。1925年5月15日，上海发生了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的事件，随即“五卅惨案”发生。全国反帝浪潮迅起。

消息传到韶山，爸爸则抓住这一时机，以秘密农协为中心，组织了雪耻会，开展了游行示威活动，农民就这样被组织起来了。

在家乡，他开展了一次又一次活动。不久，赵恒惕又来抓爸爸，爸爸又一次离开了。这期间一共是半年。发动农民运动，是他改造中国的实践，这一步为他带来了十足的信心。

1927年1月，爸爸又回到了长沙，亲自感受到了农民大革命的力量。在长沙，他对农村运动做了大量的调查，写出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把对中国农民的感情，对农民问题的研究都倾注其中。

随着北伐战争和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蒋介石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1927年2月，他扬言要制裁共产党。在他的反动气焰鼓动下，各地土豪劣绅向农民发起了疯狂的反扑。

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爸爸紧紧抓住农民问题，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反击一切反革命派的攻击，但是，他的思想得不到中央主

要领导的支持和理解。

在中共“五大”上，爸爸的重新分配土地，加强农民斗争的提案被陈独秀否决。

这一年的5月，白色恐怖笼罩了长沙。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爸爸又一次回到了湖南。他善于恢复党对工会和农协组织的工作，并转入地下。他提出了武装斗争的问题。

爸爸就在这块他熟悉的土地上，开始了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并从此离开了家乡，上了井冈山。

爸爸再回到家乡，已是三十二年以后，在家乡的土地上，他写下了著名的诗篇《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我的二叔、三叔及姑姑

我从未见过二叔、三叔和姑姑。他们都为革命而牺牲了。他们的活动都与爸爸密不可分。说实话，我了解他们的事情还是从一些书上、资料上开

始的。《毛泽东家世》一书，恐怕是比较细致的。

二叔毛泽民，字润莲，1896年4月3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由于爸爸很早便离家外出求学，二叔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在家务农，帮助爷爷持家理财。在精明能干的爷爷身边，他十几岁就学会了多种农活，而且能写会算。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他便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1921年春，爸爸回到故乡韶山。在爸爸的耐心开导下，二叔决心舍家为国，舍己为民，从韶山到长沙投入革命洪流。

二叔到长沙后，首先在爸爸任主事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搞校务，负责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在这里，他的理财特长初露锋芒。二叔为改善师生生活，不畏劳苦，经常到外地采购廉价的肉食、蔬菜，还发动大家种菜、养猪，以增加收入，减少开支。学生的膳杂费，学校原来规定每学期一次交清，许多穷学生往往因此而辍学。二叔和主事商量后，改为分期缴纳，减轻了学生负担，受到师生的赞扬。

1921年秋天，爸爸在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第二年二叔转到该校任庶务，同时还兼任省学联的庶务。当时，中共湘区委员会是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每月四百元社务经费来办自修大学的。

1922年10月，长沙笔业工会成立，二叔担任该会秘书。他和其他工会骨干一起，领导笔业工人积极开展斗争。10月中旬的一天，三百多名笔业工人在二叔等人带领下，手持小旗，高呼口号，前往省议会和长沙县署请愿，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但遭到省、县当局和资方蛮横无理的拒绝。工会乃决定罢工。二叔根据中共湘区区委的指示，发动工人互济互助，妥善地解决了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吃饭问题。这次罢工斗争，前后坚持了40天，终于取得了胜利。

1922年冬天，二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受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指派，到江西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

为了方便工人的生活，防止中间盘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于1923年3月创办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二叔是该社的负责人之一。他常到工人群众中进行调查，根据群众的需要，派人或亲自去长沙、汉口等地购货。合作社出售的物品价格，比私商便宜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工人们从合作社买到廉价的米和油、盐、酱、醋以及其他生活用品，非常高兴。他们深感合作社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纷纷要求加入，并主动向合作社捐款，踊跃到合作社购货。

7月，合作社大整顿，二叔专任营业部主任。成立总社时，二叔出任总经理。在二叔等人的领导下，合作社搞得生气勃勃，工作很出色。它不仅打击了投机商人的封建把头，维护了工人的利益，而且还为党筹集了一笔活动经费，积累了开展工运和开办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经验。

1924年深秋，二叔因患阑尾炎离安源到长沙住院。翌年2月，他跟随我的爸爸和杨开慧妈妈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

1925年，二叔从广州农讲所学习结业后，调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主持上海书店的工作。上海书店是党的总发行机关，印发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和内部文件。

随着书刊的销售量猛增，印刷、发行任务更加繁重。党中央遂决定增开一个印刷厂和秘密发行所，由二叔负责。他于1926年在上海新闻路培德里找了几间房子，化名周泰安、杨杰，公开身份是印刷厂老板。为完成任务，他派人到韶山挑选工作人员。中共韶山支部推荐毛特夫、毛远耀等人来上海，充当秘密印刷厂的工人。1926年，他与青年女工、共产党员钱希钧结婚。

二叔的活动和上海书店的营业情况，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书店暴露后，二叔向党中央建议，在革

命形势较好的汉口，建立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长江书店。经党中央批准，长江书店于1927年3月正式营业，属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二叔通过长江轮船的水手、茶房，将上海书店所剩书刊巧妙地运到了汉口。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二叔到了汉口，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

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二叔根据党的指示，回湖南准备秋收暴动。他化名周方，深入到湘潭、湘乡一带活动。当他9月中旬返回长沙，得悉爸爸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经发动时，便带领一批同志化装成商人，赴平江、浏阳。途中为反动军队所阻，乃返回长沙，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这年年底，二叔接中央来信，要他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工作，于是他又来到上海。印刷厂虽已停工，但没有被敌人破坏，他便利用原厂继续工作。

1929年初，地下印刷厂被敌人发现。二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妥善地将机器运往天津，在英租界广东道（今唐山道）47号办起了华新印刷厂，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二叔任该厂经理。华新印刷厂对外公开承印发票、请柬、表格之类，对内印刷党的内部刊物、文件、传单以及顺直省委主办的

《北方红旗》、《铁路工人》等，有时还翻印些马列主义书籍。

当时的天津，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二叔在小白楼先农里租了一套住房，作为机关。凡是要印制的刊物、文件、传单等，先送到这里，然后再由钱希钧送到印刷厂去排版印制。外人到印刷厂联系印刷事宜，必须先先在柜房接洽，如发现来人形迹可疑，就掀动办公桌下通往排印车间的暗铃，车间工人便迅速将党的文件收藏好，马上改印《马太福音》之类的东西。由于组织严密，一直未被敌人发觉，直到1931年二叔奉调离开天津，这个印刷厂的任务才告结束。

1931年初，二叔奉党中央指示，再次返回上海，以开酒栈为掩护，继续领导党的地下发行工作。这时，他得知嫂嫂杨开慧于前一年11月被国民党军阀何键杀害的消息，十分悲愤。经请求党组织同意，他通过地下交通员带信到长沙板仓，请杨妈妈的母亲和嫂嫂设法摆脱敌特监视，将岸英、岸青、岸龙护送到上海。并将他们送往地下党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还时常去看望他们。

4月，在党中央负责保卫、交通和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使得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和上海党的组织处境十分危险，部分机关遭到破坏。二叔等人

离开上海，到香港去开辟工作。二叔等人到香港不久，由于顾顺章也窜到香港，党中央令他们立即离港，去中央根据地。

1931年7月，二叔到闽粤赣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不久，他被调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随后，又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委派，筹建国家银行。1932年3月，国家银行正式成立，二叔担任第一任行长。

当时，中央苏区的财政十分困难。国民党对红色根据地不但不断地进行军事“围剿”，而且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红白两区贸易往来几乎完全断绝。苏区的钨砂、木材、樟脑、纸张、茶叶、粮食等运不出去，需要的食盐、布匹、医药等运不进来。面对这一系列严重困难，二叔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名义，向各级财政部门发出了“统一财政，筹款支援前线”的指示。为贯彻这一指示，二叔领导国家银行与吴黎平为部长的经济部，邓子恢、林伯渠为部长的财政部密切合作，向困难开战。

国家银行成立后，二叔就把统一财政作为首要任务。

统一财政，必须把战争中的战利品都由银行统

管。二叔常以中央财政特派员的身份，深入前方，帮助部队建立财政系统。他领导国家银行在各部队设立派出机构，重要地方还派了工作组。每次打完仗，就把缴获的东西收上来，由银行开给收据。由于采取上述措施，至 1932 年底，苏区的财政货币得到了统一。这是二叔一大功劳。

二叔在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大功劳，是发展苏区生产。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苏区军民严重缺盐的问题，二叔让一些人化装成乞丐到白区去讨饭，买了盐装在讨米袋子里带回来；又发动大家把粪桶做成双层，利用到白区挑粪的机会，将盐放在底层挑回来；还有把棺材改做双层，下层放盐，上层放一些臭猪肠，让一些人装作送葬，从白区把盐运回来。二叔特别注意利用苏区的自然资源，发展生产，开展对外贸易。在中央苏区赣南的安远、宁都、会昌三县附近，蕴藏着丰富的钨砂。1932 年春，中央苏维埃政府决定成立钨矿公司，由二叔兼任公司总经理。起初，公司下辖只有盘古山和铁山垅两个矿场。1933 年 4 月，二叔从这两处调集二三百人，又开发了小垅矿场。三处矿场年产钨砂约一千八百吨，其中盘古山矿场从 1931 年秋至 1934 年秋，产值达二百多万银元。钨砂的大量出口，使

苏区获得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也换进了苏区急需的食盐、布匹和药品，对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革命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二叔还领导国家银行开展了储蓄运动。

长征开始时，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全体人员编入第十五大队，二叔任大队政委。遵义会议后，十五大队整编合并到先遣工作团，二叔任副团长兼没收征集处处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成立了总供给部，二叔任副部长。在整个长征中，他一直担任着管理运输、打土豪、筹粮筹款、保障红军给养的艰巨任务。

十五大队携带黄金、白银和苏区的钞票共一百六十多担，并负责接收沿途抄收的土豪财物，因而行军的负担很重。一路上，他们吃尽千辛万苦。

中国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的 1936 年初，二叔任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在当时的陕北，红军物质生活十分艰苦。时值寒冬，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二叔提出派人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到白区去采购布匹和棉花，以解决战士们的冬衣问题。他亲自组织采购人员，打通各种关系，在附近的中小城市里购得二万八千匹布和大量的棉花，陆续运回党中央的所在地瓦窑堡。接着，又通过根据地的妇女组织，发动妇女为红军纺纱织

布，赶做棉衣。不多久，几万红军都穿上了新棉衣。

1936年秋，国际工人阶级为支援中国革命，筹集了一大笔款子，由法国汇到上海。中央决定派二叔负责去取钱。次年四月，他与钱之光等四人化妆去上海。通过上海地下党，将这笔外汇分批兑换成法币，藏在特制皮箱的夹层里，再由几个人装扮成大商人，辗转数千里，将款运到西安。然后，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和叶剑英等的亲自接送、掩护下，终于使这笔巨款安全地运到延安。

1937年冬，二叔的支气管炎日益严重。党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疗休养。1938年初，二叔启程去苏联，行至新疆时，恰遇新疆与苏联交界处发生鼠疫，交通中断，他便留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暂住。

当时，新疆的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打出“亲苏拥共”的旗号，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多次要求我党从延安派干部去新疆工作。我党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决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关系，以促进新疆革命运动的发展，保证西北国际交通运输线的安全。因此，从1937年起，陆续派遣了一百来名干部到新

疆工作。盛世才还特别要求我党派一名财经能手到新疆整理财经。党中央鉴于二叔已抵迪化，遂决定将其留在新疆，与党代表邓发（1939年7月以后为陈潭秋）等人一起，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二叔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职务，尔后又任民政厅长。

那时的新疆，财政制度混乱，各级官吏贪污成风，市场上纸币充塞，加之货币不统一，除有省银票外，喀什地区又印发了喀票。市场上应付财政支出，而且还借了二千余万元的外债。二叔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大刀阔斧地整顿财政金融，在整顿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进行建设。

1941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德国法西斯又进攻苏联，国际国内形势逆转。这时候，盛世才逐渐撕下了他“亲苏拥共”的假面具。1942年8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初来迪化与盛世才谈判，达成了反共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陈潭秋、二叔等建议党中央从新疆撤退共产党员。党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责成他们制定一个分期分批撤退党员的计划。由于当时新疆通往延安的道路被国民党封锁，他们准备暂时撤退到苏联。在与苏联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以前，二叔和陈潭秋一起，组织 117

名准备撤退的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开展革命气节教育，以应付突然事变。

1942年9月17日下午一时，盛世才端出蓄谋已久的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对共产党人下了毒手。他派全副武装的军警特务，先将陈潭秋、二叔等人的住处包围，将陈潭秋、二叔等五人软禁在“刘公馆”。接着，又将我党在新疆的全部人员逮捕软禁。面对敌人的阴谋，二叔满腔怒火，当众将盛世才手下的特务头子、警务处处长李英奇痛骂了一顿。李英奇被迫打电话向盛世才请示，二叔抢过话筒，大声斥责盛世才：“你背信弃义，竟敢把我们这些抗日有功的人关押起来。你必须无条件地立即释放我们，把我们送回延安去，否则你是没有好下场的！”盛世才支支吾吾，企图掩盖自己的罪行。二叔知道这家伙已无可救药，愤怒地把电话机砸烂。

1943年2月7日，盛世才把软禁的共产党人投入监狱。4月10日起，敌人开始对二叔进行连续审讯，动用了“抽皮鞭”、“坐飞机”、“坐老虎凳”等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

1943年9月27日深夜，敌警务处李英奇与敌审判委员会主任富宝廉，拿着盖有“盛世才”印章秘密处决手令，来到第二监狱。他们指挥九名刽子

手，手拿棍棒、绳索，把陈潭秋、二叔、林基路从牢房中唤出，先用大头棒将他们击昏，然后用绳子勒死，装进麻袋埋在荒无人烟的山坡上。过了三天，盛世才又下令把他们的尸体挖出来，一个个进行拍照。然后把照片送给宋美龄，向蒋介石报功领赏。

三叔毛泽覃，字咏菊，又名润菊、泽淋，1905年9月25日出生。爸爸很喜爱我的这个活泼、天真的三叔，在自己开始独立生活的时候，将三叔从韶山带到长沙，入第一师范附小学习。

从这时到后来离开长沙，前后整整五年，三叔一直生活在爸爸的身边。爸爸主编《湘江评论》、建立中共湘区党委等一系列活动，对三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他较早地接触到马列主义，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秋，三叔进入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爸爸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时，亲自创办的一所培养斗争骨干的学校。自修大学还附设了一个补习学校。补习学校于1922年9月开办，在爸爸的领导下，由何叔衡主持，夏明翰、二叔、罗学瓚等任教职员。三叔在自修大学学习期间，身体力行，一有机会，就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和斗争实践。

他曾到长沙码头创办过工人夜校，深受工人好评。还曾到远离长沙的一个矿山去参加罢工斗争，历时一个多月。

1922年11月，水口山的铅锌矿工人成立俱乐部。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湘区党委和爸爸决定派三叔和朱舜华等，去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

1923年3月底，三叔等几个青年，乘坐去衡阳的小火轮离开长沙。爸爸到码头送行，再三嘱咐三叔，到水口山以后，要好好锻炼和改造自己，要到敲砂棚去敲砂，要到矿井里去劳动。三叔含着晶莹的泪花，向爸爸挥手告别。

三叔和朱舜华到水口山后，担任工人俱乐部教育股委员，兼任工人学校教员，并以此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三叔分工负责团的工作，具体联系机械科的工人和团员。他遵照爸爸的教导，经常到敲砂棚、机器间、矿井里去劳动，每个星期天，总要下到矿井里去，和工人一道采掘矿砂，体验工人生活。

1923年10月，三叔在水口山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回长沙，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委书记处书记。1924年冬，爸爸和杨妈妈从上海回韶山养病，同时从事发动农民工作。随后三叔亦

回韶山，到银田镇的白庙办农民夜校，借小学的教室做夜校的课堂。白天给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上课，晚上给附近村子里的农民上课。

1925年秋天，军阀赵恒惕通缉爸爸。三叔按照爸爸的意见，先行去广州，接洽有关工作。此后，跟随爸爸在广州黄埔军校和广东区委从事革命活动。这期间，同周文楠结婚。不久，生下了毛楚雄哥哥。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三叔奉党的指示，偕周文楠乘船经上海转移到武汉。在船上碰见了二叔。到武汉以后，他们很快就到武昌找到了爸爸。根据三叔的要求，他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授上尉军衔。这时，汪精卫正在与蒋介石暗中勾结，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

一天，爸爸把两个叔叔请来，一家人围坐在一张方桌旁边，以打麻将为掩护，分析形势，决定今后各人的去向。爸爸说，汪精卫一伙肯定要叛变，我们不能在此等着别人屠戮，要尽快地转移，或者跟部队走，或者回湖南去。三叔表示要随部队到江西去。不久，他离开武汉，前往南昌。兄弟三人各自奔赴自己岗位。

1927年八一起义，三叔赶到南昌时，起义部

队已经南下。他追到临川时，被起义军的哨兵扣押到临川，周恩来等好几位领导都认识他，立即安排他到以叶挺为军长的十一军政治部工作。后随朱德、陈毅等转战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大庾、汝城、韶关一带山区。在得知爸爸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的信息后，三叔受朱德委派，去井冈山与爸爸联络。

1927年初冬，三叔身着国民党正规军军官的服装，带着证件，化名覃泽，顺利通过国民党一道道关卡，到了井冈山。三叔向爸爸汇报了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留下的部分队伍艰苦转战到达湘南的情况，随后便留在井冈山工作。

1928年初，爸爸率部向遂川进军，攻占了遂川县城。三叔参加了这次战斗。战斗结束后，随部队留在遂川，担任团政治部代理主任，并任遂川县委委员和县游击大队党代表。

2月21日，在宁冈砦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成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三叔被推举为宣传部长。

1928年底，三叔在大庾战斗中负伤，被留在地方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一边养伤，一边工作。

1930年初，黄公略任红三军军长，三叔任政治部主任，代行政委职权，和军长黄公略一道，率

领该军在赣水两岸开展游击战争。1930年10月，三叔被任命为中共吉安县委书记、赣西南后方办事处主任。在第一、二次反“围剿”期间，三叔主持赣西南后方办事处，负责筹集钱粮物资，领导军工生产。办事处下面有兵站、兵工厂、被服厂、特务连，共计两三百人。1930年冬，爸爸在去永丰县君埠的路上，碰见两个红军战士正押着一个青年往君田村走去，背后一位老太婆跌跌撞撞地哭着。爸爸急忙上前扶住老太婆，喝住两个红军战士。当爸爸听说是三叔所部在搞“扩红”时，怒不可遏。当晚，三叔办公室里灯光通宵达旦，屋里隐隐约约传出激烈的争吵声。爸爸后来回忆这次争吵时讲，他当时急了，挥拳要揍三叔。三叔大声说：这是革命队伍，不是毛氏祠堂。次日，三叔找到这位青年赔礼道歉，并把他送回家去。老太婆见儿子回来，急忙迎出门外，三叔连忙向她作检讨。

第二次反“围剿”以后，1931年6月，成立永（丰）、吉（安）、太（和）特委（后又改为中心县委），三叔任书记，兼独立师政委。第三次反“围剿”期间，他和师长萧克一道，根据爸爸和朱德总司令的作战命令，率领该师在富田一带牵制陈诚、罗卓英的增援部队，到处袭击敌人，阻止他们前进，配合主力红军在各处完成歼敌任务。

在这期间，三叔与姨妈贺怡结婚。姨妈亦在公略县委工作，任县委妇女部长。

三叔在担任永、吉、太苏区和红军独立师的领导职务期间，对教育和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有时注意不够，在土地革命中分配胜利果实时，有不适当地照顾机关干部的地方。爸爸严肃地批评了他，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不要以为是兄弟关系就可望得到庇护。

1930年冬，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内部发生“富田事变”。在处理这一事变中，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爸爸又派永、吉、太特委书记三叔到东固调查处理。

三叔来到东固后，在姨妈的协助下，深入调查，释放了那些被关押的党员和群众，并及时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接着就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央苏区，他们又无理地给邓小平、三叔、谢唯俊、古柏四位同志扣上“‘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执行人”的帽子，开展反对邓、毛、谢、古的所谓“反党派别”的斗争。

当时，邓小平任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

记，三叔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唯俊先后担任江西省军区参谋长、乐安中心县委书记，古柏任总前委秘书长，都是江西省委的主要成员。他们坚决拥护爸爸提出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反对和抵制王明的“左”倾错误。

1933年5月上旬，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在宁都召开的“江西省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认为临时中央迁入苏区以后，江西党三个月的工作是落在革命战争需要之后的，没有完成“紧急动员”、“扩大红军”等任务，原因在于江西党内有一个“怪物”障碍了工作的进行。这个“怪物”就是所谓“单纯防御”的“罗明路线”，而邓、毛、谢、古“就是这个怪物的代表”，“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勒令他们“立即解散”，“否则立即开除出党”。会议还决定给他们以处分，全部或部分地撤销了他们在红军、地方和党的机关的重要职务，并在会上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到基层去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作出新的检查，“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姨妈贺怡，当时也受到谴责，并要她揭发三叔。她想不通，就跑到妈妈家诉说。爸爸

心情沉重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

当时，爸爸亦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排斥和打击。职务减少了，空闲增加了。爸爸利用这个机会，经常深入基层，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三叔有时也跟随爸爸去搞农村调查。

在长冈乡搞调查中，有的干部向三叔提出，该乡已有百分之八十的青壮年参军，劳力不足，应该想个办法。女共产党员李玉英立即站起来建议，把妇女组织起来学犁田，并且表示，自己愿意带头。在李玉英的带动下，二十多天，全乡四个村有130多位妇女学会了犁耙。三叔返回瑞金后，向爸爸汇报了长冈乡妇女学犁耙的情况。爸爸很赞赏，在瑞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名义，奖给了长冈乡两头耕牛，奖给李玉英一条蓝色围裙。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长征。三叔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担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姨妈贺怡因为身怀有孕，由一个同志转移到她在白区的老家，隐蔽起来。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三叔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在闽赣边界、武夷山区。

1935年1月，三叔根据中央分局的统一安排，

率领独立师的一部前往福建长汀的四都，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军区司令龙腾云率领的队伍会合整编，成立新的闽赣边界军区领导机构，三叔是军区司令部的领导成员。4月上旬，部队在腊口西分水坳被敌人包围，伤亡惨重。

1935年4月25日，三叔率领游击队穿山越岭，跃涧涉溪，来到瑞金县黄膳口附近一个名叫“红林”的大山之中。敌人在叛徒的带领下，包围了休息地。三叔听到枪声，立即冲到门口担任掩护，部分战士得以突围，三叔则被一颗子弹击中前胸，献出年轻的生命。三叔牺牲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了浸沾着血迹的爸爸和朱德的照片，还有党证，才知道他就是爸爸的亲弟弟。

姑姑毛泽建，1905年10月出生在韶山冲东茅塘。这时，正是金秋季节，漫山遍野菊花盛开，她的父母亲给她取个乳名，叫菊妹子。他是爸爸的堂妹。

姑姑的父亲毛尉生，是一个十分贫困的佃农，由于过度劳累，39岁就去世了。姑姑的母亲陈氏，是一个勤劳俭朴的农家妇女。丈夫去世后，她带领姑姑和三个弟弟，辛勤劳动，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姑姑为了帮助母亲养活全家，她从小就参加劳

动，除了上山捡柴，下地挖野菜外，在寒冬季节，还经常跟着母亲沿户乞讨，养活弟弟。

在姑姑七岁时，韶山出现了大灾荒，她家中生活更加困难。这时爷爷、奶奶就把姑姑从东茅塘接到上屋场，作为过继的女儿收养。

这时姑姑的家中生活仍然十分困难，弟弟都很幼小，母亲双目几乎失明。不久，姑姑就被她的姑母接走，被送到杨林乡萧家去当童养媳。

1920年冬，爸爸回到韶山，他把已到萧家做童养媳的姑姑接回家中，他知道姑姑还没有正式名字，随手在一个纸盒上写了“毛泽建”三个字。从此姑姑有了新的名字。

1921年春，爸爸帮助姑姑解除了封建婚约，带着她到长沙，送进了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在文化书社里借宿。由于姑姑刻苦攻读，进步很快，开始跟不上班，后来名列前茅，尤其是刺绣的成绩更加突出。她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到平民夜校听爸爸等讲课。她还到文化书社推销各种进步书刊，替秘密开会的同志站岗放哨。

1921年6月，爸爸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来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领导湖南工人运动，并任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姑姑跟随爸爸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她还在

自修大学补习，在平民夜校听课。1921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上半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秋天，姑姑前往衡阳，考入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并改名为毛达湘。她在这里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爸爸在军阀赵恒惕通缉他后，离开长沙前往广州。在赴粤途中，路过衡阳时，到三女师看望姑姑，鼓励她努力学习，团结同学，发展进步力量，打击顽固派。

姑姑是三女师学生党支部书记、湘南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她在三女师的日子里，经常阅读《向导》周刊、《新青年》和鲁迅的《呐喊》等进步书刊。还利用假日组织同学步行到衡阳县东乡、北乡以及附近的工厂、矿山，去开展革命的宣传活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姑姑积极组织同学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支援上海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斗争。

在学运中，姑姑结识了衡阳县省立第三中学的学生、共产党员、湘南学联负责人陈芬。1925年，他俩结了婚。婚后，陈芬前往郴县领导农民运动。姑姑继续在三女师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她担任了湘南学联女生部长。

1926年夏，北伐军开进衡阳后，姑姑遵照中

共汀南特委的指示，离开了三女师，来到衡阳县从事农民运动，担任中共衡阳县委妇女运动委员。她经常深入衡阳县神皇山、园山、蹬子岭等地，发动和领导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发动妇女成立女界联合会，教育妇女放脚、闹祠堂；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协助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夜校，并亲自讲课。

1927年，姑姑作为衡阳县的代表，到长沙参加省妇联召开的妇女工作代表大会。在会上，她了解到爸爸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和开展农民运动的指示精神。返回衡阳后，按照爸爸的指示精神，到衡阳县集兵滩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1927年三四月，姑姑按照爸爸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在衡阳县集兵滩的观音堂举办了两期农民运动骨干训练班。亲自给学员讲课，还带领学员上操，学军事常识，既学文，又学武。两期农训班共培训了四百多名学员，其中还发展二十多名党员，为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927年5月，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湖南各地的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衡阳也在白色恐怖中。这年夏天，神皇山的大地主罗清溪、罗老八等人，勾结国民党军队，前往神皇山地

区“围剿”革命势力。姑姑迅即在钟家花园、罗家坪、白露坳一带发动群众，组织了几千农民自卫军，向前来奔袭的一队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伏击，使他们不能立脚，仓皇撤回到衡阳县城。

1927年10月底，姑姑和陈芬按照中共湘南特委的指示，到衡阳县城郊主持召开全县临时党的代表会议，改组和重建中共衡山县委。由陈芬任县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姑姑任县委妇运委员。改组后的衡山县委，组织了衡山工农军游击队，在衡山、湘潭、醴陵三县交界地区进行游击活动和建立政权。姑姑除领导妇女运动外，还兼管县委通讯联络等机要工作，她还多次指挥游击队到县城、南岳、白果等地贴布告、撒传单，破坏敌人的电讯设备，用土炸弹炸县政府，使敌人惶惶不安。1928年3月，姑姑积极参加领导了在南岳举行的一次武装暴动。她率领衡阳、湘潭、衡山交界地区的游击队，穿过崇山峡谷，向南岳镇进军。部队抵达南岳镇后，迅速摧毁了南岳团防局的反动武装。午后，衡山县团防局派了百余人的反动军队，向游击队反扑过来。游击队在姑姑的部署和指挥下，做好了迎敌的战斗准备。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她带领游击战士扑向敌人，三面包围，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四散奔逃。游击队击退敌人之后，姑姑迅速率领部队往南岳大

庙后山崎岖小路撤退，隐入群山密林之中。第二天，敌人搜山“转剿”时，游击队早已安全转移。

南岳战斗后不久，中共汀南特委遭到敌人的破坏，衡山县委因此同上级党失去联系。彭瓚投敌叛变，又使衡山县委处于十分困难、危险的境地。姑姑和陈芬等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于1928年3月来到耒阳县，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湖南暴动的队伍。在一次攻打耒阳城的战斗中，姑姑带领一支数十人的农军，使用大刀、长矛，杀得耒阳团防局的敌兵狼狈逃窜。在这次战斗中，农军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装备了自己。随后，姑姑积极参加了耒阳县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深入到石准、新市、东湖、遥田一带，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建立区乡红色政权，扩大革命武装，发动群众打土豪，除劣绅，分田地。

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分队伍上井冈山与爸爸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后，姑姑根据斗争需要仍留在耒阳工作。她和陈芬一起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亲自担任游击队长。她领导的游击队，白天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侦察敌情；晚上集中兵力，打击敌人，曾先后捕捉和惩处了耒阳民团的一部分反动头目，使得敌人闻风丧胆。姑姑领导的游击队还掩护了一部分红军伤员和农民自卫军家属安全撤退到山区，

积蓄和保存了革命力量,支援了井冈山的斗争。

1928年夏,姑姑和陈芬领导的游击队在耒阳县夏塘铺的一次战斗中,陷入敌人重围,终因寡不敌众,两人都身负重伤,先后被捕。不久,年仅25岁的陈芬在耒阳敖山庙惯武桥上英勇就义。灭绝人性的敌人还把陈芬的头割下来装在木笼子里,挂在耒阳城头“示众”。姑姑被捕后被反动武装押往夏塘挨户团关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知这一消息后,派来部队袭击了耒阳县团防局和夏塘挨户团,把姑姑和陈芬的姐姐陈淑元营救出狱。耒阳县敌人随后组织兵力反扑追击。当时姑姑身负重伤又身怀有孕,主动要求留下来隐藏在夏塘一个孤老太婆家里。没多久,姑姑生下了一个男孩,她给孩子取名叫艰生。

敌人在搜山时,听到婴儿的哭声,挨户团很快就找上门,姑姑和陈淑元又一次被捕。刚出生的艰生也一道关进了牢房。不久,陈淑元被保释出狱,她把艰生带出。由于没有奶吃,孩子几个月后,不幸夭亡。

敌人再次抓到姑姑,如获至宝。6月,夏塘挨户团为向上级请功受赏,把姑姑押解到耒阳县城。8月,国民党衡山政府又以姑姑“系毛泽东之妹,马日前后,在衡山县负该党重要职责”为理由,把

她从耒阳押解到衡山县女监狱。

1928年8月20日，姑姑被枪杀于衡山县城南门外。

我的杨开慧妈妈

1901年11月6日，湖南长沙县清泰都下的板仓杨家，一个女孩呱呱坠地。“板仓杨”的主人杨昌济先生给女儿取名开慧，号霞，字云锦。

杨妈妈长到七岁，父亲从国外来信，要她上学读书。她家斜对门的杨公庙，办有长沙县第四十初级小学。山冲里从来不让女孩读书，学校破例为她等七个女孩子单开一个班。

杨妈妈在杨公庙小学只读了三个学期，便转到离板仓五里多路的隐储学校去了。这个学校比杨公庙小学大，图书也多，强烈地刺激了杨妈妈的求知欲。

辛亥革命发生不久，杨妈妈从隐储学校转到衡粹女校，接着又转到麻林桥附近的县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读到毕业。

1913年春，杨昌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杨妈妈便随全家一起迁到长沙。同年，爸爸也来到一师求学，自然认识了教师的千金杨开慧，相互之间都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1918年夏，杨昌济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杨妈妈随全家北上，住在地安门豆腐池胡同9号。9月份，爸爸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北京，杨昌济推荐他到北大图书馆当了助理员，双方仍然交往不断。这时的杨妈妈，已是17岁的少女，身处异地，得遇同乡知己，自然情愫暗生。爸爸要赴上海时，两人彼此心照不宣，相约分别后互通信息。次年4月，爸爸转道上海回到湖南。杨妈妈写给爸爸的信，称呼已是一个字：润。爸爸回信，称呼也是一个字：霞。

1919年12月18日，爸爸率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京，有时候就住在杨家，公开了她与爸爸的亲密关系。

1920年初，杨昌济去世后，杨妈妈扶柩南下，将父亲归葬长沙板仓。不久，她便从板仓来到长沙城，进了湘福女中。

驱张运动后的一天，爸爸身穿薄薄的旧长衫，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湘福女校，在选修班的教室旁，找到了杨妈妈。回湘后的重逢使两人格外高兴。爸爸邀请杨妈妈去省学联帮他工作，杨妈妈一口答应。这年冬天，两人便同居结婚，寒假相约到板仓过春节，不做嫁妆，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用他们两人的话说，就是“不作俗人之举”。

婚后，杨妈妈继续在校学习。每逢假日，便从学校出来与爸爸住在一起。

1921年秋，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后不久，杨妈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掩护爸爸的活动，她接来母亲，一起住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所在地——清水塘，自己则担任湘区党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

1922年10月，杨妈妈生下她的第一个儿子，取名毛岸英。

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爸爸，爸爸被迫离开长沙赴上海，后又到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工作。婚后的第一次别离，平添了爸爸的许多离愁别绪，他写下了著名的《贺新郎·别友》的词：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

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24年夏，杨妈妈和她的母亲一起，带着毛岸英和刚刚出生不久的毛岸青，来到上海。爸爸在码头上亲自等候，结束了梦牵魂绕的两地生活，得以“重比翼，和云翥”。

1924年底，爸爸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同，加之身体不好，回韶山养病。杨妈妈也第一次来到韶山冲，协助爸爸办农民夜校，搞调查，并创建了中共韶山支部。

不久，赵恒惕再次通缉捉拿爸爸。脱险后，全家先后到了广州，住在乐山庙前西街38号。杨妈妈继续担任联络工作，与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等人过从甚密。

北伐开始后，杨妈妈回到长沙，住在望麓园，协助爸爸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后来爸爸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也凝结了杨妈妈的心血。

1927年2月，爸爸一家先后到达武昌，住在都府堤41号，不久杨妈妈又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

4月27日至5月6日，中共五大就在武昌召

开。由于与陈独秀的意见继续相左，爸爸又一次“赋闲”。杨妈妈陪同默默无语的丈夫登上了黄鹤楼。看万里长江，烟波浩渺，爸爸用厚重的诗篇《菩萨蛮·黄鹤楼》，表达了两人此时此刻的心境：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妈妈和爸爸一起由武昌回到长沙，住在北门外沈家大屋旁的北角门楼。爸爸组织秋收起义时，杨妈妈带着孩子回到板仓老家。不意这次分手竟成了两人的永诀。

秋收起义后，爸爸把队伍拉到了井冈山。他用暗语给杨妈妈写了一封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这封信经过不少周折，直到1928年初，才辗转到了杨妈妈手中。

在板仓坚持地下活动的日子是艰苦的，再加上关山远隔，音讯不通，杨妈妈的心情日益惆怅不安。1928年10月，她写下了《偶感》词一首：

天阴起朔〔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1930年8月，红军撤出长沙后，湖南省清乡司令何键悬赏大洋一千元，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情况越来越紧张，形势越来越险恶。1930年10月中旬，杨妈妈被捕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保姆陈玉英和岸英哥哥。

在狱中，反动派要她声明与爸爸脱离关系，遭到她的严词拒绝。她对前去探监的亲友说：“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又嘱咐说：“我死后，不要作俗人之举。”

1930年11月14日，杨妈妈在长沙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被枪杀，时年29岁。

杨妈妈死后，遗体被亲友连夜运回板仓收殓，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爸爸从报上得到噩耗后，当即寄信给杨妈妈的亲属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寄款为杨妈妈修墓立碑，上刻“毛母

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

1957年5月11日，爸爸词赠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蝶恋花·答李淑一》已广为人知：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
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
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1962年，当友人章士钊请教该词中“骄杨”作何解释时，爸爸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骄杨”，是爸爸对杨妈妈的礼赞和怀念。

■ 我的楚雄哥哥和岸英哥哥

毛楚雄，我的哥哥，是三叔毛泽覃的儿子。叔叔牺牲时他才八岁。他出生不到一岁，婶婶周文楠被捕入狱。他就由外婆抚养。为了安全，外婆给他由姓毛改为姓周。1937年11月党组织把他们接到韶山冲，外婆激动地对他说：“楚雄，从今天起，你就是韶山人，不姓周，该姓毛了。”

爸爸在延安得知楚雄哥一家人有了下落，且搬到韶山，心里很高兴。

当王震率三五九旅由陕甘宁边区南下，开辟和扩大南方根据地时，爸爸嘱托王震到湖南后，将楚雄哥哥带到部队。王震同意了。

1945年9月，由组织联系，哥哥随军北上了。一路上，哥哥积极参加筹粮和收税工作，调查了解各乡的经济情况。派粮、筹款、挑谷、押船，什么工作都干。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鄂东、豫南地区的中原解放军，我军奋起应战。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不等战斗结束就分路突围。6月底，他随部队突围转移，从湖北宣化店出发，急行军打仗二十多天，7月中旬到达河南淅川县，碰上了王震。王震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上下打量着他：小伙子英姿勃勃，长得挺帅气，身材魁梧，穿一身灰布学生便服，眼睛大大的，脸上有颗黑色的平痣。王震高兴地说：“小毛跟我走。”他笑笑，向首长行了个礼。随后，就跟着三五九旅继续西征，奔赴延安。

8月7日，他们抵达陕西镇安县。因有胡宗南重兵集结，对秦岭实行严密封锁，战事又很频繁，所以旅部决定部分人员化装，分散前进。

中旬，他与几个同志扮成商人到达文家庙山村，在两户农民家里住下了。谁知被伪保长发现。

当第二天他们告辞老乡刚刚出村不远，伪保长就带一伙保丁、土匪手执凶器追赶上来，对他们开始盘问、搜查，伪保长猜想他们中间肯定有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就硬逼着他们承认自己的身份。

敌人把楚雄哥哥拖出来，围住他，恶狠狠地问：“说！你们是不是掉队的共产党？谁是你们的领导？准备到哪里去？不老实说，宰了你！”他沉着地回答：“你去问当兵的去，我是个学生，不知道！”伪保长见问不出结果，黔驴技穷了，两眼露出凶恶的目光，绝望地，疯狂地向刽子手们下命令：“杀！给我杀。”

刽子手举起斧子，凶残地扑过来，向他砍去。他就这样英勇牺牲了。其他的同志也惨遭杀害。

他是我们同辈人在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个亲人，那年，他才19岁。在他以后牺牲的就是大哥毛岸英。

建国后不久，大哥在北京机器总厂任总支副书记。他悉心钻研工厂管理和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想在厂里呆它十年，干出一番事业来。谁知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他再也静不下心来了，立即向爸爸、党中央递交了要求参加志愿军的申请书。恰巧这时彭老总在东北组建志愿军总部，正赴京向爸爸和党中央汇报工作。爸爸便把大哥交给了彭老总，要他

带大哥到朝鲜去经受一点战火的考验。出国前夕，大哥又随彭老总自东北回北京，再度向爸爸和党中央报告情况。汇报结束，已是下午六时，他抓过一辆自行车，先匆匆赶到工厂，向领导和工友们告别；然后又赶往医院，看望因手术住院的嫂嫂刘思齐。来到医院，天早已黑下来了。

小两口结婚才不过一年时间，而在这一年里，大哥住工厂，去湖南，难得和刘思齐见一次面。思齐突然见大哥这么晚来看她，有点惊愕，“这么晚了，你还来干啥？”难得相逢，却又分别在即，大哥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出国作战是军事秘密，大哥不好随便透露，却又不能不告诉她。

大哥坐在病床前的凳子上，掏出手绢来，不断地擦着脸上的汗水说：“我明天将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出差，所以急急忙忙赶来告诉你。我走了，通信不方便，如果你没有接到来信可别着急呀！”

“那是个什么地方？”

“嗯，这你就别问了……你知不知道有个朝鲜半岛？美国侵略者在那里打得很厉害。”

“怎么，你……”刘思齐仿佛已经猜到了一点什么。

大哥连忙岔开话头：“啊，不不，我这是考考

你的政治呢!”他流露出稚气的笑，像一个大孩子在哄一个小孩子。该走了。他依依不舍地站起来，说：“我走了，你出院后，每个礼拜六要去中南海看望爸爸，不要因为我不在你就不去。希望你好好照顾岸青。能答应吗？”

“嗯……”刘思齐点了点头，咬住了嘴唇。

大哥在志愿军总部，充当俄语翻译，在没有翻译任务时，就当机要秘书，分管发电报的工作。

1950年11月25日，是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上午，当所有的战斗命令下达以后，司令员可以有片刻的轻松了。一夜没合眼的彭老总，实在太劳累了。大哥正在靠北墙的大火炉子前签收有三个“A”字的加急电报。彭总就和衣躺倒在大哥旁边一间小屋的行军床上。

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有架美军轰炸机嗡嗡震响着，掠过志愿军总部的上空，向北飞去。作战室的参谋们认为是去北面轰炸什么目标，也就不十分在意。但对彭老总的安危，警卫员成普是十分上心的，他匆忙走进老总睡觉的小屋。

“彭总，敌机来了，赶快防空！”

彭老总睁开惺忪的睡眼，唬着脸，呛了成普一句，“怕什么啊，你这么怕死呀！”

一句话把成普噎住了。恰好这时，洪学智副司

令员从防空洞里跑到作战室来了。他也是看到敌机以后起来叫彭老总的。成普就像见到救星，赶快催他把彭总叫起来。

他一来，就掀起了被子，伸手去拉彭老总：“彭老总，快快快，快躲飞机去！”

彭老总笑骂道：“你这个娃子啊，这么怕死啊！”

“不但我怕死，还怕你死呀！”说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拖起彭老总，在后头推搡着，绕过大哥的身旁，向门外的防空洞走去。

成普松了一口气，点上一支烟吸起来。大哥这会儿也登记、发完了电报。他不吸烟，就从子弹箱里抓了一个大苹果吃。

敌机又从北边飞回来了，好快啊！那四架敌机已飞临作战室的上空。一眨眼出现了上百个银白色的亮点，这是凝固汽油弹，用铝作包皮，所以在太阳的光照下显得明亮而刺眼。成普大喊：“不好！快跑！”话音未落，炸弹已下来了，光房顶上就落了好几十个。顿时，熊熊烈火奔腾涌起，蔓延成一片火海！

……司令员、副司令员、参谋和通信警卫人员，都在火海外围急得连连跺脚，急得溢出了眼泪。灭火和抢救正在进行，但是，火势中心的温度

高达八百度，别说冲进去，站在外面都感到一种难耐的灼烫。

“岸英！岸英！”

这嘶哑的呼唤，丝毫不能减小那猛烈的火势……

等医生替成普身上的创伤涂上油膏，扎上绷带，他赶到作战室的时候，警卫排的战士们已经开始在灰堆中清出大哥和另一位参谋的遗体了。

在新的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弥漫着一种异常的气氛。这是悲痛的沉默！愤怒的寂静！空气在窒息，血液在凝固，但静穆中，可感到火在升腾，恨在奔流。彭老总趴在一张小木桌上，正在起草一份电报。那上面这样写着：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

老总站起身来，将电报递给值班参谋：“马上发，报告毛主席、党中央。”

在不久回国向爸爸当面汇报完工作之后，彭德怀顺便汇报了大哥牺牲的经过。他心情沉重地说：“主席，我没有保护好岸英，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爸爸点燃了香烟，抽着，听着，默默无语，有时还闭上眼睛，然后抬起头来，缓慢顿挫地说道：革命战

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仆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优秀战士。岸英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不能因为是我、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当彭老总走出爸爸的房间时,他一方面为爸爸豁达的胸怀所感动;另一方面也有恼火,因为他看出爸爸对于这个消息有些吃惊。这就是说,他是第一个通知爸爸说大哥牺牲的人。原来,为了怕爸爸伤心,秘书叶子龙他们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压住了彭总发来的电报。彭老总连连跺脚,要是早点告诉我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我讲话也可以做点准备。

在朝鲜,在平安道桧仓郡,在志愿军烈士陵园,增修了一座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三尺高的花岗岩石碑,碑上刻写着这样几个大字:毛岸英烈士之墓。

这些人都是爸爸的亲人,六位亲人都牺牲在革命事业中。有一次,爸爸曾沉痛地说:我的六位亲人牺牲了,开慧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这就是我的爸爸,为革命奋斗了一生的爸爸。

第五章

- 永新一枝花——我的妈妈贺子珍
- 我的爸爸毛泽东与我的妈妈贺子珍
相识在井冈山
- 袁文才想当媒人，想把毛泽东拴住
- 爸爸和妈妈在战火中的爱情
- 遵义会议结束，爸爸笑着对妈妈说：今后有发言权了
- 我的爸爸毛泽东和我的妈妈贺子珍
风雨同舟、相依相随了整整十年

■ 永新一枝花——我的妈妈贺子珍

爸爸和妈妈是在革命斗争最残酷、最艰难的岁月里，相认相识，在一个共同目标的奋斗中结为

伴侣的。

我的妈妈贺子珍，是1909年9月的一天出生的。那时正值秋月朗朗，桂花飘香。外婆外公喜悦地看着这个眉眼长得十分俊俏的女儿，心里特别高兴。为了表达他们对女儿的爱，对女儿的最美好的祝愿，商量着要给她起个最好听又最美的名字。外婆说：桂花迎贵客，明月照金秋。于是就给她起名叫桂圆。桂圆，就是我的妈妈贺子珍的小名。

妈妈有一个温馨的家。我外公的家在永新县万源山区的黄竹岭。妈妈的祖辈是个望族。有很多的田山和房屋。我的外公叫贺焕文，是个老实巴交的憨厚的读书人，曾捐了个举人，当过安福县的县令。我的外婆叫杜秀，是广东梅县人。听妈妈讲，外婆长得挺漂亮，还读过《四书》《五经》，是个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

听说，外公、外婆全力支持子女搞革命。当小姨被敌人杀害、小舅被错杀后。外公外婆到东田跟姨妈一起生活时，自己也投身于革命工作。他二老为革命做过勤杂工、刻过钢板、印过文件，抄抄写写，凡有利于革命，什么工作他们都干。后来，因为“左”倾路线的排斥，二老只好去教书挣钱来维持生活。

1938年1月，外公病逝。后事是项英和杨尚

奎出钱帮助料理的。外公去世了，外婆感到凄苦孤单，组织上把她送到延安，想让她跟妈妈一起生活。可当外婆到延安时，妈妈已经到了苏联。

外婆的生活就由爸爸照顾，直到她病逝都生活在爸爸的身边。

外婆病逝后，又是爸爸把她安葬的。爸爸还给她立了一块石碑。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把外婆的坟给挖了。延安收复后，又是爸爸出钱，请当地老乡重新为外婆修了坟。

这当然是后话了。

妈妈的兄弟姐妹挺多，大舅贺敏学，妈妈排行第二，第三是姨妈贺怡（银圆）。他们三个年龄上相差得不多。因此在各方面志趣都很相投。小舅贺敏仁，小姨贺先圆，年纪比他们三个小得多。外公的家业，直至妈妈记事时，还是很可观的。

妈妈4岁那年，因为一场官司的牵连，外公被关进了大牢，为了赎外公出狱，几乎卖光了所有的家产，外公是出狱了，但家道也中落了。

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妈妈同姨妈就读于永新福音小学，妈妈给自己取了个学名叫自珍，意思是要善自珍重。

子珍这个名字，是同爸爸结婚以后，妈妈请爸

爸给自己另取个名字，爸爸说：“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后来，还是在中央苏区时，妈妈把自珍写成子珍，于是，子珍这个名字就这样一直沿用下来了。

听姨妈说：妈妈年轻的时候可漂亮啦，秀气的瓜子脸，配上一双大大乌黑而亮的眼睛，加上白嫩的皮肤，中等身材，长得挺苗条，真是没处挑缺点。她人又活泼热情，高兴的时候，常常是开怀大笑，真可谓容光焕发，楚楚动人。她被人们称之为“永新一枝花”。

妈妈的老家就在井冈山脚下。险峻的井冈山，丛山密林，一直是起义农民、绿林好汉出没的地方。多少惩恶扬善的故事在人们中间传颂，多少关于井冈山英雄好汉打抱不平、周济穷人的故事在民间传颂，妈妈都听到过。家里又有很多英雄故事的书，她也最爱看。但妈妈最爱看的要算是剑侠之类的小说了。看起来入了神，常常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那些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思想，萦绕在她的脑海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之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妈妈很快就接受了新的思想。她参加县城“左”派学生举办的孙中山纪念会；她如饥似渴地吸取新的知识，传阅新书新报，不断地武装自己的头脑，扩

大自己的视野。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在她脑海中逐渐形成，很快她便参加了革命。她成了贺家兄妹中最早的革命者。

1926年7月，大革命进入高潮，妈妈就在这革命高潮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年，妈妈还未满17岁。这时，永新县党组织开办了政治夜校，不仅有共青团员来听课，还有共产党员参加，一大批拥护革命，追随革命的积极分子，也都纷纷前来听课。这些男男女女济济一堂置“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古训于不顾，投入到了如火如荼的革命的洪流中。夜校一直办了好几个月，把永新县的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

后来，北伐军从湖南来到这里，建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为了便于革命工作，妈妈又加入了国民党以跨党分子的身份参加了永新县党部的领导工作，而这实际是权力在中共党员的手里。她既是共青团县委书记，又是妇女部部长，是个双肩挑双职的干部。她是永新县开天辟地第一任妇女部长。

从此，妈妈开始了职业革命的生涯。

大舅、姨妈也都先后被选为永新县县委委员。

这就是后来被人们传为美谈佳话的“永新三贺”。

不久，妈妈被调往吉安工作。

有一天，妈妈正在县党部办公，一位同志突然出现在妈妈面前。他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永新出事了，右派夺权了。”这句话把妈妈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她急急地问。

原来是这么回事：当永新的革命者逮捕反革命分子的时候，一些漏网分子逃跑了，他们同一伙土匪武装勾结在一起，乘一天夜里，偷偷地摸进了永新县城，把正在开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全部包围了起来，强行缴了农民赤卫队的武装，放出了被关在监狱里的反动分子。他们疯狂地到处抓捕共产党员，把大批革命者投进了监狱。

一时间，永新县城黑雨沉沉。

舅舅贺敏学也被捕投进监狱。外婆同姨妈逃离永新，到别处暂时躲避起来。

从永新来的一些同志，联络了袁文才（党员）、王佐两个人所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发动了有名的“永新暴动”。

为了组织这次暴动，妈妈在吉安、永新闻忙于奔走。回到永新，妈妈设法同被关在狱里的同志们取得联系，把武装攻打永新的计划、时间告诉了同志们，以便行动时能里应外合共同战斗。为防万一，妈妈通过熟悉、可靠的人把口信传到狱中去。

再说，被关在狱中的同志，也在积极设法争取

尽快出狱，以便更快地参加革命斗争。

此次暴动，正值盛夏酷暑，妈妈不顾暑气逼人。经过两天的奔波，她赶到永新见到城墙上飘扬着鲜红的旗帜时，她心情异常激动。她知道了，这次暴动成功了！被关的同志们都被救出来了，其中也有舅舅贺敏学。

反革命分子总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总是要伺机对革命进行反扑。所以，在暴动成功不久，反动势力就联合起来扑向革命。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的殊死斗争，在永新激烈地展开。妈妈率领一支赤卫队的任务是守县城南门。

这支队伍只有几十个人，三枝枪。其他武器就是近日赶制出来的梭标。妈妈身背步枪，腰扎皮带，肩上挎着子弹带，好威风啊！她就这样率兵上阵了。

敌人甚嚣尘上，一溜风似地来到南门下，见不到人，也听不到动静，就以为农民自卫军都让他们给吓跑了，更是趾高气扬了。一到城根，马上就架云梯、布阵势，开始攻城了。说是迟，那时快，敌人的十几部云梯很快就搭到了城墙上，一切准备做好了，就只等当官的一声令下，就开始爬梯攻城了。妈妈在城墙上看得清清楚楚。大家都纹丝不动地静静地等待着，用紧张而又期待的目光看着妈

妈，等待着她发出攻击敌人的命令。

妈妈还从来没有指挥过打仗，这是头一次。看着眼前的敌人一个挨一个地顺着云梯往上爬，她的心里也有点紧张。她看着云梯上的敌人才只爬了一半，梯子还有半截是空的。她心里想：等敌人爬满云梯再打，不就可以更多地消灭敌人了吗？她看看舅舅，舅舅在一旁向她点了点头，表示赞许她的做法。妈妈沉住气，等待时机。当看到敌人快爬到城楼时，“打！”一声令下，赤卫队员们跳起身来，有的举起梭标直刺敌人冒出城墙的脑袋；有的使劲往外掀起云梯；有的搬起石头往下砸。一时间，给敌人来了个措手不及。就听到鬼哭狼嚎般的叫声，一架架云梯翻倒了，敌人被刺破头的、戳瞎眼的、刺穿喉的，从云梯上被抛在空中，又重重地给摔倒在地下，滚的滚，爬的爬，死的死，伤的伤。第一次攻城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又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攻城，结果也都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攻城时，妈妈看到一个军官模样的敌人，手里还拿着枪，喊着叫着往上爬时，妈妈举起枪，对准他的脑壳就是一枪，这个家伙像死猪一样从梯子上滚了下去。妈妈心里一阵高兴。正在这时，另一个家伙又逼着敌兵再往上爬，妈妈又举枪

瞄准他，一扣扳机，又一个敌人应声倒下了。

几攻几败，敌人无心再战，准备逃跑了。

妈妈一看时机已到，命令赤卫队员打开城门，冲出城去，乘胜追击。赤卫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举着梭标刺向敌人。喊声、杀声连成一片。敌人被打得七零八散，丢下尸体狼狈逃窜了。

这次战斗，赤卫队大获全胜，杀死敌人百余名，缴获了一百多枝枪。也就是在这次战斗后，妈妈两枪打死两个敌人的事就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传到如今，有人说她是“神枪手”、“百发百中”，更有甚者，说妈妈是个“双枪手”。

妈妈却一直都这么说：“这些讲法都不是事实哟！我的枪法不好。打单枪都很勉强，哪能会打双枪哟。就是在城头上打死两个敌人，那也是形势给逼出来的，哪里是什么神枪手呀！……”

不过我倒认为，妈妈在战斗中能端枪上阵，虽然枪法生疏，还是凭着机智、勇敢、灵活而杀敌制胜的，的确是应该称赞的。

这次农民武装获得全胜，使伪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非常恼火，他暴跳如雷，命令两个团开赴永新。

在这种大兵压境的形势下，总指挥部决定，赤卫队全部撤出县城，向井冈山进发。

妈妈是1927年7月底由永新县向井冈山撤退

的许多共产党员中惟一的一个女同志，当然也是撤向井冈山队伍中的第一个女兵。这在当时来说，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她不愧于人们给予的“永新三贺”的光荣称号。

妈妈率赤卫队上了井冈山，那是因为有袁文才。袁文才在永新第一中学读书时，同舅舅贺敏学是同窗好友，还一起搞过学生运动。妈妈早就听说过这个人。这次上山后才见面。袁文才对妈妈备加关心和照顾，他的夫人还送衣服给妈妈，他们相处得跟一家人一样和睦友好。

提到袁文才，说到王佐，就我所知，这二位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也是很有影响，对革命有功的人。

袁文才是客籍人，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土籍人。在宁冈一带，外来户与土籍人的矛盾很深，常常受当地人的欺侮，他就参加了马刀队。这也可以叫做被逼无奈吧，他就常带队伍打土豪。早在大革命的初期，他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宣传，他自己也非常向往革命，认为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够真正实现消灭压迫与剥削，打倒天下的地主老财，穷人才可能真正得到解放。而共产党在哪里？为了追求革命，他要找共产党，他化装打扮了一番，就悄悄地跑到南昌去，到处打听共产党的消息。结果事情并不像

他想的那么容易。他只好又回到井冈山，继续干起打土豪来。

宁冈的党员龙超清想组织一支农民武装，又觉得实力单薄些，就主动与袁文才联系，说服动员他带着马刀队参加了农民武装，改为宁冈农民自卫军。这支三百多人的农民队伍就拉起来了。

袁文才于1926年底参加了共产党，才有前面说的他带队攻破永新城的那次战斗。

再说王佐。王佐是盘踞在井冈山的另一个首领，有些地方和袁文才非常相似。他也是客籍人，除了受军阀、土豪的压迫之外，还受土籍人的压迫。他不甘心受压迫，就揭竿而起，领着三百多穷苦农民上了井冈山落草为寇了。

那时候的一些山大王，为了能巩固自己的地盘，不让其他的势力吃掉，总要想方设法纵横结交一些力量，来保存自己。所以，王佐就同袁文才结拜为兄弟。袁文才的队伍就驻扎在井冈山脚下的茅坪，王佐的队伍驻在井冈山的腹地八面山。两个人山上山下，互相关照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

我的爸爸毛泽东与我的妈妈 贺子珍相识在井冈山

1927年10月17日，我爸爸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来到井冈山。

爸爸能上井冈山，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当时的情况看来，袁文才可以接受爸爸这支革命队伍的来到，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还是一致的，可王佐就不同了。他是不可能，也不会轻易就让人入伙共享他的山头的，当爸爸带着队伍来到时，与袁文才，主要是同王佐还进行了一番不寻常的“谈判”。

第一次谈判内容：是向他们讲明他率领的是一支革命的队伍，到这里来是为了同这里的革命武装一起搞革命。为了表示诚意，支援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准备送给他们枪支的同时，希望他们能安置一批伤病员，协助解决部队的驻防和粮食问题。

袁文才、王佐也是有头脑的人，他们也在多方了解这支队伍来到此地的目的和对他们的态度如何。

通过第一次的谈判，袁文才知道这是党中央委员毛泽东领导的队伍，他非常高兴。王佐并不了解

这支队伍，但因为他和袁文才是把兄弟，他相信袁文才就跟相信自己一样。既然袁文才欢迎革命军，他也就同意了。

第二次谈判开始了。不管大事小事，爸爸向来是说话算数的，所以他就派人把70枝枪送给袁文才和王佐。他们也帮助革命军解决了粮食问题，还主动帮忙给支锅灶生火做饭。

通过这两次的谈判，袁、王才下决心请爸爸上山，共商大计。

会面是在步云山那座大房子里进行的。

那天，袁文才、王佐一大早就来到这里，准备迎接爸爸上山来。

爸爸这天穿一身灰布中山装，衣服的袖口、胳膊肘都磨破了。他也和大家一样，脖子上结了条红色带带。爸爸的个头大，经过这么多的磨难，人十分消瘦，颧骨显得特别突出。头发从中间分开，比较长。皮肤晒得黑黑的，神色显得很疲劳，但他的一双眼睛却是特别有神，显示出他的刚毅和温和。

他走路有点一拐一拐的，当时有人看到他这样，就偷偷地笑，悄悄地小声议论说：毛泽东是个跛子吧！其实，是因为长途行军，草鞋把脚磨伤，脚不光肿而且还化了脓。所以走起路来才显得有点不得劲儿。

爸爸上山来，同袁文才、王佐握手后转身把自己的战友一一介绍给他们两个人。袁文才、王佐也把山上自己的人介绍给爸爸。爸爸同他们握手问好。

当袁文才领着爸爸来到妈妈贺子珍面前为他们介绍时，爸爸有些惊讶，他没有想到，在如此艰苦困难的环境下，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这样年轻的女将。

袁文才说：“她叫贺子珍，是永新县的干部。”

爸爸笑笑说：“我原以为是哪位的家属呢！”说着握住了妈妈的手。“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井冈山的地理环境特别好。爸爸的队伍上山以后，搞革命就有了落脚点。井冈山就是最好的落脚点。这里既可以进攻，也可以防守，回旋余地大得很。

也就是在这里，爸爸创立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也就是在这里，我的爸爸毛泽东与我的妈妈贺子珍相识了。

据老人们讲：爸爸虽然上了井冈山，也是真心诚意地同袁文才、王佐合作，可是王佐总是对爸爸有点不放心。大概因为他在绿林生涯中吃过的亏太

大太多的原因。从而养成了一种多疑的性格。他生怕爸爸会抢占他的山头，会吃掉他的队伍。所以他总是与爸爸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不近不远的关系，流露出一不卑不亢的态度。

有一天，袁文才与王佐又谈起爸爸这支队伍时，王佐又表示出了猜疑态度，但他还是特别相信袁文才。只要袁文才说怎么做，他就同意怎么做。这时，袁文才对他说道：“你一会儿不相信老毛在井冈山能呆得久，一会儿又怕人家吃掉你。你呀，莫要定不下心来。老毛不会是你想的那种人。你要再不放心，我们就想个主意，把毛泽东拴住。”说到这里，他再没有往下说。

王佐急切地问：“你说，怎么个拴法？”

袁文才说：“这还不好办，叫贺自珍嫁给毛泽东，让老毛做井冈山的女婿，这样日后对大家都有好处。”

王佐听了说：“这个主意蛮好！我也盘算过，自珍要人品有人品，要才识有才识，配毛泽东最合适！老毛要是做了井冈山的女婿，我们一万个放心了！”

此时，王佐一颗悬着的心，算是落地，他心里踏实了。

袁文才又说：“自珍配老毛，郎才女貌，天造

地设。只是听说毛泽东在湖南已有妻室。”

“我发现毛泽东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左唇下一颗朱砂痣，日后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你别看他现在那个瘦条条的样子，那副骨架子如果要是丰满起来就有帝王之相！我们跟着这样的人靠得住……”

袁文才这话，听起来是在夸赞我的爸爸毛泽东，其实，他是在进一步说服王佐解除顾虑，他是在为革命军能在此站住脚，为巩固党刚刚创立的这片红色根据地进行宣传。他这样一夸，王佐可以放心了。当然，袁文才也是真心实意地夸赞我的爸爸。

“行啊！还是你想得周到，这事就这么定啦。”王佐说。

从袁文才和王佐的这次谈话之后，才有了爸爸与他们的一番对话。

■ 袁文才当媒人，想把毛泽东拴住

有一天，袁文才来到茅坪八角楼，与爸爸见面了。谈完了工作后，袁文才说：“毛委员，我们想替你做一件好事。”

“么子好事呀？”爸爸问。

当他听说他们要当“月老”时，惊讶得身子往后一仰，一时答不上话来。“毛委员，我们的‘井冈山才女’贺自珍，你看她怎么样？”袁文才问。

“不行，不行，这个使不得。”爸爸连连摇头说。

“不般配是吗？她可是个才貌双全的人。”袁文才又说。

“是我不配人家。文才，我在湖南有妻子呀。”爸爸说。

“毛委员，你莫辜负我们的一片好意……王佐肯定已和自珍讲了此事，要是这样，事情可就不好办了……”袁文才说完看看爸爸。

“文才，感蒙你们的好意，这件事乱来不得。”爸爸有些着急地说。

“那，你考虑一下，日后再说吧。”袁文才结束了这次谈话。

至于爸爸和妈妈的恋爱、结婚那是以后的事了。

爸爸讲：他一生做事爱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凡事总要亲自搞个清楚，要弄个明白。从1927年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初，爸爸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跑永新、到宁冈；跑宁冈又到永新，来回对两地的一些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搜集到的东西不少，

但是还没有时间加以整理。

这时，他和妈妈相处的时间也长了，彼此也算比较熟悉了。

一天，爸爸忙完军事的事以后，对妈妈说：“这几天，我想腾出手来，到象山庵住几天，好静下心来把《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继续写完。想请你帮个忙誊写一下。你看怎样？”

“不嫌我的字写得差就行。”妈妈说。

他们就到了象山庵。这是一座古庙，工农革命军在这儿开办了后方留守处，这儿住着 20 余名官兵。到这里以后，爸爸抓紧时间写，妈妈就赶紧帮他抄呀抄，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两个调查报告都整理好了。

后来爸爸讲：在他的许许多多的调查报告中，这两份最好，他最满意。他说过，在我党和军队的建设中，妈妈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因此，他也最珍惜。可惜，这两份报告在长征途中丢失了。他感到非常遗憾。他讲：“丢掉其他东西我不痛心，惟这《井冈山调查》的丢失，是最为可惜的事。”

爸爸这样讲，我想：一，可能是调查报告确实是写得好，他很满意，也很欣赏，或许它是得意之作；二，可能是因为这调查报告中，不光是他本人尽了心费了力，而更重要的是其中有妈妈的热情相

助，有妈妈的一腔心血。

因为妈妈是当地人，从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这里的山山水水她都熟悉，这里的风俗人情她知晓。多少次，当爸爸写文章遇到困难写不下去，觉得有些地方搞不清楚，理不出头绪时，总要问问妈妈。妈妈能解答出来的，就会像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一样，一题一题地对答出来。遇上她自己一时也说不清的时候，她也会像个学生一样，认真地记下来，找熟悉情况的同志去一一了解清楚，再抽空儿回答爸爸的提问。

妈妈成了爸爸调查的对象，也成了爸爸调查报告的第一个读者。

就是在这日常的接触、工作中，他们彼此增进了了解，加深了感情。正因为彼此间的同志式的志同道合，才有了后来两个人的结合。当然袁文才、王佐在此事上起了促成作用。但最根本的还是他们彼此间的相爱。

在井冈山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在那风云多变的岁月里，爸爸此时已无法了解到湖南家乡的情况，但他如实地将家里情况告诉了妈妈，他不会欺骗妈妈的感情。那么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结识新的同志，认识新的朋友，又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进而产生了诚挚、纯洁的爱情，恐怕这也是人

生活中合情合理的事情。

爸爸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政治家……但他毕竟是人，是一个有血有肉，需要爱情，需要温暖，需要家庭生活的人。不能把革命者都看成苦行僧，要他们成为除了革命就是革命，除了工作就是工作，要求他们不食人间烟火。谁也没有权力，更没有资格剥夺他们的爱情。

1928年5月，是25日还是26日，爸爸记不清了，妈妈也说不准了。他们的老战友们讲起来，也大概记得是这个时间。离茅坪东去七里多的万山丛中的象山庵变得热闹起来。爸爸毛泽东和妈妈贺子珍成婚了。说是成婚，其实没有搞什么婚礼。没有鞭炮，没有唢呐，也没有锣鼓，更没有花轿。只有袁文才他们带来了一些糖果、花生之类。大家在厅堂里一边吃东西，一边说笑着。

一直到快晌午，大家才纷纷散去。

爸爸妈妈在这儿只住了两天。爸爸惦记着正在永新帮助农民分田的红四军官兵，就告别妈妈到了永新。

过了几天，爸爸妈妈都来到永新西乡的塘边村，领导附近村庄的农民分田地，并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天。所以有人误传爸爸和妈妈是在塘边村成婚的。

当我与爸爸闲谈时，我说：“妈妈这个性格开朗……”爸爸讲：“当年妈妈的组织能力很强，特别擅长做宣传鼓动工作。毛笔字写得娟秀端正。干起工作来风风火火，可有股子泼辣劲头，而坐下来后，还真是一个温柔娴淑的姑娘。

“我的娇娃温柔俊俏、端庄秀气很像妈妈当年。就是小嘴巴笨了些，只会说‘洋话’，讲不来中国话，当不了宣传鼓动家哟！”

我知道，爸爸又在说我的中文水平差，表达能力不强。我只好对爸爸笑了笑了之。

爸爸和妈妈在战火中的爱情

妈妈和爸爸结婚以后，妈妈肩上的担子重了，既要工作，又要想法照顾好爸爸的生活。在那极端艰苦的年代，要保证爸爸的身体不缺营养，可不是很容易就能办到的事。

听爸爸讲：他特别爱吃辣椒。妈妈有时为了他就从老乡手里买点，这在当时就算是奢侈了。因为环境恶劣，供应不足，尤其是蔬菜太少太少。爸爸因为吃菜少，腹胀难受，大便困难。这可急坏了妈妈。她步行四十多里，向一位郎中借了个大便通气管拿回来。又把仅有的一块肥皂放在温水盆里，像磨墨一样在盆里来回磨呀磨。等肥皂溶解了，然后

把管子插入肛门，把肥皂水灌进去。尽管爸爸感到特别难受，但用这种方法还真是缓解了爸爸的便秘。为给爸爸解除痛苦，妈妈付出了很大的辛苦。

在井冈山这一段时间里，爸爸是非常忙的，白天爬山看地形，晚上开会、听汇报。有时分不清白天黑夜地连轴转，一天只能有几小时的休息。加上生活困难，饮食又差，只见爸爸一天天消瘦下去了。妈妈看着心痛，就和警卫、勤务人员商量如何改善爸爸的生活。没有更好的办法，买吧，没有钱。他们只好下地里捉田鸡，到河里捞鱼摸虾。就这样，爸爸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还时不时地能尝到点鲜味，这也多亏了妈妈和那些警卫、勤务人员，他们想得多周到啊！

妈妈无论多苦多累，始终跟爸爸一起并肩战斗，共度艰苦岁月。

每次谈起过去时，爸爸总是那么轻松，那么喜悦。好像那不是在硝烟弥漫、殊死搏斗的战场。

罗霄山脉的中段，有一带雄伟的高山，苍松翠竹常年青，山涧流水永不断。当红五军跋山涉水，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后，队伍壮大了，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了，但跟着而来的是，人员增多了，生活供应上的困难就更加突出了。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两万多的兵力，妄图

将这支革命军扼杀在此。这对红军来讲，不能不说是一大难关。

1930年11月，红军在宁冈新城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冬季整训：一是要修筑坚固工事；二是建立“红光医院”；三是从宁冈挑粮上山，以解决部队口粮问题。

爸爸总是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同战士共甘苦。他经常是脚穿草鞋身背粮袋，同战士一起运粮。还边走边做思想政治工作。群众为此编了一首山歌：“毛委员运粮上山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努力，粉碎敌人‘围剿’。”

为了红军的生存与发展，爸爸有一次亲自率领红军，趁国民党军队清晨出来架枪做徒手操时，出其不意，发动猛攻，激战半天，就攻克新城，歼敌五百余人，击毙敌军营长，还活捉了宁冈县长。此战，一举粉碎赣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进犯。

这是1928年2月18日的事。

在近两年半的时间里，国民党反动派以十倍、百倍的疯狂，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围剿”一次比一次升格，一次更比一次凶猛，两军生与死、存与亡的战斗就这样展开了。而每次都是以我军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终。正应了爸爸说的那句话：敌人总不甘心自己的失败，

他们总是要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彻底灭亡为止。

1930年12月30日，敌人向红军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战斗从下午三时许打响，到傍晚结束战斗。红军歼敌九千余人，俘虏了敌军长张辉瓒，缴获各种武器九千余件，子弹千余发，电台一部。

爸爸兴奋地挥笔写下了那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名词一首：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第一次反“围剿”首战告捷。

在这战争频繁的岁月里，妈妈总是相跟相随相伴地与爸爸并肩战斗。她既是爸爸的妻子，又是爸爸的战友，她更是一名红军的革命战士。也就是说，她既要以妻子的身份照顾好爸爸的衣、食、住、行，她又要以战友的身份与爸爸共商大事，更要以战士的身份，随时准备奋不顾身，出生入死地

为红色苏维埃，为保卫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而战。这对一位女同志来讲，不能说是一副轻担子。

1929年的春天，当红军攻打下福建龙岩时，妈妈在这里生下了第一个女孩，也就是直到如今都下落不明的姐姐。这也是爸爸的第一个女儿。爸爸曾高兴地说：“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个好地方才出生。”一句话把妈妈逗笑了。

1932年11月，妈妈在福建长汀生了第二个孩子，我的哥哥，取名岸红（毛毛），跟岸英哥他们排下来了。

长征开始后，爸爸、妈妈把两岁多的哥哥（岸红）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三叔毛泽覃、三婶贺怡代为抚养。当形势发生变化，环境越来越恶劣、斗争越来越残酷时，他们怕哥哥遭到不幸，就把他寄养到瑞金城一个警卫员的家里。后来，叔叔牺牲了，我的哥哥岸红（毛毛）就再也没有下落了。

解放后，姨妈为找他，因出车祸而牺牲了。

1933年，妈妈生了第三个男孩，是傅连璋医生接生的。可惜刚一出生就夭折了。

过密的生育，使她的身体受到很大影响。在那样的年代，转战频繁，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妈妈从未休息过一天，从未放弃过战斗。从敌人的第

一次“围剿”开始，妈妈跟随爸爸进行反“围剿”始终战斗在前线。

第三次反“围剿”的一次决战是在兴国县的高兴圩展开的。

在这次战斗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战斗激烈地进行，突然，敌人的一颗炸弹恰恰落在妈妈和另一位女同志的身旁。把她俩都给震得失去了知觉。等她俩苏醒过来追上队伍时，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爸爸看见她们平安归来，又是喜又是惊，就风趣地说：“通讯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炸弹在你们身边开花，以为你们被炸死了。我打算等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现在，你们是人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引得大家都笑起来。

“我们不光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带回来了。”妈妈说。

后来，爸爸还跟妈妈开玩笑说：“我原以为这回恐怕连你的尸体也找不回来了。敌人要认出这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领赏哟！”

“我的头长得牢，可不是那么容易掉的呀！”妈妈也笑着说。

1934年4月24日，是第五次反“围剿”敌我决战的一天。

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是艰苦的也是极残酷的。尽管红军发动群众，以经济建设力量来帮助革命战争，粉碎敌人的“围剿”，但终因各种原因而错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战机，反“围剿”失利了。

中国革命的航向在哪里？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惟一的出路，只有战略转移了。

遵义会议结束，爸爸笑着对妈妈说：今后有发言权了

1934年10月18日傍晚，我的爸爸，带着警卫班的同志，离开于都城，踏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长征路！

10月上旬的一天，爸爸派人通知妈妈，告诉她：她是中央批准随部队出发的30名女同志之一。妈妈便和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们一起，开始了长征。

长征的组织、计划、部署是严密的，起步也是迅速的。

10月24日，妈妈抵达古陂时，看望了爸爸。妈妈向爸爸讲起瑞金县的男女老少送别红军的情景时说：“乡亲们紧紧拉着我们的手说，‘你们千万要

回来啊！我们的亲人’……”

爸爸听了后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爸爸此时心里也不好受。望望苏区的山山水水，想想苏区的人民，难舍又难离啊！中国革命事业的根，在这里！

长征从这里起步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大转移从这里开始了。中国革命的出路，从这里打开了！

10月25日，红军全部通过了国民党层层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爸爸不无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在井冈山的战斗年月里，有苦也有乐；有失败，也有胜利。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妈妈自始至终紧紧跟随在爸爸的身边。关心着他的身体，保护着他的健康。

人们讲到中国革命的这段历史时，把它称之为中国革命的低谷，又叫低潮。总归一句话，此时，中国革命受到挫折。爸爸从他置身于革命的那天起，他的命运就与中国的革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人们还把中国遵义会议前的日子，称之为苦难的日子，又叫做黎明前的黑夜。不管称之为什么日子，爸爸的心，都同这些日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妈妈跟爸爸的心是相随的，也是相通相印的。

中国革命的航船在这个时刻搁浅了，航标灯被黑暗笼罩了。妈妈同爸爸一样，在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而担忧。他们夜不思寐，日不思食，在努力寻找，探索那指航的灯塔。此时，爸爸的心情是沉重的，情绪是低落的。他告诉人们前进的航道在哪里，但无人听了，因为他的指挥权被剥夺了。他向人们阐述革命的出路在哪里，但无人听了，因为他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但爸爸的心中，仍然装着中国的革命，中国的未来！

爸爸接连遭到“左”倾路线的沉重打击和无情排斥。那一段时间，更是一次又一次地对他进行无理批判：什么“一贯右倾主义”，什么“上山主义”……铺天盖地而来，统统都戴在了他的头上。“左”倾领导人同时还剥夺了爸爸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权。这种打击使他多年来劳累过度的身体吃不消了，他曾两度病倒。

妈妈对这一切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她时时想起那同战斗共甘苦的岁月：在瑞金时，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充满欢声笑语。而今此时的家里没有人敢来了；昔日欢乐热闹的家庭，今日门前冷落。

爸爸消瘦了，那平日英俊的脸庞上也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喜欢谈笑的爸爸，常常是一个人默默无语，凝神静思起来。他，有时遥望苍穹，对天长叹，有

时又以吹吹洞箫来排解自己一腔的烦恼与忧愁。

妈妈对这一切又全都看在眼里。从不知忧虑的妈妈，悄声地走到爸爸的身边，或陪他到河边散步聊天，或陪他默默无语地坐着。妈妈无时无刻不在替爸爸分担忧愁。

眼见日渐体弱的爸爸，承受着种种的压力，妈妈还担心他会垮下去，就想尽一切办法，甚至暗地里求人帮助弄些新鲜的东西给爸爸改善一下生活，补养补养身子。

妈妈拖着孱弱的身子，硬是挺着，把苦埋在心里，把笑放在了脸上。真可谓做到了一心一意为爸爸的地步。

人，只有在患难的时候，方能找到知音，找到知己，找到真诚的同志。

妈妈在爸爸连遭打击身处逆境甚至牵连到自己时，她毫无怨言，却更加关心体谅爸爸。

我想，如果当年没有妈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难以想象爸爸将会怎么度过那最难熬、最痛苦、最艰难的日子。

正如爸爸和妈妈当年的一位老战友所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贺子珍立下了他人不可代替的巨大功劳。至今，我仍然怀着崇敬之情深深地怀念这位中国革命史上的杰出女战士。”（陈士渠语）

妈妈用她对爸爸的真挚而深切的爱，使爸爸在生活上得到无限的关怀、无限的温暖，使爸爸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鼓舞、极大的安慰。爸爸身处逆境时，妈妈仍寸步不离地陪伴着他，当时有许多人曾以羡慕的目光望着爸爸，羡慕身处逆境中的毛泽东有这样一位贤慧、豁达、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的好妻子。爸爸也深深地感到了妈妈给予他的爱，是任何人所不能代替的，也是任何人所不能办到的。因此，多少年之后，爸爸一提起这段时间的生活，还总是深深地感激妈妈。

当年的老人们都说：毛泽东与贺子珍，不仅有夫妻之爱，又具有战友之情。他们是一对“响叮当”的好夫妻；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贺子珍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我想，这些夸赞，对于我的爸爸毛泽东和我的妈妈贺子珍来讲，是不过分的。这些夸赞，是真诚的，又是友好的。也可以说是给我的爸爸、妈妈作了个很公正很贴切的评价。

正像老人们说的那样，谁家的夫妻生活中都难免碰碰撞撞，来一场舌战，来一次“干戈”，双方对垒的时候，总是会各有胜负。爸爸有时就爱以“武力威慑”、“政治威胁”来对付妈妈，有时就“开除”妈妈的党籍，给妈妈一次口头“处分”。但

爸爸毕竟是爸爸，有时是他自己引起的“战火”，自知不对了，就又主动“停战”求和，化“干戈”为“玉帛”。所以有时爸爸就向妈妈赔笑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块响叮当！”妈妈听了也就破涕为笑，不再生气了。

红军以铁的纪律，钢的毅力，双脚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到达湘南，闯过了国民党设置的第二道和第三道封锁线。11月底在湘江又越过了第四道封锁线，向西挺进，一举攻克贵州黎平。

在此地召开的会议。被称为“黎平会议”。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使红军赢得了主动权，不光是完全打乱了国民党的原有部署，而且是连战连捷。

红军，挥戈西指啦！

1935年1月9日下午，红军进入北倚娄山，南临乌江的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遵义。

1月15日，16日，17日，在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16日，会议进入第二天，也是最紧张最关键的一天。

自开会以来，爸爸总是很晚很晚才回来。妈妈一人在家，心却跟着爸爸到了会场，她同样也在关

注这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每到夜深人静时，妈妈总是焦急地等啊，盼啊，等爸爸快点回来，期望能了解点会议上的情况。

妈妈也知道，党的纪律是严肃的，像这样的重要会议，在没有做出决议之前，更是不能随便说的。当然妈妈也知道，爸爸是不会向她透露有关会议的点滴情况。妈妈是怕爸爸再遭排斥，再受打击。她关注着这次会议，关注着爸爸的命运，她还真是坐卧不宁了。

在静悄悄的黑夜中，妈妈等呀，等呀，一串熟悉的脚步声显得格外清晰，又格外轻松地传来。是他的脚步声。妈妈听得真真切切。脚步声近了，近了，且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妈妈知道，是爸爸回来了。她急速地打开房门，还未等爸爸双脚踏进屋，她便急切地问道：“会开完啦？你，你怎么样？”她紧张得语无伦次了。

爸爸知道她关心自己的处境，就笑笑答道：“不错，今后有发言权了。”这寥寥数语，在妈妈的脑海中却似掀起了狂涛巨浪，一颗悬到嗓子眼的心，总算是落位了。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机构，在中国革命的最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挽救

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有一次，爸爸给我讲起遵义会议时，他说：那晚，你妈妈等我等了好久。当我回到房里还未坐稳她就问。我想给她卖个关子吧，可我的心里也高兴，总也绷不住。人一高兴，话就多起来。我背着手在房里踱着步，慢慢地说：“这个会议，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一点本事。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不过我也没有谦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你的妈妈两眼紧巴巴地望着我，听得那么入神。那晚，我们好高兴哟！”

我听了，心里也高兴。我为他们的真挚情感所感动，无论是同志，还是战友，还是夫妻，甘苦与共，这才是人间的真情所在。

我的爸爸毛泽东和我的妈妈
贺子珍风雨同舟、相依相随
了整整十年

长征，不光是靠着自己的双脚从漫漫征途中走

过来的老一辈人的骄傲，也是我们的骄傲，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它不仅载入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史册，在世界史中，它同样也是永远不可忘记的重要一笔。

在漫漫的征途中，要经受各种自然环境变化的考验，更要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天上飞机炸，后边追兵赶，途中土匪截打的大大小小的残酷之战！

战争本来就是残酷的，而环境的恶劣，更使长征增加了十二万分的艰难困苦。

红军在1935年1月2日至6日全部渡过乌江，向黔北地区挺进。又于同年1月29日凌晨，渡过贯穿四川、贵州、云南的赤水河，寻机北渡长江。而敌人为了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特在此布有重兵。两军就在这展开了殊死之较量。

爸爸认为红军在此情况下，不宜恋战，他立即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迅速摆脱敌军重围，于2月20日再渡赤水河回师黔北，集中兵力夺取遵义。此战击溃和歼敌两个师八个团，俘敌3 000人，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迂回曲折地穿插在国民党的重兵之中，搞得蒋介石摸不清红军的准确战略意图和行动踪迹。只好像无头苍蝇那样，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乱冲。一会派兵堵这边，

一会调将截那边，搞得自己狼狈不堪。

红军却于3月16日下午，三渡赤水河而入川南。

国民党的飞机在天上呜呜叫，给蒋介石报信：“红军要北渡长江。”蒋介石就急忙调兵遣将，还得意忘形地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而红军又立刻掉头于3月21日至22日晨，神速地再次东渡赤水河。

这次渡河，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吃了一闷棍。红军却挥师南下。3月31日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的重兵合围，奔向贵阳。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爸爸“四渡赤水”出奇兵的那段故事。

也就是在红军进入云南途中，我的妈妈受伤了。

妈妈所在的干部休养连在行军途中，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击轰炸。妈妈为了掩护伤员而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昏迷过去了。经过医生的检查，妈妈身上有十七处都挂花了。当妈妈苏醒后看到我的叔叔毛泽民、婶婶钱希钧时说了两件事：“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

面。”

爸爸还是知道妈妈受了伤。当爸爸赶到妈妈身边时，妈妈对爸爸说：“润之，把我留下，你们前进吧！”

“子珍，你不要那样想。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爸爸安慰着妈妈说。

几十年后，妈妈谈起她负伤的事时，她还很感激爸爸。说是爸爸救了她一命，否则，留下来必死无疑。

妈妈这次负伤后，身上的弹片始终都未能取出。就是她到了苏联，也未能治好她的伤。十七处负伤，十七块大大小小的弹片，留在妈妈的身体内，与她的身体融为了一体，甚至可以说是成了她身体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十七块大大小小的弹片，伴妈妈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直至妈妈去世。

红军在继续长征，爸爸妈妈在并肩战斗。

翻越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空气异常稀薄、人烟罕至的海拔4 900多米的夹金山。

6月17日的早晨，爸爸喝完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穿上夹衣夹裤，手持木棍，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又滑又陡的雪路，向山顶攀登。

他把马让给体弱有病的女同志骑。爸爸说：“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

力量。”部队走到半山腰时，气候突然发生变化，冰雹劈头盖脸地打了下来。爸爸拉着战士的手继续前进，并一再嘱咐大家：“低着头走。低着头走，莫要往上看，也莫要往山下看，眼睛要向前看。千万不要撒开手呀！”

越往山顶，空气越是稀薄，人的呼吸十分困难。这时候，千万不能坐下休息，否则，就再也不会站起来了。

爸爸见一位同志坐在雪地里休息，就对他说：“你坐在这里是非常危险的。来，我背你走。”爸爸的话音未落，他的警卫员抢先背起那位同志，爸爸就帮着、扶着走向山顶。终于翻过了大雪山。

红军长征经过的草地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是看看亲身经历过的一辈是怎样讲的吧：

1935年8月下旬，红军开始向荒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地进军了。

爸爸当年的警卫员这样回忆说：

一当走进草地，情况就完全变了。天空像用锅底黑刷过的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边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

如果一不留神，踏破了草皮，就会陷

入如胶似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远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儿，幸好被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摆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我想，这不是什么神话故事，这是真实的历史经历，是红军走过的草地。

我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妈妈自始至终，跟着部队行进，随着爸爸长征。同样要渡赤水河，要翻越雪山，要走过草地。当妈妈与战友们胜利走出草地，光着两只脚扎扎实实地踏在坚实的土地上时，妈妈的喜悦，战友们的喜悦，爸爸的喜悦心情，是语言所不能名状的。

过了岷山，长征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爸爸的心情从《七律·长征》诗中可以足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
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
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诗句，正是红军长征业绩的记录；这诗句，正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写照。

爸爸对我说起长征胜利时，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翻过了五岭山脉，涉过了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走出了雪山草地，攻下许多城镇，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无论是在井冈山艰难的岁月里，还是在漫漫长

征途中，十年，整整十个年头，爸爸与妈妈风雨同舟；十年，整整十个年头，妈妈与爸爸并肩战斗。

这种生死与共、患难相交的战斗友情，使他们相依相随了十个年头。这种情，这种意，是难以割舍的。

第六章

- 我的爸爸毛泽东对我的妈妈贺子珍的追忆
- 爸爸和妈妈婚姻悲剧的根源
- 爸爸和妈妈的庐山相会
- 庐山相会后，妈妈大病一场
- 爸爸说：江青嫌我是土包子，她同你妈妈完全不同

我的爸爸毛泽东对我的妈妈贺子珍的追忆

刚到爸爸身边的一段日子里，我想妈妈，后来功课一紧，就顾不上这些了。可有一天，爸爸突然对我说：“娇娃，是不是该给妈妈写封信。”我听了

爸爸的话，就动笔给妈妈写了封信：

亲爱的妈妈：

您好！我在爸爸这里很好。您想我吗？我很想您。爸爸问您好，希望您保重身体。

这封信是我写的，可后两句话可以说是我代爸爸写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爸爸突然让我给妈妈写信。是不是妈妈给爸爸来了信，爸爸不便回信，才让我回信，还是爸爸根本没有收到什么信，只是想起了妈妈才这样做的。

我是只要一放寒假，就到上海去看妈妈，因此，我也和所有的同学一样盼寒假，盼过年，好去看妈妈。

我盼望，我发现爸爸好像也在盼，也在盼假日的到来。

每当我要走之前，爸爸不光让别人帮助我准备、收拾打点行装，爸爸还亲自出马，为我前前后后地忙活。一会儿让人去买北京特产品茯苓饼和蜜饯；一会儿又让去“六必居”买酱菜。就这样左一包右一包的，直到我拿不动为止。爸爸这是为谁呢？是为我的妈妈。因为爸爸知道，我从小就不爱

吃零食。

除此之外，还给我带足了往返的路费，伙食费，零花钱。因为我到上海不住在妈妈那里，她的一间房太小，加上我就太挤了。爸爸让我住在一个宾馆里，我就跟上班的人一样，三顿饭在宾馆里吃，晚上回到这里睡觉，其他的时间我都跟妈妈在一起。

等我要动身走了，爸爸又一再提醒别忘了带上药。有一次，还特意让我把外国朋友送给他的香烟也给妈妈带去了。

我想，我带去的仅仅是物品吗？我带去的仅仅是女儿的一颗心吗？不是，远远不是，我带去的还有爸爸对妈妈的热诚、真挚的战友情。

开始几年，我在爸爸眼里或许是个不懂事的小女孩。后来，爸爸看着我长高了，长大了，就不再像往常那样仅把我当成乖孩子，乖女儿，乖娇娃，还把我当成了他的知己，当成了他的朋友。

渐渐地，我与爸爸开始了心灵上的交谈。而谈论的主题往往是过去，更多的则是谈我的妈妈。当然，这种愉快的交谈只限于我们两个人，而且是在绝对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情形下进行的。谈得高兴，谈得开心时，我们会同时笑起来。当然也有我们俩都很伤心很难过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下，我们

往往是无言相视以表达我们心中对同一个人的思念。

我记得，我到爸爸身边那么多年以来，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爸爸的心情十分不好。我为爸爸端来洗脚水，我为他洗脚时，爸爸望着我，又想起了过去，又想起了妈妈。爸爸说：“1927年10月23日，我率领部分队伍向井冈山转移，由于连续奔波，我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了，行动很困难，脚背肿得像个紫茄子，紫里透亮，他们要用担架抬我。我是坚决不坐担架，坚持自己拄个棍子步行，队伍到达井冈山南荆竹山下时，王佐派人接应我们上了山。就是在井冈山认识了你的妈妈。”

“她看见我这个样子上得山来，好心痛呀！她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让我把脚伸向她的手里。她小心翼翼地揭下我脚上的药膏后，便又起身忙去熬药煎汤，给我洗脚，敷药。”

“‘疼吗？’她抬头问我。”

“我强忍着脚钻心的剧痛，笑着对她说：‘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物极必反，这脚痛过了也就不痛了。’”

“‘都这样了，还开玩笑呢！’她说。”

爸爸把脚从盆里抬起，擦干。“好了。”说着冲我笑了。

我知道，爸爸的心情好了，爸爸该休息了，我端着盆走出房间。

1954年，我正在读初中。一个周六，我回到家里，收到了舅妈的来信，她告诉我说：“妈妈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

原来那天，收音机里播放爸爸的重要讲话录音。她听得发呆，舅妈说：主席的声音真洪亮。

“是呀，他的声音很洪亮，跟过去一样。”妈妈说。

电台播一遍又一遍，妈妈听了一遍又一遍，忘了吃饭，忘了睡觉，她病倒了。

舅妈不说我也明白，爸爸的声音对妈妈来讲，真是太熟悉，太熟悉了。妈妈会跟着这声音回到井冈山那难忘的战斗岁月；重踏长征那艰难征途；重回延安那似平静非平静的生活。妈妈的心太苦了！作为女儿，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恨不能马上飞到妈妈的身边。我急了，找爸爸去，只有爸爸能帮助我。

“妈妈病了。”我说着，把信交给了爸爸。

爸爸拿过信看看，又看看，不说一句话。看得出，此时爸爸的情绪很不好，心里很沉重。我第一次见到爸爸流泪了，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明白，爸爸为妈妈的病而伤心，他一直在惦记着妈妈。眷念

着他们之间的那真挚的情感。

我只好请假去上海看妈妈。因为妈妈除了我，再没有第二个亲人了。

我是带着爸爸的信走的。爸爸在信上劝妈妈要注意身体；不要抽那么多的烟，抽烟多了对身体不好，要去看医生，好好治病；要……

爸爸对我讲：“你告诉上海的组织，妈妈病了，请他们多多照顾，带她去看病。但不要说，她是因为什么病的。”

我点点头走了。我心里明白，爸爸心里比我更明白。我们都明白妈妈是为什么病的。

后来，爸爸还托人给妈妈送去吃的和用的。

等妈妈的病稍有好转，我就回京了。因为我还在上学，功课也很紧，不敢耽误得太多。

爸爸见我回来了，心里挺高兴。

“你妈妈现在什么样子？”爸爸问。

“我妈妈现在这么胖了……”我边比划边说着。

“不会，她过去身体就瘦弱，现在有病，怎么可能胖呢！”爸爸惆怅地说。

我本想是让爸爸开开心，别为妈妈的事发愁。看来我瞒不过爸爸，就照实告诉爸爸说：“妈妈身体很瘦，很弱，很……”

爸爸听了，很久没有说话，转过身去取了支烟

抽了起来。我知道，我该走开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我与爸爸一见面，我们就谈起妈妈的身体，说起妈妈的病情，讲妈妈的孤独，讲妈妈的寂寞、凄苦。有时候，说到难过时，我们彼此谁也不再说话。爸爸的心情比我还沉重，爸爸对妈妈的怀念比我更切更深。

有时候，我真想说爸爸几句，想责怪爸爸几声：爸爸当初就不该和妈妈分手；就不该和……但每每话到嘴边都没有说出口。我深深知道，爸爸的心里也不是滋味。爸爸也已明白，当初不该……爸爸的神情已经告诉我，我就不能再叫爸爸伤心了。

爸爸又讲起了过去……

“你妈妈年纪很小就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了。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红军女战士，她作战很勇敢……”

“你妈妈是一个很开朗，很豁达，很善心的人，常常是一高兴就开怀大笑……”

“过去，我们在茅坪河里抓鱼时，她也打着赤脚，站在河的中央，看到鱼游过来了，她就伸手去抓。你妈妈比我灵活，有时还真让我们抓住一两条警惕性不高的笨鱼，她高兴地开怀大笑，差点跌倒在水里。”

伤心人怕说起伤心的事，可越是伤心人越想说

那伤心的事，尽管说的是过去的快活事，同样也勾起人的伤感。

我只好与爸爸长时间地坐着，一言不发地相视着。

我一年年长大，对家庭、对爸爸、对妈妈的过去往事，从一些长辈们的谈话中，也断断续续地听到过不少，这又能怪谁呢？爸爸对妈妈旧情难忘又难舍，这割不断的旧情自始至终，都深深地埋在两位老人的心里。这又能怪谁呢！

人都爱说，老人好怀旧，老人易思往事。我从爸爸的多次谈话中，也越来越有这种感觉了。也许是爸爸认为我是个大人了，应该更多地知道一些往事。

也许是爸爸本身对往事的眷恋过深，近些年来，只要我俩有机会在一起，爸爸就跟我在院里散散步，让我宽宽心。我知道，爸爸明白我心里受了委屈，这是在宽慰我。虽然我跟在爸爸身旁走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我们的心里想的是同一件事。

有时，爸爸也会为家里的琐事而烦恼。我知道，这时候，也只有我能为爸爸排除忧伤，分担爸爸的痛苦与烦恼。每到这时候，我会把自己的复习、作业放在一边，悄声地、轻轻地走进爸爸的房

间，跟爸爸坐在一起，拉着爸爸的手，和爸爸聊天：说现在，谈过去，给爸爸开心、解闷。爸爸这时就把我的手放在他那大手心里，另一只手来来回回地在我手背上抚摩着，又讲起了过去的事情：

1928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们在井冈山时，你妈妈在后山捡来半篮金黄鲜嫩的小松菇。把它洗干净，煮了一大碗端给我吃。我吃得好香啊！你妈妈见我吃得额头上都出汗了，问我：“田里的泥鳅你吃吗？”

“我这个人，四脚的不吃板凳，长毛毛的不吃蓑衣。”我这样跟她开玩笑说。

谁知第二天早晨，你妈妈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后来见你妈妈裤脚卷得老高，提着一只鱼篓回来了。我一见你妈妈提的是半篓活的鲜泥鳅，才恍然大悟道：“你呀！我随口说了声，你就去抓泥鳅……”

“好吧，我烧水，你妈妈煮菜。我们就忙起来。也不知道妈妈从哪里弄来的米粉。蒸熟了粉巴泥鳅，又放上些葱花、姜丝丝，还有辣椒粉，那味道鲜美可口。这顿晚餐吃得好开心哟！”

听着爸爸讲，好像眼前就有一大碗粉巴泥鳅一样，连我都觉得好像闻到了香味。我知道，爸爸又在想过去的那段生活，又在想他与妈妈共同生活、

战斗的岁月。

爸爸讲着，我听着，我与爸爸的心又同步跳动起来。爸爸在生活上的孤独和精神上的苦闷，我知道，也只有我知道。

每当遇到这种时候，我都要等爸爸情绪平和了，精神放松了，想要休息了，才慢慢起身，离开爸爸的身边，走出房间。

这种人世间最珍贵的父女亲情，只有我俩能体会到。我与爸爸经常进行这种有声的谈话，无声的相视而坐，我们父女的心却是相通的。

爸爸和妈妈婚姻悲剧的根源

我的爸爸和妈妈的后半生是在极度的孤独中度过的，他们从未停止对对方的思念，这种思念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强烈起来。

在爸爸、妈妈和江青的关系上，社会上一直传说很多，说法也很多，有些说法从延安时期开始一直持续了那么多年。

我理解爸爸，也理解妈妈。他们之间的情感上的悲剧其实只是因为性格，尤其是妈妈的性格所致。她失去爸爸就是从她出走延安开始的，随后，她为此付出了一生。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的政治形势进入了

一个新阶段。

妈妈和爸爸结婚多年，她一直担任爸爸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她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放在了爸爸的工作和生活上。

这时，她不愿意再当家属，也不满足于在爸爸身边做点秘书工作。

延安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干部，妈妈这时强烈地感觉到她需要工作，独立的工作。

组织上了解她的心情，她随爸爸东征回到瓦窑堡后，被分配到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当科长，监督、印刷在根据地通行的苏维埃纸币。

妈妈生下我以后，虽然高兴，但也有自己的忧伤。因为对她而言工作比享受做母亲的快乐更重要。她觉得我生的不是时候，于是她把我送到了老乡家，去抗大学习去了。

抗大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要学马列、政治、军事，每天早晨还要出操。妈妈同大家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

抗大的学员是集体食宿。那时爸爸已经搬到凤凰山下一个老乡家的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两里路。可是除星期六外，她很少回家。

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爸爸妈妈间出现了一些裂痕，但是这不是因为江青。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和中心。它像一颗闪闪发亮的红星，吸引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青年男女。他们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给延安带来了生机。

爸爸博学多才，对许多问题都感兴趣，他很喜欢同这些知识分子交往，并从中了解情况，获得知识、信息。这样自然与妈妈的交流就少了。

妈妈这时感到了孤独。本来她的文化程度就不如爸爸，思想交流就很困难。而现在这种交流就更少了。

本来他们间的一些误会，只要冷静下来，都可以解释清楚。但是妈妈太倔强了，她不表露这些，但心里却起了狂波巨浪。

那时，她想了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身上的弹片太多了，使她常常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她想到了动手术，把弹片取出，这样早日恢复健康，才能多做些工作。

然而，这个手术在延安做不了，条件太差了。她决定到西安然后转赴上海，在那儿取出弹片。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此时她要走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爸爸看到妈妈要走，就极力地挽留她。爸爸自己心里十分清楚，这时妈妈要走，肯定与自己有

关。

他对妈妈真诚地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掉泪；三是我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爸爸的这番话，充满了情感。接着，他又说：“我现在情况不同了，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然而，这并没有打消妈妈要走的念头。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外表温柔却极富个性。长期的战争生涯，也磨炼了她坚强的性格。那年在中央苏区爸爸和妈妈大吵一架，事后爸爸诙谐地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

妈妈又拿出了当年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我托付给人，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终于一个人走了。

她走的时候，江青刚到延安两个月，正等待分配工作呢。

妈妈到了西安后，抗战形势已发生了变化，上

海沦陷了，妈妈便住在了西安。

爸爸很着急，他托人捎口信，请妈妈回到延安去。他还给妈妈捎来一个装满日用品的小木箱，也捎来了和解的愿望。但是妈妈只是用自己的津贴，给爸爸买了一床新被。可她仍留在西安。

她在西安一住就是几个月。当时共产国际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妈妈从中受到启发：上海不能去了，我可以去苏联，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有学习的机会。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又到了新疆，住在中共驻新疆办事处。

正在她等待飞机去苏联时，爸爸又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一定要回到延安来。

但是，妈妈仍然没理会这个召唤。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一个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让她回延安的好机会，可是妈妈还是没有回去，不久，她终于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走了。

到达莫斯科以后，已经是1938年10月了，妈妈怀着乐观而热烈的情绪，给爸爸写了信，不久，爸爸发来了一封电报，内容仍然是让她回延安去。

从国内陆续到苏联的同志，也多次给妈妈捎来口信，让她回延安。

这时的妈妈和爸爸愠气的情绪都没有了,她想,自己既然来了,学习也开始了,怎能半途而废呢?说什么也要把这学期的课程全学完了才能回去。

妈妈提笔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在信上她重诉了这些想法。她在信中说:她要等两年后再回来,那时学业已成。

信的基调是和解的,心平气和的。

然而不久,爸爸和江青结婚的消息就传到了苏联,妈妈极度震惊。

她反复想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她万分痛心。自己这么草率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后果。

她永远失去了爸爸。

从此,她开始了自己特殊的生活。

从苏联到哈尔滨到沈阳到上海,妈妈永远地与爸爸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有思念可以穿过时空。

这是一段不可修复的历史,悲剧不仅在于两位老人一生的痛苦,还在于江青不仅一直迫害着妈妈,还并未给爸爸以幸福,更重要的是江青的野心,她的凶恶为国家带来了那么久的灾难。

爸爸和妈妈的庐山相会

人们都知道,1959年在庐山,我爸爸曾与我

的妈妈见过一面，那是在庐山预备会议召开之前。

关于这次两位老人相会的传说也是很多的。其实，这种见面，说白了，也没有什么神秘的。爸爸是人不是神，妈妈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革命老人，见见面本无什么可以非议的。一则他们有过10年的共同生活，更何况他们是从生活最艰苦、斗争最残酷的年代共同度过来的。

庐山相会的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有些说法是真实的，有些说法是编造的。人们这样说，我想可能是出自对我爸爸的崇敬与爱戴和我妈妈的可怜与同情。不管怎么说，这种好意我理解，这种善心我领情。但历史的事实是不能随意改变的。它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们还是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貌。

爸爸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见我的妈妈呢？爸爸事先也没有同我讲过，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当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杨尚奎同志。1959年7月7日，杨尚奎要他的夫人水静同志去南昌接我的妈妈上庐山。

8日下午3时许，水静和我妈妈准时离开南昌，奔庐山而来。到庐山牯岭，住在二十八号房。

9日上午，大约是9点钟左右，爸爸在一八〇号院住处，接见了我的妈妈贺子珍。当时，只有爸

爸的贴身卫士封耀松和水静两个人陪同妈妈，再无第三个人在场。

我们还是听听封耀松是怎么说的：

时在 1959 年 7 月 1 日傍晚，我与毛泽东主席同车上庐山，住在一八〇号院。

主席到庐山后，情绪很好，一路风尘，但毫无倦意。他对等候接待的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和夫人水静同志讲：“庐山，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有老表好！”

在 7 月 5 日这天晚上，毛主席突然问我：“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我算了下，报告主席：“7 号、9 号……”主席当时并没有再说什么，但他似乎在安排着一件事情，我也想了好久。

7 月 9 日晚，约 9 点多，一辆轿车停在一八〇号院楼下台阶边。当时，主席在二楼，就只有我一个人值班。我到车边，打开车门，将一位女同志扶下来，与同车来的水静同志一起，把她扶进一楼的卫士值班室。我上去报告主席：“水秘书她们来了。”主席说：“好的！”然后看了看表，站起身来，好像要到楼梯口迎接的意思。

我下去与水静同志一起把那位女同志扶上楼来。水静秘书先下去了。我拿过藤椅，在主席对面放好，安排她坐下。然后泡了杯茶给那位女同志，又给主席的杯子添了水，并为主席放了香烟在桌边。回到卫士值班室。大约过了四十五分钟，主席按铃召我去。我给他们的杯里又加了水，绞了两条小毛巾放在桌子上，看他们谈得很热烈，就下去了。

回到卫士值班室，水静同志讲：“小封，他们还在谈吗？”“是啊！”我讲。他们讲话的声音很响，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水静同志讲：“小封，贺子珍同志身体不太好（至此，我才知道那位女同志是贺子珍），是从山下边刚接上来的。”我与水静继续谈着。这时，铃又响了。我上楼，搀下贺子珍同志，并告诉水静同志：“主席要你去一下。”水静同志上去，只一会儿，即下来与我一起搀着贺子珍上了车。看贺子珍的表情很高兴，并讲：“主席还像原来一样，只是老了点，头发有点花白。”

送走贺子珍一行，我上楼去，主席在

屋里来回踱着步，对我说：“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主席并让我再下楼为他去拿香烟，主席是离不开烟的。我拿烟上来，看了一下，主席显出既高兴又不高兴的样子。“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接着，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水静同志，不要把安眠药给贺子珍吃了。我马上下楼去与水静同志通了话。因为主席的安眠药有三种，按顺序吃的，错服是会出事情的。这时快一点钟了。我为主席擦了澡，梳了头，给他服了安眠药。安排睡下。

次晨，水静同志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从贺子珍手中要回来了。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连连讲：“好，好！”就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关于贺子珍同志上庐山一事，只有我与水静同志接待、安排的。以往有这样那

样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1995. 8. 8

封耀松还回忆说：

主席让水静上楼，对她说：贺子珍的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要她注意贺子珍的情绪，明天就送她下山。还说：“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

这就是我的爸爸见我妈妈的全部经过。连当时当事人的引见人和值班卫士都没有听到我爸爸和妈妈说了些什么，局外人士却说得有声有色，岂不怪哉！

当然，爸爸与妈妈这次庐山相见，除了老革命、老同志、老战友的关系之外，还有着十年夫妻的情分。常言道，“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爸爸和妈妈是在同患难、共甘苦中生活了整整十个年头呢！

至于爸爸在这个时候邀妈妈相会，是否想乘此机会商讨我的婚事如何办理？我是不排除爸爸会有这种想法的，因为在此期间，爸爸曾让卫士长李银桥几次打电话给我说：婚期要推迟，一定要等爸爸

返京后举行。爸爸还亲自写信给我，要我注意身体，说他会议结束后即刻返京。

所以，我想爸爸可能要同妈妈商量我的婚事，等征得妈妈的意见后，再为我办婚事。

1949年，妈妈从苏联回来，因为种种原因，两位老人未能相见。1959年，又是整整10个年头，爸爸是否还想让妈妈回到他的身边？爸爸没有对我讲过，但从他们见面后，看爸爸的反应是失望的，他很痛心，恐怕是相见不如不见。因为相见之后，反而使两位老人心里更痛苦，更凄凉。

爸爸回到北京后曾对我说：“你妈妈的身体不行……见面什么也不说，光知道哭……让她来……”爸爸的声音很低很低，很悲伤。我想再听听爸爸说些什么，但爸爸再没有往下说。

爸爸见到了妈妈，妈妈也见到了爸爸。可结果呢？双方的心里都不痛快，反而更增加了对彼此的怀念、牵挂，增加了彼此的忧虑、悲伤和彼此心灵上的痛苦。

我觉得，他们双方那旧日心灵的伤痕又重新被撕裂开来，鲜红的血又汨汨而出，这撕裂般的疼痛，更加厉害，犹如在伤口上撒上了一把盐。

至今，我仍认为，两位老人相见不如不见。妈妈也好，爸爸也好，都平平静静地过了那么多年，

何苦又掀起情感的波澜呢？

■ 庐山相会后，妈妈大病一场

一天，爸爸把我叫到了他的书房里。

我站在那里望望爸爸，他不说话，只是用手示意让我坐下来。看来爸爸像有什么大事要跟我说。

我坐下来，静心地等着爸爸开口。

爸爸在房里踱着步，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吸着烟。

我望望爸爸，心里想，会出什么事呢？爸爸怎么不说话呢？是家里有什么事？还是我做错了什么？还是妈妈她……想到妈妈，我的心咯噔地一下，我慌神了。因为妈妈身体一直都不太好，会不会是妈妈……我有点着急了。

“爸爸，您叫我有什么事？您就说……”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爸爸猛吸口烟，转过脸来望着我，我明白了，我从爸爸的眼神中看出来了，准是妈妈有什么事，我也用焦急的目光望着爸爸，等他说话。

爸爸把烟头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看样子他是要下决心把事情告诉我了。

“江西省委告诉我，你妈妈病了。此次病得很重。你看该怎么办？”爸爸心情很沉重地对我说。

一听说是妈妈病了，我心里着急，真恨不能马上就赶到妈妈的身边去，看看她，并照顾她，去尽一个女儿的孝心。妈妈，妈妈生活得太苦，太苦啊！

“妈妈病得不轻，这该怎么办？”我着急地向爸爸讨主意。

爸爸并没有马上回答我该怎么办。他也同样着急，同样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怎么办？该怎么办？”爸爸似与我商量，又似在自言自语。

“你先莫急。让我来想想该怎么办？”爸爸说又划火柴点起一支烟，一句话也不说地抽了起来。

我知道，我该离开爸爸的房间了。

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我的房里。我的心里很乱很乱。我一会收拾东西，准备随时离开家去看妈妈，一会又不知所措地把衣物放回原处。

爸爸只是告诉我江西传来妈妈有病的消息。妈妈病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突然有病呢？这些我都不知道。爸爸又只是告诉我，妈妈病得不轻。我是走，还是不走？令华此时又不在家，我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我真是没有半点主意了。急得我在房间里直转。

别急。爸爸会想办法的。爸爸会有好办法的。

妈妈的病会好的，这么多年来，什么样的困难妈妈没有遇到过，多大的难关妈妈都闯过来了，这次也会好的。我这样自我安慰着自己，可心里又放不下，又急不可待地静等爸爸的消息。

当晚，爸爸没有找我。那就是说，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我想念妈妈，我惦记着妈妈，整整一夜我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一大早，我以最快的速度洗漱完毕，收拾好房间。就等着，等着，人越是心急有事，时间过得就越是慢。从早晨到中午，到晚上了，爸爸还是没有找我。我急啊，爸爸难道真的就拿不出什么主意来？我真的是坐卧不宁。

我站起来，一脚踏出房门，找爸爸去？不，不能。我的另一只脚还没有迈出门时，就站住了。相信爸爸，爸爸会有主意，会想办法，会有所行动的。想到这里，我立刻又退回到我的房间。

我又苦熬了一天，这难熬的一天。

到第三天，爸爸还是没有叫我。但中央办公厅却给我来了个通知：专机已准备好，送我到南昌去。

我的心头一喜，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踏实了。

我的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我相信，我的爸爸会有办法的；我相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爸爸总会

向我伸出他那双温厚的大手，给我以极大的帮助、支持，使我去战胜困难，渡过难关。

我心里笑了。原来这几天爸爸做的是这样的安排，想出的是这样的主意。我真心地感谢我的爸爸。

我去看妈妈的心切。急忙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带上日常用品。就要走时，细心的爸爸出现在我的眼前。爸爸的身后，一个警卫员拎着两大筐水果。

我望着爸爸，只是冲着爸爸笑。

“你到南昌去，好好照顾你妈妈。告诉她要看病，要吃药，要喝水，要吃饭。”爸爸对我说。

我认真地点点头，表示都记住了。

“这两筐水果你带去，给你妈妈吃。她不喝水，吃点水果也能解解渴，增加点营养。”爸爸又对我说。

我又点点头。爸爸多么细心，想得多么周到啊！

“只听说你妈妈病重，不知道你妈妈的病情究竟怎样。我怕你自己去了，遇有事情处理不了，就让这位管理员同志跟你一起去。有什么事请他帮忙。”爸爸再一次对我说。

我拿好东西，就要上汽车了，爸爸又叮嘱我

说：“要好好照顾你妈妈。”

我坐在汽车里，隔着车窗望着爸爸，向他摆摆手。我的心头是热的。

到南昌，见到了妈妈，我吃惊了，我都有点认不出她来了。才几个月不见，妈妈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如今的妈妈，形容枯槁，两眼直愣愣的，面部毫无表情。妈妈头发乱，而且脏，似有多日没洗了，更映衬出妈妈满面的病态与愁容。

我连忙帮妈妈洗换。工作人员边帮忙边告诉我：“你妈妈不肯让医生看病，也不肯吃药。她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了。再不喝水进食，会有生命危险的……我们怎么劝说都不行，实在没有法子劝她了，就只好这么陪她坐着，坐着……”

首先，我们想法给妈妈换上干净的衣服。

妈妈不动，只是呆呆地坐着；妈妈不说，只是无语地坐着。除了两眼闪动之外，真像是泥塑木雕的一般。

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妈妈怎么就会病成这个样子呢？

我走上前去，慢慢地拉住她的手叫道：“妈妈，妈妈，我是娇娇，我是娇娇……”她不理也不睬我。

“妈妈，妈妈，我是娇娇，爸爸让我看您来

了。”她连正眼都不看我一下。

望着眼前的妈妈，我有说不出的伤心。妈妈好苦啊！

我记着爸爸说的话，要让妈妈多吃些水果，我就把带来的水果洗干净，端到妈妈跟前，我坐在妈妈身旁，一边削皮，一边对妈妈说：“您吃吧。这是爸爸特意让我给您带来的。”我劝着妈妈，我笑在脸上，疼在心里。我一会把水果削成条，一会把水果削成块，一会又削成片，小心翼翼地送到妈妈嘴边，变着法地劝她，妈妈就是不张嘴，不肯吃。

我劝多了，妈妈心烦，就自己动手削水果。她不是削着吃，是一块一块、一条一条、一片一片的全都削着扔掉了。

我看劝她不成，强迫就更不成。我真是急又急不得，恼又恼不得。我耐心地陪着妈妈坐着，慢慢地用一些话来劝导她。我想方设法让妈妈早日恢复健康。

看着带来的水果都让妈妈给削着扔掉了，我觉得怪可惜的，就把剩下的水果送给工作人员了。

我心里急呀，再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呢？但我也知道，这时候光着急是没有用的，要想办法；对病人强迫也是没有用的，对妈妈的性格，我太了解了，她不想干的事，谁都无法强迫她去办。如果我

要是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地劝说，会使妈妈的心里更烦躁，这只能使她的病加重。

妈妈不肯吃，不肯喝，不说不讲，是她的心里有着解不开的疙瘩。这疙瘩一日解不开，她就不会去吃喝。

妈妈心里有什么疙瘩呢？我忽然想起：爸爸不是告诉过我，我结婚前，在庐山预备会前，他和妈妈见过一面吗！我明白了，妈妈这次生病，可能是由于那次相见所引起的，是她的思想中思念太切所造成的。

一位老人曾经说过这样一件事：当年妈妈和我回到祖国哈尔滨时，妈妈曾对他提出过这样两点要求：一，不要因为我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我给“禁”起来；二，我想见毛泽东主席一面，说句话，握握手就行。

我只有想办法将她的思想从这些往事的记忆中引开，让妈妈多想想高兴的事。让妈妈的心情开朗起来。这样会对她的病有好处，使她慢慢地好起来。

我就想法先使妈妈能吃点东西，或者是能喝点水也好。

我就跟工作人员商量好，让他们在我俩吃饭时，给准备几瓶汽水和矿泉水，因为汽水太甜，我

只能对上水喝。

我当着妈妈的面强装着吃饭特别香的样子，以引起她的食欲。开始时，妈妈连看都不看，不在乎。我就使劲装样子吃。后来，她看我一眼又把脸转向别处，一会儿，她又转过脸来看着我。我心想：这法子兴许能成。我又使劲大口大口吃，还冲妈妈笑笑。可我的心里却是苦啊！

妈妈看着看着，就伸过手来要我的饭碗，我赶紧双手把碗递给她。妈妈又拿过我的筷子，吃了一口，又一口。啊！“妈妈吃饭了！”我高兴得泪花都流出来了，工作人员听我这么一说，也都高兴得笑了。

我又赶快打开一瓶汽水，对上矿泉水，“咕咚咕咚”地喝起来。我还时不时地看看妈妈有什么反应。真好，妈妈吃几口饭放下碗，又把我喝的汽水拿过去，妈妈也喝了两口。

妈妈的眼神中含着笑意。尽管我很想让妈妈多吃，多喝。但我却无论如何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强劝。否则，会前功尽弃的。

我开始，也慢慢吃，便轻声细语地向妈妈说起我的婚礼。我告诉妈妈，我请了她的老战友蔡畅妈妈、邓颖超妈妈，还请了……我告诉妈妈，我的新房里布置得典雅、朴素、大方；我告诉妈妈，我的

婚礼非常热闹；我还告诉妈妈，我们请客人吃了顿饭，还看了场电影，还一块照了相……

我讲着，注意看着妈妈表情上的点滴变化。看得出，妈妈在倾听着，只是没有说话。

后来，我帮妈妈洗漱，穿好衣服，搀扶着妈妈一步一步由屋里转到屋外，一步一步在院子里慢慢走着。能使妈妈一步一步地迈出，要付出多大的心血啊！

“妈妈，您看这是棵什么树呀？苏联有这种树吗？”我问她。

妈妈看看，摇摇头，我们母女俩开始沟通了。

“妈妈，您看这是什么花？东北，哈尔滨有这种花吗？”我又问。

“妈妈，您看这是什么……”我就这么问着，妈妈有时就点点头，有时就摇摇头。我俩就这么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我俩的思想已经开始交流了。

再后来，我们开始走出房间，走到院里，又走出院子，走到大街上去看看。遇见来来往往的人们，我就对妈妈说，“这是小学生，他们放学了”，“这是老大爷，手里还拿着报纸”，“这是……”我想让妈妈从痛苦的往事中挣脱出来，看看现实。

我俩天天就这么走着，走着，看到什么，我就给妈妈介绍什么，妈妈听起来感到新鲜，对外界的

事物感到了很大兴趣。这真是一大收获。

妈妈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吃饭、喝水、看病，吃药，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一天，妈妈告诉我说：“我离开老家永新已经几十年了。还一直没有回去过。我现在可真想回去看看。”

“好吧，我向组织上讲讲，只要您身体好，可以回去看看。”我当即表示支持妈妈的这一行动，我想，到外边看看，开开心，会对妈妈有好处的。

“你来了快一个月了吧！”妈妈问我。

“您的记忆真好！”我为妈妈的康复而高兴。

“那你也该回去看看小孔了。”妈妈又说。

我俩就这样走着，聊着；聊着，走着。我感到欣慰的是，妈妈的病情大有好转，她的思路很清晰，话讲得通情达理，为此，我向江西省委报告了妈妈想回永新的事。

省委同意妈妈的请求，还专门派一位同志陪妈妈专程乘车去永新。

那天，我为妈妈安排好一切，望着远去的车子，我高兴地长长舒了口气，我完成了爸爸交给我的任务，妈妈的病终于好了。

第二天，我拖着疲惫的身子乘车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的家里，我的心里并不轻松。妈妈远

在南方，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再生病。妈妈除了我又再无一个亲人，有谁来照顾妈妈呢？

我向爸爸讲了妈妈的病情和恢复的经过。爸爸仔细地听着，还不住地点头，说我会照顾病人，说我照顾得好。爸爸对我此次南行是非常满意的。

“我的娇娃长大了。会办事了。”爸爸夸我说。

“我觉得妈妈一个人生活很孤单，很寂寞。我又不在她身边，不能照顾她。我想把妈妈接到北京，跟我和令华住在一起，也好有个照顾。”我说出了自己的设想。

“你想过没有，你妈妈到北京，她能受得了江青的气？”爸爸的语调缓慢而又沉重。

“我和令华搬出去，不住中南海。江青管不着。”我又力争说服爸爸。

“你认为不住中南海，你妈妈就可以不受气了？”爸爸的反问，我无以答对。

“那这样吧，我们到上海去，跟我妈妈住在一起。这该碍不着江青的事了吧。”我提出了最后一个方案。

“你到上海去，我不同意，我希望你留在我的身边。”爸爸直截了当地谈出了他的意见。

我知道，爸爸始终想念着妈妈，在延安，他对她多次的召唤都未能如愿。而现在妈妈已经不可能

再回到他的身边，这是事实了。爸爸把他对妈妈的爱，对妈妈的思念，全部给了我并以此填补他内心之苦，补偿他对妈妈的亏欠。因为爸爸知道，妈妈虽然身体不好，精力不支，这非她本意所为。这是时代、社会、环境、形势所造成的，是历史所造成的。爸爸总是这样想：他欠妈妈的情，欠妈妈的爱。爸爸也知道，妈妈所以苦苦熬了这么多年，都是为了他，为了他的荣誉、地位，为了党的威信，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对他的爱。十年，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可在人生的河流中却是永远值得记忆回味的。

“那您说怎么办好？”我实在别无他法了，只好又向爸爸讨教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李讷都18岁了。”爸爸的语调显得更低沉。

我有些过意不去了。我原本只是想从自身多想些办法来解除妈妈的孤独之苦，想使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妈妈，照顾妈妈，尽我一个做女儿的义务，没想到我的办法都被爸爸否定了。这样看来，我是在北京不能接妈妈来住；离开北京到上海陪妈妈又不忍心使爸爸感到孤独凄苦。这可叫我怎么办呢？真叫我站在爸爸和妈妈中间，左右为难！

更使我没有想到爸爸最后那句话，说得那么伤

感,那么凄楚。望望爸爸,我的心头也真不是滋味。

“谁叫您当初……”我真该死!我真后悔!我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我怎么能使爸爸伤心呢!可话一出口,是怎么也收不回来的,我担心爸爸听了会生气,会伤心,会责怪我。

“这是过去的事了。在对你妈妈的问题上,我们来个四六开,六成的错误由我来承担吧……”

“我没有办法照顾你妈妈,大概也只有由你来代替我照顾你妈妈了。”爸爸像是总结我俩的谈话,又像是在做自我批评。

这话,叫我这个当女儿的听了还能再说什么呢?我还能再埋怨爸爸吗?不能!爸爸的坦诚,爸爸的直率,爸爸能与女儿真心相见,在女儿的面前敞开了心扉,使我对爸爸更加深了敬爱与崇敬。

可如何能使妈妈生活得愉快,能使妈妈摆脱孤独与寂寞?现在看来,我的想法都不能实现,我与爸爸都找不出能够帮助妈妈改变一下环境的好办法来。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

爸爸说:江青嫌我是土包子,
她同你妈妈完全不同

我和爸爸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除了谈我的学

习、生活之外，更多地则是谈妈妈。谈妈妈的现在情况和过去的往事；谈妈妈与爸爸那难忘的十年情谊。

爸爸对妈妈念念不忘，旧情难舍。

爸爸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人。爸爸知道，谁都无法去纠正这历史造成的错误，谁都无法减轻妈妈的痛苦。爸爸是深深地了解体谅到妈妈孤独、寂寞、凄楚的心情。正因为爸爸了解妈妈，爱着妈妈，为了安慰心灵上遭受过巨大打击与创伤累累的妈妈，爸爸从妈妈离开延安时的那天起，从来就没有忘记妈妈。他写过信；派人去过；打过电报，希望妈妈回到他的身边。当这一切未能实现时，当年又把我送往苏联去找妈妈，让我代替爸爸去宽慰那颗饱尝孤独凄苦的心灵，去慰藉那颗远离祖国、远离亲人在异国他乡寄人篱下的孤苦的心灵。恐怕爸爸当时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妈妈能度过在异国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能坚强地活下来，是因为我以女儿的心去慰藉了妈妈那颗凄凉的心灵；以女儿爱的甘泉，注入妈妈那曾一度干涸的心田，使它长出一片青绿来。如果说这是我做女儿的功劳，更不如说是爸爸良苦用心的结果。

这苦心，爸爸明白，妈妈理解。长大以后的

我，虽然觉得小时候那曾一度“无妈”，一度“无爸”的生活是苦的，是涩的，但能使爸爸的心灵得到安慰，使妈妈的心灵得到宽慰，这是我做女儿该尽的义务，尽管这一切都不是我主动去做的，那是因为我当时的年纪尚小，否则我也会主动去以自己的心去慰藉两颗心，因为我是爸爸和妈妈两个人的女儿。

我在爸爸身边度过了最美好的青少年时代。我有更多的时间生活在爸爸的身边。爸爸爱我，我也爱爸爸，但我并不仅仅是爸爸一个人的女儿，我还是妈妈的女儿。我与妈妈同甘共苦、相依为命的那段生活，我终生都不会忘记。爸爸爱我，但爸爸不自私，爸爸从不剥夺妈妈对我的爱。因此，爸爸对我的生活进行了妥善的恰当的安排。爸爸决定要我定期去看望妈妈，而每次我走前，爸爸总是亲自忙前忙后，准备这个，又让人去购买那个，带上这个，又别忘了那个。就这么千嘱咐，万叮咛，“代我照顾你妈妈。”这句话要重复说上几遍才放心地离去。

当我从妈妈那里回来以后，爸爸又总是忙里偷闲，抽空儿和我一起谈起妈妈；问长问短，谈寒叙暖。有时我都笑了：“爸爸，您这话都问了好几遍了。”

“老了，老了，爸爸没得记性了。”爸爸笑着用右手食指指指自己的脑门，引得我又跟着笑起来。

妈妈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的爸爸也是很孤苦、很寂寞的，你要多体谅他。”

看看，爸爸把我当个小大人，妈妈把我当个贴心女儿，他们什么话都对我讲，什么事儿都对我说。两位老人都把我看作是自己最真挚、最可靠、最要好的朋友。我做女儿的，又有什么办法能为他们排解忧与愁，为他们解除痛与苦呢？我这个女儿要当好，实在是太难啊！我明白，爸爸与妈妈间的情，真是难舍又难分。他们早已分手，那是历史之过，可他俩的心却如此相印、相通、相连，又有谁人能够说得清楚呢！

我成了爸爸与妈妈沟通感情互相问平安、互相关致祝福的桥梁。成了“架”在两位老人心灵上的一座桥。这座桥，成了妈妈的生命和心灵的全部寄托；这座桥，也成了爸爸的生命和心灵的全部寄托和安慰。

尽管我自己小的时候吃了不少苦，爸爸与妈妈的分手同样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不少的痛苦，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暗暗为此而落过泪，但我绝不埋怨我的爸爸，更不怪罪我的妈妈。我能生活在爸爸、妈妈的身边，这要比起我早逝的哥哥、姐姐们来，比起

更多举目无亲的革命烈士的孤儿来,还是很幸福的,更何况我有一个极细心的爸爸的关照呢!我知道爸爸爱我,他通过种种方式,设法补偿我曾过早地失去的父爱亲情。我知道爸爸给我的爱是双倍的,因为这爱中,还有一半是通过我转给我妈妈的。

我说过,妈妈生病了,不就医,更不吃药,爸爸知道后非常难过。爸爸就在百忙中,总要抽空儿为妈妈寻药治病,写信劝告宽慰妈妈。

说来也怪,谁劝都不听的妈妈,每当接到爸爸的信后,态度就发生变化,变得肯就医、肯吃药,情绪很快就好了起来,病自然就轻了许多。

这人与人的感情,真是捉摸不透,说不明道不明的东西。

爸爸把我看做是女儿,看做是他可以信赖并能真心相见的朋友,所以在我面前,爸爸从来毫不隐讳同妈妈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扯不开的情感。爸爸对我讲:“我知道你妈妈生病都是为了我。都是因我而起。只有我才能治好她的病。”

“可我又有办法呢?”爸爸叹息道。

“江青对我不好,她嫌我老了,嫌我是土包子。她同你妈妈完全不同。”

我深深理解爸爸内心的苦楚,可作为女儿,此时此刻,我能对我的爸爸说些什么呢!

第七章

- 一张照片引起的风波
- 一幅“西瓜画”引来的风波
- “后妈”问题引来的风波
- 爸爸为我主持婚礼
- 婚后我们生活在爸爸身边
- 我们被迫搬出中南海

一张照片引起的风波

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那时，西单商场内出售领袖照片，也出售当年苏联卫国战争时的英雄卓娅等人的照片，好多同学都买了成套的。我的零花钱有限，我还要留点买俄文版的知识类书籍。所以，当我看到领袖的照片时，我就

买了一张爸爸在延安时期戴八角帽的照片。

这张照片在我们家里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妹妹李讷见到我拿着这张照片时，就问起我来，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是谁给的？这事让江青知道了，本来就爱小题大作的她，特意为此找我谈话。

“你老老实实地说，你这张照片是从哪里弄来的？”江青一板一眼、一字一句地问我。

“我这张照片是从西单商场里买来的。”我也不紧不慢地回答她。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老实说，不许说谎，这可是保密问题。”她又盯着我问。

“是从西单商场买来的。”我还是这样说。

“我要派人去调查，你可真犟，嘴犟得老高老高，可以拴三头毛驴了，可以……”她气得不知说什么好了，“你说……”

我站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再说，还是那句话，她听了会急得跳起来的。

我喜欢爸爸，我爱我的爸爸，同学们都可以有我爸爸的照片，同学们也都有自己爸爸的照片，我为什么就不可以有一张呢？我真不理解。我买不起全套的，就买了我爸爸的这一张照片，这又犯了什么家法家规了呢！也值得江青动肝火大呼小叫地审

我。

我真感到委屈，我很难过。这时，我就又想起了我的爸爸，我要把心里话儿跟爸爸说说，诉说我心中的苦。可最后我还是忍住了。我还是遵守着我的原则：不向爸爸告状诉委屈，不给爸爸增添任何麻烦。我又把苦咽进了肚子里。

江青还真派人去调查了。调查的人回来汇报说：西单商场真售领袖照片。江青听了说：这事就不许再提了。

这当然是别人告诉我的。这样江青还有什么说的！我既没有扯谎，又没有泄密，句句说的都是实话。她不会再对我说这事，否则不就成了她对我道歉的话外音了吗！她是不会在任何人面前说自己的过错的，更何况对我呢！

■ 一幅“西瓜画”引来的风波

1949年，我和二哥岸青同时回到爸爸身边。爸爸爱我这个女儿，同样也爱儿子。但江青不喜欢我，更不喜欢有病的二哥。总想找茬把我们从爸爸的身边挤走。

二哥知道大哥牺牲的消息后，非常痛苦。他与大哥的感情太深太深了。自杨妈妈牺牲后，他与大哥相依为命，流落上海街头的日子，他得到哥哥无

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在苏联，兄弟俩又携手共进，同学习、同娱乐，他俩形影不离。他忆起往事，更加悲痛难抑。本来他的脑子小时候就受过刺激，受过伤害和摧残。哥哥牺牲了，他想哥哥，他爱哥哥，现在又上哪里去找哥哥呢？他病倒了。

江青借这个机会让二哥离开中南海，离开爸爸的身边。

当二哥离开中南海，离开爸爸时，爸爸的心情特别沉重。爸爸爱每一个孩子，对每一个孩子都寄予厚望，但他又无暇照顾孩子们。爸爸舍不得二哥离开他，他心痛啊！

爸爸用极沉重的语调对我说：“我爱岸青，也非常同情他。他很小的时候就跟岸英一块沦落上海街头，受尽了苦难与折磨，曾多次遭到警察的毒打，这些摧残对他的刺激太大了。他苦啊！因为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他要搬出去了，要离开我了。我很难再常见他的面，更难再照顾他。以后，你就要代我多多照顾岸青吧！”

除了照顾妈妈外，这是爸爸第一次托我代他照顾家里的亲人。尽管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我不愿意让爸爸忧伤，不愿意让爸爸为二哥难过，我还是答应了。因为一个是我的哥哥，一个是我的爸

爸。

在爸爸的神情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苦。萦绕着爸爸的苦，好像又不好说，无法说。却总困扰着爸爸。每每看到这，我心里也很乱，也很不是滋味。

有人这样讲：一人困难两人分担，就不算困难；一人痛苦两人分担，就不会痛苦；一人欢乐两人分享，就是两个欢乐。我也总在想，要替爸爸分担忧伤，替爸爸分担困难，尽到一个女儿应尽的责任。

我也知道，我们这个家里的事，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好说，那么好办，别认为我们这“中华第一家”什么都应该排在第一位。家里的事，也够复杂，够烦人的。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水平虽然不是很高吧，但基本上还是能把自己的心意表达出来。那次，又是美术课，我画了个西瓜，又涂上水彩。我看看那西瓜，深绿的瓜纹，青青翠翠的瓜皮，真美！我越看越得意。心想：这次作业，准能拿5分！我看看看着，脑子一动，人们不是常说“隔皮看瓜，谁知里边是什么样”吗？对呀！我还应该看看里边。我就又动手在画纸的左边空当里，画了一块切好的三角形的西瓜，然后动手上色，真美！鲜红鲜红的瓜

瓢，再点缀上几颗黑黑的瓜籽。这就告诉人们，那圆圆的西瓜里，也同样是饱含着红红的瓢、甜甜的汁，谁看了谁都想吃。

我特别欣赏这幅画，我把它交给了老师。果然，老师在我的画纸上写了个红红的5分！

后来，我给妈妈写信时，把我这得意之作寄给了妈妈，让妈妈分享我的欢乐，让妈妈看到我的进步。

谁知妈妈的回信我没有收到，它却为我惹了祸。

平时见人总爱说“这是我的女儿，比亲女儿还亲”的江青，不知是从哪儿来的无名火，找不到发泄的地方就冲我来了。

平时很少或根本不进我房间的江青，那天突然腾腾腾地几步就冲进我的房间。我正在写作业，还未等我站起来，她就大声斥责道：“我问你，你用西瓜诗来拉什么线？搞什么鬼名堂？还嫌这个家不乱吗？”

我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感到莫名其妙，我又做错什么事啦？我一言不发，随她叫喊去吧！她总有叫累了、说够了的时候。我一声不吭地站起来，望着她，听着她吼叫。

“你妈在你的西瓜画上写诗讽刺我，嘲笑我，

辱骂我……反了你们啦！这事没完！我要组织上去处理这事。非处理你妈妈不可！”

她好像出够了气，刚要转身走，又扭过身来恶狠狠地说：“不光处分你妈妈，还有你舅舅，还有……还有你舅妈。都是他们出谋划策，是他们，在……在捣鬼……”气得她说话都语无伦次了。

噢，原来是我的美术作业惹出来的祸，我这才听明白点儿。

“那画是我的美术作业。画是我寄给我妈妈的，这和我舅舅、舅妈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知道我的作业，也没有给我出过主意。”我说。

“我知道了，准是我妈妈有信给我。通信是我的自由，您不得到我的允许，没有权利拆看妈妈给我的信。这是犯法的。”我不紧不慢地说着。因为我知道，和她这种人吵是不管事的，你声音高一度，她会比你高八度。常言道：有理不在声高。现在是我有理，是她找上门来闹。偷看了我的信，是她没有理。

她看我没有被吓倒，反而告她个没理，气得她鼻子差点歪了。她吭了两声又说：“这事没完，一定要处分你妈妈，看你还敢跳来窜去地……”她甩下这两句话走了。

开始，我还真为妈妈担心，但又一想，不就是

我的一张美术作业吗！要是只为一张作业就给人处分，那谁家的孩子还敢向家长报告学习成绩啊！当后妈的权力也太大了。而且这种处分也太没有道理。我想过，要是真的妈妈为这事受了处分，我非找爸爸评理不可！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家里又风平浪静了，看不出有什么不祥的症候。再看看爸爸，爸爸依然对我那么和蔼，那么亲切，那么关心。从爸爸的神态中看，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

有时，我真想跑到爸爸跟前，把我受的气，把我的委屈向爸爸诉说一番。几次想去，我又都忍住了。我还是遵守我的那条原则：就是受到天大的委屈，绝对不去爸爸跟前告状，绝对不因为我的琐事，给爸爸增添麻烦与苦恼。为了爸爸什么我都能忍，而且全都忍了。

女儿跟妈妈是无话不说、无事不谈的。当我寒假回到上海后，与妈妈闲聊时，把这次家里的“风波”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妈妈，还问组织上是不是给了妈妈什么处分。妈妈听了我的话，很久很久，一句话也没有说。

再后来，我无论给妈妈写多少封信：有的是报个平安；有的是告诉她我的学习有了进步；告诉她我按爸爸的吩咐读完了什么书，有什么收获……妈

妈却从此再也没有回一封信给我。

是江青，是江青割断了我与妈妈的书信来往。而那封信，那首诗，我至今未见过，也不知它的下落。

我想爸爸肯定是知道这事的，只是不说而已。江青也知道，她除了借机冲我找茬发发火，出出她的邪气之外，她没有别的办法来对付我。尽管我对于她来说，是眼中钉、肉中刺，但她无法对付我。因为她也知道，我来这个家虽然时间不长，但在这个家里却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因为我的爸爸爱我，有爸爸作为我的坚强后盾，她不敢把我怎么样。

我也知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谁家都有是是非非，都无法说清楚。只要我不惹爸爸生气，不给爸爸增添麻烦与烦恼，我的委屈我忍，我甘愿当个和事佬。

“后妈”问题引来的风波

我有一个同学，当时我们都住校。她比我年岁小点，我们又同在苏联一块学习过，现在家又同住中南海。她的家庭与我类似，她的妈妈也是后妈。

她对我说：“我回家后感到很苦恼，后妈不喜欢我，嫌弃我。我想我妈妈，觉得生活过得挺不愉

快。”

“你最好不要老回家，咱们都住在学校，多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生活也很快乐。每两周或一周回一趟家就行了，我就是这样。”我劝她说。

谁知她回家后又遇上不高兴的事，无意中对她后妈说：“还是娇娇姐姐的话对。”

她后妈听了，认为我是在挑拨她们母女的关系，挑拨她们的家庭关系，就把这事告诉了我爸爸。

爸爸最了解我。爸爸知道我从来就不是那种咬舌头，拨弄是非的人。爸爸相信我在同学中站得直，走得正，是个正正派派的人。爸爸当她面说：“这事让江青去处理吧。”

她转身走了，找到江青又前前后后说了一遍，还说：“主席说让你处理。”江青一听可乐了，认为这回可抓住把柄了，可要借这个机会出出上次的恶气。于是，当着那位阿姨的面，江青让人把我叫去了。

她把我叫到跟前说：“当阿姨的面，说说你跟她女儿说了些什么？不许说谎。”

“我没说什么呀！”我回答。

“你好好想想，没说什么，阿姨怎么会找到我们家来呢？”江青又问我。那阿姨把她女儿的话说

了一遍。

“是这样说的吗？”江青问。

“是。”我回答她。

“你说这干吗？”江青又问。

“她说自己回家后挺苦恼，挺不高兴，我劝她多在学校跟同学补补课、玩玩，一周一次，两周一次回去，这样大家都高兴。我就是这样。我们家挺好。”我说。

那阿姨一听我说的话和她女儿说的一样，全无挑拨的意思，就说：“还是娇娇大点，懂事……”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江青原本想借机整整我，出出气，一听我说的话也有道理，而且与她也无害，就对我说：“以后说话注意点。给阿姨道个歉！”

“阿姨再见！”说完我就走开了。我心里想：我没有错，为什么要道歉呢！

尽管是这样，我心里还是感到挺委屈，挺难过，她们为什么总是把我往坏处想。

爸爸为我主持婚礼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爸爸的小大人真的成长为大人了。我也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开始交朋友、谈恋爱了。我与孔令

华的相识不像社会上传的那么神，说的那么奇。我们曾经是同学，彼此都认识，就不用别人来拉线、介绍，彼此看得上、说得来，接触多了，自然就产生了感情。有了好感，才有了爱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加深了解，进而发展成为恋人，然后结婚。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事。

在我的朋友中，许多人也都是这样相识—相爱—结婚，我觉得这都很正常，没什么可以非议的。

为什么对我的事儿人们就多了些关注，多了些议论？大概是因为我的爸爸是毛泽东，这才引起了这许许多多真的假的风波来。我是个正常人，是个普普通通的需要生活、需要工作、需要爱情的年轻人。

有人说：令华的父亲，我未来的公公当初不同意我们的婚事，认为我们是门不当、户不对。有人说：令华的父亲，我未来的公公强迫令华和我断掉来往。还有人说：令华不听父亲的相劝，气得老人打了令华。还有人说：我们最终成为眷属，是因为我的爸爸说服了孔令华的父亲：孩子们的婚事由他们自己去做主，当家长的不要干涉孩子们的自由等等，等等。说得真像有那么回事儿一样，结果人们就把假的全都当成了真的流传起来。

其实，哪有这么多的事呀！

我和令华交朋友后，爸爸问过我，他的爸爸妈妈姓甚名谁，问过他们在什么单位工作；问过他的家庭情况。这些事，当初我都没有打听过的，也没有像审干部那样去逐条逐条地问过令华。

我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爱的是他，不是其他的任何人，所以别人什么工作、什么职务、什么家庭对我好像都无关紧要，我只要认识他、了解他就行了。

当我觉得该把事正式向爸爸讲的时候，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令华的情况全部无保留地介绍给爸爸听，还想听听爸爸的意见。

“小孔的父亲是哪个？在哪里工作？”爸爸听完我的话后问。

“这，这，我没有问过。他也没有说过。”我为难地如实回答了。

“家长干什么你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朋友呢？”爸爸反问我。

“我是跟他交朋友，了解家长干吗？”我有点不解。

“还是要问一问。了解情况嘛！”爸爸语重心长地说。

我一向都很听爸爸的话，也非常尊重爸爸的意

见，更何况这又是我的终身大事呢！当我再次与令华见面时，便把爸爸的意思告诉了他。

他听后笑了，我也笑了。真的，我们同学多年，无话不谈，无事不说，还真是没有专门介绍过这些情况。这次，他都详细地告诉了我。

我脑子里可装不了那么多事，我就记住个大概。后来，我把情况如实地告诉了爸爸。

“噢，小孔的父亲是孔从洲将军。我熟悉、熟悉。”爸爸笑了。

“那您……您同意吗？”我小声问。

“好。好。”爸爸望望我微笑着说。

就这样，就这么简单。我与令华的终身大事就算是定下来了。这哪像社会上传的那么奇那么复杂啊！在我们结婚之前，我爸爸还没有机会见一次令华的父亲、我未来的公公呢！两位老人的见面还是在我和令华的婚礼上。

1958年，大概是7月的一天，我第一次把令华领到我家，在中南海见到我的爸爸。

老人家见我和令华来了，放下手里的书，示意让我们坐在他的身边。我俩坐下后，服务员端上茶来，随后就退出去了。

爸爸那亲切而慈祥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令华。因为令华是第一次见爸爸，本来就有些紧张，爸爸

这一看，看得他很不自在。

爸爸看过来，又看过去，又看看我。爸爸的脸上掠过一丝外人不易察觉的表情。这表情意味着什么？我心里却是非常明白。

爸爸又扭过头来看看我，但没有说话，目光稍稍在我的脸上停了一会儿，冲我笑了。我也会心地笑了。

父女俩相视而笑，是因为我们父女俩的心是相通的，都明白了这笑中的含义。

在爸爸的心里，“娇娃”是个漂亮的女儿，当然会找一个帅气、漂亮的男友啦！令华很帅气，也很漂亮，但眼睛似乎让人觉得小了点，这似乎是爸爸对未来的女婿感到的美中不足。

但爸爸冲我一笑，我全明白了。这就像老师改我的考卷一样：答案全对了，如果字再写得漂亮点，这个百分就是十全十美了。

爸爸这笑告诉我，爸爸还是挺喜欢令华的；这笑告诉我，眼睛小点算不了什么缺点，人好就行；这笑告诉我，爸爸是同意我们交朋友了。

1958年7月份，我高中毕业要升大学，为了让令华帮助我复习功课，准备升学考试，令华第一次住进了中南海，就住在爸爸的书房里。

爸爸关照我们：既要好好复习功课，又要注意

身体。要我们有劳有逸，要劳逸结合。他还特别关照我，不可为了升学而搞垮了身体。

江青对孔令华说：“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孩子，跟他们都一样。”

我的爸爸是个十分细心的人。对我的事儿，他都关心到了。

我与令华的事儿，其实在寒假到上海时我就对妈妈提起过。妈妈说：“你要跟爸爸商量，他同意的我也同意。”这话我没有跟爸爸讲，后来时间长点了，也就给忘了。等升学考试过后，爸爸说：“你们的事，是个大事，我同意了，还要征得你妈妈的同意。如果你妈妈没得意见，你就跟小孔去见他的父母。俗话说，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哩！我的娇娃不丑，更要见公婆。”

就这样，我们俩乘车到南昌，见到妈妈后，原原本本把爸爸的话转告给妈妈。妈妈说：“你爸爸同意，我也同意。”妈妈还是这句话。

在妈妈那里住了几天，她舍不得让我们离开，但她知道爸爸为我俩安排了行程，就让我们尽快乘车到沈阳去了。

当时，令华的爸爸、我未来的公公在沈阳高级炮校任校长。我这是第一次见令华的父母，第一次认孔家的门。

两位老人高高兴兴地接待了我，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关心我、爱护我。他们满意，我也很高兴。

这就是我和令华的认识、恋爱的全部经过。

在我们那个年代，不光是我，就是其他的同龄人在谈情说爱时，没有、也不会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花前月下，相依相偎，相伴相随；没有、也不会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乘车旅游，欢度蜜月。但就我的情况，自己还是非常满意，非常知足的。

我的婚礼是1959年8月29日在北京中南海的家里举行的。婚礼说仓促吧，也可以说早就有了准备。爸爸向来都不主张大操大办，当然也就用不着去东采西购地忙活了，更用不着摆什么喜庆大宴。

爸爸是8月27日晚上回到北京的，我和令华到车站接他回来。第二天吃过早饭后，爸爸把我俩叫到他的房间，商量结婚日期，请哪些客人参加等等。除了双方的家长以外，我们商定请蔡畅，因为我在苏联就见过她，回国后在哈尔滨、沈阳和她来往多，比较熟悉。请邓颖超，是因为江青曾带我多次到总理家去，我自己也曾多次去过她家，也是因为比较熟悉。当年江青曾认为我的画画得好，请曹轶欧给找人帮忙辅导一下，就这样认识了，这次也请她了。其实，后来她也没给我找人帮忙，我呢，从“西瓜诗”的风波以后，也就再没有画过画。

因为我是女孩子，当然请的都是妈妈们了。“我的亲戚王季范（爸爸的姨兄弟）在北京，他是一定要请来的。”爸爸告诉我说，我当然也点头同意了。

同时还请了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我的同学和朋友。

婚事对我来讲是件大事，但为此给更多的老人增添麻烦我于心不忍，更何况他们又都忙于国家大事，又都公务缠身。

参加我与令华婚礼的客人由我们提名，爸爸做主定下来了。

新房是由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帮忙收拾的。他们把新房布置得既简单，又典雅。

房间里有书柜、写字台、桌子、三四把靠背椅子。这些都是从仓库临时搬来的公家的旧家具，我们暂时借用的，连大床也是。

床上摆放着两套白色被罩套起来的夹被。褥子是旧的，用白色的大床单盖着。

他们帮我把被褥摆放整齐，又把地打扫干净，把桌椅摆好。

这就是我的新房，我的全部新婚摆设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

婚礼是在午后举行的。参加婚礼的约有 30 多

人。

我那天穿的是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白色皮凉鞋。令华穿着白色衬衫，深蓝色西裤。这些都是前些天一起做好的。

爸爸不主张大操大办。就委托生活管理员张国兴帮忙采办了三桌酒席，规定每桌为八个菜。除了鸡鸭鱼肉和几个素菜外，没有别的。

因为我俩都在上学，没有收入。就这样，我就觉得太让爸爸破费了，心里很是过意不去。这几桌酒席的花销，在当时，也不是个小数目。

爸爸亲自为我主持婚礼，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爸爸那天特别高兴，他举着酒杯向我和令华祝福。他说：你们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还风趣地对令华说：“不用忧来不用愁，二人心意两相投。”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我俩向爸爸举杯答谢。

爸爸还举着酒杯向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表示谢意。为大家劝酒。

我和令华双双端着酒杯走到爸爸跟前，想说什么，又一句也说不出。我俩久久地望着爸爸，千言万语在心里，此时竟说不出一句来。爸爸望着我俩，微笑着。那笑里透着骄傲，似说我的娇娃长大了；那笑里透着幸福，似说我的娇娃成家了；那笑

里又透着辛酸，似说那苦难的漫漫岁月，印在了我们父女的心田；那笑里又透着爱，似说娇娃啊，爸爸永远在你的身边！

我俩望望爸爸，只是深深地向爸爸鞠躬来表达我们做晚辈的对爸爸的深深谢意。表达我们做晚辈的对爸爸的培养、教育的谢意！表达我们做晚辈的此时此刻的心情。

我望望爸爸，爸爸笑了，我也笑了。我们向他敬酒，爸爸喝了好几杯。

我们又举着酒杯，走到令华的爸爸——我的公公面前，向他敬酒，献上儿女的敬爱。

爸爸和工作人员、客人们一起，共同举杯，为我俩祝福！并与参加婚礼的人一块儿照相，又单独与我和令华合影留念。

饭后，又请大家在春藕斋看了场电影。

婚礼就这样结束了。

这就是毛泽东大女儿的婚礼。

我想，这婚礼比普通人家孩子的婚礼还要简单、朴素，但它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这婚礼洋溢着浓浓的父女亲情，因为这婚礼是我的父亲毛泽东亲自为我主持的。

爸爸对我的婚事如此重视并亲自为我主婚，我深深懂得爸爸的心意：他把对妈妈的关心和思念，

全部给了我。为了我的幸福，他尽到了而且超越了一位做父亲的责任。他把父爱倾注到我的身上。我过得好，我过得幸福，妈妈会高兴。妈妈高兴，就能使爸爸得到宽慰，得到慰藉。

我也明白，爸爸所以请王季范夫妇，同意我请蔡畅妈妈、邓颖超妈妈等参加婚礼，同样是为我想，为我们家的复杂关系着想。人们都知道，江青是个心胸狭窄、尖酸刻薄的人。在与她相处的十年中，她表面上看似大度，而在一些小事上，没少给我“小鞋”穿。这些事，我不说，可我的爸爸却深深地了解，因为他了解江青的为人。

所以，对我的婚事爸爸格外操心，对我的婚礼，爸爸又同样是格外重视。这除了表示出爸爸对我的爱之外，还向人们示意：一旦发生任何意外的变化，我女儿的婚事别人无权干涉，这是我当父亲的做主的，我说了算的，江青也休想借此做任何文章！

爸爸为我想得多周到，多周全！

婚后，我们就住在中南海爸爸的家里，生活在爸爸的身边。

爸爸时常到令华和我的屋里来坐坐，与我们谈谈生活，说说学习，问寒问暖。有时候，爸爸还让我们陪他在院里散散步，在院里转转，这是我们最

高兴的时刻。

我的爸爸，像所有的父亲爱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我们，关心我们的成长。在谈话中，在无声的漫步中，透着爸爸的爱。

我生活在爸爸的身边，还能像过去一样时常见到爸爸。当爸爸累了，我坐在他的身旁，爸爸用那温厚的大手抚摩着我的手，说家常，谈儿女，说工作……这样，爸爸的精神就会渐渐放松了，能够很好地休息一会儿。

这时，尽管我也感到很累了，但我心里却是非常高兴，我尽到了做女儿的义务。我宽慰爸爸，使爸爸舒心、高兴，这也是我听了妈妈的劝导。妈妈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说：“在爸爸身边，不要惹他生气，不要给他添麻烦。”

爸爸在感情上得到的慰藉，是我给爸爸的，也是我的妈妈贺子珍——爸爸所深爱的人给他的。

爸爸、妈妈和我，或是爸爸、我和妈妈，这期间扯不断、理不清的感情，维系着我们三个人。一人喜，三人同喜；一人忧，三人同忧的事情，也时时发生在我们之中。不过，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凡是忧，无论是谁，都会把它深深埋在心里；凡是乐，无论是谁，都会把它分给所爱的人，让欢乐同在我们心里。

我的婚事办完了，这也算了却了爸爸的一件心事，也了却了妈妈的一件心事。虽然妈妈未能参加我的婚礼，但情况妈妈也是知道的。

婚后我们生活在爸爸身边

人们都说我的长相酷似我的爸爸，可爸爸却说：我长得文静、清秀跟妈妈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我想，可能是我综合了爸爸和妈妈两个人的特点，继承了两个人的遗传基因，所以才酷似爸爸又似妈妈吧！

周围的人们这样说过：娇娇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她怎么不像主席，可现在一看，她人长大了，越长越像主席。我听了心里觉得好生奇怪，我是爸爸的亲生女儿，这难道还是假的吗？

在一次与爸爸的闲谈中，我说：“爸爸，当初您怎么就认我是您的女儿呢？”

“我不认你，你就没得爸爸呀！”爸爸冲我亲切地笑着，一把把我揽在他温暖的怀里。

现在想起来，当时我的问题提得多可笑，多幼稚。

我升入大学以后，因病重实在无法坚持正常学习，爸爸就特别关照我，要我养好身体，就这样，不久我休学在家养病。

爸爸要求我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注意休息，但没有就此放松对我的教育，尤其是在我的学业上，爸爸同样抓得很紧。

一天，李医生给爸爸检查完身体后，走到我的房间里，对我说：“李敏，从今天起，我每晚都要给你补半个小时的古典文学。”

我听了后一愣，心想：我是在休息养病。可忽然又一想，我明白了，这准是爸爸的意思。我点点头答应了。从此，我天天晚上要上半个小时的古典文学课。

中国的古典文学，对我来讲，学起来可真够难的，就像人们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时，我学习起古文来，恐怕比登蜀道还难。因为我的中文水平有限，认识的方块字又不甚多，尤其是对一些古诗词，更难理解。所以，老师补课时，首先要教我过认字这一难关，然后才是讲解古文的含义。这样一来，时间当然就显得紧了些。有时候，我也真感到很累，有点力不能支了，老师讲着，就见我点头太频繁了——打瞌睡了。当医生的老师，当然会明白再补下去是徒劳的。所以有时候也就会放松一下对我的要求，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让我早点去休息。我呢，犹如受到大赦一般，轻轻松松地休息一晚上。当然这样的机会是极少的，也是难得

的，但更多的则是超过规定的时候，要延长学习时间。我也只好认了，因为老师比我还辛苦！

我知道这是我爸爸的意思。开始，我想，要好好学习，说不定什么时候爸爸会突然要考查我呢！

真怪，爸爸有时见到我，或周六吃晚饭时，从来不提此事。莫非是爸爸忘了？不会，爸爸的记忆好着哪，办起事来都是丁是丁、卯是卯的有始有终。不管怎样，我始终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有一天，我偶然到了爸爸的书房，见爸爸桌子上放着一本《唐诗三百首》。我顺手拿起来，翻了翻，看了看，有几首还真能看出点门道、体味出点意思来。我对此书挺感兴趣，心里也挺高兴。心里想，多日来的古文课还真没白补，我笑了。

我一抬头，看见爸爸冲着我笑，笑得那么慈祥，那么和善。好像是说：我的娇娃古文开窍了，对古文有了兴趣，这真是一大长进。

“爸爸，这本书借我看看好吗？”我问爸爸。

“好嘛，拿去看吧！”爸爸点头答应了。

我走出爸爸的房间后，还在想，爸爸的点头，不光是答应我拿书去看，还包含着对我补课效果的赞赏，包含着爸爸对我刻苦努力学习的赞扬。显然，爸爸对自己的精心安排也是满意的。

看见我学业的每一点长进，爸爸都很欣慰。爸

爸没有白白为女儿操心，女儿对爸爸也给予了最好、最让他满意的回报。

在平时，只要是在不影响爸爸工作，也不影响我们日常学习的情况下，爸爸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对我们进行热爱祖国艺术的教育。

我从小在苏联长大，不像妹妹李讷那样，从小就有机会接触祖国的文化，认识祖国的艺术。我刚刚回国不久，对祖国的各方面都不尽了解，有些东西过去见都未见过，听都未听过，不用说叫我去欣赏了。比如京剧，开始我就是一窍不通。听着京胡声还不错，还挺好听的。看到戏中人衣着打扮，我搞不清他们饰的角是谁，一唱起来呢，又是没完没了。我坐在台下就直想打瞌睡。

有一回，爸爸让我跟他一块去看马连良演唱的“空城计”。一开始，我觉得挺新鲜，看着他们的行头也很好玩，我觉得还行，出场、退场的我看不出门道来，只看热闹。可越看越不想看，这不是小孩看东西没长性，这是越看越觉得没劲，看着看着我抬眼看着台上的人一起身，不再唱了，像是要走下后台去了。我心里一阵高兴，心想：这会儿可能该换别的人上场了吧。嗨，谁知，他起身转几下，扑通一声又坐下，唱个没完。

“呼噜呼噜”，我都进入梦乡了。“哗哗哗”一

阵鼓掌叫好声，把我震醒，睁眼一看，他还在台上唱呢！唉，什么时候才能唱完呢？我不耐烦地看看爸爸，爸爸却全神贯注地听着，可能早忘了身旁还有个我。爸爸的头还在随着唱腔轻轻地摇动着，两手还不住地自己的双腿上打拍子。那动作，那神情；与戏中人，戏中词，那么合拍，那么和谐，又那么专注，那才叫如醉如痴。懂得艺术，欣赏艺术，那才叫艺术的享受，享受的艺术。而这一切对我来讲，真可谓受罪，可我又不敢说声退场。

不过说来也怪，头次收获不大，可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我也有点入门，也有点喜欢京戏了，喜欢上祖国的传统艺术了。

再往后，像看梅兰芳表演的《贵妃醉酒》时，就不像刚开始那么感到枯燥单调而无味了。渐渐地听懂了词义，看明白了内容，这也可真是一大收获。

我倒是挺喜欢七龄童的戏，当初他们彩排时，江青曾带我和李讷去长安大戏院看过。因为是彩排练习，演员不化妆，只是穿上高底靴子，戴上所有的行头，就“真刀实枪”的在台上练了起来。那一招一势，也是很吸引人，很扣人心弦。有时我还真为他捏着把汗，心想，手里的家什要是万一掉了，打过来的棍棒要是万一接不住，或者碰到鼻子眼睛

的，那可怎么办呢？可结果我的想法是多余的，我想的事一点都没发生。“真棒！”我看完后特别赞叹道。

正式演出那天，我是跟爸爸一块坐在包厢里看的。

那时候，北平刚刚解放不久。戏院子里就跟咱们现在看到电影里演的过去的场面一样，戏场里有递热毛巾的。隔老远，就那么一转、一扔，还准能递到那要毛巾人的手里。还有送茶水的；还有脖子上挂着带子或绳子，胸前托着个盘子，里边摆着香烟在座位中穿行叫卖着的；还有卖花生米的，他们用纸包成三角形的袋，有的用锥形袋装着；还有卖水果糖的，红色、绿色、黄色，五颜六色的，挺吸引人的。我买了包花生米吃。

这一切，对我这个刚刚回国不久的“洋人”来说，真是感到既新鲜，又好玩。

后来，我在中南海又跟爸爸一起听过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相声《买猴》。这相声我是基本上听明白了。相声大师的丰富的语言词汇，幽默诙谐的话语，时时引来观众的欢笑，博得大家的阵阵掌声。我也高兴地使劲鼓起掌来。

听相声，对我是一次考试。它考了我对中文的听力，更主要的是考了我对自己祖国语言的理解能

力，对自己祖国语言的认识能力。这使我懂得了自己祖国的悠久文化，使我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文化艺术的宝库，珍藏着世界上最美丽的瑰宝。

现在想起来，爸爸当时为什么总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硬要拉着我去听相声，看京戏，恐怕也是想对我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

1958年秋，当我高中毕业，升学考试完毕之后，我又有较多的机会跟爸爸在一起了。每到这时，我最高兴，最欢乐。

那年，爸爸在1957年5月11日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早在1958年1月1日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范》就发表了，很快就引起人们的注意，且广为流传开来。人们把这首词谱上曲演唱传诵。其中我最爱听的却是上海评弹，这也许是我在上海陪妈妈呆得时间长的缘故。从评弹中，我不仅感受到它音韵的优美、动听的柔声，同时，我还领略了这首词的基本意思。

总之，我觉得呆在爸爸家里，跟在爸爸身边，我可以随时接受到爸爸的教诲，接受到爸爸的指点，我会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尽快的提高，要是能总这样该有多好啊！

但是，事情有时往往会与愿相违。我们家，和

普通人家一样，也有一本难念的经。

在中南海的家里，每周六的晚饭我们都要跟爸爸一起吃，如果有爸爸在，我们个个都会特别高兴。因为爸爸一向是谈笑风生，有时候，会旁征博引地给我们讲些典故，或讲些世界的大事给我们听。有爸爸在时，我们就会不拘小节地边说边笑轻松地愉快地进餐。要是有江青在，那气氛就不同了，我们就要小心谨慎。谁知道她什么时候一不高兴就要发火啊，惹她干吗！每到这时，我们就是为就餐而吃饭，什么也不说，只是埋头快吃、快走，早点离开这沉闷之处。

爸爸很关心我，也很关心令华。

那年，令华在北京郊区黄土岗公社一个月的劳动结束了。星期六的下午，回到了中南海的家里。

我见他脸晒黑了，头发也长了，胡子也长了，皮肤也显得粗糙了。可肤色挺好，身体也不错。我就赶快帮助他收拾好东西并对他说：“你赶快到外面去理理发，刮刮胡子，早点回来和爸爸一起吃晚饭。”

爸爸不知听谁说令华回来了。

“莫到外面去嘛……”他正要走时，爸爸说着向我们走来。

“爸爸，您好！”我俩同时问候。

“我让令华到外面理发，很快就回来，误不了全家吃晚饭。”我说。

“莫走，莫走。叫小周（爸爸的理发员周明福）为他理发。”爸爸高兴地望着令华笑起来。那笑容透着赞许，也透着爸爸对令华的疼爱。

随后，爸爸又特意让卫士通知伙房的师傅，将吃饭的时间往后推迟一小时。

平时，家里的男孩和令华他们都是到中南海外边的大街上理发店去理发。因为周明福是专为爸爸理发的，家里的人谁都不能去找他给理发。这是爸爸定的规矩。

爸爸说过：他们是因为工作需要才到我身边来的，你们谁也没有权力让他们为你们办事！遵照爸爸的指示，我们也就早已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凡事都自己去办，凡事都尽量到外边去办，实在办不到的，想请工作人员帮忙的，也要事先请示爸爸，或者同工作人员商量一下，看他们有没有时间，再请他们帮忙办一下。但这样的时候是很少的。

今天，爸爸这样高兴，破例让小周亲自给令华理发，这是我和令华意想不到的。

“还是到外边去理吧！外边人少也快！”我说。

“莫去，就找小周来理。”爸爸又一次说话了。我们只好服从了。

今天，爸爸这样高兴，破例推迟吃晚饭的时间，这也是我和令华所意想不到的。

不过，很快我就明白了。爸爸今天所以这样高兴，这么开心，是因为他看到令华走到了农民中间，和农民一样，背朝太阳、脸朝土地同起同息地干了一个月；是因为看到令华带着那晒得黑黑的脸，炼得结实的身板回来了。

爸爸今天这样高兴，这样做，是对令华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赞扬，是对令华由中南海、由大学走到农村田间的大课堂的最高奖赏。

等一切事儿都办完后，我看看表，差几分钟不到一小时，我俩走进餐厅。爸爸和其他家人都已到齐了。我歉意地对大家笑笑！

这顿晚饭吃得很热闹，大家有说有笑的。爸爸还时不时地往令华碗里夹菜。

“你们也应该到农村去锻炼锻炼，向令华学习。劳动光荣嘛！”爸爸说着又看看我们。

“爸爸，您莫偏心，怎么光给他夹菜呀！”我玩笑地说。

“我这叫赏罚分明。不劳动者，不得食嘛！”爸爸说着又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爸爸这乐呵呵的笑声，是他最高兴的时候才有的。我们也因为爸爸的高兴而活跃起来。

今日的晚餐，虽说推迟了，但大家心里都很高兴，温馨家庭的气氛，融到了我们的心里。

我们被迫搬出中南海

记得我回到爸爸身边不久，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

原先妹妹李讷多年来独自一人和爸爸一起生活习惯了，这时突然多了个我。换句话说：一个人的爸爸变成了两个人的爸爸，她就会感到我分了爸爸对她的爱，为此，她有点不大高兴。

爸爸曾不止一次地对江青和妹妹说过：娇娇小时候吃苦太多了，她从小跟妈妈相依为命，我不在她的身边，她没有享受过父爱！现在她回到我的身边，我要爱她、疼她，要尽父亲的义务，你们也应该爱她、疼她才对。爸爸说：“手心手背都是手上的肉。”我知道此时爸爸心里很难受，我明白爸爸这句话的含义。爸爸爱我，也爱妹妹李讷。

我的儿子出生后，爸爸更是高兴，闲暇时常来看看小外孙，有时还抱抱小家伙，亲亲小家伙。爸爸也像所有的老人一样，对隔辈人更是格外亲，内心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

说起儿子来，他的名字叫孔继宁。这名字还有着特殊的来历：儿子的出生，给我们都带来了无限

的欢乐。可为儿子的名字，爷爷和外公确实是都费了一番心思。

二老都不约而同地想到马、恩、列、斯。因为孩子是生在10月，又都想到了取革命之意。

爷爷想，用马字不好排字，用恩字与他人有重，列、斯又都不适合人们的习惯。就用列宁的“宁”字吧，取个宁静、安宁之意。

我爸爸提出几个原则：一是虎、豹、彪；二是杨、柳、松；三是牛、马、羊，一律不用。可以用马、恩、列、斯，不许用毛泽东的名字。

知道了孩子爷爷的意思后，我爸爸说：“好，就叫他长大继承我们的事业吧。这叫后继有人，就叫继宁吧！”

这样，儿子的名字就由外公和爷爷两位老人给选定了，取名叫继宁。

可江青看不得这些，也容不得这些。别看江青当初对令华说得那么好听，做起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江青对我们轻视、冷淡，这我倒是不在乎，因为我已经完全看透了江青的为人，也习惯了这种家庭生活。现在江青常常无故寻事找茬，搅得大家心里都不痛快。这点，爸爸看出来了，我也看出来了，令华当然也明白了，真是叫他有点受委屈了。

我是1963年被迫搬出中南海的。

我为什么说是被迫的呢？因为搬出中南海不是我心甘情愿自己要走的。当时，我和令华都在大学读书，还没有参加工作，当然也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更谈不上靠工资来养活我们一家三口人了。

这时候，我们也正像当年许多在大学求知的同龄人一样，正待需要家庭的经济资助，亲友的多方支援，朋友的精神鼓励，才能够更顺利地完成我们的学业后参加工作，走向社会，才能靠自己的劳动所得来养家糊口，可此时此刻，我们两手空空，身无分文，没有独立生活的起码条件啊！出去后，我们怎么生活？拿什么买粮？用什么买菜？用什么交房租水电费？仅靠爸爸从稿费中拿出补助的30元钱维持一家三口外加一位女保姆的生活，我们可怎么过呀？但这些却都无人问津。

仅仅是以我“什么也不会做”为借口要把我们赶走。要赶我们走，可又不明着赶、明着轰，反而叫我自己按照谈话的内容向组织写个申请说：为了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而要搬出中南海。

我被迫写了这样的申请。我知道不写不行，不这样写也不行。这是组织上定的，是组织的决定我当然就得服从了，可我心里明白，这样一来，借着我的口，我的手，既可以掩人耳目，又可以“名正言顺”地达到把我们赶出中南海的目的。

当时，我曾要求：一要把这份申请递给我的爸爸看看；二要请爸爸就此事跟我谈谈话。

我等了好久。爸爸没有为此事跟我谈过话。申请是否递到爸爸的手中？我就更不得而知了。

最后组织还找人跟我谈话说：“你是不是闹意气？”倒找起我的错儿来。

“不是闹意气。是因为说我什么也不会，我就出去锻炼吧！”我无奈地说。

就这样，1963年7月的一天，一辆平板车拉着我一家三口的全部家当，离开了中南海，离开了我的爸爸。

我在爸爸的身边生活了十四个年头，我的心里能不为此而难受吗？这父女离别的情由，爸爸是否全部知晓呢？我时时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当初不去找爸爸问个明白，说个清楚，就这么被赶走了！

离开爸爸以后，我们像所有成家的同龄人一样，开始了独立生活，从自己动手做饭开始。

困难当然有，而且还不少。米饭焖不好，不是米多水少夹生了，就是米少水多成了粥。蒸馒头又是大难题，我更是一时掌握不好，没办法，我们就到食堂去买主食，自己做点菜。也好，甭管好坏与否，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吃起来也是很香的。

有一回，我去看爸爸，说起做饭来，爸爸笑笑

说：“我的娇娃可比妈妈当年有水平，莫得出洋相哟。”爸爸给我讲起了一件往事：

1929年3月的一天，红四军前委在闽西长汀时，召开整编会议。会议开得时间很长，直到下午会议还在进行中。

傍晚，朱德爹爹和爸爸一块离开会场。他们边走边说边欣赏着山区的黄昏景色。傍晚，黄昏，金光四射，晚霞余辉，还真好看，真像出自一位名画家之手的诱人的山水杰作。朱德爹爹举目观望，赞叹不已。爸爸对朱德爹爹说：军长啊，吃晚饭的时候到了，你就莫走啰，我来请你品尝一样美味。朱德爹爹说：好哇，有啥子好吃的东西，尽管摆出来，我的肚皮可叫了。

两人边说边走进屋里。

妈妈见他们来了，就从厨房端出一锅热腾腾的清汤。热气里还带着香味扑鼻而来。爸爸和朱德爹爹禁不住抽动着鼻孔。两人高兴地四处搜寻那香味，会心地笑了起来。

大家坐好，朱德爹爹忙打开锅盖，看完后，他眉头一皱。顿时疑惑起来，这锅里怎么还有那么多的燕毛毛在漂动呢？

妈妈一听，感到很难为情，她说：“早上，警卫员小吴拿来了个纸包包，也没有说是什么东西，

是从哪里搞来的，也没有说这个东西该怎么个煮法。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做，就这么一放水煮起来……

爸爸在一旁听得笑了起来。说：“这是好东西，叫燕窝。是一位房东特意送来慰劳我们的。我已经叫小吴按价付款了，东西是我们自己买下的。”

妈妈望着那一锅带毛的“燕窝汤”，怪不好意思地笑了。

该怎么办好呢？

还是朱德爹爹有办法，他说：“这有啥子，把燕窝毛毛统统捞起，就是上等的补品了。这要比井冈山南瓜汤好喝得多了！”说完，就亲自动手用筷子打捞起燕窝毛来。

妈妈摆上饭菜，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起来，朱德爹爹还咂着嘴，风趣地说：“要得，要得，味道就是好！”

爸爸看到朱德爹爹吃得那样津津有味。高兴地说：“既然军长说好吃，我们大家都吃好哇！”

这就是当年爸爸、妈妈请朱德爹爹尝美味，妈妈却不知道煨燕毛就煮了一锅“燕窝汤”，待到吃饭时，朱德爹爹当场献巧技，捞燕窝毛毛，与众人共享美味的一段故事。

我的做饭水平可不如妈妈。妈妈除了这次“燕

窝汤”的笑话之外，做别的饭菜还是挺拿手的。我想，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加上我的实际操作，我在做饭菜方面能赶上妈妈，兴许还能超过妈妈呢。

可实际生活起来，并不像小孩子过家家那么容易。我遭的难，出的洋相也不少，但我还是练出来了，挑起了这个家的担子，担起了抚养子女的责任。持家方面，我没有辜负爸爸、妈妈对我的期望。

生活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很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爸爸。

有一年的夏季，我们跟着爸爸去北戴河。一天，我们到了游泳场，会游泳的人都先后跳进了水里，令华却迟迟不下水，因为他的确还不太会游泳。最后没法子，就套上游泳圈下水了。

这事，正好让爸爸看见了，爸爸像是玩笑又像是批评似地说：“套个圈能学会游泳吗？莫套，把圈子扔了！”

令华听了。看看爸爸，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取下游泳圈，自己在水里扑腾起来。经过几次实践，他还真学会了游泳。

爸爸喜欢令华，在中南海时，除了常到我们房里坐坐，跟我们聊聊天外，还特别地关心令华和我的身体与学习情况。

有一回，《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了日本一位学者的文章。爸爸看完后觉得很好，就给令华看。两人看着谈着，爸爸很同意这位学者的观点，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科学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的分化中发展、前进的。

爸爸对他说：“大学是个人门。是浏览多门科学文化知识的领域。真正学成，有所造就，还是要通过实践才行。”

正是遵照爸爸的指示，争取学校领导的同意，令华又重新返回学校，重新选专业。除了学习物理、化学等专业课程之外，又广泛地浏览阅读了更多的课外读物，为他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多少年后，我们坐在一起闲谈时，令华还总是感慨地说：我能有现在的基础知识，能有部队二十多年工作的实践，能使我现在的思路如此开阔，能较快地接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新事物，是与爸爸当初的谆谆教诲分不开的。

令华爱学习，更爱看书。这点，爸爸更是特别喜欢。令华也常常爱到爸爸的书房里去，在那装满知识的书房里，他像吸水的海绵一样，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或半天，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武装头脑，增长才干。

尽管如此，生活中不顺心的事总是难免的。人都有个性，都有脾气。在这个家里，令华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使他不太习惯，或不太高兴的事。

有一次，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儿，妹妹李讷在餐桌上说了一句很不顺听的话，这在令华听来，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一句话也不说，就起身离开餐桌走了。

我看在眼里，没有拦他，也没有说什么。爸爸也看在眼里，也没有说话。当时大家谁也没有说什么。

年轻人之间，闹点摩擦，磕磕碰碰的事儿也总是难免的。我长期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令华却没有过过这种生活，当然会觉得别扭，会感到委屈，有时候心里也很不高兴。我就笑笑对他说：“驸马不是好当的，你就受点委屈吧！”

因为我始终遵循着我的原则：就算是有天大的事，我也不会给爸爸添麻烦。就算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我也不会到爸爸跟前诉苦。令华当然也很理解我的处境。

后来，妹妹李讷向他道了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又和好如初。

有爸爸在身边，这些区区小事，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说，谁家的饭勺能不碰锅沿呢！何况我们又

都是活生生的年轻人呢，有点火气，也不足为怪。

记得 1963 年 12 月 26 日，这是爸爸七十岁的生日，我们又像往常那样，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地都聚到爸爸家里，来到爸爸身边，为他祝福！

这天，家里显得特别热闹，平时因为爸爸总在忙于工作，我们这红墙里的深宅大院总是那么静悄悄的。这天，我们家到处都洋溢着欢声笑语，能听到孩子们无拘无束的欢笑，更能听到爸爸那每逢高兴时的爽朗笑声。

我们拥到爸爸身边，争先恐后地与爸爸说笑，一个个围在爸爸的身边，高高兴兴地同爸爸照相：有的昂着头，有的笑弯了腰，有的拉着爸爸的手，有的拽着爸爸的胳膊。孩子们的高兴劲，引得爸爸又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家，这充满温馨的家。

说来也巧，我们都在忘乎所以地尽情欢乐，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如此热闹、热烈、快活高兴的场合中，惟独少了江青。她没有在场，难怪孩子们如此轻松愉快！

“主席哪去了？主席在哪里？”听到声音时，江青人已经来到我们众人跟前。

看到我们还在照相。她跑过来。

“我也照相，我也照相……”她边说边走到爸

爸跟前。

刚才还是谈笑风生、欢乐快活的场面突然变得冷冷清清，大家的情绪立刻就低了下来。

看到这种场面，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大家看看没什么意思，也就各自悄悄地走开了。

我原来想得很简单，谁家的孩子也不能跟随着父母一辈子，我只不过是搬出中南海，不和爸爸住在同一个院了。但我还是住在北京，离中南海不远，想什么时候回去看看爸爸，就什么时候回去。虽然我已经上班了，成了一名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可总还是有个节假日吧，回去看看爸爸，叙叙家常，为爸爸宽心解闷，总是可以随时尽到我一个做女儿的孝心吧！

许多人家的孩子都是这样自立锅灶，独立生活、工作。他们都在忙完一周的工作之余，或独自，或携儿女，回到老人的身旁，与家人团聚，我为什么就不可以这样呢？

可结果是我想错了，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太容易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出了中南海，再想回到中南海，回到我的爸爸的身边，竟是这样难，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回想当初，我把离开家的想法告诉爸爸时，爸爸说：“何必一定要走呢，我想能常常见到你和令

华。”

我知道爸爸爱我，可除此方法外，我实实在在想不出更好更妥善的既不离开爸爸身边，又能独立生活的两全齐美的方案来。

回想当初，我这样做是不愿受江青的气，更主要的是我们要身体力行去在实践中培养锻炼自己。而没有往更远的方面想。

离开中南海，我见爸爸的机会确实少了，少多了。刚开始，我还时常去，后来一个月见一次；再后来两月见一次；再往后，几个月、半年也难见上爸爸一面了。

想当初，我要是不离开中南海，留在爸爸的身边，我会尽全力照顾好爸爸，也许爸爸的晚年生活就会多些欢乐，少些苦闷；也许爸爸的晚年生活就不会那么孤苦，就不会那么寂寞，就不会那么……

过去，我常听人们说这样一句话：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总觉得这句话说得不对，最起码是说得不那么贴切。当时我认为：人是有良知、有感情的；人是最懂得是非曲直、是最能辨得酸甜苦辣的滋味的，人也是最能体会人间饥饱冷暖的。怎么能说生活得很幸福的家庭，反而就不知道这一切是幸福，是美好！如果真有这种人，那么这种人真是不可思议，叫人不能理解。

过去，我还常听人们说这样一句话：得到手的東西不覺得它可貴，一旦失去它之後，才知道它是無價之寶。我想，這也許是說這東西來得太容易了。

人，對任何事情，沒有親身經歷，就很難道出個一二三來。正如爸爸所說：沒有親口吃過梨，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滋味。凡事只要自己經歷過後，才能說個明白。

我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我真正明白了，懂得了这些来自一辈又一辈、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从实践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真理。

我跟爸爸生活在一起时，真是无话不说，无事不谈。我跟爸爸谈学习，我跟爸爸说生活。爸爸跟我谈理想，爸爸跟我说入党。然而，我们父女俩谈论最多的话题，还是我的妈妈。

爸爸给我讲妈妈过去的事情：讲他们在井冈山，在长征路上，在陕北的那段难忘的战斗生活。我给爸爸说我跟妈妈在苏联时的艰苦生活。爸爸给我讲他与妈妈十年的相亲相爱，共同奋斗的战友情，夫妻恩。爸爸讲得那么真，又那么深情，像是回忆，又像是品评着当年的情！我给爸爸说妈妈和我相依为命八年的艰辛，妈妈如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母亲的情，母亲的爱，才使我又一次得以回

到父亲的身边，投进父亲那博大的胸怀！说着，听着，我们俩都会高兴地笑起来。

有时，我们俩又默默无语，那辛酸的往事，又是苦涩的回味，真是伤心人怕提伤心事，提起往事更伤心。

我跟爸爸谈妈妈现在的生活，我说她是孤单、寂寞、凄苦的。我给爸爸说妈妈现在的身体，她多病、虚弱，心灵的伤疼无法愈合！

每到这时，我们父女俩要么是长时间地默默无语地漫步在中南海家里的小路上，要么是长时间地对坐在爸爸的书房里。就这样，我们彼此什么也不说，但心里却都在想着一个共同的人——我的妈妈。

每年一度看妈妈，这是爸爸给我的特定任务。因为，我会将爸爸对妈妈的关怀带给她，我也会将妈妈对爸爸的问候带回来。就这样，我带着爸爸的影子去看妈妈，我也带着妈妈的影子问候爸爸。爸爸和妈妈虽不能见面，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因为维系他们心灵的纽带紧紧系在了我的心里，我不会忘记妈妈，我同样也不会忘怀我的爸爸，在我的心里，我们永远是美满幸福的三口之家。

当我生活在爸爸的身边时，说句心里话，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有一天离开他。所以每每跟爸爸一

起散步聊天，我觉得这是件很平常很平常的事，谁家的父母亲子女间也都会是这样的，而且还想到，这有什么呢！跟爸爸在一起的时间多着哪，今天有，明天有，下周有，下月有……而且还想到：谁家的子女不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又怎么能说是福中福呢！

现在看来，这些话说得真对！

可这伟大的慈父的爱，我却没有牢牢地把它抓住，把它留住，把它留在我的身边。因为我离开了中南海的家，离开了我的爸爸。我失去了它！我只能把它永远永远地留在我的心里。

这爱太可贵，太可贵了！可我却过早地失去了它，失去之后，才感到那段生活是可贵的，是幸福的。

当我搬出中南海爸爸的家时，心里是酸酸的。我是含着泪花迈出中南海的大门的。

我走了，我看不到江青了，我不再受她的冤枉气了。可是，我的心却在震颤，在撕裂，在剧痛。因为我从此再也不能与爸爸相伴相随了，再也不能相依相偎，再也不能漫步聊天，再也不能……

当我静静地坐下来想想，我的心里却是空空的、没着没落的。我这才真的感到我失去了我不该失去的，可我再想返回去，再想得到它，真的就很

难很难了。

爸爸那高大魁梧的身影总在我的脑子里闪来闪去；爸爸那慈祥的音容笑貌，总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爸爸那乐呵呵的笑声，又在我的耳边响起……

爸爸！爸爸！我的爸爸！我怎么就轻易地离开您哪？！我怎么就这样搬出中南海呢？！爸爸，女儿搬走了，走了才知道后悔，后悔了才知道、才懂得了与您在一起的那段生活的可贵！爸爸，女儿搬走了，见您的机会少了，说家常的机会少了，说妈妈的机会就更少了！我带走了爸爸对女儿的爱，我同样也带走了妈妈对爸爸的爱和爸爸对妈妈的爱，想起来，我的心好痛啊！

爸爸，爸爸！您听到了吗？我在红墙外，在中南海的红墙外呼唤您！

我回忆起一件件往事——

那天，放学后回到家里，我放下书包，悄悄地、轻轻地走到您卧室的门口。

当我刚小心翼翼地从小缝里往里看时，门突然开啦！

“爸爸！”我叫着扑向爸爸的怀里！

“娇娃！”爸爸伸开双臂紧紧把我揽在怀里。

爸爸乐呵呵的笑声，引得卫士们也笑声不止。

那日晚饭后，我跟着爸爸“一二一”齐步走在

南海岸边的小道上……

“莫掉队！”爸爸扭回头叫着。

“您太快啦！”我停步喊着。

爸爸乐呵呵的笑声，又把卫士们引得笑声不止。

那次，我要到上海看妈妈。

“莫忘了带药去！”爸爸说。

“知道了。”我回答。

“莫忘了带香烟。”爸爸又说。

“我带上了。”我又回答。

“带上这筐水果。”爸爸让人把它提到我的跟前。

“我都带不动了。”我望着水果筐子犯了难。

“莫忘了……莫忘了……”

“爸爸，您已经说过好几遍了，我记着哪！”我笑笑对爸爸说。

“老了，老了，老糊涂了！”爸爸笑笑说。

爸爸乐呵呵的笑声又把我和卫士们逗笑了。

那次，那次……

如今，这一切都成了昨天，都成了过去，都成了只能回忆的昨天和过去。

我搬走后的第一个星期去看爸爸时，还是在爸爸的卧室门口相见的。当我走进那熟悉的小院时，

当我见到那四棵依然挺拔站立着的柏树时，我心里顿生羡慕之情，我羡慕它们能时时在爸爸的身边，能常常伴随着爸爸那高大的身影。我也真有点妒忌它们。

门开了！

“爸爸！”我扑进爸爸的怀里。

“娇娃！”爸爸把我抱得紧紧的。

爸爸的温厚的大手抚摩着我的肩头，我听到了爸爸那颗慈父的心在“咚咚”地跳。我想哭！我又使劲忍住了。我知道，爸爸不喜欢爱哭爱落泪的孩子。我也学会了克制自己。

“娇娃，爸爸想你呀！……”爸爸拍拍我的手。

“爸爸，我也想您，想您……”我还是忍不住落泪了。

我坐在爸爸的身边，许久许久，爸爸不说一句话，爸爸望望我的脸，又摸摸我的手；我们就这么坐了很久，很久。我们是在用心说话。

我知道，爸爸他也苦啊！

他不仅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同志，是我的老师。我是爸爸的女儿，也是爸爸的朋友，还是爸爸可以信赖的“小大人”。

我知道，我走之后，爸爸再也听不到有关妈妈的任何消息了；爸爸再也无法了解到有关妈妈的任

何情况了。

爸爸的内心是孤苦的，是寂寞的，是孤独的。

那次，我俩单独坐了很久很久，我不想走，爸爸真想留住我，可我还是走了……当我迈出中南海的大门后，我回头望望，这围墙，是这红红的围墙把父女俩的爱给隔断了，把这人间的亲情给隔开了！

在“文革”中，我想爸爸，但为这请示、报告、待批的繁琐手续，把女儿与父亲的距离拉远了，拉远了。

爸爸同样想着女儿，惦念着女儿。爸爸曾不止一次地让妹妹李讷去看我。

……

真的，往事不堪回首。我后悔我离开了爸爸，离开了中南海的家，再想回去确确实实是很难！我只能在回忆中安慰自己。

第八章

- 爸爸的独立生活观
- 心系人民的爸爸
- 风趣而真诚的爸爸
- 爸爸的读书生活
- 爸爸的简朴生活
- 富于同情心的爸爸
- 乐于慷慨助人的爸爸

爸爸的独立生活观

1964年秋初的一天，我带着儿子宁宁到中南海去看望爸爸。

到了家里，爸爸正在休息，我只好在外边等着，我逗孩子玩着。

“妈妈，小金鱼哭了。”宁宁看着院里的养鱼池

对我说。

“小金鱼不会哭。”我对他说。

“它听话吗？”宁宁说着伸出小手就要抓小金鱼。

“小金鱼离开水会死的。宁宁听话，不动它。一会儿妈妈带宁宁去看姥爷。”我又对他说。

等我抱着孩子进到爸爸的卧室时，宁宁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他的哭声这么大，这么突然，把我搞得莫名其妙。我只顾抱着哄他、逗他，等我回头一看爸爸，我也吓了一跳。难怪孩子吓得大哭呢！他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姥爷。

原来，爸爸刚刚从北戴河回来身上盖着个雪白的单子，只把晒得黑黑的脸膛露在外边。是爸爸这种形象让孩子看了害怕了。

我认为此时哄孩子不哭的惟一方法就是给他点吃的。

“爸爸，您这儿有点心吗？给宁宁点，逗逗他，他就不哭了。”我问爸爸。

“没有点心。只有糖。”爸爸说着，并不起身动手给孩子拿糖。我就只好自己给孩子拿两块糖。

“莫得如此惯着孩子。”爸爸说。

“只拿一块，就一块。爸爸过去对我都不这样，对宁宁怎么这样？”我感到爸爸对宁宁似乎有点不

近情理。

“小孩子，莫要惯他。”爸爸又说。

宁宁拿到糖后，那表情既高兴，又委屈地望着爸爸，小手使劲攥着那块得来不易的糖。

等我们离开爸爸，走出中南海时，我无意中发现，宁宁手里还拿着那块糖，没舍得吃。

我抱起孩子，边走边想，是不是爸爸对孩子要求太过分了？又想，爸爸这样做，也许是对的。

我看看孩子，又看看他手里的糖。他当然不会想到这是伟人姥爷给的糖。他可能是从爸爸和我的谈话中、眼神中，感到这块糖能到手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才省着舍不得吃吧！这也只是我爱孩子，才这么想。

爸爸对子女要求严格，这是众人皆知的，除了一再告诫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外，还叮嘱、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绝对不能为我们任何人搞特殊。

爸爸还时时从工作人员中了解我们的思想表现，问问我们有没有违犯纪律的事，要他们实话实说，不许徇私情。

1956年，爸爸在散步时，这样问身边的卫士：“你的感觉是李敏好呢，还是李讷好呢？”卫士说：“都很好，两个孩子对我们都很尊重，她们没有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她们要求自己也很严格，有上进

心。”爸爸听了，摇摇头说：“我看她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卫士说：“主席，您还想叫孩子们怎么吃苦？她们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了。”爸爸说：“你说得不对，你讲吃苦的时候，思想不对头，因为你首先把她们看成是我的女儿，所以你就给她们规定了不同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她们吃苦不就是吃大食堂吗？大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庭的伙食好多了嘛，难道不是这样吗？人哪，生活还是向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没有出息。”

爸爸给我们几个孩子定了规矩：无论办任何事，都必须通过工作人员，同他们商量着办，不得号令工作人员为我们办私事，更不许我们盛气凌人地对待他们。否则，就要挨爸爸的批评。对他们要绝对尊重。

至今，那些当年在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仍同我们保持着亲似兄弟、密如朋友、好似同志的关系，因为我们同是在爸爸、在毛泽东主席身边长大，同受毛泽东思想的培养与教育。这凝成了我们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同志加兄弟的友情。

当年爸爸曾对我们讲过：你们要向工农学习，

拜他们为师，和群众打成一片。离开群众，你们将寸步难行，你们将一事无成。

爸爸还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别看他们是我的子女，但是今后你们要比我的孩子强。”

尽管我们也遵照爸爸的教导深入农村，到过工厂，但总不如他们照爸爸的规定到农村三年，到工厂三年实践后的收获大。

现在看来，爸爸的话是对的。我觉得他们的工作要比我们出色，他们的生活比我们更充实。他们真的比我们强。

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些人确实是缺少实践生活的锻炼。虽然爸爸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提出，要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也都遵照爸爸的指示到工厂、农村，也确实是脚踏实地地参加劳动，真心诚意地拜工农为师，向他们学习，努力改造自己。但我们的收获总是有限，远不如当年我大哥那样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晒黑了脸膛；也不如他在工厂那般一身油泥，锻炼了身体，磨练了意志，学会了技术，培养好的思想。

爸爸还不失时机地利用一切机会，让我们去经受实践生活的锤炼，但我觉得，我们的收效比起他人来，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爸爸一向主张我们要独立生活，要过普通人的生活。虽说我离开中南海，离开爸爸家，离开爸爸，是实属无奈，爸爸从心里讲是舍不得让我走，哪位老人不想儿女绕膝呢？但爸爸对我们的爱，不光看眼前，他从长计议，要我们接触社会，接触群众。将来能自立于社会，就必须早早独立生活，靠在他的大树底下生活的日子是不能长久的。最后，尽管爸爸也心痛，心里也不愉快，还是忍痛同意我离开家，像普通人一样，开始过上独立的生活。

这样的“苦”日子不好过，可当我看看我的左邻右舍，我发现他们也都一样，一些跟我年龄相仿的，她们也并不是一开始什么家务活都会做，都能做，也是吃过“苦”头的。现在她们不是把家料理得挺好，生活安排得有序，饭菜做得也挺香吗！我向她们学习，总有一天我也会像她们一样，有条不紊地、顺顺当当地挑起家庭主妇的重担。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我相信，我能做到，我时时这样鼓励自己。

有一次回到中南海见到爸爸时，爸爸高兴地望着我笑。他上下打量着我，良久没有说话。

“坐。坐。”爸爸对我说。

“您看什么呀？”我边坐边问爸爸。

“看看我的娇娃长大了没有？看看我的娇娃长

本领了没有？”爸爸笑笑说。

“我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炒菜。”我也挺高兴地对爸爸说。

“好。好。靠我不行。靠自己的双手什么都能办到。”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爸爸说完又乐呵呵笑了起来。

我想，这可能是爸爸对我的独立生活的试卷评分吧！为此，我也感到满意，因为我没有辜负爸爸对我的教导与期望。

1965年，爸爸曾一再对我们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当初我是怎么想也悟不出这句话的深远含义。我想，生在干部家庭的子女，就称为干部子弟，无非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好一些；生活条件优越一些。吃的、穿的、住的都无须要自己发愁，因为他们的父母有薪水，他们靠父母的工资养活。工人、农民子弟，相对来讲，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差点，与我们相比，可以称为“苦”点，可是我们怎么就称为“一大灾难”呢？

当我独立生活之后，我渐渐明白了这句话的道理：在爸爸的身边时，虽然我们都被爸爸“赶”到大食堂吃饭去了，但仍然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而工农子弟却朝夕生活在劳动群众中，

劳动者的优秀品德，他们是耳濡目染，他们早早就跟在父母的身前身后，参加了力所能及的劳动，他们早早就懂得了生活，并且学会珍惜生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是这个理儿。

平凡生活的锻炼，使他们懂得劳动的伟大与光荣，培养了他们勤劳、朴实、忠厚、诚实的优良品德。而我们所缺的，恰恰就是实践。这是最重要的一课。

这又正是爸爸再三再四强调要我们到实际生活中去锻炼、去学习的根由。

爸爸是怕我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会借着父母的地位而飘飘然地忘乎所以；会借着父母的权势而目中无人地自以为了不起；会借着父母的荣誉，什么都不懂却哇啦哇啦地乱发议论。

这样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会给我们党、我们党的干部造成不良影响，会影响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会使我们党的干部与群众离心离德，会使我们党的事业受到损害。这难道不是“一大灾难”是什么？！

我粗浅地悟出了爸爸这句话的道理所在，我也真正明白了爸爸为什么一贯如此地严格要求我们，严加管教我们，再三再四强调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小而言之，为我们，大而言之，为国家。

爸爸的教诲使我至今难忘，爸爸的教育使我终生受益。

■ 心系人民的爸爸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是爸爸对我们的谆谆教诲。爸爸常说：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心里都要想着人民，想着群众。你们更要虚心向群众学习，与工农的子女交朋友，学习他们的优良品德。不可以因为是干部子弟就傲视一切。

有人告诉过我，一位老人曾这样说：在延安的时候，爸爸住在杨家岭，经常到延河滩上去散步，遇到人就和人家聊天，问寒问暖，拉家常，从不摆领导人的架子。

有一回，爸爸在延河滩上散步时，遇到一位文人从城里回来。他拿着个拐杖不住地在手里打转玩，他跟爸爸打招呼时，拐杖还在手里转来转去地挥动着。说来也巧，这时正好有老乡驮盐的毛驴队从这里经过。他的拐杖这么不停地转动，把老乡和毛驴队都挤到一边去了。就这样，他还没有停下转动拐杖。

爸爸看到后气愤地对身旁的人说：“真是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

威风，只比老百姓多这么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

爸爸是一个有相当深沉情感的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最为深沉而真挚。这情感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一点矫揉造作。

当大哥岸英回到延安后，爸爸曾语重心长地对哥哥说：“在中国，不懂得农民，不了解农村情况，就不晓得中国的实情。要知道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任何时候，千万别忘了农民啊！”

当送大哥到“劳动大学”时，爸爸又对他说：“俗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学不完的。往后有机会，你还要去学习去拜农民为师。”

爸爸不光是对我们进行这方面的教育，爸爸也身体力行，为我们晚辈作出了榜样。

爸爸住在杨家岭时，杨家岭的沟沟口上住着一户姓杨的贫农。他家的窑洞同所有陕北贫苦人家的窑洞一样，只有一个进进出出的门，没有窗户。所以洞里是黑乎乎的。尤其是烧火做饭时，烟就在满窑洞里窜，满屋子都烟熏火燎的，日久天长地这么熏燎，墙都变成了黑色。

杨家门口有个碾子。杨家的媳妇经常在门口推碾子。三十来岁的妇女，不仅手脏，脸也不常洗，连脖子都是黑黑的。每次见到爸爸走过来，都要和

爸爸打招呼。爸爸不仅不嫌弃他们，还停住脚亲切地对他们问长问短，和他们拉家常，说年景。

爸爸对于干部们说：“老百姓不懂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苦苦地劳动，还被人们看不起，这真是太不应该了。”

这也正如爸爸当年所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爸爸一有机会就忘不了对我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教导。他常说：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群众，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热爱他人胜于自己。心里要时时装着群众，不要存有任何私心。

我深深懂得爸爸的心意。因为我也曾饱尝了人间的冷暖，也曾经历了艰辛的岁月，我更懂得生活的艰难。我也更理解爸爸的良苦用心，因此，我无论是在学习中，还是在工作中，一直把爸爸的教导铭记在心里。

爸爸一心为公，身体力行，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爸爸一生，将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在爸爸的影响、教育下，我们的亲属中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有六个人，这还不算旁系亲属在内。

不是我在吹嘘自己的家庭，这种情况，在我们

党的各级干部中，也是极为少有的。这一点，值得我们做后人的为此而骄傲，更值得我们做后人的以此来激励自己奋发有为和勇于为人民献身。

风趣而真诚的爸爸

听老人们讲过这样一段往事：

当年，爸爸无论是在什么时候，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同战士们在一起，与他们接触，和他们谈话拉家常。他一会儿问这个战士是什么地方的人，一会儿问那个战士是什么时候参加队伍的，再问家里还有什么人……他和战士们说得贴心、打得火热。

因为爸爸那时常爱穿便服，人们都觉得爸爸随和，有的战士看爸爸身材高大、魁梧、有力气，又不认识他，便认为爸爸是个老百姓，是个民夫。一次行军，他走在战士们中间，有一个战士走累了，就对爸爸说：“你帮我扛会儿枪吧！”爸爸冲他笑笑答应了。把战士的枪扛在自己的肩上，继续拉着家常话。于是，别的战士看到了，也让他帮忙扛枪。这个刚把枪拿走，另一个又把枪递过来。这样战士们可以轮班歇了，可爸爸却没有空歇的机会。他给这个扛一阵子，又替那个背一会儿，没完没了，实在太累了。

爸爸不急不躁，便笑咪咪地对总是让他扛枪的战士说：“我扛了好几天了。今天你们连长让我休息嘛！”一听这话，他们便不再说什么，也不再让爸爸替他们扛枪了。

当战士知道爸爸是毛委员时，都惊奇地说：“原来他是毛委员啊！毛委员还帮我背过枪哩！”战士们感到能和毛委员同行，能让毛委员给扛过枪，是对自己的鼓舞，也很是感到自豪哩！

爸爸身为中央委员，又是部队的最高级领导人，却和普通人一样，帮战士扛枪，从不拒绝任何一个战士的要求。在实在累得受不了，不能再为战士负重时，爸爸既不发脾气，更不亮出自己的身分，只是笑笑以：“今天你们连长让我休息。”一句诙谐的话语，道出自己需要休息一下的意思。

他不摆伟人的架子，这正展示了伟人平等待人的作风。

另一位老人这样讲：

在井冈山时期，一天，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爸爸讲故事。这时，一个区赤卫队员满头大汗地走到爸爸这伙人面前，停住脚喘气。

爸爸问他：“你要找哪一个？”

“要找毛委员。”他回答说。

爸爸听了站起来，两手叉着腰，头稍倾斜地

问：“你有没有见过毛委员？”那个区赤卫队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没有见过，只听区队长讲过。”

爸爸趁此机会和他开起玩笑来。爸爸说：“毛委员，毛委员，他全身都长毛。从头到脚都是毛，长了一身长毛啊！”

“嗯。嗯。”赤卫队员半信半疑地听着爸爸讲话。

爸爸接着又说开了：“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们是天天在一起。”

赤卫队员擦了一把汗，说：“我们区队长见过毛委员，他没有说毛委员全身都长毛。他只是说毛委员像那个摇什么扇子的孔明。”说着还伸开右巴掌扇了两下。

爸爸说：“是不是摇羽毛扇的？”

“对！是！就是。孔明会用计谋，毛委员也会神机妙算。他会领导军民攻城，会领导军民活捉县太爷，还会领导军民打死敌军营长，还会……”他讲起来没个完。

“是区队长教你这么说的？”爸爸问。

“也不全是，还有是听别个人说的。”

“还有什么事吗？”爸爸问他。

赤卫队员摇摇头，表示没有什么事了。把信递

给爸爸说：“你每天都能见到毛委员，就请你将这封信转交给他。”

“你回去告诉区赤卫队长，叫他尽管放心，我一定把信亲手交给毛委员。”爸爸接过信对他说。

赤卫队员认认真真地给爸爸鞠了个躬就走了。

大家开怀地笑了起来。

这儿再讲 1927 年 11 月中旬的一件事：

在第二次攻打茶陵时，爸爸对大家讲：茶陵的反动势力不大，县城是空虚的，敌人的兵力是薄弱的。那里的老百姓已经发动起来了，他们正在准备迎接我们去消灭茶陵的敌人。

听爸爸这样讲，大家情绪特别高。心想：这次，毛委员要亲自指挥我们打茶陵了。可那时爸爸脚伤还没有好，肿得走路都很不方便，甭说行军打仗了。他又总不能这样告诉大家：我脚有伤行走不便，这次就不去了。于是爸爸以风趣惋惜的口吻说：“本来嘛，我想和你们一起去，我这个人革命的，可是（爸爸指着受伤的脚）我这个脚不大革命，至今它还不听我的指挥呢。”一句话，逗得大家笑起来了，这也就取得了大家的赞同和谅解。

爸爸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是一个很喜欢说说笑笑的乐观的人，也是一个很善于在说笑声中把工作做到家的人。

爸爸说笑话人们爱听，爸爸批评起人来，也同样有他的独到之处。

批评人的事，一般人都不爱干，因为谁都知道这被人们看作是得罪人的事，可有时又不能不干。可我爸爸批评起人来，都使人感到声声入耳，亲切受听。

老人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给我听：

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每到一地，都要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除了讲话作报告外，更多的宣传方式是演节目，还到处写标语、口号。

有一次，爸爸看到墙壁上写着一条大标语：“打倒帝国主义”。爸爸看完后禁不住地笑了起来，他指着其中“倒”字说：“你们看看，这个帝国主义用不着打它就自己倒了，它缺了一条腿呀！”大家听了仔细一看，原来是“倒”字两竖少了一竖。那写标语的同志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写错了。”急忙把字改正过来，还做了自我批评。

爸爸说：“这就对头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不是那么好打的嘛，我们必须认真地打，它才能倒哩。”

爸爸对人的批评，是幽默中见严肃，笑声中见效果。

也有人这样说我的爸爸，说我爸爸一生从不认

错，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太全面。

我叔叔毛泽覃曾经与爸爸有过争吵。叔叔说，这是共产党内，不是毛家祠堂，我要党章，不要家法。后来，爸爸就觉得自己做错了，认为叔叔批评得对，就向叔叔认错道歉。

1944年9月24日，爸爸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提到1943年审查干部工作中出现的错误，说：“今天要行个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共产党办事，不明白的时候是会犯错误的，明白了以后错误就要改正，这样做才是正确的。”

爸爸的话是实在的，是中肯的。

事隔不到一年，也就是1945年2月25日。爸爸在给党校五部、六部的同志讲《时局问题及其他》时，又一次提到过去审查干部中曾出现的错误。

他说：“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

他自己首先承担了责任，并当场向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受到冤枉的同志赔礼道歉。爸爸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一样，立正，面向大家，把右手举到帽

檐，向被戴错了“帽子”的同志敬礼说：“现在我把帽子给你拿下来，赔一个不是。你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你应该还我一个礼吧！现在我向你敬礼，你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几句肺腑之言，使在场的同志们很激动，也很受感动，有的由衷地笑了，有的落下了眼泪。

爸爸见同志们高兴了，就又微笑着说道：你们该给我还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个手还是放不下来哟！

几句话，使在场的同志们也纷纷举起右手向爸爸还礼了。这是多么感人的场面啊！就这样，一个敬礼，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还礼，使共产党的领袖与干部的心贴得更紧了。

爸爸也很激动，他放下手，又继续向同志们说：“我说，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对被搞错了的人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

“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的，都要修正，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

爸爸的自我批评，是洒向同志间的一片真情。爸爸的自我批评，在幽默中寓着坦诚，在坦诚中又

寓着真情！这才是战友之情，这才是人间最伟大、最珍贵的！

爸爸的读书生活

我想起了爸爸讲过的一件事：

有一次，爸爸带着小部队行军。南方的天气，说晴，天气晴朗朗的；说下雨，就是哗哗的一阵子。爸爸要是看起书来，就什么也不想，也不顾，把什么都抛在脑后了。他专心读书，忘掉了一切。

爸爸在行军中边走边看起书来。这时，天下起小雨来。爸爸用右手遮住头，还是边走边看书。这时候，一个战士看到爸爸没有戴斗笠，就赶紧跑到爸爸的身边说：“报告毛委员，天下雨了，为什么您不戴斗笠？”

“请你替我到群众家买一个。”爸爸眼睛连书都没有离开，看都没有看那战士一眼就脱口而出。

“毛委员，你背上不是有个斗笠吗？”那战士又提醒爸爸说。

“我忘了。”爸爸这时才两眼离开书，笑着对战士说。

我想，爸爸所以给我讲这段事，就是教育我干事要专心。爸爸的博学多才，不是一日之功，是在长期的学习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的积累，对我们年

轻人来讲，更显得重要了。

爸爸酷爱读书。读起书来，简直入迷。

我记得，爸爸的卫士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

1952年到山东视察时，爸爸坐在专列上，全神贯注地读着一本小说。直到深夜一点钟了，卫士给爸爸端来一碗面条，爸爸却视而不见，仍在看书。卫士把碗摆在爸爸面前，又把筷子放在爸爸的右手里。爸爸眼光只顾盯着书，筷子插在碗里不动，左手按着厚厚的书还在专心致志地读。读到要翻页时，卫士提醒说：“主席，吃完再看吧！面条都放凉了。”

爸爸却根本没听见，还在继续翻看着。

“主席，要不……再给您热热去？”卫士伸手准备去端碗。

“嗯。不要。”爸爸说着，嘴慢慢靠近碗边，眼睛却始终盯在书上，呼噜一声，一筷子面条吃进嘴里。恰恰在这时，有几个字因为靠近书脊看不到，爸爸就用左手一边握书一边让书展开些，这一动作卫士看在了眼里，就上前帮忙。噢，爸爸看的原来是作家周立波的名著《暴风骤雨》。

爸爸不仅爱读书还爱书。早在井冈山和长征路上，每打下一个地方，他就让战士为他搜集书，然

后带上。

1947年3月31日，爸爸离开陕西省清涧县枣林沟开始向子洲县高家塔转移。这一天国民党的先头部队离爸爸他们的住地只有十里地了。

爸爸像每次转移时那样，卫士们除了护卫爸爸外，还将两箱子书抱出来。爸爸看着这重重的两箱子书，有些为难了，他对一位警卫员说：“你是本地人，我想请你办一件事。”

“主席，您只管吩咐！”警卫员说。

“我有几箱子书能放到你家里吗？”

“能！没问题。”警卫员说。

“对家里人不会有妨碍吧？如果，万一那个，会不会受牵连？”爸爸望着警卫员说。

“主席请放心。我家离公路很远，就是万一那个，家里人也不会害怕。”

“那就请你跑一趟吧！”爸爸望着他说。

凡跟随过爸爸的人都知道，爸爸非常喜欢看书学习，就是在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时，扔掉了被褥衣物，也舍不得扔掉一本书。

爸爸有个习惯，看书时，把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就塞上个枕头，然后就靠在上面办公批文件。多数时间是看书。

这样看书看得时间长了，后脑勺在床栏上，压

出一条深深的沟来。

后来，宋庆龄知道爸爸这个习惯后，送给爸爸一只挺高级的大枕头。爸爸对宋庆龄非常尊敬，礼物是收下了，但爸爸说：“我习惯了，不想变了。”结果大枕头被送进仓库了，爸爸还是把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还是塞上了白布荞麦皮枕头。

就是在爸爸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爸爸的心脏、肺、腿部都已不大方便，走路需要有人搀扶。爸爸最喜欢的游泳活动，绝对不能进行了。只有书，始终是爸爸的最好的伙伴。

在爸爸的卧室、客厅……凡是有个地方就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当爸爸卧床不起的时候，就是躺在床上，还是要看书。

为了方便，爸爸让人给准备了两副眼镜：一副眼镜没有左腿，一副眼镜没有右腿，这是为了在两边侧身躺时使用。

书，成了爸爸生命的一部分。

小字书看不清了，就看大字书，没有大字本书，就干脆拿着放大镜看。有一次，爸爸发烧烧得很厉害，两天都不大吃东西，却没有丢掉书，仍然躺在床上看书。

1975年8月，爸爸做了白内障手术。自己看书不行了，爸爸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读给他听，当

病情刚有好转，爸爸又要照常看书了。为保证爸爸眼睛能够很快地恢复，医务人员规定每天只准爸爸看十五至三十分钟的文件或书。爸爸答应得满好，但只要书一到手，拿起来就不会轻易放下。有时，爸爸见医生来了，就急急忙忙把书藏在被子里，闭着眼睛假装休息。等医生一走，爸爸就拿出书继续读起来。

工作人员都知道，爸爸直到心脏停止跳动前的几个小时，还在示意工作人员给他读鲁迅的著作。当爸爸听到满意的内容时，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爸爸的简朴生活

在生活上，爸爸也同样是我們做子女的学习的榜样。爸爸总是对我们，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讲：生活上要同低标准相比，不许任何人搞特殊。在这方面，爸爸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当年爸爸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时，学校发的一套青色呢子制服，一穿就是好几年。衣服的颜色都褪了，袖口、胳膊肘处都磨破了，就这样，爸爸还是舍不得扔掉，还要一补再补、一缝再缝并一直穿在身上。

除了这套衣服外，爸爸有一件灰色的布长袍。到了冬季，长袍里面加上件旧夹袄，就这样穿着过

冬了。他的下身总是那条一年四季不变的白色布裤子。有人同爸爸开玩笑说：“你这叫冬天用加法，夏天用减法的穿衣法。”

“是呀。这就叫学用结合。”爸爸听了风趣地回答说。

一到夏季，爸爸常常不穿袜子，也没有袜子可穿，有时连鞋子都破得露出脚指头。听说爸爸当年的被褥是湖南农家用的蓝大布套被，棉花是用过多年的，又旧又硬，盖在身上很重，还不挡风。爸爸住校，一到星期日回校晚了，食堂的饭菜都是凉的，别人总是想法热饭炒菜，爸爸总是打点冷饭剩菜吃。爸爸的同学多数都是从农村来的，农家的孩子本来生活就比较简朴，爸爸的简朴在同学中间、在学校是很闻名的。其实爸爸的钱都花在订报纸、买书刊和杂志上了。

爸爸一生在衣着上从来不讲究。如果说在井冈山、在长征中，是因为形势紧张，经济条件差，不去讲吃说穿，那到延安后，相对来讲，各方面条件都好了，多做件衣服还不能说是什么过分之举吧！但爸爸却始终保持着这种简朴的作风。

1937年冬天，爸爸穿的那件旧棉衣，不管谁劝，爸爸就是不肯换新的。

警卫人员想办法找到管理部门，让他们想法给

爸爸做了件新的阴丹士林布的棉衣。

他们知道爸爸的脾气，要是直接把新棉衣拿给爸爸，爸爸肯定不会要，更不会穿它。最后几个人想出个办法来：趁爸爸休息时，把旧棉衣偷偷拿走，把新棉衣轻轻放下。他们想，等爸爸醒来时，见没有旧棉衣了，只好穿上新的。然后再抽空儿把旧棉衣拆洗一下做好，两件换着穿。

想好了，就依计而行，换完后他们几个三下五除二地就动手把旧棉衣给拆了。这一拆才发现，爸爸穿着时是件棉衣，谁知布都糟了，拆了，就是照原样也缝不起来了。

爸爸醒来，发现自己的旧棉衣没了，把警卫员叫进来问：“这是哪个的衣服？我的那件棉衣呢？”爸爸指着那件新棉衣问。

“这是管理局给你做的……”警卫员吞吞吐吐地说。

“我有棉衣嘛。我不要！还是把我的那件拿来。”爸爸说。

“那件，那件棉衣都让我们给拆了，想洗洗再缝好。可看样子，布破得缝不起来了。你还是……”警卫员说。

“那，你看怎么办？”爸爸明白了，无可奈何地笑着说。

“主席，这件棉衣挺好，你就穿它吧！”警卫员高兴地说。

“这样吧，你拿上它，给我换件灰布棉衣，和你穿的这件一样。”爸爸拿起那件新棉衣，指指警卫员的衣服说。

没办法，警卫员只好照办了。

那时候，国民党对边区进行严密封锁，延安的物资也极为匮乏，生活条件也是很差、很苦。

到了冬天，陕北可冷了，部队干部就自己动手做了一批毡帽。因为毡帽料的质地不好，人们又是第一次做，没有经验，做好后一看，帽壳平塌塌的，帽檐软软地挺不起来，老往下耷拉着。那个样子好难看，大家宁可冻着也不愿意戴它。

一天，警卫员拿着一顶这样的帽子对爸爸说：“主席，你看，这帽子戴上倒是挺暖和，就是样子太不好看，戴到头上，别人一看到就笑。所以谁也不愿意戴它。”说着顺手把帽子扔到爸爸的办公桌上。

“这帽子不错嘛，没人戴我戴。”爸爸说着拿起帽子看了看，就扣到自己的头上。

爸爸不光戴上毡帽，还特意到院里走了一圈，让大家看看，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爸爸无论是开会，还是做报告，只要是外出，

都戴上这顶毡帽。在爸爸的影响下，大家也都先后戴上了它。不久在人们中传诵着这样几句顺口溜：“八路军，土包子，头上戴着毡帽子，打仗就像钢炮子，敌人像个龟孙子。”

爸爸穿衣服，也有讲究的时候。那是在特殊的场合和时间里。

1949年，一次，爸爸在香山双清别墅要接待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这其中就有知名的民主人士张澜先生。

见张澜前，爸爸对卫士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要见他了，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卫士将爸爸的全部家当翻了个底朝天，找了个遍，也找不出一件不破不补的衣服，就为难地对爸爸说：“主席，一件好衣服都没有。做也来不及了，要不，我去借一件……”

“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爸爸说。

结果，爸爸就穿着那件补丁衣服见了张澜先生，又穿着那件补丁衣服见了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等知名人士。他们哪位也没有笑话爸爸的“穷”样。就这样，爸爸一直不让给他做衣服，直

到爸爸准备“十一”上天安门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才让卫士找人为他做了一身新的中山装。

爸爸不光是在衣着上这样简朴，对生活日用品，他也同样特别注意节俭。有的东西，使用到无法再使用时，爸爸还是舍不得丢掉换新的。这些东西常换换，条件还是允许的，可爸爸从不准这样做。

解放战争时期，爸爸的一条毛巾是两用的，既用它擦脸，又用它擦脚。用了很长时间了，那样子简直就像块麻布片。卫士想给爸爸领条新的。就这点小事，也要征得爸爸的同意，否则爸爸准要生气。卫士就拐弯抹角地动员爸爸说：“主席，领条新毛巾吧。新的用来擦脸，旧的就用它来擦脚。擦脸、擦脚应该分开嘛。”

“分开就不平等了。每天行军打仗，脚要比脸辛苦多了。它能用，我看还是不分开好；分开，脚会有意见哩！”爸爸听了卫士的话后，幽默地说。

“那就让它俩分工。新毛巾用来擦脚，旧毛巾用来擦脸。”卫士也笑着说，反正是想着法子要爸爸同意领条新毛巾。

“账可不能这么算。我领一条新毛巾，好像不值多少钱，如果我们的干部、战士，每人节约一条

毛巾，这笔钱就够打一个沙家店战役了。”爸爸的话引起了大家的笑声，也引来了大家对爸爸的敬意。

有一次，我的一位同学，见到我用的牙刷都掉毛时说：“你的牙刷都这样了，还舍不得扔掉，现在谁还用这样的牙刷呀？”

她的一句话，使我想起了爸爸。

我这是跟我爸爸学的。爸爸的牙刷用得什么时候变成“不毛之地”时，什么时候才肯换用新的。我这牙刷虽说荒凉些，毛草长得稀疏些，但还没有变成“不毛之地”，所以还是让它继续尽职尽责吧！

爸爸特别喜欢吸烟、喝茶。而这两项的开销全从他的工资中支出。爸爸又只爱喝龙井茶，这种茶在当年是很贵的。

尽管当时我们也想尝尝这种高级茶的味道，但爸爸和他的工作人员都不许我们品尝。对爸爸这样的规定，当时我很不理解，也稍稍有些不满意。心想：一点茶叶还这么小气！事后想想，爸爸和他的工作人员不得不这样做。茶如果全部对我们这群孩子们放开供应的话，那也是个数不小的数目呢！因为经常跟着爸爸一块生活的有六七口子人，也就是说，爸爸要供岸青、思齐、我、李讷、远新、博文、姨等人，而且江青吃饭也同样不交钱的。再加

上我们几个人都在上学，光学费一项开支，也不是个小数字。这一大家子都靠爸爸的工资生活，经济上也确实是够紧张的。

如果我们每人只要爸爸一点儿龙井茶，加起来也有小半斤呢！所以仔细想想，爸爸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想到这儿，我就不再怨怪爸爸小气了。

我记得好像是 1954 年，或是 1955 年的冬季。那是个刚刚下过大雪的日子，好像是个星期天。那天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复习功课。江青叫我到她的房间里去。我进去后一句话也不说地站在那里。因为平时我从不进她的屋。

“娇娇，我想让他们（工作人员）给你爸爸做个丝棉背心。刚才征求你爸爸的意见时，你爸爸生气，发脾气了，说不让做，你去劝劝他吧！”江青一口气把话说完。

“您们间的事儿，我怎么能管呀！”我为难地说。

“你爸爸听你的。还是你去劝劝好。”江青说。

我点点头再没说话就走出了她的房间。

我心想：叫我去征求爸爸的意见！这么多年来，就我所了解到的，只要涉及到爸爸的衣、食、住，比如想给他增添衣服，改善伙食，修缮房屋等等，只要是事先去征求意见的，没有一件事他能同

意。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我去劝，也准会碰钉子。我真的有点不想去。可我又怕爸爸为这点小事真的生气。为了爸爸，我还是硬着头皮，到爸爸房里去了。

平时，我想到爸爸房里去，都是爸爸叫我我才去。或是我先让人告诉爸爸一声，说我想见见爸爸，我想他了。得到允许后，我才能进爸爸的房间。这次是江青让我去，我才不得不去。我没有事先说一声得到爸爸的允许，就直接进去了。

“爸爸，您好！您……”我的话还没说完。

“哪个要你来的？”爸爸坐在沙发上生气地望着我问。

“是江青叫我来的。她说……”我望着爸爸说。

“她叫你来干什么？”爸爸的气还没消。

“走。你跟我走！”爸爸说着就站起来了。

我再没说话。赶忙帮着爸爸把棉大衣穿上，把帽子递到爸爸手里。爸爸戴好帽子后一回头顺手又把那条长长的灰色围巾拿来，折叠一下，用左边手一撑，右边手一套，左手一拽，套好围巾，拉住我的手就往外走。

我不知道爸爸要我跟他干什么去。我不问，也不敢问。因为此时，爸爸的气还未消呢。

爸爸拉着我的手，我们父女俩并排走出院子，

漫步在南海的岸边上。雪在我们俩脚下发出声响。我使劲儿迈开大步跟着爸爸走着，走着，两个人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你看，我穿着毛衣、毛裤，又穿着棉大衣，冷吗？还做什么衣服！你莫听她的。”

“莫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富嘛！能吃饱、能穿暖就满不错了嘛！莫搞特殊！”

瞧，我还没说一句话，爸爸就已经知道江青搬我到他房间的目的了。我知道，爸爸还是不同意做背心。也就没有再劝说他。

我陪着爸爸慢慢地走着，我俩站住脚，望着北海的白塔；看着北海中的一片白雪；再看看眼前南海中那白莹莹的雪，心里觉得那么清、那么静！

我抬头看看爸爸，爸爸凝视着这洁白的雪海，长长地舒了口气。我知道，爸爸喜欢雪，望着这茫茫雪海，心里舒畅了，心情也好了。当然，此刻爸爸的气儿也消了。

“爸爸，他们还在……”我回头看见卫士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就对爸爸说。

“走。我们该打道回府了！”爸爸说着，拉起我的手，笑着冲卫士们走去。

我知道了，爸爸的气全消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我的娇娃受冻了。”爸爸说着伸出右臂把我揽在他的怀里。

这时，我真的感到一股暖流流淌在我的心头。虽然，我未穿大衣就跟着爸爸在外边“冻”了一段时间，确实是感到有点冷了。但我的心头却是热乎乎的。因为我为爸爸做了我当女儿该做的事情。

天再冷，我的心里也是热的，这父女的亲情，永远暖着我的心！

爸爸搬进中南海办公以后，我看到办公室和休息的东屋里，都摆着许多花。我们就常常悄悄地轻手轻脚地跑到花盆跟前，闻闻这盆花，摸摸那株花。菊香书屋变了，变成了一个百花盛开、争奇斗艳的小花园。有时，偷偷捏个小花叶，小心翼翼地放在书里夹起来，觉得挺有意思。

可没过多久，这些花都没了，都被搬走了。一问警卫才知道：是爸爸让他们搬走的。爸爸说：我的住处不要摆这么多的花，有几盆就够了。以后工人、农民的代表来了，干部来了，看到我这里摆这么多花，要是都向我学，回去也都摆弄起花来，还哪有心思干工作。这种风气不好，不可长。

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家的院子里，只摆了两盆棕树，两盆无花果，除此以外再也没有摆过其他的。

再后来，南边房前的小花园，也改成了小菜园，由警卫人员和我们一起劳动，种上了黄瓜、辣椒和各种应季的青菜。我们也就只能从这些不同的蔬菜品种中看到各色各样的不起眼的小花了。

爸爸不光是在衣着上不讲究，就是在饮食上，也不是个挑剔的人。

日常生活中，爸爸总爱吃点小菜，辣椒是绝对不可少的，再就是酱菜、腐乳以及以青菜为主的几个炒菜，再常吃的就是大家时时提到的红烧肉。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特殊的爱好。爸爸这个人干起事来是很专一的，尤其是读书时更是如此。所以，那些鸡呀、鱼呀吃起来太费事，又要分心，不像红烧肉那么方便，夹一块送进嘴里便吃，没有什么需要小心的，也用不着吐骨剔刺的。

爸爸的这种习惯，也是在那漫长的战争年代养成的。战争年代无暇去琢磨吃喝。那时节，那环境，那形势，那情况，只要能填饱肚子，饿不着，什么东西不吃啊，哪还有心思去挑肥拣瘦啊！

1927年11月间，在江西宁冈县茅坪。一天，爸爸由住地洋桥湖去和农民自卫军的同志们相会，到时，正遇上他们吃饭，见到他们碗里盛的都是从山里采来的野菜。这时，有人说：“这么苦的野菜怎么能吃得下去呀？”爸爸闻声，走进伙房。炊事

员对爸爸说：“这里下霜很久了，所有的野菜都被冻得枯黄了，只剩下这一种了，这种野菜是比别的菜要苦得多……”

爸爸听着，拿起碗盛上野菜与大家同吃起来。边吃边对大家说：“这菜是苦，可它很有营养。我们能够吃下这种苦，日后就能战胜更多的苦，我可是要多吃哩！”

1938年春季，抗日根据地正处于困难时期。一天，爸爸外出回来，走到延河滩，发现了一种长着圆圆叶子的小草，就对警卫员说：“这是一种能吃的寒菜。搞点回去炒炒吃，就少炒一个别的菜。”

1949年进城以后，爸爸依然保持着这种简朴的生活习惯。什么山珍海味，爸爸从来不去问津。爸爸的饮食中，比战争年代多见的是增加了鱼。

爸爸特别讨厌宴会，更反对那种大吃大喝的作风。在不得已而设宴时，爸爸总是一再指示，再三叮嘱：不能总是山珍海味，既浪费又不实惠。并一再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活在世界上，不是为吃世界，是为改造世界。”

尽管医生多次规劝，爸爸的饮食习惯却一直未变。每当提起要爸爸注意营养、改善生活，爸爸总是摇摇头，津津有味地吃着二米饭（大米、小米合做）说：“要是全国人民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菜，

那就很不错了。”

1960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爸爸对工作人员讲：我不吃猪肉，也不吃鸡。用猪肉和鸡出口换机器。我呢，有米饭、青菜、盐和油就够了。”

过不久，爸爸又给自己规定新的方案：“不吃荤菜，只吃米饭和青菜。”

当工作人员劝爸爸要增加营养、改善伙食时，爸爸深情地对他们说：“全国人民都这样，我一个人吃了也不舒服啊！”

为了保证爸爸的健康，工作人员只好增大素菜的量。就这样，爸爸还是不让，每顿只好按爸爸的指示，只炒一个青菜，两样小菜，还是照样吃“二米饭”。

卫士长李银桥同志提起这段往事时，总是忘不了他与爸爸的那段对话；一天，他帮爸爸做睡前按摩时，他发现爸爸脚脖子一按就是一个坑，而且很长时间起不来。这是明显地缺乏营养而造成的浮肿。他对爸爸说：“主席，你看，这是缺营养……”还没等他把话说完，爸爸却接过话茬说：“脚脖子都长得胖了，你还说我缺营养。我看是营养过剩了！”

富于同情心的爸爸

爸爸自己生活简朴，但对他人，无论是衣服，还是钱财，只要对方需要，爸爸都会送给他的。

爸爸这点倒很像我的奶奶。爸爸从小对人就有同情心。当年在老家的桥头湾、井湾里等地读私塾时，有一个名叫黑皮伢子的小同学，他家里很穷，常常不带中午饭到校，到晚上再回家吃晚饭。我爸爸知道后，就把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午饭分出一半给他吃。午休时还常帮助他捡柴。这事让奶奶知道了，每天给爸爸带午饭时就特意多装上些，让他们俩都吃饱饭。

后来，爸爸到长沙第一师范上学。有一年的冬天，在去长沙的路上，遇到一个穷苦的青年，爸爸见那青年在风雪天里还只穿着单衣，冻得浑身直打颤。就和他谈起来，从谈话中爸爸知道他家境贫寒，是生活所迫，才外出谋生的。爸爸很同情他，就把自己的一件上衣脱下来送给他。那青年很感激爸爸。学校放假回家后，奶奶发现爸爸的上衣少了一件，就问爸爸，爸爸把事情如实地告诉了奶奶，奶奶只是笑笑，没有责怪爸爸。

爸爸关心群众的事是很多的。

1927年的冬季，井冈山上大雪纷飞，寒风刺

骨。爸爸的房东谢槐福，大冬天身上无防寒抵风的棉衣，只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单衣，在寒风中冻得直抖。

爸爸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就走过来，轻轻地拍拍他的肩头，亲切地说：“槐福呀，天冷了，你要穿衣服哩！”

谢槐福回过头来看看我爸爸，便实话实说：“毛委员，我没有衣服呀！”

爸爸听了，马上把自己身上刚刚发的一件棉衣脱下来，披在谢槐福的身上，告诉他说：“外面正在下雪，槐福，你穿上吧。”

“毛委员，你身上只穿两件单衣，我怎么能穿你的棉衣哩！”谢槐福说着又把衣服递给爸爸。

“你莫担心我啰，我不怕冷，我习惯了。”爸爸说着又把棉衣给他穿上，还亲自给他扣好扣子。

在长征途中有一天，正遇上阴天，天昏地暗，部队行进很困难，这时恰恰又遇上国民党的飞机。突然，敌机投下一颗炸弹，不偏不倚在警卫班长身边“轰”的一声爆炸了，班长倒在了血泊中。爸爸哭了，在场的人都哭了。

爸爸慢慢地举手摘下红星帽，默默地站在警卫班长的遗体旁，不说一句话地站了很久，很久。

大家含着泪水，掩埋了战友，又继续上路。突

然间，爸爸又返了回去，从一个战士的手里拿过一把小小的工兵铁锹，又一次为警卫班长的坟培土。爸爸一锹又一锹地把土培在高高的坟堆上，又沉重地用铁锹拍打拍打。爸爸站起来，深情地望着这座新坟。很久他才拖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回头地缓缓地离开，他又带着队伍继续长征。

1934年12月下旬，爸爸和红军从黎平向黄平行军时，在一个村边见到一个农村妇女，躺倒在路边上，奄奄一息了。爸爸走上前问清楚了，原来她是当地的农村人。爸爸毫不犹豫地从我身上脱下一件毛线衣，给她穿上，又从自己的行李中拿出一条布被单子，又让警卫员拿了两条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起都送给她。这位老乡有了活命粮，暖身衣服，她含泪连声对爸爸道谢。

1934年4月的一天，红军与敌人作战时，爸爸和朱德爹爹在指挥所里，离前沿阵地只有两里路远。战斗开始后，爸爸看见一个战士在攻击敌人时负了伤，倒下去了，就马上出了指挥所跑了过去。随手就把自己的衣襟“嘶啦”一声扯下一片来，像个训练有素的卫生员一样，很快给战士把伤口包扎好。他又弯下腰，弓起身，背上战士就往卫生队走。

“同志，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那战士觉得背着

他的这个人看着挺面熟的，就是一时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面，才这样试探着问爸爸。

“我们都是红军，经常见面的。”爸爸怕说实话后，战士不让背，会耽误治伤，就含糊地回答他。

当警卫员满头大汗地追上时，爸爸已经背着那战士走出一里多地了。

“毛委员，您快歇歇。我来背他！”警卫员边擦着额头的汗边对爸爸说。

“你先去找副担架来，我们两个抬他走。”爸爸说着还在继续大步流星地朝前走。

那个战士一听说背他的人是毛委员，也不顾自己伤疼，一下子就从爸爸的背上滑下来，说什么也不肯再让爸爸背他。警卫员要背，他也不让，非要坚持自己走。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正好担架队来了。爸爸同警卫员把他轻轻抬上担架。

1935年6月2日，红军在翻越一座大山的时候，遇上国民党的飞机轰炸，爸爸身边的警卫班长胡昌保牺牲了。爸爸悲痛万分，他双手抱着胡昌保放在地上，让他躺平后，爸爸又用自己的毛毯盖在胡昌保的遗体上。并在遗体旁站了很久很久，才依依不舍地又继续率队伍前进。

再就是红军奔袭云南途中，妈妈为掩护伤员而负重伤的事。

其实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这样的事情是常常会遇到的。爸爸生活上，是最清苦，最简朴的。因为爸爸心里装着的不是自己，而是中国的普通群众。

1935年，红军翻越了梦笔和长板这两座大雪山。这一带地形非常险要，周围许多山上都是积雪，又时常下雨，真是河流错综，路滑坡陡，要是再遇到森林，有苍松古柏遮天蔽日，行军就更困难。爸爸拄着根木棍和战士一起行军，警卫人员悄悄地弄来担架，要抬着爸爸走。

“我身体蛮好，干吗要我坐担架？”爸爸说着把棍子一扔，大步朝前走。他们知道，爸爸丢掉棍子，是故意做出不疲倦的样子，可他们还是不离开爸爸身旁。爸爸被缠不过，就干脆停下脚来，让他们在前面先走自己再跟在后边走。当爸爸发现伤病员和体弱的同志时，就叫住担架队员温和而又耐心地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完成任务了，抬伤病员和抬我都是一样的，快去抬上走吧！能让一个伤病员恢复健康，我们的革命就多一份力量！去吧，去抬吧！”担架队员只好服从了。

同年的7月，红军到达黑水、芦花一带，正值青稞麦熟季节，总部就命令部队帮助藏胞下地收割。

部队所有人员都投入了这一行动。爸爸和大家一起割麦、打麦，还要从几十里地外背着几十斤麦子运回来。一天黄昏时分，爸爸背着麦子往回走，他边走边和同志们聊起天来。这时，他见到前边有些同志在路边休息，还不起身走，样子很疲惫，爸爸就上前询问，原来这些都是大学生和留学生，是刚来不久的知识分子。爸爸就风趣地对他们说：“年轻人，血气方刚，你们怎么倒有点老年气呢？”他们一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后来爸爸才知道，他们是在割麦时因不会使劲儿，手掌都磨出了血泡，脚也被麦茬子扎破了。爸爸就非常关心地说：“原来是这样，那你们就少背些嘛！记住，回去后就找医生给上点药，万不可让毒水浸了。”

队伍已进入草地第七天了。那天天色已晚，部队准备就地宿营了。爸爸却一直朝前走。原来爸爸是看见有两个战士倒在路旁了，他走上前去，弯下身子亲切地拍拍两个战士的肩头说：“同志，不能倒下啊！”他俩认出了这个人是毛泽东。

一个战士轻声无力地说：“首长，我走不动了。我，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爸爸听了，伸手从自己的干粮袋里掏出几块青稞饼，又亲自送到战士的手中，并恳切地说：“再

走一天就可以出草地了，无论如何你要走出去。”

两个战士望着爸爸，激动得流出了热泪。他们知道，这几块青稞饼，在此时、此刻、此地意味着人的生命！他们怎么也不肯收下。爸爸说道：“你们要吃。不吃，就出不去了。”他们含着泪，吃着饼，望着爸爸，用力撑着身子站起来，艰难地挪动着步子。爸爸就让警卫员扶他们走。

爸爸就是这样爱每一个战士，疼每一个人，无论是谁遇到困难他都会相助相帮的。

当胡宗南进犯延安时，爸爸因连日的急行军，身体感到很疲劳，大家又担心爸爸的健康，于是很快准备好担架。爸爸看到后说：“大家都很累，你们愿意抬，我还不愿意坐哩！坐担架可不是件好事，不是生病，就是负了重伤。”还在谈笑时，有人向爸爸报告：“周恩来同志病了！”爸爸一听，连忙命令：“快拿担架去抬他！”

当担架抬到爸爸跟前时，周伯伯要下来，爸爸连忙用那双温厚的大手按住周伯伯并扶着担架走了一段路。爸爸幽默地对担架队员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的担架终于派上了用场，这叫有备无患嘛！”一席话，逗得病中的周伯伯和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

爸爸总是时时把自己融于战士之中，把自己看

成是普通一兵，又总是时时把战士挂在自己的心中。

乐于慷慨助人的爸爸

在我们家里，爸爸一向是主张自由的，从不干涉我们与人的交往。在爸爸的眼里，从来就没有等级、门第的观念。他还特别教育我们眼睛要向下看，要拜工农为师，要和工农子女交朋友，学习他们的勤劳、忠厚、朴实的优秀品德。

爸爸不光对我们这样，对我们的同学也一样。凡是爸爸知道的人，也时时提起。1959年我结婚时，我的好友王桂苾未能参加我的婚礼。事后爸爸问起她。我说她去青岛了。爸爸笑笑说：“看她的炮兵去了！”当时，她爱人在青岛某炮兵部队工作。爸爸对我的同学也像对我们一样关心、支持、爱护。

我记得在我结婚前后，我的一位女友和令华的同班同学也在恋爱，准备结婚。这本来是一件挺好的事。可有一天，我的女友对我说：“我们双方家长都不同意我俩恋爱，更不同意我们结婚。我感到非常苦恼，心里也很痛苦，真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

“为什么？”我没等她把话说完就迫不及待地问

她，想尽快知道结果。

“门不当，户不对。”她用六个字把原因告诉了我。

我知道，她的父亲是某部部长，她男友的父亲是某个工厂的书记。我想，这可能就是她说的门不当，户不对。就是说部长和工厂书记不是一个级别，不能同坐一条板凳，当然就不能攀亲结友，更不能互称亲家了。

门第高的不愿意女儿下嫁。为使女儿将来生活得舒适些、安逸些，想攀个高枝。我认为父母有这种想法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不能阻挠、干涉女儿的婚姻大事。

我给她讲了我爸爸当初为什么一再让我看“打金枝”这段京戏，意在让我明白自己婚后该怎样对待令华及他家里的人。

她的男友家长也不同意他们的婚事，这就难了，我一时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个理儿。后来我也明白了，他们认为自己是一般干部，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去攀个高级干部的女儿。不去跟那高门子弟人家结亲，怕娶个“小姐”回来家里的关系不好处，说深了不是，说浅了也不是。家长有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两个年轻人又的确相处得很好，他们彼此相

亲相爱着。我认为当家长的不宜过多地干涉儿女的自由。可我又没办法帮她解决问题。我就想到了爸爸，爸爸能解决女儿的任何问题，同样，我相信爸爸也会帮助我的女友。我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爸爸。

爸爸听了以后说：“娃儿们的事，当家长的不要去管那么多。像我娇娃一样自由多好！”爸爸很支持他们的婚事，我把此话转给了女友。

他们结婚后，爸爸还曾问过他们的情况，我说：他们在生活、学习上遇到些经济困难，一时还没有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来。爸爸听后说：“我来支援他们。”

“您怎么支援？”我问爸爸。

“我有稿费嘛！”爸爸乐呵呵地说。

从此，爸爸每月都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 40 元钱，由我转给他们，供他们学习、生活，直到他们完成大学的学业为止。

提到他俩，我又想起了令华的另一位同学，也是因为学习时遇到了经济困难。爸爸知道后，二话没说，以同样的方法，从自己的稿费中每月支出 40 元钱按时由我们转给他。帮助他克服了困难，使他顺利地读完了大学。

我想，爸爸这样做，是出于他对年青一代的关

心、爱护，因为在爸爸的眼里，年轻人是祖国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不属于某一家，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同样，爸爸用自己的稿费来帮助他们克服困难，继续深造，这也是在为国家培养人才而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第九章

○我参军当上了参谋

○“文化大革命”，我成了“保皇派”

○我们戴了高帽，挨了批判，爸爸却
乐呵呵地说：经风雨见世面嘛

○中央领导关心着我

我参军当上了参谋

1958年夏季，我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学习。

这一选择也正合我爸爸的心思，因为爸爸一直主张，我要是升学，就学师范，做一名教师。

升入大学以后，我的身体不好，无法坚持学习，只好听从爸爸的意见，休学了一段时间。

1964年，我到国防科委机关任见习参谋，成

了一名军人。说是参谋，我这个人既不会参又不会谋，因为我所学的专业与工作中的业务完全不对口。对我来讲，一切都那么陌生，我真的成了人们常说的那种门外汉了。我感到自己力不从心，要想搞好本职工作，真是太难了。想做好工作，我就得从头学起，从实践中学起。

我在国防科委情报局开始工作了。我感到摆在我面前的担子是很重的，压力很大。

我真的感到自己几年来所学的东西太少、太少了，这真应了那句“书到用时方恨少”的话。我觉得自己虽然在大学学习了一段，可还像个小学生一样，对什么都一无所知。我感到自己的能力不够，知识贫乏，我真想再回到大学去好好学习几年。

当时，因为我什么都不懂、不了解，领导就叫我先熟悉一些科技资料。因此，那些资料就一摞一摞地堆在了我的面前。国内的、国外的、中文的、外文的，除了资料还是资料。什么原子弹、什么导弹、什么飞机、什么什么、一大堆又一大堆的资料，看得我头脑都发涨了，太枯燥、太单调、太无味了。

但又不能走开，又不能不看，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就硬着头皮看下去，我必须熟悉它、了解它、掌握它，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我就带着一颗

军人的责任心，一头扎进了资料堆里去。

我的同学们曾对我说：“高中毕业不升学的话，你就干脆给毛主席当俄语翻译吧。”

“我可没有那水平。”我笑笑说。这也只是同学们的玩笑而已。

中学时，在解剖青蛙、老鼠、小兔子时，我却连看都不敢看，甭说叫我亲自去动刀了。同学们都在动手对动物进行解剖，我却远远地躲在同学们的身后，从他们的缝隙中偷偷地看着，并用心记他们所说的动物的内脏的名称、位置。不然，解剖笔记就无法写了。

我的表现可能让老师发现了吧，在下一次解剖青蛙时，老师特意把我叫到她的身边，给我讲解解剖程序，让我细心地看着她怎样操作。“大胆点，一只小青蛙有什么可怕的。”老师把“小”字说得很重，像是在给我壮胆，又像是在给我鼓劲。我站在老师身边，认真地听着。“我不怕。”我说着又看看那只躺在白色瓷盘中的小青蛙。

这时，老师说：“李敏，你来用手拉住小青蛙的这条腿。”“嗯。”我答应着，伸过手去，接过老师递给我的那条小青蛙的腿。

“注意，看我怎样下刀解剖……”老师对围在身旁的同学们说，说完她就开始操作，还没等老师

下刀呢，我的头却早早扭向了另一边，朝别的地方看去。手还在使劲地拉着小青蛙的腿。

“放松点。李敏，你别用那么大劲拉呀！”你都快把小青蛙拉出瓷盘了。”一个同学说着从我手里拉走了那小青蛙的腿。

我又悄悄地走到同学们的身后去了。

看来，我这见血就头晕的人是注定与医学无缘了。医学的一些基础知识，好像多多少少与化学专业还有些关联，我这样想，就这样，我这个喜欢医学的人就学了化学专业。

工作以后，在单位天天与导弹、飞机、原子弹的资料打交道。对资料能看懂，工作起来比较顺手。

但要叫我写起东西来，因为中文水平有限就显得困难大了些。

我开始感到苦恼了。在学校，除了书本还是书本；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在机关，除了资料还是资料；除了读资料，还是读资料，由于自己的知识面实在太狭窄，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一种枯燥无味的感觉时时袭击着我，有时看着看着，我的上眼皮跟下眼皮就打起架来；看着看着，我还打起瞌睡来。这不是我不想读、不想看，更不是不想干，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领导可能看出了我的心思，知道了我的难处。就又重新调整了一下，让我看原子放射性元素钴有关的什么阿尔法、贝塔、伽玛之类的知识。这些东西与我所学的化学知识稍稍靠近了些，不管怎么说吧，难归难，我还认真地读了一阵子资料，老老实实地说，还是增长了一些知识，开阔了眼界，这对工作还是有利的。

庆幸的是，我这个出了校门就进机关门的见习参谋，各方面都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和帮助，关心与照顾。为了让我能尽快地熟悉机关的工作和生活，尽快地提高业务能力，一有机会他们就让我外出参观学习，从各方面帮助我提高。也就是在这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中，使我更明确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目标，我懂得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政治思想觉悟也提高了。我懂得了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立志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就是在这个集体中，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感谢这个集体，我感谢这个集体中的同志们。

到国防科委工作的第二年，也就是1965年，我被调到八局。八局是负责管理国防高等院校工作

的。我是学师范的，这样的调动算是专业对口吧。

当时，国防科委八局管理十多所院校：北京工业大学、北京航空工业学院、西北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电讯工程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南京航空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

当时，各个学校正在进行教育改革。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教育要革命”，“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诸多的指示。国家高等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随后，军委在长沙召开了军队院校工作会议。我因工作关系，随局领导和同志们一起到长沙参加了这次工作会议。

会议结束回到北京后。科委要派工作组到所属各院校搞调查研究、检查贯彻教改指示的落实情况。就这样，我就被派到北京航空学院教改工作组工作，成了一名工作人员。

我想，有些人捕风捉影地写东西，因为这段事儿就把我说成是北航毕业生，这也太缺乏调查了。

■ “文化大革命”，我成了
“保皇派”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到了1966年，“文化

大革命”开始了。因为我也生活在那个年代，当然也就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所在的教育改革工作组就撤出了北京航空学院。我自然也就跟着回到机关。

在人们的心目中，好像我是个最走运的人，认为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就不会挨批挨斗。其实错了。我也同样离不开那个时代，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形势，我也同样受到批判，被勒令交待问题，被列入“五一六”分子的名单中。孔令华也被说成是埋在我爸爸身边的定时炸弹，没完没了地挖了起来，不也同样挨批挨斗吗！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俩同时受到批判。不过我俩也有不一样的时候，就是他戴过高帽子，我没有戴过。但这比起一些挨批挨斗的老干部来，我个人受点冲击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在我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抛开个人的得失，为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保护一些老同志尽了我一个公民、一个党员、一个军人的职责和义务。

在我的记忆中，有几次批判会，我至今无法忘记。

一次，是在北京航空学院批判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的大会。

钟赤兵是长征途中英勇战斗失去了一条腿的红军干部。当时他因有严重的心脏病，正在三〇一医院住院治疗。为了批判他，就强行把他从医院的病床上拉起来。他是带着氧气瓶到北京航空学院礼堂接受批判的。

看到这种情况，说实话，我心里非常难过，心情非常沉重，可我又无能力来阻止，因为我也在受批判。我为此心急如焚。

等到会议一结束，我就不顾一切地向中南海跑去。我一心想见爸爸。我要向爸爸反映这一真实的情况。

走到中南海西门，警卫人员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去，无论我怎么说都没有用，因为我已经没有进中南海的任何证件了。

那我也要力争，我还真有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儿。我就左说右说的，想法说服了警卫人员。还真好，他们真的就让我进去了。我很高兴，虽然费了些周折，但总算是达到了目的。

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爸爸的住处。谁知刚刚进门，就碰上了江青。真是冤家路窄。尖酸刻薄的江青看见了我，就阴阳怪气地挖苦我说：“小保皇回来了呀！怎么偏偏在这时候回来呀！是不是想摸底？”一进家门就被江青扣上了“保皇”的帽子。

江青的话，让我爸爸听到了。爸爸生气地说：“你去告诉她，就说你是回来摸底的，看她怎么办。”

“爸爸，您别生气。我是回来向您反映情况的。”说着，我就把批判钟赤兵同志的情况如实地向爸爸作了汇报。

爸爸听了我的汇报后说：“钟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来的。”

“您的话我可以转达吗？”我问。

爸爸点点头，同意我转达。

我回到机关后，向有关领导转达了爸爸的指示。这也算是我为保护老干部做了一点工作吧。

“文革”进入高潮，批判会在步步升级。那些残酷批斗老干部的会议及方式，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我非常反感也感到了极大的苦恼。当看到斗萧华同志并让他坐“喷气式”时，我无可奈何，就和坐在一起的一位女同志写了一张条子，“要文斗，不要武斗”传给主持人。但这却无济于事，他们仍然我行我素，继续采用这种残酷的批判方式。

当我看到罗瑞卿同志被用筐子抬到台上批斗时，我实实在在不忍再看下去，就站起来，当即退出了会场，以此表示我的不满与抗议。我想，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不一会儿，周围许多同志也相

继退出了会场。我想，他们的心情肯定和我是一样的。作为一般工作人员，我们也只能以此表示反对了。

又如，原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同志，是因心脏病去世的。当时，有些人说他是自杀，是叛徒，要打倒他。我就找机会跟爸爸讲了这件事。爸爸说：“赵尔陆是个好同志，是井冈山的人。”我明白了，爸爸是要保护他。

我问爸爸：“能不能转达？”爸爸说：“能。”

我如实将爸爸的指示转达给有关人员，尽到了我的责任。

爸爸给我讲：“人批的过火了以后受不了。就像烤鸭不能烤糊，不能烤焦，要恰到好处。批汪东兴的错误就像烤鸭一样，不能烤焦了，焦了就不能吃了。”

爸爸还给我说：朱德是司令，我是政委。批司令，政委也有责任。

我欣慰的是，我曾经帮助过徐海东同志。那时徐海东同志因病住院。“四人帮”强迫医护人员不予他应有的治疗，并强行中断了输氧。

徐海东的家属找到我，让我想办法救人，我一个普通人能有什么办法呢？

但没办法也要想办法，因为救人要紧呀。我首

先想到了我的爸爸。

我进不了中南海，只好打电话告诉爸爸。

我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汪东兴同志说：一定要保证治疗。

我将汪东兴同志的话转达给有关人员，这样保护了徐海东同志。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时，爸爸还特意点名要徐海东同志坐到主席台上。

我们戴了高帽，挨了批判，
爸爸却乐呵呵地说：经风雨
见世面嘛

国防科委领导讲过：别让主席为难，别增加主席的负担。不要为这点小事叫主席分心，影响工作。李敏的事就由我们来管吧。就这样，才让我到国防科委工作。我才成了一名解放军干部的。

1968年初，因为北航老找国防科委领导提出要“勒令”我交待问题。没办法，领导就让我跟机关的同志到北京郊区王四营公社参加农业劳动去了。直到麦收之后，我才又回到国防科委机关。

1969年10月25日晚，我又随国防科委机关干部被“一锅端”到河南省遂平县莲花湖的“五七”劳动农场。

当晚，钟赤兵同志赶来车站送行。钟赤兵同志由夫人陪着拄着拐杖登上车厢，和机关干部们握手送别。他见到我就问：“你去那里干什么？”

“我去种菜。”我回答他说。

“我残废了，不能劳动。我去给你们看门吧！”他风趣地对大家说。

我把自己的行李物品，先托给一位同志代为照料，随后我也去了遂平。

我回到家后，买好火车票，把我的儿子宁宁送到上海妈妈那里，请妈妈照料孩子。一切都安排好我又回到北京，就与机关的第二批干部一起到了干校。

因为1971年初，爸爸对我说过：“你和李讷到中央办公厅江西省‘五七’干校劳动去吧。”我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说：“我是国防科委的干部，还是到科委干校去吧。”

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我和同志们由于干校一起回到北京。

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在揭批清查林彪集团罪行的过程中，我也被列入了他们所谓的“国际口‘五一

六’”的黑名单中。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是其他同志们意料之外的。

1973年12月，国防科委党委为我们这些黑名单上的干部正式作出了平反决定。

原以为从此以后我的日子会好过些，就会平安无事了。谁知事隔不久，一天，爸爸告诉我说：“江青要抓你‘五一六’，你要小心。”看看，我又要倒霉了。

听到此话，我觉得似乎不大可能，但我又想到世间什么事都会发生，我还是防着点好，我做了最坏的打算。我首先想到的是妈妈送给我的珍贵纪念物——一条她与爸爸共用过的毛毯。这件东西绝对不能落到他们的手里。我将毛毯送到我的一位姓钱的亲戚家，请她为我保管起来。

我最初见到江青时，别看她对我又抱又亲，那是假的，是做给别人看的。在日常的生活中，江青的所作所为，我可是都看在眼里。江青总是冷淡我，这是周围的人所共知的。当然我对江青也没有什么好感。

我最不愿见那些高高在上、把人不当人看的人。江青就是这样一种人。

她身边有一位服务员叫小张，工作挺好的。江青却横挑鼻子竖挑眼，事事找小张的麻烦，处处跟

小张过不去。变着法地欺侮小张。小张实在受不了江青的气，都想寻死。我知道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爸爸。

爸爸狠狠地批评了江青，又安慰了小张。为此，江青恨我，恨得牙根都痒，总想找机会报复我。

现在看来，江青借这个机会报复我、整我那真是轻而易举的事了。对她来讲，这只是举手之劳。但既然爸爸告诉了我。我还是防着点好。

江青不仅找我的茬儿，也找令华的麻烦。

令华是1971年3月到三十八军的。是我的爸爸毛泽东同意让他到部队去锻炼的。作为军人，他当然要穿军装了。

1971年8月，我们在青岛陪伴我的妈妈贺子珍时，接到通知告诉我们说：江青也要来这儿。

我们同样按时到站相接，按时陪伴她。

当江青见到我们时，第一句话就问令华：“你怎么穿军装了？”

“爸爸（毛泽东）同意我到部队锻炼去。”令华如实地告诉了她。

江青不是个健忘的人。可事隔三年后，也就是1974年，江青要到部队抓点了。且单枪匹马地要到三十八军，要到某团八连抓点。这一抓，当然就

抓到了点子上，这个八连，正是令华所在的连队。

当时因为工作关系，我不便带着孩子。所以儿子宁宁就到令华那里去了。孩子玩耍时因不慎，跌坏了胳膊，须要人照顾。所以江青到时，令华没有去见她。

江青在三十八军说：“我们的女婿在你们这儿。他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和主席都不知道。他又没有失业，到部队来干什么？他的背后是不是有黑手？他是不是通过他的父亲孔从洲走后门来的？要查查嘛！不过，他还是个老实人。”

江青也还说了一句实话：令华是个老实人。

当年我俩都同时挨批判，令华被迫戴上用纸篓糊的高帽子。因为纸篓大，挨批判时，他还时不时地用手扶着高帽子。那样子也够狼狈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见到了爸爸。谈到当时的形势时，我说：“令华和我都在受批判。我是‘随叫随到’，他还要戴高帽。”

我想，爸爸听了这话，可能会安慰令华几句，给他宽宽心。谁知，爸爸听了后，没有说话，只是冲着我俩笑，而且笑得很开心。就像那年我们为 he 祝贺生日一样，乐呵呵地笑出声来，而且声音还挺大。

“经风雨见世面嘛！”笑过之后，爸爸只说了这

样一句话。

事后爸爸让王海容给令华所在的三十八军打电话说：“告诉他们（三十八军领导），孔令华到三十八军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告诉令华要安心工作。代我问他好。”

如果不是爸爸这样处理，江青很可能让人查令华背后的“黑手”；一些人很可能继续深挖埋在爸爸身边的定时炸弹了。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中央领导关心着我

无论是过去，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对江青一伙，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在家庭中，江青常用给东西或带着出游等方式，拉这个孩子，孤立那个孩子，这是她惯用的手法。我在她的眼中，往往就是那个被孤立、被疏远的角色。江青看不上我，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只不过因为爸爸爱我，她也奈何我不得。

“文化大革命”中，我从来都没有和江青谈过任何问题，和她的另几个同伙，更没有什么交往。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要我发觉了。总要找机会向爸爸和中央其他领导及时汇报和反映。

1974年，江青在批林批孔中搞阴谋活动，我和令华一起给爸爸写了封信，真实地反映了江青的

情况。可我们又很担心，这封信要是不直接递给爸爸，会不会落到江青一伙的手里。想到这一层，我们就要求亲自见爸爸，等见到后直接向爸爸汇报。为此，我们又反复慎重考虑，因为爸爸年事已高，且身体也不太好，就是能见面，汇报的时间也不可过长。所以，我们又准备了一个汇报提纲，明确而尖锐地指出江青的阴谋所在。如，江青以“毛主席的代表”的身份出现，以谁也管不了的特殊身份，到处使用特权，破坏党的原则。另外还有个人专权等等。

试想一下，如果这样的信和汇报提纲要是落到江青一伙的手里，我们还有好吗？

当我们到中南海东门要求见爸爸时，无论怎样请求通报，都不许我们进中南海，当然，更不许我们见爸爸。江青一伙以“主席现在领导运动，还要接见外宾，特别忙；主席年事已高，不能见面……”为借口，将我们挡在中南海的大门之外。不管我们怎样要求，好话说了多少，结果还是没能见到爸爸。

我难过，我伤心，我气愤地质问：“为什么不让我见父亲，搞运动就要骨肉分离？我爸爸知道了也决不会赞成你们这样搞。”

“你们这样封锁主席，为的是干见不得人的事

情。”我大声地跟他们嚷嚷着。最后无奈，我还是含着眼泪离开了我曾经居住过十四个年头的中南海。一道红红的围墙，就把我和爸爸隔得这么远、这么远。

1975年3月，我得知王洪文背着中央要在上海搞核武器：我想这可是件大事，要及时向中央领导汇报。找爸爸，肯定又是不让见。怎么办？事不宜迟，我通过关系将这一情况报告了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同志说：“此事我不知道，军委不知道，要查。”听了邓小平同志的话，我的心里踏实了。结果把他们的阴谋给揭穿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76年3月25日，上海《文汇报》转载了《人民日报》关于学习和纪念雷锋的文章，在全文转载中，惟独砍去了周总理的题词。我将这一情况设法及时报告给党中央和我的爸爸。中央对此事作了及时的了解和纠正。

我说这些事，不是为我自己证明什么。我只是觉得我做到了一个军人该做的事，我尽到了一个党员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该尽的义务。

人的能力有大小，人的权限有范围，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军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国家干部、普通党员，我也只能凭着党员的觉悟、个人的良心，做

到这些了。

1976年9月9日，我的慈父离我而去了，我的精神支柱没了，我在极其悲痛中度日。

同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啦！确确实实同全国人民一样，有一种解放了，重见天日的感觉。我从内心感到高兴。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记得一次见到我爸爸时，他说：“你可以出去走走，看看。”

“我是个军人，不能外出串联。”我对爸爸说。

“那你可以穿便服嘛。”爸爸又说。我知道，爸爸这是在逗我。

“我是军人，不能随便脱去我的军服。”我一本正经地回答爸爸。

爸爸点头笑笑说：“对呀，对呀！这才是军人。”

这段对话，始终深深地记在我的脑海中。

这次，我却兴高采烈地与同志们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我与同志们一起，揭批“四人帮”的罪行。

我和“四人帮”没有任何瓜葛，可不知道怎么就阴差阳错地又成了被批判的对象。甚至过了多年之后，有些人还在我身上大做文章。什么“自认心中自有红太阳的李敏，也就当仁不让，身先士卒地

走在、冲在甚至杀在革命群众最前头。‘红司令’下令‘炮打司令部’，她就去开炮拉火栓；老人家号召揪出‘走资派’，她就绝不对那些人（许多是她的叔叔）‘请客吃饭’。”

“以她爸爸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批判‘资反路线’，她当然不能‘温良恭俭让’。”

“她确如伟大的父亲当初给她命名时对她所期望和要求的那样，果然‘敏于行’了。虽然她名字本身就出自‘反动透顶’的孔老二的‘黑话’。”

“曾与她‘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革命造反战友们，有的纷纷作鸟兽散，有的在清查交代说清楚时，痛快地供认他们的‘黑后台’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人李敏同志，说是她向他们传达了‘最高指示’，才干下了那么多‘暴烈行动的’。”

“别的单位揭批查的目标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她所在单位的批判对象却是‘王、张、江、姚、李’。‘李即她李敏也！’”

以上是我引自《红色贵族》一书中的某些段落。

如果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我有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说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话，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我承认。因为我也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

同龄人一样，是在党和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无条件服从党，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特点，是我们这一代人要求自己做人的基本准则，我同样也不能例外。

每当一个运动来了，我们都会积极地、热情地、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中去，对这场运动，也是如此。在这方面，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行动是不能求全责备的。人，谁能无过呢！何况那时我们还很年轻！

但像《红色贵族》一书中写的那样的话语，恐怕就不止是针对我个人了。这样写的目的，不只是对我个人的辱骂和人身攻击，恐怕是借攻击我之笔，想继续燃起那股早已被党中央否定了的批判毛泽东、否定毛泽东的余火吧！

对我个人而言，说我什么话，批我什么错，都无所谓。因为我就是我，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一个普通的军队干部，无关于党和国家的大局，无损于党和人民的利益。

历史是昨天。历史是过去。过去的历史自有公论。

人们所以这样关注我，是因为我的爸爸是毛泽东，是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当然，对于一些莫须有的东西，我不能沉默，我同样以大量事实一一

报告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因为我不仅是个普通公民，我还是一个军人。

这里，我也不妨提提几位领导同志关于我的问题的谈话：

1980年万里同志这样说：“没有想到国防科委把李敏搞成这个样子，把李敏和江青‘四人帮’连到一起，根本不合逻辑，这是个天大的冤案。问题一定要解决。我的这些话是我们集体的意见（指中央领导集体意见）。”

罗瑞卿同志出任军委秘书长后，得知我的情况，他非常气愤，并表示：“等我从国外治病回来，我亲自处理。”

黄克诚同志任军委纪委书记时，也非常关心我的事，并委托军委纪委副主任甘维汉同志和总政副主任朱云谦同志找我的单位领导谈话，要求他们解决我的问题。黄克诚同志明确指示：“李敏没有什么问题，告诉单位领导，要让李敏上班工作。恢复组织生活。如有什么问题，党委可和李敏当面谈嘛！”

余秋里同志任总政治部主任时，也非常关心我，并指出：看来一下子做不通单位的工作，是不是先调到总政来。

这不，从1977年5月被没收的工作证又拿到

手了，我的工作和参加会议的权利又都恢复了。

我说这些，不是炫耀自己，更不是为抬高我自己。我只是想告诉人们，我不是像一些人传说的那样，凶神恶煞一般。我从未打着我爸爸的旗号去胡作非为！我只是想告诉人们，告诉那些关心我的人，我的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圆满的解决。因为除了党的英明政策之外，还有这么多的领导和同志们关心着我。我在此，对各位由衷地说声谢谢！

第十章

- 爸爸面对社会主义这个全新的课题
- 爸爸的生日清冷寂寞
- 爸爸与江青之间
- 爸爸悲凉地说：娇娃，你为什么
常来看我
- 爸爸走了，他走的时候，身边竟没
有一个子女

爸爸面对社会主义这个全新的课题

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是个全新的命题。一个伟大的新中国建立起来后，爸爸和他的战友们面对百孔千疮的久经战争创伤的国家在谋划着理想中的将

来。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对于刚刚放下枪杆的人们来说比打仗更深奥。

按照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在爸爸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开始系统地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北京是最先宣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那天，在曾经主持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爸爸从工人、店员、农民和工商业者代表手中接受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喜报。随即，天津、杭州、哈尔滨、上海、长春……全国各大中城市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喜报接踵而来。

包括农业改造的三大改造的高潮在全国已经兴起。爸爸非常高兴。

爸爸为成功而喜悦，却没有为之陶醉。

合作化完成了，下一步还怎么走呢？

很明显，这一步的迈出是仿照苏联的结果，这个样板在苏联是成功的，但运用在中国，就自然有了些警惕。

在那一段时间里，爸爸不停地听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汇报，以了解情况。而那时，我正度着自己天真的少年时代。

不久，国际上发生了一件令西方震惊的大事。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后果。

西方世界为此大做文章，说这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标志”，这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震惊不已。

爸爸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的斗争，同时指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

对于爸爸来说，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并不奇怪。因为他在 1955 年就提出了以苏为鉴。苏共二十大使爸爸对斯大林问题以及苏联模式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反思。因此，“以苏为鉴”的思想明显起来了。

1956 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爸爸做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理论已经突破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

走出苏联的模式谈何容易？

急促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本来是想在 15 年内完成的事情，竟然压缩到三年里完成了。这短短几

年的改造，建立的所有制结构又是那样的单一，这本身就是一种缺陷。

但是，这是走出苏联模式的一个初步结果，随之而来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爸爸为此而兴奋。这一年他畅游了长江。写下了这样一首《水调歌头·游泳》词。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党的八大召开了，历史处在一个转变的关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几亿中国人进入社会主义，党的八大将怎样把握这次历史机遇呢？

八大上确立的八大路线，它比《论十大关系》更丰实、更具体、更全面。

1957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小规模罢工、罢课和退社风潮，知识界并不平静。爸爸发表了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但是知识界有的人说了一些过头话。这使爸爸无法平静地接受，接着就有了全国上下的“反右”斗争。

爸爸的心理随着政治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仍然尖锐。随着“反右”斗争的大规模展开，他思想的偏差就发展起来了。

他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结论，开始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种思想随着他的

莫斯科之行而走向了极端。

人所共知的 1958 年大跃进带来了多么可怕的经济后果，有那段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其惨痛的程度。

一天，爸爸的卫士马维从家才回来，带来一个窝头。这个窝头又黑、又硬，掺杂了粗糙的糠壳。爸爸费了好大劲才掰开窝头，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不一会儿，爸爸眼圈红了，泪水流了下来。

马维说：“乡亲们就吃这个东西！”

爸爸叹了一口气，他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每人尝一口，他声音哽咽地说：“吃啊，这是农民的口粮，是种粮人吃的口粮。”

爸爸为此陷入了痛苦之中，他常喃喃地说：“怎么是这样呢？翻身了，人民当家做主，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嘛。”

爸爸不能允许花太长的时间来改变中国的面貌，于是，“大跃进”就走向了更远的歧途上去了。

我和令华结婚时，爸爸是从庐山会议上赶回来的。

爸爸在那次会议上是准备纠“左”的，但由于彭德怀拿出了“万言书”，结果纠“左”又转向了“反右”。

1960年12月26日，是爸爸67岁的生日。

爸爸坐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眼望着案头堆放的反映各地困难和实情的报告，心情十分沉重。

他点燃香烟，吸得很深，然后重新靠在沙发上，工夫不大，他便被一团弥漫的烟雾笼罩了。

烟雾中，传出爸爸一字一板的声音：“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学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那天下午，爸爸和这几个人一起围在桌前吃饭。没有酒、没有肉，只是多放了一些油。爸爸的筷子伸向菜盘，没等夹菜就又放下了，他用目光扫视着他们。

“现在，老百姓遭了殃。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爸爸的声音迟缓沉重，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听者都无声地点头，神情肃然。

爸爸用手指指叶子龙，又指指李银桥：“子龙、银桥，你们下去，不去山东，改去河南，广泛地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反映给我。”

……

这一顿饭，爸爸没吃几口就放下了筷子。他吃

不下去，别人也吃不下去了。

夜里，封耀松用电炉子替爸爸煮了一茶缸麦片粥，劝爸爸喝下去，然后劝爸爸睡一觉。

“睡不着啊。”爸爸悲凉地说，“全国人民都遭了殃，我哪里睡得着啊！”

爸爸从他的亲身经历中深深了解，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成功。所以，无论是在长征路上，在陕北，还是在全国解放后进北京，他从没有忘记人民群众。在对我们的教育中，更是强调要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依靠群众，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群众，尤其是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爸爸更是念念不忘人民群众。

当年，周恩来伯伯曾难过地对一些干部讲：全国人民生活困难，主席落泪了，他不吃肉，不喝茶。……困难时期，爸爸确实如此。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爸爸那开朗、豁达的性格像是有些变了，变得寡言少语，我们也很少听得到那乐呵呵的笑声了。

爸爸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他常常是独自一人在那里久久沉思。

平时，爸爸最爱吃猪肉了。为此，周伯伯也曾多次动员爸爸吃一点猪肉，爸爸用极低沉的声音说：“有多少人民群众连野菜都吃不上，我怎么能

忍心去吃猪肉呢？我咽不下呀！你不是也不吃吗，我们都不吃。”

爸爸的生日清冷寂寞

说起生日，爸爸从来不主张搞什么祝寿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家里人和工作人员一起聚聚。我的记忆中，爸爸的生日好像没有大操大办过。

解放初期，我到爸爸身边的日子还不算太长，对爸爸的一些生活习惯也不太了解。因为爸爸的生活习惯与我们不同，他一般情况都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所以我们参加爸爸生日活动的机会也不是很多的。

1952年12月26日，是爸爸59岁的生日，工作人员在餐桌上摆好了与往日一样的腐乳、酱菜、辣椒三碟小菜和一碟牛肉。桌上没有放往常的二米饭，也没有摆炒菜，在白色的搪瓷盆里盛着刚刚煮好的面条汤。桌子上还摆着高脚小酒杯，里面盛着半杯红葡萄酒。

爸爸醒来走出卧室，举着酒杯对王鹤滨医生说：“王医生，来！干杯！今天是我的生日。”

“祝主席身体健康。”王医生与爸爸碰杯。

爸爸说：“王医生，咱们不祝寿，但可以吃汤面的，是吧？”

“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

“人活百岁就很不得了喽，哪有什么万岁呀！”

爸爸说完跟王医生都笑起来。

这就是我爸爸 59 岁的生日“宴会”。他只与一位身边的医务人员同吃了一顿汤面就算过去了。

1953 年 12 月 26 日，是爸爸的 60 大寿，照理，应当好好祝贺一番，结果呢，爸爸请了所有的卫士们一起吃了顿汤面，共同度过了老人家的 60 大寿。

照风俗，谁家的子女都会为老人祝寿过个生日。我们记着 12 月 26 日这天，工作人员也记着这一天。到这天，就总想到给爸爸搞个简单的纪念活动：一是让爸爸也有放松和休息的机会；二是也表达一下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一份心意。但不管我们说得怎样简单，也都被爸爸拒绝了。

爸爸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不搞个人做寿。爸爸对为自己过生日毫无兴趣。每逢生日这天，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顶多吃一碗长寿面，这个生日就算过了。

有一年的 12 月 26 日，工作人员事先未征得爸爸的同意，就高高兴兴地做了祝寿的准备，为爸爸办了个稍稍像点样子的生日小宴。结果这一片好心，反遭到爸爸的严厉批评。无论怎样解释、劝说

都没有用，爸爸就是没有参加这次的生日宴席。

我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还真的就是不给大家“面子”。

1959年12月26日，是爸爸66岁生日。按照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66岁应该做大寿，这是个吉利的寿日，也是一生中的大寿。为了吸取以往的教训，这次大家觉得要办得稳妥些，就事先请叶子龙、李银桥两人去做爸爸的工作，要想方设法征得他同意举办66岁生日活动。

爸爸这次还真同意了。工作人员就里里外外地忙活起来。

时间虽是冬季，可我们心里却是喜气洋洋的。大家在欢笑声中忙碌着，真有一番过节的热闹气氛。

因那天，除了我们家里人之外，工作人员都在。而且还带来了他们的子女。因此，厨房的师傅就准备了两桌比平时要稍丰富些的菜肴。准备了白酒、红葡萄酒，还特意做好了长寿面，就在中南海为爸爸举办了66岁的生日宴席。

按照爸爸的事先指示，我们没有去麻烦，也没有去请中央任何一位领导同志来参加祝寿宴席，只有我们和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子女欢聚一堂，举杯为爸爸祝寿。

饭后，爸爸要同我们和所有工作人员及其子女一起合影留念。大家一听说要照相，都非常高兴地聚拢来，欢欢喜喜地与爸爸照了相。

这天，爸爸特别高兴，尤其是喜欢和孩子们说笑、逗乐。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为我爸爸毛泽东办的一次最“豪华”、最“高档”的生日宴会了。

这欢乐的场面，热闹的气氛，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留在我的记忆中。

再后来，就连 70 岁、80 岁生日的时候，爸爸再也没有让我们为他摆宴祝寿。

1973 年 12 月 26 日，是爸爸 80 岁大寿的日子，按说是应该好好庆祝一番的。中央一些领导人、爸爸的卫士、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曾多次提出要为爸爸做寿。但都先先后后地被爸爸谢绝了。

爸爸不是说：“穷人家从来不做寿。”就是说：“做一次寿，寿星就长了一岁，其实就是少了一岁，不如让时间偷偷地走过去，到了八九十岁时，自己还没有发觉。”

就这样，人们左说右劝，爸爸却左推右挡，免去了一次又一次的贺寿。

可这次不同了，我记得当时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国家的元首、政府的首脑人物、马列主义政党及其

领袖人物都纷纷给爸爸发来贺电、贺信，祝贺爸爸的 80 岁大寿。

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金日成主席，还特地派专人送来寿礼。

而国内，到处都是静悄悄的，一点祝寿的动静都没有。爸爸只像往常生日一样，与工作人员和家人欢聚一堂。爸爸接受了我们这些晚辈的祝福！

爸爸 80 岁的生日，就这样过去了。爸爸又过了一个清静的寿日。

1975 年 12 月 26 日，是爸爸最后一次过生日。在中南海的家里，往常是冷冷清清的，今天倒显得热闹起来了。

这天，我和妹妹李讷都回来了。尽管我们平时很少回家，很难回家，也很难见到爸爸。但 12 月 26 日这天，我们无论怎么忙总是要抽空回来的，要来看望爸爸。

这天，我又听到爸爸乐呵呵的笑声；这天，我又听到爸爸呼唤“娇娃”的声音。

我们围在爸爸身旁，说着，笑着。爸爸看来很高兴，因为爸爸又听到了女儿的祝福声。

爸爸与江青之间

江青是 1937 年末来到延安的，1938 年与爸爸

结婚。关于她的情况我不想多说了，至于她在上海的演员生涯以及后来嫁给爸爸的情况很多人耳熟能详。

上一代人的感情纠葛已是历史，我并不在乎她是我的后妈，甚至我也不在乎她对我如何如何不好。

作为下一代人，我只关心她和我爸爸之间的事情，作为爸爸的夫人，她应该给爸爸带来幸福，最起码能让爸爸在晚年感到充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爸爸娶江青时，45岁，那时江青24岁。婚后不久，江青从鲁艺调到了爸爸的身边，任军委档案秘书。听爸爸说，他们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住在三口新窑里。窑洞在山脚下，砌上了石头，刷上白灰。窗门是木制的，糊上纸，可透进光线。门外有一小块碾过的地，摆着简单的桌子、石凳。三间房分别为起居室、爸爸书房兼卧室、江青卧室。地上铺砖，桌椅是木料的。房子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灯。

开始爸爸和江青过着平常的生活。

江青的主要工作是照料爸爸的饮食起居。不久李讷妹妹出生了，江青几乎不露面了。

在40年代至50年代初的10年里，江青没有

什么惹人注目的活动，她只在党内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1950年7月11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委员是周扬、陆定一、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田汉等文艺界名流，江青挤进去，当了个委员。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报上只见她以“李进”之名出现过两次。一次在1951年5月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时候，《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组长袁水拍、冯牧之等几个人，江青以李进的名字列于其中。又一次是1961年9月9日爸爸写的一首七绝中，题目是《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1963年公开发表。

江青喜欢搞摄影，这项活动是从1949年夏在苏联养病时开始的。1971年七八月合刊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同时登出她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为总题的13张摄影作品。

建国以后前几届全国人大或政协会议，江青都不是代表或委员，一直到1964年召开的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山东代表团里才出现她的名字。

江青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她以治疗为名，曾前后四次去过苏联，而回国后，一直巡回于全国各大城市之间。

我初到爸爸身边时，正好是江青第一次从苏联

回国。这次去苏联除了查病外，还带了李讷去割扁桃腺。回国时，正是秋天。

1952年，她去了苏联，这是第二次赴苏，因为参加了武训历史调查下乡两次，把她累坏了，得了胆囊炎，去苏联做引流手术。1953年她返回国内。

1955年7月，她第三次赴苏。

总之，她曾四次去苏联。在苏联除了住医院和疗养院外，都住在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别墅里。随行的有医务人员、厨师、警卫员、司机等。休养的日子里，她主要是看欧美电影，或叫人陪着打牌或跳舞。她吃腻了俄国菜，就要从中国国内用专机运蔬菜去。然而，她还不称心，认为长久以来没得到苏联高级领导的接见，是对她的不尊敬。

这时，江青在苏联开始从事外事活动。刘少奇访苏时，苏联方面为了表达对爸爸的尊敬，也请她参加了会见。那一年10月，爸爸访苏，准备向斯大林送一些寿礼，礼品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去办理，但江青瞎指挥，她提出，一定要带山东特产。于是，除湘绣、瓷器、茶叶、竹笋外，大白菜和大萝卜几乎占了一车皮。

从此，江青开始露出了她介入政治的兴趣。至于她好享受，在全国各地造“行宫”的行径就不用

说了。

1954年的9月中旬，她曾忽然来到《人民日报》，找周扬、邓拓、林默涵谈话，透露了从爸爸那里听来的消息：爸爸十分赞赏刚刚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两个“小人物”即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全文。

周扬并没把这个意见放在眼里，根本没有刊登。

10月16日。爸爸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署名的信，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息》，支持了李希凡、蓝翎。并指出，有人要求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但未能实现。

江青胜利了一次。

1955年到1962年，江青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两个空衔，实际上一直休息。

1961年，爸爸写了那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1963年公开发表后，成为她进军政界的资本。

1962年4月，她约见了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的严重问题。然而，部长们

并不在意她的警告。

这时，上海的柯庆施发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江青大喜过望，就跑到了上海，表示支持柯庆施。

1965年，江青与柯庆施、张春桥在上海聚首。不久，署名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这项活动是江青秘密策划，并没得到爸爸批准，但她口口声声地说得到了爸爸的允许。

江青已深切地体会到借着爸爸的威望，她可以为所欲为。

后来爸爸在接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时，说得非常清楚：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写我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这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狂波巨澜，成了“文革”的引爆点。

1966年5月4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成立“中央文革”的决定，江青成了副组长。1967年，随着人员的调整，“中央文革”成了王、张、江、姚的天下。

应该说，“文革”的前期和中期，爸爸对江青还是比较信任的。正因为如此，在1969年“九大”

时，江青平步青云，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但是，林彪事件出现后，爸爸对江青一伙失去了信心。

1973年，爸爸重新启用了邓小平，让他分担周恩来总理的工作。邓小平的复出对江青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

1973年3月，政治局开会讨论派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根据爸爸的意见，决定让邓小平去。而江青坚决反对。

江青这时已不再顾忌爸爸了。

知道这一个情况后，爸爸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3月27日

爸爸这时开始直接批评她了，并对她越来越不满。

第二年，江青要见爸爸。工作人员通报后，爸爸并不同意见，只让人带出一封信。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话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81了，也不体谅，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1974. 3. 20

这几年里，爸爸已不再愿意见江青，因此他规定，见他必须事先同中央办公厅申请。

爸爸已经伤心了。

一年前，江青被批准来见爸爸，没想到她是为了要钱，爸爸给了她3万元。爸爸伤心地流下了眼泪，他悲凉地说：“她看我身体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要夺我的遗产稿费了。”

江青对爸爸一点也不关心，甚至都不了解爸爸的病情。

当她知道爸爸病了以后，就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她还说爸爸身边工作的人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

领导同志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作为爸爸的女儿，我为爸爸感到凄凉。应该说，身为毛泽东主席的夫人，又是政治局委员，她应该为爸爸健康付出辛苦。她非但不如此，还给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扣上这样令人心寒的帽子。

1974年7月17日，爸爸主持了政治局会议，当着政治局委员的面，公开批评了江青。并点了“上海帮”的几个人。10月4日，邓小平出任了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江青的女皇梦开始进入破灭的境地了。

在爸爸的生活里，江青是什么呢？

在爸爸的晚年里，她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对爸爸尚且如此，妈妈的境遇就更不用说了。

妈妈在上海一直没有安排工作。江青开始四处造谣，诬蔑妈妈没有文化、不懂政治，是精神病。后来干脆让人把妈妈看起来，不许任何人接近。记得有一年在青岛，我陪妈妈在那儿疗养，不巧江青也来了，我们就必须走开。

在我和妈妈、爸爸的关系上，江青一直是一个沉重的影子。

爸爸怎能不在孤独中度着晚年。

爸爸悲凉地说：娇娃，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

爸爸晚年的生活是孤苦的。爸爸的内心是孤独、寂寞的；爸爸的内心也是很矛盾、很复杂的；爸爸像所有的普普通通的老人一样，易怀旧、易忆往事；同样是喜欢有自己的儿女亲人在他的周围，希望度过一个欢快的晚年，但又因为国事、家事的缠身，使得爸爸的内心感到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无名的苦恼和烦躁。

“文革”中期，一次偶然的机会有，我见到了爸爸。这次正好遇上爸爸休息的时间。我们父女俩在一起的时间比往日要长了些。

爸爸除了问问我的工作、生活、孩子之外，就很少再说话。我俩是长时间地相对无语。

“为什么走？当初为什么要走呢？”爸爸望着我，说话的声音很低很低，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自言自语。随后，爸爸顺手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

我俩又是长时间的无语。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爸爸的话。我能告诉爸爸说我是被迫写申请搬出中南海的吗？我能问爸

爸，您看过我的申请报告吗？我能问爸爸，您当时怎么就不和女儿谈谈话呢？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们走了，还会常来看望您！”我也曾这样对爸爸承诺过。

现在爸爸又提起“为什么走？当初为什么要走呢？”说完之后，又是长时间的无语，爸爸仍然在慢慢地吸他的烟……

但从爸爸的神态中看得出，爸爸的心在伤悲，爸爸又在忆那个遥远的当年。

我明白了爸爸这句双关语。

爸爸想起了妈妈，想起妈妈离开延安，离开他的那段痛苦的往事。

本来，我是不该再走开的，就因为我不愿意受江青的闲气，因为我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按照我们那个年代的思想标准来要求自己，表示自己要刻苦锻炼，要努力改造思想，不给组织和领导增添麻烦，不给家长增加负担，这是一种积极的进步的思想表现。爸爸一向都很支持我们的进步要求，鼓励我们自己独立生活。我当然知道，爸爸爱我，但爸爸从不娇惯我，就是再舍不得我离开，爸爸也不会阻拦我搬出去独立生活的。

结果，我被迫地搬出了中南海。

离开中南海，我见爸爸的次数真的是越来越少

了。尽管我时时想抽空儿回去看望爸爸，可爸爸忙于国家大事，忙于世界大事，有时去了见得着。有时去了，等很长时间也见不着。不少次我都是满怀希望而来，又带着失望独自返回我的家。

我感觉到了，我们父女俩往日那种亲密无间的父女情，明显地不如过去了。

当我离开爸爸的生活区时，爸爸时时惦记着我，惦记着令华，也时时惦记着我的宁宁——爸爸的小外孙。一有机会，爸爸还是抽空儿与我们相见，还特别喜欢逗小宁宁玩耍……

如果我们有几天时间不去看望爸爸，爸爸会漫步到我们家来看看我们，问寒问暖，详详细细地了解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情况。

我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忙家务，本来就体弱的我，被这些事情缠住，天天早出晚归。想时常看望爸爸，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被迫搬出中南海以后，再见面的机会就很少甚至没有了。

像这样与爸爸常见常会的日子真的就是一去再也不复返了吗？我有时会这样想，我有时会常常这样地问自己。

爸爸是个很重情感的人。到了晚年，爸爸更是重情，不过这时的重情，已经不像当年那样激动地

把感情不加任何掩饰地表露出来了。此时，爸爸是上了岁数的人，他的感情显得很脆弱，他时时有深深的感叹。

我们父女俩难得见面，所以相见时我总是希望爸爸能快活，能像往年那样，敞开心扉地谈过去，说现在，道将来；谈生活，说工作，道古论今。我总是希望爸爸能开心，能像往日那样，听到爸爸乐呵呵的笑声；我总是希望……

如今，我住在外边，虽然与爸爸同住在北京市，共居在西城区，一道红墙虽不算高，但要越过这堵墙，随时去看望我的爸爸，这实在是太难太难的事了。

普普通通人家的儿女，也是成家后单独生活的，可他们父母、兄弟、姐妹随时都可以见面；随时都可以去看望父母。他们全家团聚，想聚就聚，想见就见。

可我见爸爸怎么就这样难?!

爸爸真的就不想我吗？不会的。爸爸是爱我的，这一点，我这辈子都是坚信的。

“文革”期间，爸爸曾让妹妹李讷到单位看过我，不久因为我很长时间未回去看爸爸，爸爸又让妹妹李讷来看我。妹妹带给我的是爸爸的关怀，带回去的是我平安的消息。

爸爸晚年，疾病缠身，身体的衰老，行动的不便，对爸爸来讲，这确实确实是十分痛苦的事。爸爸把孤苦深深地埋在心里。爸爸再也不愿意让我看到他那颗伤痕累累的痛苦的心！

爸爸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

爸爸的内心世界渐渐很少很少再向我敞开来。同样，爸爸把思念女儿、爱女儿的那颗心包起来了。

那“娇娃，娇娃”的呼唤声，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

虽然爸爸平时不说，但他内心是痛苦的。至今，那些曾在爸爸身边工作过的人，还时时提起爸爸常常爱说的那句话：

“我的儿女们一年见不到几面，你们倒是常跟常随，他们比不上你们跟我亲呢！”

是的，他们与我的爸爸朝夕相处，日夜伴随，他们细心地服侍着爸爸，耐心地照顾着爸爸，精心地护理着爸爸。在他们眼里，爸爸是伟人，是领袖，是人民的救星，是共和国的缔造者，是……

为爸爸，他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爸爸又是一位慈祥的老人，爸爸把对子女的爱、对子女的情，又全部毫无保留地倾注到他们的身上。

爸爸像对子女一样，对工作人员小到生活细节大到婚事，都看在眼里、都装在心上。凡事他都要关心。

人们都知道，卫士长李银桥和他爱人韩桂馨跟随爸爸多年；人们也都知道，他和韩桂馨的婚事，是爸爸给促成的。

这事儿说起来，还挺有意思，我当然是后来才知道的。

当年，李银桥接到家里来信，信上说给他介绍了一位对象。他自己一时定不下来，想请爸爸给他出个主意，参谋参谋。

因为他和韩桂馨同在爸爸身边工作，接触较多，彼此也都有点意思，但谁也没说。这事当然瞒不过爸爸的眼睛。所以，当他找爸爸给他拿主意时，爸爸对他说：“银桥，你怎么不去问问小韩呀！她比你文化高，你就请她帮你写个回信好啰！”这一点化，谁心里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呀。当然，他们结婚是后来的事情了。

爸爸的贴身卫士封耀松，跟随爸爸跳舞时，认识了一个文工团的同志，两个人开始交往，谈了不久就吹了。后来又与一文工团员交往，也未成。爸爸说：“速胜论不成，那是要失败的，还是搞持久战好哇！”

说笑声中透着爸爸对卫士的情、对卫士的爱。

爸爸不是光说说就算了。爸爸是真心诚意地关怀他们、爱护他们，当然也就满心希望他们好，希望他们工作顺利，生活幸福。后来，爸爸还真是亲自托原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同志当红娘，为封耀松介绍朋友，使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最近，跟随爸爸多年的卫士李连成还深有感触地说起当年在爸爸身边的一件难以忘怀的小事：

1959年秋初时节，在广州时，他就因为陪江青打扑克牌出错了一张牌，惹得江青铁青着脸，瞪着眼睛，火冒三丈地叫起来。

他当时一句话也没敢说，不说话，事也不能算完了，惹了江青那还了得！结果他被江青“罚站”。他心里自然感到委屈。

等解除“罚站”后，他哭了。他哭得好伤心。他想：我要是在主席身边，不用说是为玩，就是我工作中出现任何差错，主席是绝对不会这样对待我。他实在太委屈了，就给卫士长李银桥打了长途电话，把他心里的委屈一古脑儿地倒给了李银桥。

后来，李银桥来电话要他立刻返京。他当晚就乘火车返回了北京。

原来是李银桥把他的事告诉了爸爸。爸爸听了后沉默一会儿说：“连成是代我受罪。叫他回来吧！”

不要再为江青服务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呀！让她自己呆着去，看她还跟谁耍威风！”

是因为爸爸发话了，李连成才回到北京，又回到爸爸的身边。

爸爸见到他说：“江青对你发脾气，你受委屈了。就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跟她计较了。你就给我这个面子吧！”

听了爸爸的话，他的心里好不是滋味，于是真的当着爸爸的面哭了，像个在外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回到了亲人的身边一样。他得到了宽慰，得到了保护，得到了慈父般的关心与爱。

李连成多像我的当年呀！只不过是他把委屈说给爸爸听了，我却把委屈深深埋在心里；爸爸对他是以语言来安慰，对我是以散步来宽心。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接受着爸爸的这种博爱。

想起来，我非常感谢这些在爸爸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们。他们日日夜夜跟在爸爸的身旁，照顾爸爸的衣、食、起、居；关心爸爸的冷暖、温饱。他们以自己的一颗爱领袖的心，温暖了爸爸的心。他们以对长辈的爱，代替着我们做子女的尽了晚辈的孝心，是他们以对老人的爱，填补了爸爸那孤孤独独、凄凄苦苦的心！

1976年的春节，爸爸是在悲伤与凄凉、孤独

与寂寞中度过的。我们兄妹三人没有去和爸爸团聚，没有去给爸爸辞岁拜年！据说也没有客人到爸爸身边来辞岁迎新。伴随着爸爸的，还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这是爸爸一生中最后的一个春节。爸爸像往常那样吃了点米饭和一点武昌鱼。这是爸爸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年夜饭。

爸爸身边没有儿女的祝福话语，也没有孙辈们的绕膝之乐。爸爸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着身边的工作人员。爸爸，此时爸爸在想什么呢？！

“放点鞭炮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爸爸这样说，兴许是在这静静的入夜时分，爸爸是听到了红墙外的鞭炮声响了，才对身边工作人员这样说，说完，他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1976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也可以说是个多灾难的年份：一月，人民的总理去世了；七月，人民的老总朱德去世了；七月，唐山地区的大地震；九月，人民的领袖、我的爸爸毛泽东去世了……

有时候，我想起就常常问自己：如果我不离开爸爸，不离开中南海；如果我一直守在爸爸的身边，这样，爸爸除了得到工作人员的关怀外，再加上子女的照顾，爸爸的晚年也许过得会快活些，或

许更长寿……

我知道爸爸爱我。他非常想念我，想见到我。爸爸始终在惦记着我，但却见不到我。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见爸爸的心越来越迫切，但也越来越难见到爸爸。

自1971年以来，爸爸的身体就一直不太好。但具体情况究竟如何？这是党和国家的机密。虽然是爸爸的亲生女儿，我也无权过问。所以我也从不破坏党的纪律，去打听我不该打听的事情。

爸爸是抱病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的。会后，爸爸就病倒了，病情还比较严重，时间也拖得较长。我知道此情况后，抽空到中南海的家里看望了爸爸。

一进屋，我就看到爸爸躺在床上，我轻轻地疾步走到爸爸的跟前，又轻声轻语地叫了声：“爸爸，我看您来了……”我强忍着眼泪。

“娇娃，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以后要常来看看我呀！”爸爸说着拉着我的手，望着我，那眼神里充满着怜爱之情。

我的心里又是一阵酸楚！这是我的爸爸在呼唤我。我含着泪点了头，算是对爸爸问话的回答。我真不知道，此时我该说什么好。我把脸扭向一边，悄悄地把泪水擦去。我不想让爸爸看到我流泪而伤

心。

这次，我深深地感觉到，爸爸的心里很孤独，也很寂寞。爸爸是人不是神，爸爸也和所有的普通老人一样，希望得到家里人的关怀，盼望得到子女的敬爱、温暖、慰藉，爸爸同样希望能得到人间的天伦之乐！

这一切对普通老人来讲是很平常的事，可我的爸爸却没有得到。至今想起来这些事，我的心里都感到绞得疼痛了。我为此感到内疚。

爸爸走了，他走的时候，身边竟没有一个子女

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确实很少很少能见到我的爸爸。人们传说的只有三次，但其中一次绝不是在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上。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

1976年，也就是我的爸爸从病危到去世的这段时间里，我只见过爸爸三次。

1976年夏天，那时，我正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保定。

一天，突然接到毛远新的电话，我问他有什么事？他只告诉我爸爸病重，要我回来看看，除此之

外，再没有向我透露任何有关爸爸的消息。我就立刻从保定赶回北京。

当我急急赶到中南海时，爸爸刚刚被抢救过来。

我刚迈步想走到爸爸的身旁，仔仔细细地看看爸爸时，就被江青给拦住了，她不许我靠近爸爸，只许站在那儿离远看着。

我看到爸爸的脸色黄黄的，还带着氧气罩子，闭着双眼，静静地像熟睡般躺在床上。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1975年12月26日见到爸爸至今也就是半年多点的时间，怎么一下子就病得这样厉害，病成这个样子？那时，爸爸虽然行动不太方便，可也没像现在这样呀！这哪像我们身材高大魁梧、平时谈笑风生的爸爸呀！

我望着爸爸，泪水禁不住地夺眶而出。我又要向前迈步，我要好好看看我的爸爸。

也许是我的举动被站在一旁的江青察觉了。她不冷不热地说：“主席已经抢救过来了。你走吧。”她想赶我走了。

“这个时候，我应该守在爸爸的身边。”说着，我一动不动，我不肯走，也不能走。

“你呆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

吗？”江青又冷又硬地甩出这样一句不近情理的话来。她还是要想法子把我赶走。看着我站着不动，没有走开的意思，就又说：“你要这样，以后再也不让你来看了。”

听话音，我来看爸爸好像是她对我的恩赐一样。江青的这种腔调，江青的这种脸色，二十多年来，我听多了，看多了，受多了，也习惯了，去她的吧！这时，为了我的爸爸，我何须顾那么多呢！

“怎么啦！我看望我的爸爸，还需要你让吗？”我强忍着心头的气愤加重了两个“我”字的语调，回敬了她一句。

后来，汪东兴等看到这种情况就动员我先回去。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了爸爸的健康，我咬着牙，忍着哭回到了家。

到家以后，我总是坐卧不宁，总觉得心里有事儿放不下。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是爸爸的长女，在爸爸病重的时候，我竟然被江青剥夺了守候在爸爸身旁的权利，不能去亲自照顾爸爸，不能尽女儿的孝心，我能不伤心、不痛苦、不痛哭吗！

这是我在爸爸病危时，第一次见到爸爸的情形。

我的心总也放不下，我总在惦记着病重的爸爸。总在想：爸爸现在怎么样啦？好些了吗？我想

爸爸。不，我不能坐在家里等着消息，我要去，我要去守在爸爸的身旁。我起身就想走，再一想，我没有给中央办公厅打招呼，我怎么能进中南海呢？我的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

我曾几次到中南海的门口，我向警卫诉说着我要见爸爸；我恳切地求他们让我进去……我真是毛泽东主席的女儿，我不是假冒的……没有用，我费尽了口舌，还是没有让我跨进中南海的大门一步，还是没有越过这道红墙。

一天，我从一份中央文件中看到爸爸病危的通报。我的头轰的一下子大了起来。我不顾一切地又匆匆来到中南海的门口求见爸爸。开始，警卫没有答应，经我一再恳求，他答应去向领导通报、请示。我坐在门口的会客室里等候着，我急得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站起来向门口望望，那嘀嗒嘀嗒的钟声都快烦死人啦！

这门如今怎么就这样难进！这红墙如今怎么就这样难以跨越！等呀，等呀！这时间过得可真慢……

来了，来人了！我心里一阵高兴。这次总算让我进去了，我总算是可以见到我的爸爸了。我边走边想着爸爸的病是什么情况，心里还有点埋怨。通报上说病危，肯定是病得不轻。为什么不赶快找医

生给检查，找医生给治疗，找医生……哎，我这样想，为爸爸的身体担忧，想着快请人给爸爸治疗。

又一转念，谁不为爸爸的身体健康担忧呢？爸爸身边的医生、护士、工作人员，谁都会尽心尽责的，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病人，这是人民的领袖。

我总算是见到了爸爸，更庆幸的是这次没有碰上江青。这个时候，她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样更好，她不在场，这是我巴不得的事，这是我们父女俩最好的一次见面的机会！

我望着爸爸仰卧在床上……我又一次轻轻地疾步走到爸爸的跟前，又轻声地轻声地叫了声：“爸爸，我来看您……”望着爸爸那憔悴的面容，望着爸爸那微微闭着的双眼……

爸爸听到了，听到了我的声音。爸爸微微地睁开眼睛。看看，看看，又闭上眼睛，不一会儿，爸爸又微微地睁开眼睛，脸上出现了一丝只有我能察觉到的笑容。爸爸认出我来了！爸爸认出我来了！我激动，我痛心。此时此刻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爸爸无力地伸出那颤颤的手。我明白了，爸爸又要像往常那样拉我的手啦！那双曾是温厚柔软的大手，如今变得枯瘦，那手上的筋都看得清清楚楚。我赶紧把自己的手搓了搓，让手发热后，轻轻地放在爸爸的大手里。

爸爸的手，依然还是那么大；爸爸的手，依然还是那么温暖。我的手，在爸爸的手中感到了爸爸那微弱的血液的流动，那么弱、那么弱。爸爸的手动了动，是想把我的手握紧、握紧。我感觉到了，爸爸想握紧我的手。但却失去了往日的力气，爸爸的身体太弱了……

“娇娃，你来看我了？”我俯下身去，听到了爸爸唤女儿的声音。爸爸的声音是极微弱的、极微弱的，但我听到了。因为我的血管中流淌着爸爸的血！我听到了。我冲爸爸点了点头。

“娇娃，你今年多大了？”爸爸突然问起我的年龄来。

“爸爸，您忘啦！我今年 39 岁了。”我轻声地回答着爸爸。

“娇娃，不对，你今年 38 岁，你是 1937 年……”爸爸说着，又微微摇了摇头，不再说话。

爸爸病得这样厉害，还能清楚地记着我的出生年月……我的泪水又一次涌了出来！

爸爸问着。我回答着。我多么想还像过去那样，父女俩敞开心扉说着、笑着，听着爸爸那乐呵呵的笑声；我多么想还像过去那样，父女俩坐在一起，听爸爸给我说古论今……

爸爸已经病得不能进食了，只能鼻饲，就是说

根据病情和保证营养的情况下，由医生配方后，从鼻子里插进管子，这样插一次鼻饲后，再把管子抽出来。下次喂饭时，再同样插进去。这种治疗是很费事的，病人也是痛苦难忍的。

我去的时候，爸爸刚刚做完鼻饲，他显得特别疲劳，体力格外衰弱。爸爸不再说话，他无力地闭上了眼睛。爸爸的手也渐渐松弛下来。我知道，此时爸爸已经很累很累了，爸爸需要休息了。也就是说，我该走了。我望着爸爸静静地躺在床上，再没有和爸爸说一句话，就轻轻地、悄悄地，退了出来。

我离开爸爸的卧室，离开了爸爸。我又一次迈出了中南海的大门。我回头望望，这座我曾经走过多少回，走过多少年的大门；我回头望望，这高高的红墙，我曾经望过多少回、多少年的红墙。这高高的红墙，一次又一次地把我阻挡在外，使红墙里的父亲不能与红墙外的女儿相会相见，使红墙里的父亲在孤独中凄苦地生活，使红墙外的女儿在思念中苦熬！

我拖着似灌了铅的双腿，拖着沉重的双脚，每向前一步我都要回头望望，望望红墙。因为那里面住着我日日夜夜思念的爸爸。就这样，走着，望着，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忍着绞心般的痛苦回到了

我的家里。

我感到累极了，累极了。我真想躺下来静静地休息一下，歇歇脚。我怎么都静不下来，脑子里总闪出病中的爸爸，眼前总是浮现出那憔悴的面容……

如果细算的话，这是我第二次见病危中的爸爸。时间是1976年9月8日。

多年后，我有机会看到了1976年9月8日的护理记录时，我才知道，是在多种疾病的袭击下，爸爸病倒了。

现将记录摘录如下：

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

零时零分：体温 36.9℃，脉搏 103 次/分，呼吸 21 次/分，血压 170/80 (mmHg)。看文件 14'。按摩双下肢，腹部人工辅助呼吸，有些微汗，生理盐水喷口腔六下。

零时五十分：呼吸 24 次/分。看文件 10'30"。辅助人工呼吸，按摩下肢。

一时十分：看文件 15'30"。

一时二十九分：血压 150/70 (mmHg)，T 波倒置，ST 段压低

0.15mV。(注：表示心肌缺血。)

一时四十分：主席自己使劲。马上去看，发现尿床约 200ml。

一时四十五分：血压 180/80 (mmHg)。看文件 10'。

二时零五分：脉搏 116 次/分。看文件 9'。爽身粉擦大腿。

五时十六分：有轻微紫绀。(注：表示缺氧)尿床 200cc。

五时五十分：换枕头及耳枕。看书 7'。

十一时十五分：体温 37℃，脉搏 102 次/分，呼吸 26 次/分。双手双脚发凉。

十一时二十一分：嘴唇紫绀明显。做呼吸器很短，不要。手指甲发绀。

十一时五十分：ST 段压低加深 0.3mV。(注：表示心肌缺血加重。)

十二时四十七分：看文件 21'。液体滴数速(度)调至 20gtt/分。(注：即每分钟二十滴。)

十三时十五分：ST 段压低 0.3mV。出现二个室性早跳连续发生(注：表示心肌缺血加重，并有一定程度的心律失常。)

十三时十八分：看文件 12'。

十四时零四分：口唇、手指甲发绀明显，给做呼吸器 12'7"。

十四时零八分：继续做腹部人工辅助呼吸。

十四时零九分：脉搏 106 次/分，呼吸 24 次/分。看文件 18'。

十四时三十五分：血压 160 次/65 (mmHg)。看文件 23'。按摩右上肢及双脚。

十六时三十分：ST 段压低 0.1 ~ 0.2mV，室性早跳一次。

十六时三十七分：看文件 30'。（注：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看文件。此后，病情进一步加重，插上鼻咽管。）

这就是那天病历的全部记录。这就是我的爸爸病危中抢救时的护理记录。爸爸，我又一次看到酷爱读书的爸爸，爸爸的一生与书结缘！

这一天，爸爸以最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搏斗与死神较量。记录中提到爸爸在如此困难、极度痛苦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多达十一次之多。即两个小时五十分钟之久。

他在进行抢救的情况下忍着剧痛去看文件，去看书。而当爸爸上下肢插上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时，这文件和书则由别人用手托着给爸爸看。

这就是我爸爸在病情极为严重时的记录。此时此刻，爸爸所承受的痛苦，我想是常人所不能承受和所不能想像的，在面对死神的威胁时，爸爸仍然像平时那样一心扑在国家大事上，一心用在了读书、看文件上，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啊！

那天见到爸爸后，我的心里就一直不安，真是度日如年。我总想打听爸爸的消息，想了解爸爸的病情，可这一切，都无从得知。我焦急，我不安……

第二天，也就是1976年9月9日这天，我正在洗漱，电话铃响起来，我赶快拿起电话，还未等我说话，电话中就传来对方急促的话音：“快点，准备好，十分钟后中央办公厅有车来接……”

我听到后，发愣了。我以平生最快的速度收拾好，刚刚喘口气准备出门看接我的车来没来时，有人敲门了。

“来了……”话音还没有落，我已经迈出房门了。

我坐在车里心想：也许是昨天经过抢救，爸爸

的病情有了好转，急于想看看女儿，想见到我，他们才派车来接我。我又在想，莫非是爸爸……我不敢再往下想。我的手在发抖。

来接我的人则一句话也不说。

汽车把我接进中南海。那大门，那红墙一闪而过。我都记不得自己是怎么走下汽车的，又是怎么走进爸爸的卧室的！我一步跨进去，急切想要见到我的爸爸。没想到，一切抢救工作都已经停止了，输氧的罩也已经撤掉了。我急了……

我面对自己深深敬爱的爸爸，我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

“爸爸，我的爸爸……”我肝肠寸断，悲痛欲绝地失声痛哭起来……

我不相信我的爸爸走了，我不相信我的爸爸就这样走了。我知道爸爸舍不得他的“娇娃”，爸爸也知道，他的“娇娃”离不开他！爸爸，我的爸爸他真走了，爸爸走的时候，身边竟没有一个子女……

人们告诉我，这是真的。因为亿万人民也在悲痛中以泪洗面；人们告诉我，我的爸爸，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是在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与世长辞的。

这是真的。

爸爸走了。我将我后来看到的抢救护理记录摘录如下：

1976年9月8日晚上二十时五分，紫绀明显，呼吸及用呼吸器几分钟后紫绀一度减轻。

二十时三十分，四肢发凉，神志模糊，紫绀又加重，用呼吸器后稍减轻。

二十时五十五分，神志更不清楚，经鼻腔吸痰时无反应。

二十一时四十四分，出现阵发性房性心动过速。

二十二时十五分，血压降至 80/58 (mmHg)。

二十三时十五分，进入昏迷状态。

二十三时四十四分，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

九月九日零时四分，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

零时六分：自主呼吸完全消失。

零时十分，心跳停止。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伟大的领袖，我

的爸爸去世了，享年 83 岁。

中国人民沉浸在失去领袖的悲痛之中。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人民大会堂设灵堂，祭奠我的爸爸毛泽东。

当我静心想想时，我真感到后悔。我 9 月 8 日见到爸爸时，为什么不多在爸爸身边陪一会儿，为什么不多跟爸爸说说话……我好后悔啊！谁承想，这竟是我同爸爸的最后一次见面；竟是爸爸最后一次握着我的手；竟是爸爸最后一次唤我“娇娃！”；竟是我们父女俩的最后一次……

结 语

叙述这些关于父亲的往事，我又一次深深地沉浸于那逝去的岁月里，但是，我已经能够平静地面对那重忆起的一切，包括我的辛酸与灵魂上经历过的痛苦。如此细致地回想父亲时，我已过花甲之年，那个出生于 1937 年的女孩子如今也已儿孙绕膝了。“六十而耳顺”，我们生命的河流淌至今天，还有什么理由能不平静呢！

1976 年至今，又是 23 年在弹指间过去，时间真是个伟大的东西，只有它才具有总结一切、梳理一切、收割一切的能力。

先是“四人帮”在中国垮掉，然后是妈妈贺子珍复出，她在阳光中将双脚踏在北京的街市上。尽管这时，我的爸爸已逝去几年，但是这对妈妈而言意义不凡，因为我们都从这件事本身看到了时间、

历史以及潜藏于人民心中的巨大力量。

江青开始在监狱中赎罪。她以自由为代价偿还在那不堪回首的10年间为中国、为那么多无辜的生命欠下的债。黑暗被阳光带走了并被收拢在一起，监狱是最适合她的地方。

我并不是为我个人而这样描述江青。我成为毛泽东的女儿这是命运之一，我是贺子珍的女儿是命运之二，在我身上背负着一段特殊历史条件下一个家庭的全部阴影，人无权也无意义去指责过去。

随着爸爸的过世，一段历史很快带走了那些年月并将之盛装起来。新的时代来了，这个时代不再有充满血泪的缠斗，我也不再有那样的压力与痛苦。我仿佛看见了爸爸正在一点点儿退远，逐渐地成为今天中国的背景。

每年的那一天，我都要去爸爸长眠的地方看看。他老人家躺在中国最中心的那片开阔的广场上，永久地睡眠。中国人民把他安葬在这里，而且瞻仰他的人人流如织，我因此而知道了爸爸不是孤立地被封存在历史中，他的精神仍在感召着经历过苦难的人们。

晚年的爸爸为中国打下了很深的烙印，他思想的局限致使他亲手缔造的国家又经历了十多年的痛苦，但是人不可能超越历史，超越自身而活在世

上，更何况那个时代不断变幻的世界风云深深地影响着他。

爸爸对中国是怎样重要，这不用我多说了，他曾经挥笔写下的文字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个纪念碑记录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岁月，而在那个岁月里，爸爸有很多亲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人民，这两个字一直深深地根植爸爸的心中。这两个字决定了他一生的奋斗及生活姿态。我骄傲地这样说，他在我们儿女的生命中也植下了这两个字。

爸爸给了我们什么，他给了中华民族自由与解放，而给我们的是做普通人，融于人民群众的可能，这使我们能尊重生活，尊重别人和自己的生命。

我的妈妈在 1984 年过世了，她带去了那段岁月最后的痕迹，我除了流泪外，几乎无话可说。她和爸爸的爱情故事太让人心灵震撼，而作为他们的女儿，我经历了那一切。

江青以自绝的方式在本世纪 90 年代最后一次向世人提示了她的存在。

她的死没给我带来一丝兴奋，相反，她又让我重忆了逝去的一切。在我的房间里，我面对父亲、母亲的遗像，反而陷入了深深的悲哀。

现在，我们在北京生活，离中南海、离爸爸仍然这样近。时光就这么静静地流逝着，爸爸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意识中。

人民也在怀念着他，韶山修了纪念爸爸的纪念馆，作为他的女儿，我捐了钱，我和广大群众的心是相连的，我们的怀念是共通的。

这些年来，也有素不相识的人来看我，他们带来的是对爸爸的怀念，显然，随着时光的流转，爸爸和他们的业绩已回到人民的心中，并重放其光泽了。

这就像树越高，人们就倾慕树根一样，爸爸为民族独立富强事业所做的一切将越来越被追怀。

我作为他的女儿，今天是普通百姓中的一个。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我都为此而骄傲。我觉得这是生活对我的偏爱。

每天在日常生活的洪流中经历着时间，我感到爸爸的精神越来越强地笼罩着我，像一盏灯，让我平静，让我真切地想到这一点：

这就是我的生活本身。